**毛泽东大传之**

**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1章**

**“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

**很！6亿5千万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

**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

**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话说1959年8月18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信，立即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第4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了南昌，又从南昌乘专列到了上饶，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调查研究。

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浙江公安厅厅长王芳说，主席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座谈一下。王芳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毛泽东，并召集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诸暨各县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这天下午，跟随王芳来到毛泽东专列上等候接见的5位地委、县委负责人都有点紧张，也非常激动。王芳向他们说明了见到毛泽东时和汇报工作时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5时许，王芳带着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的车厢，毛泽东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他见地委、县委的几位同志都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众人落坐后，王芳逐个将这几位地方领导人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一边在纸上记，一边问每位负责人年龄、籍贯，是在何时南下的？生活是否习惯？大家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紧张了半天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毛泽东问的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他见大家回答问题有些迟疑，显然感到不满意，就说：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

县委书记们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毛泽东说：

“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

有人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地说：

“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

有人汇报说，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饭菜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毛泽东说：

**“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

他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

“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

马蕴山搔了一会头，说：

“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

毛泽东说：

“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带上诸暨县委书记离开金华北上，进入诸暨境内，他又和诸暨县委、萧山县委的负责人们进行了座谈，了解农村和生产方面的情况。

此后，毛泽东到杭州小住，每天工作到凌晨，上午睡觉，下午起床后学习英语，然后到附近的丁家山散步或在亭子间里休息。

8月23日，毛泽东给陈伯达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4同志：

此版右角甘薯问题，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5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8月21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毛泽东 8月23日上午6时，倚枕

这一天，毛泽东到丁家山散步，他忽然听到啾啾的鸟叫声，循声望去，见道路两旁的树上挂着几个鸟笼子，立刻就明白了，心想，这一定是警卫处处长伍一的特意安排。

原来，杭州的警卫处长伍一为了给毛泽东增添一些雅兴，就在毛泽东经常散步经过的道路旁边和山坡上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又从园林部门借来了几个装有小鸟的鸟笼子，挂在道旁的林子间，以使幽静的山林增添几分悠闲的情调。

毛泽东让林克叫来了伍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指着树上的鸟笼说：

“你这个伍一，搞这个干嘛？旧社会玩鸟的都是公子哥儿。今后生活好了，别人搞了消遣消遣，我不反对，反正我不要！你马上把它给我拿走！”

伍一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吓得不敢做声。等毛泽东批评完了，他转身就去摘鸟笼子。毛泽东又叫住了他，指着路旁的花木，放缓了口气说：

“伍一呀，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你看这么多的空地多浪费。庭院绿化也不要光考虑到好看，形式的东西，中看不中用。你动动脑子，假如种些蔬菜、果树，既能开花结果，又有经济收入，群众减轻了负担，我们也能改善改善伙食，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伍一打心眼里敬佩眼前的这位领袖，他高兴地说：

“主席说的是，我一定照办。”

后来，伍一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领导警卫部队开出了不少地，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果树，还种上了不少茶树。

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他说：

“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

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就**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问题**，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10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10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30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10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我月底可回。

毛泽东 8月24日于杭州

关于反右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5%都不够，有10%。**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10%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10%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在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再说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就黄克诚8月22日承认错误的来信，在复信中写道：

克诚同志：

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毛泽东 8月24日

此时，毛泽东在杭州已经住了两天，他要乘专列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一路北上回京。由于北京的警卫干部要参加学习班，都提前回了北京，所以就只好由伍一带几个干部随专列护送。

途中，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他见伍一来了，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招呼道：

“这边坐。”

伍一落座后，毛泽东和蔼地说：

“这次警卫人员不巧都回北京了，只好辛苦浙江的同志，你代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伍一说：

“主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护送主席回京，同志们都感到很光荣。”

8月25日，印度巡逻队侵入中国西藏马及墩地区南端的朗久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部队猛烈开火，挑起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8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了北京，李敏和孔令华一块儿到车站接爸爸回家。

叶子龙受毛泽东的委托，负责招待伍一这几个浙江的护送警卫干部，他对伍一说：

“主席讲，你们中有些同志是第一次到北京来，让我请你们吃顿饭，饭钱主席付。下午再安排去参观。”

这天下午，毛泽东派他的专车送伍一他们去颐和园参观，伍一等人连连谢绝。随车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开玩笑说：

“主席安排的，谁敢不坐！”

车子开到颐和园门口停下来，执勤的民警见车子里只下来了几个年轻人，就有些不解，有一位上前问司机说：

“首长没有来？”

司机笑着说：

“首长的客人，也是首长。”

8月28日早饭后，毛泽东把李敏和孔令华叫到面前，商量他们的结婚日期及准备请哪些客人参加婚礼。李敏说，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和令华商量了，只请妈妈们。于是他们决定除了双方家长，要请蔡畅，因为李敏在苏联就见过她，回国后在哈尔滨、沈阳，和她来往多，比较熟悉。要请邓颖超，因为江青多次带李敏到她家里去，李敏自己也曾多次去过她家，比较熟悉。还要请曹轶欧，因为江青曾认为李敏的画画得好，请她给找人帮助辅导了一下。毛泽东又问：

“你是否要请宋庆龄来？”

李敏摇摇头说：

“我是晚辈，请那么多老人不好吧，还是别去麻烦更多人了。”

毛泽东同意了，但他又说：

“我的亲戚王季范在北京，他是一定要请来的！”

他们还决定，要请姐姐毛远志，要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要请李敏的同学和朋友。就这样，参加李敏和孔令华婚礼的客人，主要由他们俩提名，毛泽东做主定了下来。

李敏的新房，是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帮忙布置的。他们把新房布置得既简单、又典雅。房间里有书柜、写字台、桌子，还有3、4把靠背椅子，一张双人床。这些都是李敏从公家的仓库里临时借来的旧家具。床上摆放着两套白色被罩套起来的夹被。褥子是旧的。用白色的大床单盖着。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把被褥摆放整齐，又把地面打扫干净，把桌椅摆好。这就是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的新房。

8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在军队中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斗争的精神，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清查“反党俱乐部”，清除其影响。

8月29日午后，李敏和孔令华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了婚礼。

李敏的公公孔从洲正在北京开会，毛泽东一早就叫秘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

下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亲家孔从洲，紧紧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今天是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

孔从洲以前还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毛泽东。他见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初次见面的拘谨很快就消除了。

毛泽东一向不主张大操大办，他委托生活管理员张国兴帮忙采办了3桌酒席，每桌规定8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没有别的。

此时，江青在广州休养，李讷也没有在家。参加婚礼的客人除了孔从洲外，还有蔡畅、邓颖超、曹轶欧和姐姐毛远志，还有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王季范的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容，还有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处处长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机要秘书罗光禄等工作人员以及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等，一共30多人。

新娘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皮凉鞋。新郎穿的是白色衬衫，深蓝色西裤。他们的服装都是前些天一起做好的。

毛泽东拉着孔从洲向在座的客人们介绍说：

“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

毛泽东亲自为女儿主持婚礼。他特别高兴，举着酒杯为女儿和女婿祝福，说：

“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他还特意对女婿孔令华说：

“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

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还举着酒杯向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为大家劝酒。

李敏和孔令华双双举着酒杯，走到爸爸跟前，想说什么，可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向爸爸鞠躬，表达做晚辈的深深的谢意。毛泽东笑着，喝了好几杯酒。

李敏和孔令华又举着酒杯，走到孔从洲跟前，向他敬酒，献上儿女的敬意。

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客人们一起，共同举杯，为新人祝福。

新娘李敏、新郎孔令华一左一右拉着毛泽东的手，与参加婚礼的所有人一起在颐年堂门口合影留念。毛泽东又单独与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合影留念。

饭后，毛泽东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婚礼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留下孔从洲和王季范，到他书房里谈话。毛泽东问孔从洲现在哪里工作？孔从洲说：

“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

毛泽东对王季范介绍说：

“高级炮兵学校是炮兵的最高学府。”

他又转向孔从洲问道：

“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孔从洲说：

“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文化水平低，这个任务重。”

王季范问：

“炮兵要用数学的吧？”

“是的，我数学很差。”

毛泽东说：

“你的先人是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6门学科就有数学。你应当学好数学。”

孔从洲说：

“主要是过去学习基础不好。今后我一定努力学。”

毛泽东又问到孔从洲的经历，说：

“你什么时候到杨虎城那个部队的？”

孔从洲说：

“1924年就去了。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建立的靖国军。我是慕名而去的。”

毛泽东向王季范介绍说：

“孔从洲同志参加过西安事变，当时是警备2旅旅长兼城防司令。”

王季范笑着说：

“噢，官还不小哩！”

毛泽东说：

“杨主任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保密啰！假使走漏消息了不得。做得很好嘛。杨主任对你很赏识嘛。”

孔从洲说：

“杨主任是我的老上级，他把我一手培养大，看着我长大的。”

“你十几岁出去的？”

“18岁，我上不起学，高小毕业后考取中学，读了一个月，生活很困难。我家住在渭河边上，往往大水一冲，生活就成问题。民国十三年是最苦的困难最大的一年，没办法，上不起学，我就当了兵。”

“噢，是这样。你工作上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是干炮兵的，对炮兵最有感情。”

王季范对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老实人。”

“哦，他是个老实人。”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教育子女很严格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婚后一定会相处好的。”

李敏婚后，和丈夫孔令华就住在爸爸家里。毛泽东时常到女儿的屋里坐坐，说说学习，问寒问暖。有时候，毛泽东还让女儿、女婿陪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疼爱着自己的儿女。

李敏新婚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把女儿叫到了自己的书房里。李敏站在那里望望爸爸，爸爸不说话，只是用手示意她坐下。

毛泽东踱着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李敏心想，爸爸怎么不说话呢？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妈妈她……？一想到妈妈，李敏的心咯噔一下，有点急了，忙问：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说……”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然后就把他与贺子珍见面的事告诉了女儿。他说：

“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让她来……”

毛泽东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李敏想听听爸爸再说些什么，可是，爸爸再没有往下说。李敏感到爸爸和妈妈见面后，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显得很痛心。她心里想，两位老人相见还不如不见的好。毛泽东转过脸来，看着女儿又说：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

李敏一听，知道爸爸转入正题了。可是，自己哪儿有主意呀？她就接着爸爸的话说：

“妈妈病得不轻，这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毛泽东像是和女儿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你先莫着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他说着又划着火柴点燃了一支烟，不住地抽着。李敏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收拾东西，一会儿又不知所措地把东西放回原处，急得在房间里只是转。当晚，爸爸没有再找她，就是说爸爸还没有想出办法来。第二天，爸爸也没有找她。李敏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中央办公厅突然给她打来电话说：

“专机已经准备好，送你到南昌去。”

李敏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上日用品，正要出门。毛泽东来了，在他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着两大筐水果。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

李敏笑着点点头，表示记住了。毛泽东又说：

“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如何。我怕你自己去了，遇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情请他帮忙。”

李敏拿上东西，就要上汽车了，毛泽东又叮嘱说：

“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李敏到南昌见到妈妈，不由得大吃一惊。才几个月不见，眼前的妈妈形容枯槁，头发又乱又脏，两眼直愣愣的，面部毫无表情。工作人员告诉她：

“你妈妈不肯让医生看病，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行，实在没有法子，只好这么陪她坐着。”

李敏再看看妈妈，见她只是呆呆地坐着，不说也不动，除了两眼闪动之外，真像是泥塑木雕一般。李敏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她走上前去，慢慢地拉着妈妈的手叫道：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我是娇娇……”

贺子珍不理不睬。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爸爸让我看您来了。”

贺子珍连正眼也不看一下。李敏把拿来的水果洗干净，端到妈妈面前，一边削皮，一边对妈妈说：

“您吃吧。这是爸爸特意让我给您带来的。”

李敏把水果切成条，切成块，或者切成片，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送到妈妈嘴边，变着法儿劝她吃。可是，贺子珍就是不张嘴。李敏劝得多了，贺子珍心烦了，就动手把水果一块块、一条条、一片片地扔到地上。李敏无计可施，只好把剩余的那么多水果送给工作人员吃了。

李敏心想：妈妈心里的疙瘩解不开，就不会吃喝。那么，她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庐山和爸爸见了面吗？这样的疙瘩不是靠劝慰所能解得开的，只有想办法把她的思想引开，让妈妈的心情开朗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李敏和工作人员商量，在她和妈妈吃饭的时候，准备好几瓶汽水和矿泉水的混合水，她要装出吃饭吃得很香的样子，以引起贺子珍的食欲。一开始，贺子珍连看都不看，后来，李敏故意弄出一些动静来，贺子珍看一眼又把脸转向别处。李敏心想，这法子兴许能成，就愈发装出很夸张的吃相。贺子珍看着看着，伸手要李敏的饭碗，李敏赶紧递过去，贺子珍又拿过李敏的筷子，吃了一口又一口。李敏拿起水瓶子，咕嘟咕嘟地喝着，贺子珍放下饭碗，要过李敏的瓶子，也喝了两口。李敏尽管心里很高兴，就是不表露出来，也不劝妈妈吃饭喝水。

后来，李敏吃饭时，一边慢慢地吃，一边轻声慢语地说起了自己的婚礼。李敏说她和孔令华的婚礼非常热闹，请了妈妈的老战友蔡畅、邓颖超，还有曹轶欧等人，吃了一顿饭，一块儿照了相，看了一场电影。还说她的新房布置得如何典雅、朴素、大方。贺子珍倾听着，没有说一句话。饭后，李敏帮妈妈洗漱，换好衣服，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在屋里转转，走到屋外，一步一步在院子里慢慢地走着。

“妈妈，您看这是棵什么树呀？苏联有这种树吗？”

李敏故意指着一棵树问道。贺子珍看看，摇摇头。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花？东北、哈尔滨有这种花吗？”

贺子珍又摇摇头。娘俩就这样在院子里转着，后来，又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看看。贺子珍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吃饭、喝水、看病，吃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有一天，贺子珍突然对李敏说：

“我离开老家永新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没有回去过。我现在可真想回去看看。”

李敏马上表示支持，说：

“好吧，我向组织上讲讲，只要您身体好，可以回去看看。”

“你来了快一个月了吧。”

“妈妈，您的记忆真好！”

“那你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

李敏向江西省委报告了贺子珍想回永新看看的事，江西省委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还专门派人全程陪同。李敏为妈妈安排好了一切，望着远去的车子，终于舒了一口气。她回到北京后，向爸爸详细地汇报了照顾妈妈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仔细，还不住地点头。最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娇娃长大了。会办事了。”

1959年9月1日，毛泽东给《诗刊》编辑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还寄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他在信中写道：

臧克家、徐迟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5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就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 9月1日

1959年初秋，李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她住在北大校内，只有每周末才回家一次，周六晚饭与父母共餐。她每次回家，从来不坐小车，不搞特殊化，都是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从北大到中南海，要换乘两次车，两头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一旦学校有活动，李讷往往就要摸黑回家了。

李银桥觉得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不安全，就瞒着毛泽东去接李讷，他让司机将车子停在僻静处，然后到宿舍去叫出来李讷接回家。谁知这事还是被毛泽东察觉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争辩说：

“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不然我也不会去接……”

毛泽东严厉地说：

“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李银桥也大声说：

“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孩子呢？别人的孩子敌人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孩子国民党特务可是很感兴趣呢！”

毛泽东一怔，看着李银桥这种口气和不服气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他还是不松口，只是把口气放缓了一些，坚持说：

“不许接，说过的要照办。让她骑车子回来。”

有一个星期六，李讷感冒发烧，老师怕她乘车路上出事，就没有让她回去。江青晚上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李讷生病了。她马上告诉了毛泽东，可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让自己的小车司机去接女儿。

李讷刚入校的一个时期，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

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春藕斋的舞会上欢声笑语。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又有了一次和毛泽东跳舞的机会。她忽然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我一直觉得芙蓉这个名字不好，花花草草的。”

满面红光的毛泽东摇摇头，说：

“哪个说的？芙蓉这个名字蛮好的嘛！来来来，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一曲未完，毛泽东就坐在舞池边的藤椅上给刘芙蓉讲起了故事：

“唐朝时，有两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进京赶考，结果一个人金榜题名很高兴，一人名落孙山蛮灰心。考中的便安慰落榜的说：‘你虽然没中榜，但你的才华横溢，还可以来年再试，或在别的方面好好发挥嘛！’临别还赠诗一首鼓励他：‘天上碧桃和露种’，”

因毛泽东的湖南乡音重，“碧桃”的“碧”刘芙蓉听不懂。毛泽东便在她的手掌上，边划边解释：

“碧，就是王、白、石的碧。”

刘芙蓉笑着点点头。毛泽东见她听懂了，接着说道：

“日边红杏依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东风怨未开。”

他吟诵完了，看着刘芙蓉还是一脸茫然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

“诗人所指的芙蓉乃是水芙蓉，秋天开的那种，春天不开秋天开，耐寒力强，这便是它的长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丧气，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结果，这个落榜的诗人鼓起勇气，发奋努力，第二年也上了金榜。”

说到这儿，他笑着问：

“小刘，你说芙蓉这个名字好不好？”

他见刘芙蓉笑而未答，沉思片刻后又说：

“要不，你就叫秋江吧。”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刘芙蓉学到了知识，愉悦了心情，受到了鞭策。这一天她回到宿舍，马上把毛泽东吟诵的4句诗，端端正正地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一个星期后的夜晚，刘芙蓉去春藕斋演出，毛泽东一见她就问：

“那首诗背下来了没有？”

刘芙蓉不假思索地一口气背了下来。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

“很好，很好！背得好，更要做得好哟！”

9月6日，毛泽东看了题名为《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文章中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他立即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食，全力以赴。**”

9月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9月7日

9月8日，周恩来就印度政府在8月制造中印边界冲突、印军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朗久村向中国驻军开火、制造流血事件复信给尼赫鲁，说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建议越境的印军撤退，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尼赫鲁对此置若罔闻，强词夺理把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中国。

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苏联在声明中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9月9日这一天，**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

关于树立毛泽东的威信问题，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

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

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

**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

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来信，当即和他通了电话，告诉他，马上将他的信转发全党，并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交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

**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9月9日

后来，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到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9月9日，郭沫若给胡乔木写信说：

“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知如何？”

9月10日，郭沫若写信给胡乔木说：

“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如雨’。”

胡乔木将郭沫若的意见转呈给毛泽东。

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各大单位召开干部会议，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9月13日，毛泽东致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了，给了我启发。两首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3日早上

毛泽东又在信的末尾解释道：“‘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32年的历史。”

后来，郭沫若看后再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9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特赦一批战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他写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

“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

他还回顾了炮打金门的历史，他说：

“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12艘航空母舰来了6艘，第7舰队是它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两个茶杯，分放两处，比作美、蒋的军舰：

“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挂着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印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笔者注），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来一到武昌，”

毛泽东对着张治中说：

“我不是跟你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10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提到了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问题，他说：

“适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对一些确定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1957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揭露出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得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两年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由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工作，由于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更加巩固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大部分右派分子在目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其中一部分人，确实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为了使这些人以及其他右派分子更好地进行改造，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感到，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现在决定：**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他们所在的单位，应当根据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作出结论，在群众中予以宣布**（载于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笔者注）**。**

9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党内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对于这一批右派分子，党采取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区别对待的正确处理方针，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这就促使右派分子中的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分化。根据若干单位的初步统计，右派分子的当前表现，大体可分为以下3类：（1）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0%到30%，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显著的悔改表现；（2）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50%到60%；（3）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0%左右，**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有反动言行。**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工作，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就可以逐步地把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过来。

二、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央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对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将会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摘掉帽子的人，必须具备下列3个条件：（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各地各部门应该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定出摘帽子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对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但不要机械地硬凑比例数字，比例可以稍大或者稍小于10%。

四、**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只有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考察，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才可以接受他们重新入党。**

五、审查和批准的手续，应该是，由右派分子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研究讨论，提出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名单和对他们的鉴定。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吸收群众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不要开群众大会。名单和鉴定，经过现在所在单位的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取得原机关的同意以后，在有关单位中公布。**在国庆节以前，最好宣布摘掉一批。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应该根据9月18日公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向群众作必要的解释，使群众正确认识这一措施的意义**。

在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各地党组织要充分利用这个事实，对右派分子继续加强教育和改造工作，给他们指明前途，使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精神振作起来，在工作、劳动和学习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六、**现在，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中，还有少数人继续散布右派言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向大跃进、向人民公社进行攻击，表现得十分恶劣。对于这些人的言行，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充分的材料和证据，在国庆节以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他们所在单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群众中进行斗争，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党委应该注意掌握，打击面不要宽。现在，不进行像1957年那样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七、关于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的工作和待遇问题，中央将另有指示。

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根据毛泽东9月14日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决定中说：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第15项的规定，决定：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这一天，刘少奇根据人大《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颁布了特赦令。

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一批被特赦罪犯中的33名战争罪犯于12月4日执行。在这批战犯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有30名；另外还有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人。

溥仪被特赦后回到了北京，不久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8月24日就**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问题**给刘少奇的信，值得认真一看。他在信中说：“**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重要证据。可当时工作在第一线的邓小平等人对这一重要指示先是拖着不办，继而在毛泽东身后却对反右运动一风吹，最终使得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右派分子在平反后恶毒咒骂毛泽东而对邓小平则歌功颂德、顶礼膜拜。现在是到了应该认真梳理从反右到平反这一整个过程、以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第2章**

**“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

**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

话说1959年9月1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河北、山东、河南3省视察之行。

9月19日，毛泽东在天津郊区视察一个农场的水稻。

9月21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空喀山口，制造事端，中国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到了山东济南。

上午10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准备就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召开一个座谈会。舒同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节、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3人一起走进毛泽东专列的办公室。舒同汇报了封山造林的情况，毛泽东问：

“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

“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

“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

郑松回答说：

“玉米亩产500至700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

毛泽东说：

“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说：

“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舒同说：

“黄河同别的大河不一样，河水含泥沙太多。”

毛泽东说：

“有点泥沙怕什么？上岸来冲一冲就是了。”

历城县东郊公社的一些村庄就在黄河岸边，郑松对黄河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他说：

“黄河中漩涡很多，也很大。”

毛泽东见他们有顾虑，就说：

“漩涡也不怕，你们可以事先勘察一下嘛！”

舒同看毛泽东横渡黄河的决心这么大，就和杨节、郑松研究了渡河的地点、时间及如何组织人员勘察等等问题。毛泽东说：

“就这样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你们可以先找些人做点准备。”

眼看已经12点了，毛泽东就留舒同3人在专列上吃了午饭。

后来到了1960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到山东去，以后横渡黄河的计划也一直没有实现。

再说这天下午１时，毛泽东在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副省长白如冰、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节等人陪同下，来到省农科所试验田。车队径直开到试验田边，毛泽东一下车，秦杰副所长激动地迎上前去，毛泽东问道：

“我在哪里见过你？”

秦杰回答说：

“去年８月９日我在这里迎接过主席。”

毛泽东在秦杰等人的引导下，顺着田间小路向南察看棉花试验田。这一年的棉花比上年还好，面积也扩大了。此时正是棉花大量摘收的时候，毛泽东看着雪白的棉花，问道：

“平均每棵棉花有多少桃子？”

秦杰说：

“平均每棵有30多个桃子。”

“一亩地多少棵？”

“每亩4000棵。”

毛泽东看到有个品种的棉花长的又高又大，便问：

“那是什么棉花？”

秦杰说：

“那是木棉，这里是不是适合，还得锻炼它。”

毛泽东又继续往田间里边走，沿路还看了蔬菜、多穗高粱、地瓜等农作物。在一块大白菜地，他见大白菜长势很好，便关切地问：

“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

秦杰回答：

“亩产6000多斤。”

毛泽东问：

“大白菜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起来的，再多长些时间？”

秦杰说：

“白菜心是自己包的。”

他看到高粱地里的多穗高粱，数了其中一株有６个穗，就问：

“为什么说是多穗高粱？是不是一棵上长好几个穗子？这种高粱从哪里来的？”

秦杰说：

“是的，一棵上长好几个穗子，这个品种是从河北来的。”

看到地瓜丰产田里长的９斤重的大地瓜，毛泽东问：

“种地瓜是否翻蔓？种的什么品种？是否日本品种？”

秦杰回答说：

“不需要翻蔓，现在我们种的有胜利百号，是日本品种，另外还有一窝红、济薯一号、烟薯一号等品种。”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要给农民多培育些好品种。”

此时天上下起了小雨，随行人员给毛主席撑起了伞。毛泽东看到在场的人员没有雨伞，都淋在雨中，就说：

“下雨了，走吧！”

他挥手让农科所的干部职工回去，自己上了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看玉米的生长情况，他问郑松：

“这一亩能产多少？”

郑松说：

“这片丰产田可达800斤。”

毛泽东说：

“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

9月22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停留了一天多。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指示中说：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城乡人民对日用生活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适应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的要求，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收购、供应，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以外，还必须积极组织和指导农村集市贸易，便利人民公社社员交换和调剂商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人民公社多种经济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

领导和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原则，应当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为了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经济政策的宣传工作，让基层干部懂得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农村集市贸易，有利于促进农、副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便于组织短途运输，便于管理市场价格；便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之间进行商品的交换和调剂；同时也便于为商业部门开辟货源。人民公社、生产队对农村集市贸易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并向社员进行有关经济政策的教育，使他们在参加集市贸易当中，作到买卖公平、不抬价、不抢购、不贩运、不弃农经商。**

9月2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成安县道东堡村，视察了道东堡村的“棉花丰产方”。

据亲历者高成在《难忘的记忆——纪念毛主席视察成安县六十周年》一文中记载：1959年9月24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毛主席风尘仆仆地来到成安县道东堡村视察“棉花丰产方”。当时我有幸以学校少先队员的名誉去欢迎毛主席的到来。虽然已过去了60年，但毛主席视察“棉花丰产方”的情景还依然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终身难忘。

那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道东堡村“棉花丰产方”的棉花长势喜人，雪白雪白的棉花一望无际，如同银海一般，从成安县城到道东堡村的马路，当时虽然没有硬化，但路面整修得平平整整，打扫得干干净净，“棉花丰产方”中间一条小路两旁彩旗在秋风中招展。

上午10点左右，十几辆黑色轿车慢慢地向我们这里驶来。当汽车停稳后，毛主席从第二辆汽车里走下来，他老人家身穿灰色中山服，脚蹬一双半旧牛皮鞋，站在车门前微笑着向大家招手。大家高兴地向毛主席身边跑去，毛主席一一和大家握手，当时我跑到毛主席身边，用一双小手握住毛主席又大又厚的右手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了一句“毛主席您好！”这时毛主席微笑着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多大了，上几年级，我高兴地说：“十二岁了，上5年级”。

毛主席在省、地、县委领导的陪同下对“棉花丰产方”进行了视察，当时我就跟在毛主席的身后，一边追着跑，一边追着看。

毛主席首先来到了当时打机井的木架子前，他抬头看着又高又大的木架子，上边有一个圆圆的木轮子在转运，就问：

“这个木架子怎样打井的啊？”

打井的负责人就向毛主席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只见毛主席高兴地点了点头。往北走，就是道东堡“棉花丰产方”，小路两边的棉花地里公社社员正在摘棉花，当毛主席来到这里时，社员们纷纷从棉花地里跑出来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

再往北走，毛主席视察了棉花温室大棚，大棚一是培育优质棉花，二是提前栽培，这样可以增加棉花产量。毛主席走进一个温室大棚，看见5、6棵“棉花大王”长得像小树一样，大约有一米多高。据说这几棵棉花在温室大棚里已生长了3年了，每棵约有150多个棉桃。毛主席看见这几棵棉花就问：

“这一棵棉花能收多少棉花呀？”

大棚负责人说：

“大约5斤多棉花”。

毛主席说：

“好！”

他走出大棚，往南来到了一片菜地，那里种了两排“蛇皮豆角”，豆角有一米多长，看上去像一条条青蛇一般，毛主席看到这样长的豆角很好奇，他老人家在一串串豆角前转来转去，看了又看。豆角地南边，有一片冬瓜地，9月的秋天，地里长满了又大又白的大冬瓜。毛主席指着冬瓜说：

“这是什么瓜呀？长得这么大？”

村支书说：

“这是我们村的特产，叫大冬瓜，一个冬瓜有50多斤重”。

毛主席听了后说：

“不错，不错”。

初秋的天气，虽然凉爽了许多，但到中午还是很热，毛主席这时脱下上衣，只身白衬衣，他老人家真像一位公社社员，大家都说：

“毛主席就是咱们社里人”。

12点左右，毛主席在“棉花丰产方”简易平房里同棉花姑娘们进行了座谈，道东堡村用自家特产大西瓜，招待了毛主席。

9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军委组成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军委由下列21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 林 彪 贺 龙 聂荣臻 朱 德 刘伯承 陈 毅 邓小平 罗荣桓 徐向前 叶剑英 罗瑞卿 粟 裕 陈 赓 谭 政 萧劲光 王树声 许光达 萧 华 刘亚楼 苏振华

中央军委常委由下列13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 林 彪 贺 龙 聂荣臻 朱 德 刘伯承 陈 毅 邓小平 罗荣桓 徐向前 叶剑英 罗瑞卿 谭 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林彪、贺龙、聂荣臻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罗瑞卿为秘书长，萧向荣为副秘书长。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视察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汇报说，为给这座建筑起名字，他曾征求专家组的意见，大家提出了“人民宫”、“共和宫”、“首都会堂”等多种名称，而结构组组长茅以升则提议叫“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当即决断地说：

“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很好，可用。”

9月27日，毛泽东给来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的农垦局文工团代表李艾写了一封信。

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说过，李艾是作为中南海文工团的战士在1958年和吴凤君等二十多人一起去了北大荒垦荒。她这次到京后，给李银桥打了一个电话，把自己在北大荒糖厂亲手生产并自费购买的一包白糖托李银桥转送给毛泽东，没想到李银桥很快就给她送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接过那个大大的信封，激动得心里蹦蹦直跳，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笺上写着：

李艾同志：

承赠食物一包，甚为感谢！祝贺你的进步。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问小蒋、小胡他们好。

毛泽东 9月27日

李艾看罢信，急切地问李银桥：

“我想见见主席，行吗？”

李银桥说：

“好吧，我联系一下再告诉你。”

在国庆节前夕，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来到了北京，参加庆祝活动。毛泽东专门和他们进行了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说：

“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照协议执行。”

此时，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第二次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

此前，程思远曾将李宗仁的一封信转交给周恩来。李宗仁在信中说，他保存有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这批文物是12箱字画，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周恩来在接见程思远时说：

“你转来李德邻先生的信，说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祖国，这是他爱国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9月底，苏联派出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国建国10周年庆典。

9月30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也匆匆直接飞抵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来到机场迎接他。赫鲁晓夫神气十足地走下图-114座机，满脸堆笑地大步朝毛泽东走过来，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握了手。当体态肥胖短粗的赫鲁晓夫试图与毛泽东进行同志式的拥抱时，毛泽东像一名拳击高手一样迅速地闪开了。

毛泽东没有致欢迎词，而赫鲁晓夫则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简短讲话。他说他的美国之行，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毛泽东按响电铃，吩咐卫士搞点麦片粥。卫士用茶缸在电炉上煮了麦片粥，毛泽东喝了麦片粥，就向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谈到了1958年炮打金门前后的情况，他说：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指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上一次会谈——笔者注）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8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8月20、21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扩军的决议，所以，我们8月21号没打，23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家里，等待着一位即将到来的小客人。

此前，李银桥早就告诉李艾，说今天晚上她可以来看望毛泽东了。可李银桥站在门口左等右等，也不见李艾到来。原来，李艾这天晚上的任务是观摩话剧，看完已经很晚了，便急匆匆地骑上自行车赶往中南海，李银桥见她来了，埋怨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主席等你老半天了。”

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看书，听到外边的动静，抬头向外张望，一见李艾就说：

“哦，不怕鬼的姑娘来看我了。”

李艾原来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一直戏称她为“不怕鬼的姑娘”。

“主席，您好！”李艾行礼毕，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大手，又问：“您身体好吗？”

“好。”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下李艾，让她坐下，感慨地说：“长大啰，长大啰！”

李艾听到毛泽东的夸奖，莞尔一笑，又歉疚地说：

“主席，我去观摩话剧，让您久等了。”

“你看的什么？”

“《东进序曲》。”

毛泽东吮了吮嘴唇，点点头说：

“知道了，这是一出好戏，是华东的。”

李艾一看表，已经是夜里11点了，她腾地站起身来，说：

“主席，太晚了，明天是国庆节，您还要上天安门去检阅，我走了。”

“不要急嘛。”

毛泽东还想挽留她。李艾知道国事重大，自己不宜久呆，就说：

“我下次再来看你吧。”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建国10周年大庆。这次庆典是建国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60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和其它国家党的首脑出席了庆典。

上午9点55分，毛泽东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赫鲁晓夫头戴草帽身着乌克兰式衬衫，和胡志明、金日成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国党政其他领导人及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60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代表，8个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他们一起观看国庆游行活动。

上午10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阅兵式开始了，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

空军受阅编队增加到5机，飞机总数增加到155架，受阅飞行高度降低100～150米。

此次阅兵的装备数量大大增加，且受阅轻重武器装备绝大部分已实现了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装甲兵方队，装备了中国制造的59式中型坦克，这是我国制造的第一代主战坦克，当年定型，当年投产，当年装备部队并参加国庆阅兵。飞过广场上空的是由中国制造的歼5型飞机组成的梯队。**

阅兵规模比往年大，但用的时间却只有58分钟，这表明阅兵组织工作比往年更周密、更细致、更成熟。

**国防部部长林彪在阅兵总指挥杨勇的陪同下，乘国产阅兵车**，检阅了广场上和在东长安街列队的人民解放军海陆空3军。检阅完毕，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加紧训练和学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的军事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大力提高军事技术，使每个人都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精通业务，熟练的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和装备，以便胜利地履行我们保卫国防防止侵略的光荣职责。”

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曾兼任人民大会堂结构专家组召集人的茅以升及其家人，正好遇见了走向休息室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茅以升的3个外孙与毛泽东、赫鲁晓夫握了手，并一起照了相。

**赫鲁晓夫在休息室里向毛泽东提出，要撤走帮助中国生产原子弹的专家。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

**“你们可以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撤回去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外国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焰火。尔后，他们又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将军合唱团”的演出。

“将军合唱团”的230名共和国将军们，在人民大会堂登台演唱，由上将李志民指挥。幕布一拉开，满堂生辉，势惊四座。将军们虽然不是专业歌唱演员，却也堪称业余歌手。他们的歌声气壮山河，波澜壮阔。指挥“将军合唱团”的李志民，更是引人注目。

接下来，梅兰芳演出了从豫剧中移植过来的京剧《穆桂英挂帅》。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找梅兰芳谈话，他高兴地说：

**“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40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至于戏中的人物，是否可以将‘安王’改为‘西夏王’？”**

梅兰芳连连称是，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10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会谈，中方出席的领导人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绍了苏美首脑在戴维营会谈的情况，还一个劲儿地鼓吹美国如何好，如何富裕，工人也很富、很富。他还说艾森豪威尔是什么“和平之士”，要建立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没有军队的“三无世界”。毛泽东深沉而冷静地望着得意洋洋的赫鲁晓夫，中肯地说：

**“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访问美国只带回这样一些东西？”

赫鲁晓夫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方提出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回答说：

“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赫鲁晓夫当场红了脸。他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他已经答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可是，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周恩来则解释说：

“这8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

赫鲁晓夫又说，苏联和美国两大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大放厥词，早已忍无可忍，就严厉批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也反唇相讥，他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不该和印度为那块不毛之地发生冲突。他指责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愤然反驳道：

“这是原则问题！”

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也反复向赫鲁晓夫说明事实真相：早在1951年前后，印度方面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向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推进，侵占了中国东段9万平方公里领土，后来又在中段侵占了2000平方公里，并且还要侵占西段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中国边防军作战进入山南边境要地。印军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是他们先开枪，12个小时之后，中国士兵才开枪的。

赫鲁晓夫不顾事实真相和是非，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他说：

“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

陈毅反驳说：

“西藏印度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它从我国手里夺走的。”

毛泽东说：

“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我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到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

周恩来也补充说：

“赫鲁晓夫同志，达赖叛逃，怎能说是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界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侵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了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的中立国交火呢？”

毛泽东说：

“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

彭真接着说：

“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12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

赫鲁晓夫对着周恩来教训道：

“你是大外交家，怎么也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说：

“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却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不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受到如此指责，恼羞成怒，就把一口恶气撒在周恩来身上。他环顾大家一眼，指着周恩来说：

“毛泽东同志1957年派周恩来去处理匈波事件，他却在莫斯科无端地教训我。”

周恩来见赫鲁晓夫旧事重提，就说：

“我们不是教训你，是讲应该很好地处理兄弟党的关系，只是给你们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们接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你当时咒骂兄弟党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原则！”

“没有！”赫鲁晓夫将拳头捶在沙发扶手上，嚷道：“我没有咒骂，我没有这样的态度！”

周恩来平静地说：

“自己说过的话，怎能不承认呢？”

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见赫鲁晓夫耍赖，他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站起来说：

“赫鲁晓夫同志，当时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那间办公室与你谈话时，还有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确实说了那些话。”

赫鲁晓夫红着脸为自己开脱说：

“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说罢，他把话题转到中国炮击金门问题上，说没有与苏联打招呼。陈毅反驳说：

“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冲着陈毅说：

“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说：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说：

“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我才这么几个人？这种会谈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客气地说：

“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向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缓和了一下紧张气氛，说道：

“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

赫鲁晓夫说：

“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说：

“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

赫鲁晓夫说：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吃了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起来了，坐在沙发里，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

后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一天下午用茶时，赫鲁晓夫提出，要见一见彭德怀元帅，并要送给彭德怀一份漂亮的礼物。毛泽东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尽管他心中非常恼怒，可还是不动声色地转换了话题，谈到了汉语的独特性，选择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争辩的话题来对付他。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毛泽东缓缓地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自己的词。”

他又问赫鲁晓夫说：

“你知道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吗？”

毛泽东不等对方回答，就接着说：

“可多啦。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

还没等赫鲁晓夫反应过来，毛泽东又说：

“想一想，你有两亿人口，我们有7亿。”

10月4日，赫鲁晓夫在离别北京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毛泽东没有发表送别讲话。两人只握了一下手，脸上没有笑容。中苏双方也没有发表联合公报，赫鲁晓夫就在这冷冰冰的气氛中踏上了归程。后来在10月6日，赫鲁晓夫到了海参崴，在讲话中攻击中国领导人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

后来，毛泽东则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气愤地说道：

“苏联曾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舰队，什么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还弄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却要求在中国的领海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提出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鸡！”

毛泽东的话语一落，听报告的全体人员立即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毛泽东也笑了。这是嘲弄赫鲁晓夫的非常辛辣、幽默、形象的语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民族精神，他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事，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超过他自己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再说10月4日晚上，李艾在中南海春藕斋周末晚会上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她，就招呼说：

“李艾，过来，过来。”

李艾兴奋地握着毛泽东的手问候道：

“主席，您好！”

毛泽东向周围的人们介绍说：

“这是从北大荒回来的李艾同志。”

他让李艾坐在自己身边，高兴地说：

“你们远走高飞，长大啰，成为一个劳动者了。前些时候，到北大荒的那个梁小芳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小鬼呀，才这么一点点高的个子，就当了列车长了，好啊!”

毛泽东又打听了到北大荒去的其他人的情况，仔细地了解北大荒的生产情况，他还问李艾：

“你有没有挨饿呀？”

李艾说：

“我们北大荒还行，按定量吃饭。”

“真的吗？”

毛泽东盯着李艾问。正在此时，江青来到了春藕斋，只见她那高挑的身材外罩着一件白色毛料长裙，愈发显得典雅脱俗。毛泽东见江青来了，就叫住了她，笑容满面地介绍说：

“这是北大荒来的李艾同志，你们拉拉手吧！”

江青微微一笑，和李艾轻轻地握了一下手，就走向了自己的座位。此时，乐曲已经奏响了，李艾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请您跳舞。”

“好嘛。”

一曲终了，毛泽东回到座位上，又问李艾：

“你刚才讲那里的情况是不是真实情况？”

“主席，**粮食是丰收了，大家的生活确实比以前改善了。我们是吃了很多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大家都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李艾那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成熟而又坚强的光芒，她又说：“主席，转业后的指战员们处处都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非常吃苦耐劳，每一个都是好样的。”

毛泽东很欣慰地说：

“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你们要爱护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李艾点点头，十分依恋地说：

“主席，我该走了，明天就回北大荒了。”

毛泽东关心地问：

“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吗？”

李艾摇摇头，像一个懂事听话的女儿一样，微微一笑，说：

“主席，您放心吧，我一切都很好。”

“长大啰。”

毛泽东喃喃地说。李艾握着他那温暖的大手，说了声：

“主席，再见！”

转身离开了春藕斋。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17国共产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3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

“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他们是一定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要缓和，否则何必缓和呢？西方国家之间也不一致。西方国家内爱好和平的人同他们的政府之间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区别。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当然，也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广大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苏联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都靠在一块儿，而且巩固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说：

“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以前我们在日内瓦谈，现在在华沙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一千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在国庆节过后，回到香港的程思远将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了香港。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人员去接回到北京，并指示故宫博物馆进行鉴定，结果发现这批字画有的是真迹，大部分是赝品。按行情计算，价值不过3000美元，与李宗仁所说11万美元相差太大了。

周恩来把字画的事情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说：为了争取李宗仁回国，准备给他3万美元。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道：

“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作‘投石问路’”**

后来，周恩来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说，他捐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情，将助他一笔赴欧洲的旅差费，以壮行色。李宗仁得知后喜出望外，连声称赞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0月7日12时40分，**人民解放军地对空导弹兵某部营长岳振华指挥部队，拦截国民党军飞向北京的美制高空侦察机，3发导弹全部命中**。飞机残骸坠落于通县东南河西务村附近，飞行员王英钦当即毙命。

**此战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人民解放军这支地对空导弹兵部队，是在1958年秋冬刚刚组建起来的，共分为1、2、3营。

10月8日，毛泽东接到了薄一波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信中写道：

“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1、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2、今年每人平均分到30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3、公共食堂59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4、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10月11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10月9日送审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毛泽东9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另外，陈伯达还参考了毛泽东在外事会议上谈及彭德怀的一段话。他在送审稿上附言：“**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请审阅。”毛泽东看罢，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批注：“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他又批示道：

“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

10月13日凌晨4点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和他一直谈到7点半。在座的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据任继愈回忆说：“这次在毛主席家的谈话是大家围着一个方桌，交谈很随便，中间吃了一顿饭，边吃边谈。胡绳和我到毛主席家比较早，陈伯达因司机不在，晚到了一个小时。”

据任继愈追记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2.关于哲学问题。3.关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4.关于百家争鸣和学术批判问题等等。他在谈话记录的最后附注说：“这份谈话过程是根据回忆整理，仅记录了毛主席的话，内容分类是整理时加上的。回忆会有遗漏。陈伯达和胡绳没有讲更多的话，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

任继愈公开发表的谈话内容和他儿子任重公开的史料，只是这份谈话记录中的一部分，抄录如次，以飨读者：

毛泽东一见任继愈的面就说：

“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来谈谈。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有没有人研究佛教？”

任继愈回答说：

“除我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说：

“我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还有可取之处，但他没有讲清楚。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

他又说：

“王阳明接近禅宗，陆象山不太纯。”

毛泽东转对陈伯达说：

“禅宗的《坛经》你们看过没有？我早就说过，要你们找来看看。继愈同志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很容易看。”

他背了几段《坛经》，并作了讲解，接着，又对任继愈说：

“中国哲学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较多，近代现代的已开始注意起来了。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你们有人注意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学史，对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艺也要注意，它们的联系很密切。你对历史注意不注意？对当前的问题关心不关心？”

毛泽东还说：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

任继愈说：

“福音书（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

毛泽东说：

“那可不好。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

任继愈回答说：

“师生加起来有500人。”

毛泽东认真地说：

“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基督教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500人的大系嘛。**研究宗教不能让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只有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因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时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

“某某搞阿拉伯哲学史怕不行吧，因他相信那一套。我们对旧中国没有迷信，我们就研究得透，蒋介石对旧中国有迷信，到死也没有办法。”

“老子的问题你们争论得怎么样了？”毛泽东指着陈伯达对任继愈说：“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毛泽东屈起一个手指，说：

**“《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是不放第一枪**。现在印度骂我们，我们不动，等到一定时机，我们就狠狠地还击一下。”

他又屈起一个手指，说：

“**《左传》的‘退避三舍’也学了，我们打仗有时一退不止三舍**，一舍30里，三舍90里，我们有时一退几百里。”

接着，他屈着第三个手指说：

“**《礼记》的礼尚往来也学了，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在这份谈话记录中，关于哲学部分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说：

“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讲社会发展的4个阶段的规律。现在把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伦理学、法律、文艺都放在里面讲，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从前可讲得不多，经过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太丰富了，是不是要独立出来单讲呢？”

“**一切东西都是发展的，动物是从植物发展来的，最初是先有的藻类**。**动物植物将来未必有一条不可改变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动起来。**如果动植物之间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外交要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更稳定的和平环境和更多的国际朋友。”**“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的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年至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

10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提出：在今年的10月、11月、12月3个月内，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特别是从短途运输、山货采集、野生植物收割、农产品加工、手工编织以及挖矿石等等方面，在切实做好“三秋工作”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扩大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0%左右的计划之外，再增加33亿5千万元以上的产值，使1959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5%，使农业在特大的旱涝虫害的侵袭之下，仍能实现大跃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各地必须立即抓紧布置下去，一直布置到公社和生产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农副业总产值增加15%的要求。**但是，**这件事只在群众中动员，切实努力去做，埋头苦干，力争实现，**没有实现以前不要登报。

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还讲到：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的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整社试点经验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整社试点的经验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经验很好。

**湖南的试点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央在10月12日批发的**河南省委批判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等同志的材料，**使同志们看到党内高级干部中那些反对人民公社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直接反映富裕中农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的。现在湖南这个材料可以更清楚地使同志们了解，**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早就对党的总路线发动了进攻。他们消极怠工，造谣诬蔑，寻隙挑衅，千方百计地要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挠和破坏大跃进。对于他们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广大的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早就不能忍耐了。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早在今年5月间就开过3次辩论会，向富裕中农“不顾大集体，只搞小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斗争。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广泛展开这场斗争。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中央和地方如果不彻底粉碎彭、黄、张、周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不可能有今年后半年的继续大跃进，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的材料证明，在党领导群众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邪气打下去之后，就立即在政治方面积生产方面出现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最集中的表现是成年社员中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由原来的70%增加到90%；动摇的，由原来的20%减少到8.5%；反对的，由原来的10%减少到1.5%。社员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蓬蓬勃勃的生产高潮立即起来了。

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只会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人数不多，不足为患。事实绝不是这样。反对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然只占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可是，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他们也参加劳动，他们说话在一部分劳动农民中有市场，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虽然人数很少，可是，正像湖南农民说的，**“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危害作用是很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人民公社化，要最后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要彻底挖掉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根子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起来坚决抵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近几月来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起来坚决地抵抗、猖狂地进攻了。**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湖南在生产大队一级整社试点的经验和有关整社的一些政策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10月16日，毛泽东在陈伯达10月13日送审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修改稿上批示道：

“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3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

10月21日，中印双方在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

10月23日晨，毛泽东为陈伯达在10月21日送审的批判彭德怀的长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了批示。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级党委，供党员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参考，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

中央 1959年10月23日

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又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1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59年第22期发表。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将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整社试点经验起草的批语中写道：“**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这些远见卓识在现在是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却难以理解。正如他们后来不理解“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一样，误认为这些警世论断都是天方夜谭。

**第3章**

“**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虽然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了**

**长期的斗争、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

**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

话说1959年10月间，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丢失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此一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劝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刘思齐重新组织家庭，但是每一次刘思齐都是流着泪，摇头拒绝。后来邵华对毛泽东说：

“姐姐是因为还没有给岸英哥哥扫过墓，怎能再谈自己的婚事呢？”

于是，毛泽东就亲自安排刘思齐由邵华等人陪同，将在1959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9周年祭日前夕，到朝鲜去为毛岸英扫墓，以尽夫妻之情。他还特意把刘思齐找来，嘱咐她要保重身体，并“约法三章”：

1、刘思齐等人往返的路费和开销，从他的稿费中支付，不花国家一分钱。2、住在中国大使馆，不要麻烦朝鲜政府。3、扫墓一事不可声张，不要报道。

10月23日晨，毛泽东为南下口述了一份长长的书目，罗列了36条，计100余种，上千册，叫工作人员装箱带走。后来，这些书装了十多箱，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10月23日上午，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陈秉忱到故宫博物院借明清两代名人书画作品20件。其中有8件属于明代大书法家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的作品。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登上专列，离京南下视察，首先到了天津。

专列进入山东境内，毛泽东见沿途土地龟裂，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心情非常沉重。

在济南，毛泽东先后会见了25日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陪同来济南参观访问的巴西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等一行4人。

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在座的还有王稼祥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夏基说：

“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搞武装斗争，我们搞议会斗争。”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知识分子。”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舒同说：

“我领导一个国家，他领导一个省。”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指着茶几上放着的一份材料对夏基说：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做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1917年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7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1955年和英共波立特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1955年11月莫斯科会议宣言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1945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1946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1949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100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9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10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10月27日，南下专列离开济南，进入安徽境内，毛泽东看到的情况更糟糕，不但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干旱情况也更加严重，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喃喃自语道：

“天灾人祸啊！”

说着，不由得眼圈红了。专列到了合肥，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地方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合肥地区是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还有一点水，已经无法发电了。毛泽东望着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了历史上的几次大灾荒，又说：

“现在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

他问大家：

“你们敢不敢顶？”

大家都说：

“敢顶！”

毛泽东将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好！赫鲁晓夫越压，我们越要顶！”

在安徽省境内，毛泽东视察了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还视察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10月30日，毛泽东在从南京到上海的专列上，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人谈话，他问道：

“你们情况如何？”

曾希圣答道：

“情况还好。”

“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

“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刘顺元回答说：

“粮食情况今年比去年好。”

有人插话说：

“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的那个样子了。”

毛泽东问：

“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点吗？”

刘顺元说：

“恐怕好得多。”

有人插话说：

“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毛泽东问：

“心放下来了？”

刘顺元说：

“心比较放下来了。”

“还是不要放下。搞10年吧，搞10年能够储备1年。能不能够？”

“大概差不多。”

毛泽东在和大家的谈话中，再一次讲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讲到了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的问题；还说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毛泽东又问了江苏省的工业生产情况。

10月30日下午6点多，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柯庆施问：

“主席，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泽东说：

“不下去。”

“他们有个晚会。”

“什么晚会也不看。”

“游泳吧？”

“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8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10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4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同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的谈话中说：

“庐山会议后，8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60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19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

柯庆施、陈丕显插话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毛泽东又说：

“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30辆汽车，坏了26辆，只有4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儿就起来了，两三天功夫，就修好了24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儿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为一份关于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发展养猪事业的材料，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吴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3人、5人至9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苞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苞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的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实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制作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化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1959年10月31日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立即要柯庆施于上午印出20份，发给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和他自己每人一份。

10月31日早晨，机要秘书罗光禄见到毛泽东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罗光禄同志：

两首诗，每首各5份，请于今日分送陈、田、胡、邓、林克5同志为盼。毛泽东 31日早

罗光禄一看，这两首诗是毛泽东在今年6、7月份写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立即分送给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邓力群、林克5人。

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6人请到专列上，他说：

“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田一头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去了杭州。

1959年11月3日中午，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乘飞机来到杭州。

这天晚上，周恩来等人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及赫鲁晓夫近期与其遥相呼应的一些讲话内容。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去。”“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周恩来和雷英夫指着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

“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10公里，印度也退10公里，中国也退10公里，有20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20公里的距离，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10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20公里，就是40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周恩来还说：

“中间有个无枪地带，是很主动的。他来了，仅仅接触，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一顿，没有枪总打不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们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大家说，主席的这个提议，尼赫鲁很难不同意。毛泽东说：**

“**还有可能，他就不退。**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毛泽东又转对周恩来说：

“由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恐怕比较好。你明天回去就开政治局会议商量。”

周恩来谈到了1960年的经济计划，他说：

“196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

毛泽东说：

“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

周恩来和彭真说：

“钢的产量计划是1800万吨，死啃那个1800。”

毛泽东说：

“死啃1800，搞个半年再讲。6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1900。”

彭真汇报说，现在农村整社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

“**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

彭真说：

“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

毛泽东说：

“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胡乔木汇报河北省搞水利的情况说：

“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600万人，不过200万劳动力，他就有160万人上水库。”

周恩来接着说：

“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6个要收尾，又增加了3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安徽大旱。”毛泽东接口道。周恩来说：

“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说：

“31号到1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说：

“下了4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说：

“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3天影响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说：

**“河南有1000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

11月4日，周恩来、彭真、胡乔木、雷英夫回了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留在杭州，和他一起准备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国际问题。

11月7日，周恩来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信，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信上加了一段话，他写道：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1月8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后来在11月16日，**尼赫鲁复信给周恩来，表示准备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退20公里的建议。这一点竟被毛泽东言中了**。

再说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走后，为在华东协作区会议上讲国际形势，让秘书林克找来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3篇讲话，非常认真地一句一句地阅读着，还不时地与英文版对照一下，甚至还要翻一翻英文字典。每研究完一篇，他都要在下面写一段批注。在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上，他批注道：

“**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在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上，毛泽东批注道：

“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从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议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毛泽东在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上批注的是：

“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入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美国在标榜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

批完了，毛泽东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将杜勒斯的3篇演讲全文，连同他的这些批注，印成文件，发给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领导人阅读。

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华东协作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3个材料——杜勒斯1958年、1959年的3篇讲话。这3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毛泽东说罢，笑了起来。停了停，他又接着说：

“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入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最后说：

“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本主义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11月中旬，毛泽东审阅了中央办公厅于19日编印的第174期《情况简报》。

简报中的第1个材料是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文章中说：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运动正往深入阶段发展，具体表现在：1、运动发展得愈加广泛深入。2、重点批判对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细致。3、领导核心健全有力或已经得到改进的单位占80%至90%。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中，仍有落后单位和落后面，主要是领导上存在右倾，不敢或不愿放手发动群众，以简单粗糙的方法代替深入艰苦的思想工作。为此，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1、必须继续大胆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大字报开展斗争。2、对重点对象要有计划、有步骤、深入细致地进行批判。3、要加强领导。4、运动必须有始有终，不能煮“夹生饭”。

简报中第2个材料是《十三个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介绍了河北等13个省份进行整社试点的情况，说在整社开始的地方，都普遍获得贫农和下中农的拥护。

简报中第3个材料是《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很快》。材料中说，据12个省、区的材料看来，最近两三个月，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都很快，常年食堂也有很大增长。目前各地在积极恢复和发展食堂的同时，开始大力抓食堂的巩固工作。

毛泽东看罢《情况简报》，批示道：

“江青阅后，交林克阅。3件都可看。”

1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现在发给你们。

**这次反右整风运动，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此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今年9月15日召开的党派会议上已经宣布过，望各地遵照执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单位，应该采用适当方式加以结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自1957年以来，在他们中间已经连续地进行过两年多的思想改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次问题的中心，不在他们，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也不是他们，而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并且有一部分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农村中有一部分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富裕中农分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虽然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因此，在革命发展到真正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就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人，为数虽然不多，但为害却不小。为了挽救，即教育改造这些同志，帮助他们赶上时代、赶上队伍、过好这一关，为了保证党的总路线的顺利地执行，党必须毫不犹豫地集中力量，在党内，首先在干部中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清理思想，进行反右整风运动。现在，中央一级和各省、市、区一级领导机关、中直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必须这样做。其次，还必须估计到，**如果目前把反右整风运动扩展到党外，就势必分散党的领导机关的精力，甚至无暇内顾，使党内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思想错误的人，马马虎虎地混过关去。**这样不仅对党的事业不利，对这一部分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利，因为**病根不除，养痈遗患，以后还会发作**。

**这次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两条道路在党内争胜负的斗争，是一场剧烈的斗争，但这是党内斗争，是党内反右整风的思想斗争。**因此，第一，**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弄清大是大非**。不要含糊，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辨明是非。在运动的领导上，还要注意抓紧大是大非，即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根本的问题，不要被非政治性的琐碎的小问题所吸引，而致分散目标、精力，抓了小问题，放松大是非。第二，在态度上**必须坚持治病救人的精神，方式上必须和风细雨，不要用爆炸形式，不要采取粗暴方式，一切同志要力求像医生、护士对待病人那样，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实事求是地好好地向党交心，好好地进行自我批评，欢迎同志们的帮助。这样，才能达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才符合党的从团结出发的方针。**第三，批判对象的确定，必须完全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不要温情主义、包庇错误，也不要片面夸大、方式粗暴。至于在各级干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百分之几，请你们搜集典型经验，加以研究，并且将你们的意见告知。

中央 1959年11月21日

11月27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制订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下发全国，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这个“标准”规定：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的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公开为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人，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借批评大跃进的缺点向党进攻的人，执行党的路线一贯右倾、1958年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言论和行动的人，均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认为“此件很好”，要求县级以上干部阅读。

11月30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还有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

会议首先由李富春作了1960年计划报告，尔后转入讨论。毛泽东就大家对计划的讨论情况，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1960年钢产指标1800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2200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2000万吨就了不起了。**‘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3年余地。现在，给3年补充计划要留1年的余地（1959年已经基本完成了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央正制定后3年的补充计划——笔者注）。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4500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4700万担，实际只有3800万担。这900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4500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6000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5000亿斤，就大有可为。

3000万吨钢（正在讨论的1962年钢产量计划——笔者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各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2800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10年和13年的打算，1972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13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来，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1亿5千万头猪，今年达到1亿8到2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10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3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10个冬春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1000斤以上，到1500斤，即比现在要加1倍，这也是10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14亿亩，10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10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10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4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35000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15000公里，平均每年5000，那就很好了。

**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的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1959年12月3日凌晨3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7同志到此一谈，12月3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4日到杭，请酌处。今日派机到广州，明日林彪可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3天就够了。”

放下笔，他仍无睡意，便吟诵起鲁迅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吟罢，联想起赫鲁晓夫9月间访美，向艾森豪威尔乞求和平，毛泽东又提起笔将诗中的几个字改动了一下，便成了后人看到的他改过的《亥年残秋偶作》的新貌：

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国际形势已经讨论了两天。是日晚，毛泽东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了总结讲话。很遗憾，这个重要讲话没有见到正式记录，笔者只好将他亲笔书写的讲话提纲抄录如次：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10年以上）；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8年内相当强大起来。8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8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的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的、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笔者注）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正是：惜无全记录，不得见宏篇。但闻评赫语，句句是真言。

更有八年破产之预言，岂不惊神仙？

试看今日中外之赫氏，竖子下场，可有二般？

12月10日，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组成一个读书小组，和他一起在杭州共同读书，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社会主义部分。毛泽东规定：从10日开始，每天下午大家一起到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里读书；他还吩咐由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朗诵，大家边读边议。

邓力群和胡绳、田家英商量了一下，3人分了工：由胡绳、田家英轮流朗读，邓力群负责做好记录。读书开始后，毛泽东见邓力群没有读书，就问他：你怎么不读？邓力群说：我的口音不标准。他见邓力群在做着记录，就没再说什么。

12月11日，毛泽东在康生的报告上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重读章碣《焚书坑》一诗，读其诗便想知其人，于是他委托康生查询章碣的生平资料以及此诗是否章碣所写。12月8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毛泽东不满意这个说法，就写信给林克，叫林克再查。他在给林克的信中写道：

林克：

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 12月11日

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12月4日被特赦的33名战犯中的11名战犯。在这11人中，除溥仪、陈长捷、卢俊泉外，杜聿明等其余的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周恩来在和他们的谈话中说：

“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侵占台湾合法化，想把金门、马祖给我们，把台湾、澎湖留给自己，把蒋介石搞掉。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给美帝国主义以机会。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支持了蒋介石。正如章士钊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总之，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与台湾有联系的，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自此以后，一直到1966年的8年中，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6批战犯，其中属于国民党战犯的有263名，使昔日战场上的敌人，成为推动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在这期间，周恩来还特别安排一些特赦人员到各地参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著名的访谈史作家马社香在《溥仪等人的韶山之行及巨大转变》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1964年3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安排了一批在京特赦人员，到江南一带参观。这个参观团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到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参观游览；4月初，再从杭州乘车抵南昌，吉安，上井冈山；4月17日到长沙，参观了清水塘；4月19日渡湘江西岸，乘专车向韶山进发。

这些过去身握权柄的人沿途感慨万千，他们看到了那个自己青少年梦中的新中国。用‘特赦犯’自己的语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共产党太伟大了。南京解放前一个扁担能挑走的修理厂，现在也能生产出自己制造的汽车了。杜聿明还亲自上去试了试，性能好得很；**上海过去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妓女满街，现在沈醉使出浑身解数，都找不到‘一个拉皮条的、卖大腿的’；到处劳动人民都昂起了头，街上的红领巾主动地搀扶着素不相识的老太太过马路……这是过去哪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却在短短的十几年就做到了。**

在韶山，溥仪主动向杜聿明夫人介绍新夫人，令这位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秀清当时就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居然能把一个处处养尊处优的皇帝，改造为一个没有任何架子能抢先跟人说话谈心的人。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曹秀清怀着激动和复杂的心情走回到杜聿明身边，讲到溥仪的变化，问：‘宣统皇帝真的变了一个人？’杜聿明认真地点点头，说：‘我跟你讲一个流传政协的小故事，你就相信了。去年毛主席号召学雷锋，公共汽车上到处让座，上车也先后礼让，年轻的让年老的，年老的让抱小孩的。溥仪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一连几次，他在车站上等车，车子一到，溥仪就让别人一个个地先上去，一直到最后汽车开走了，他却没有上去。他回来便问我们，出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我们一细问，才闹清楚他高度近视，注意力又集中在让别人先上车上，别人的话他不曾听见，最后把售票员也让上了车，人家还以为他在车站维持秩序呢!’一席话说得曹秀清笑口顿开，笑过之后似乎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新社会有了更多的感触。

离别韶山时，溥仪对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竟依依不舍，他对李淑贤说：‘要是我们能住在韶山就好了。’

沈醉当时即赋诗一首：半身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堪慰家乡（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笔者注）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代表团成员们一再表示深受教育，并表示以后一定再来。3年后，除溥仪病故未能成行外，1973年5月8日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一群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昔日黄埔军校高材，果真又再次瞻仰韶山。

1973年5月8日，杜聿明等人参观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陈列馆馆长吴大为参与了接待和讲解，笔者曾经请教过他和其他同志，国民党的这些高级将领、知识分子是否真正服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呢？关于这个疑问，吴大为没有直接问答我的提问。仅告诉我，他当天亲眼看见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的种种兴奋和种种尴尬。

在陈列馆抗日战争图片前，黄埔军校的高才，一个个精神百倍，到了解放战争图片室前，杜聿明和宋希濂等人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刚到门口，宋希濂胖胖的肉手，就拉了下杜聿明的左袖，‘我们不进去了吧。’‘为什么？’杜聿明说话几十年都喜欢直来直去。‘战争败将，看只有尴尬和难堪。’‘你为这呀’，杜聿明笑了起来，他爽快地对宋希濂等人说，‘我们都是第二次来韶山了。你们忘了陈毅在座谈会上说的话，山东先头一仗他还被我们打败了哦，共产党的元帅今天都不讳胜败之事，值得我们学。在解放战场，我们失败了，被俘了。傅先生(傅作义)说，我们打败仗有功！假如我们打了胜仗，或者把部队拖到台湾，那就会推迟解放战争的进程。我们在战场上很快把国民党军队输光了，这是对人民有利的嘛！走，我们进去看。’杜聿明这么一说，这些昔日的将军们怀着别样的心情踏进了展室。他们整整一个小时才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出来，不约而同地想表达一句话：**‘毛泽东是战神。’杜聿明觉得这句话用新观念看有点迷信，可又觉得很准确，就笑着对韶山的接待同志说，请记得把这句话提供给以后研究军事史的人。**望着这些过去趾高气扬的人，今日一个个虔诚的目光，陈列馆里里外外的人都真心佩服共产党改变了这些国民党战将的灵魂，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是人民，哪怕是鹦鹉学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毛泽东逝世后，**宋希濂带着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儿子，第三次来到韶山，教育儿子要铭记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继续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

沈醉在1991年秋主动再到韶山，他说，‘毛主席是指引我迷途知返的最大恩人，终生不会忘记’。他在韶山留言颂扬毛泽东**‘泽惠人类，东方救星’**。他还**抄录1964年自己写的**‘**当年逆子已回头’诗句，再一次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深深爱戴。**”

再说12月26日，毛泽东在给林克的信中写道：

林克：

请你找December8,1959,Vol·11,No·49《北京周报》看一下，《Battle With Nature》这一篇文章，将一切我不认识的字查明注出。我准备学习一下。

毛泽东 12月26日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的生日，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应做大寿。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吸取以往的教训，商量着为他做寿要办得稳妥一些。他们请叶子龙和李银桥先去做毛泽东的工作，要想方设法征得他的同意，举办66岁生日活动。还好，这一次毛泽东竟然同意了。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除了请在浙江工作的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江华和他的夫人吴仲廉以及读书小组成员一起吃晚饭外，不请其他任何一位中央领导。

12月26日晚上，除了毛泽东和江青，还有所请的客人，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全都在，而且，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子女。厨房师傅准备了两桌比平时丰富的菜肴，准备了白酒、红酒，还做了长寿面。毛泽东和大家欢聚一堂，显得特别高兴，不住地和那些孩子们说笑、逗乐。饭后，大家一起照了相。毛泽东又赠给客人们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纪念。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豪华、最高档次的生日宴会了。

12月29日，毛泽东复信给庐山疗养院护士、在庐山会议期间曾做过他的保健工作的钟学坤。钟学坤因为不懂毛泽东在《七律·登庐山》中所说的“九派”与“三吴”指的是什么,便写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在给她的复信中写道：

学坤同志：

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3省的9条大河，究竟哪9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毛泽东 12月29日

12月30日晨，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10年8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父亲 12月30日上午6时

12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陈云写了一封回信：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 12月30日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11月21日为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的批语中说：“**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部分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革命发展到真正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就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次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两条道路在党内争胜负的斗争”，**如果**“使党内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思想错误的人，马马虎虎地混过关去”，“病根不除，养痈遗患，以后还会发作**。”毛泽东一生见微知著，高瞻远瞩，斯言可以说是又一个重要例证！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不正是为这一著名论断作出了最清晰的注脚吗？！

**第4章**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

**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话说1960年1月4日晚，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5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车站。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在专列上读完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3章。邓力群按照他的吩咐，将整理好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1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俱乐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做准备。

会议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报告；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听取了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以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读书小组成员传达毛泽东在读书时的谈话内容。邓力群被分配到朱德、邓小平所在的小组里。邓力群问：

“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

邓小平表态说：

“可以传达。”

于是，邓力群就按照整理的记录作了详细传达。同时，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3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1月15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平安

父字 1月15日

1月16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俱乐部的住处对高智说：

“交给你一个任务。”

高智还以为毛泽东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没想到他又笑着说：

“今天是星期六，周末，请你看戏。”

高智问：

“你看吗？”

毛泽东说：

“你先去看看，看完说说你的印象。你说好，我就去看。”

于是，高智领命到兰心大戏院看了一场上海歌剧院新编的民族舞剧《小刀会》，此剧演绎的是上海农民起义军领袖刘丽川率领小刀会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故事。回到锦江俱乐部，毛泽东问他对舞剧《小刀会》的印象如何，高智便向毛泽东介绍了剧情，介绍了演员的表演，说到高兴处，免不了学着演员的样子，手舞足蹈一番，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高智本想让毛泽东看看戏，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以为自己为《小刀会》叫好，毛泽东一定会去看，没想到毛泽东却说：

“我不看！”

高智颇为意外，问道：

“这么好的戏，你不看？”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

“你讲得那么详细，还表演了一番，我还去看什么？”

高智闻言，信以为真，挺后悔的，想不到自己对《小刀会》的宣传，结果是适得其反。

一天傍晚，毛泽东在锦江饭店俱乐部院子里散步，他问身边的卫士沈同：

“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呀？”

沈同回答说：

“响应主席的号召，实行晚婚。”

“你多大啦？”

“38岁了。”

“都是38岁的人了，应该结婚了。有没有女朋友？”

另一个卫士抢着告诉毛泽东：

“人家已经有个女朋友小王了。”

毛泽东问：

“人怎么样，做什么工作？”

那个卫士说：

“是北京医院的大夫，现在给董老作保健医生。我们还没有见过，听说挺好的。”

毛泽东笑着问沈同：

“怎么样？我也没有见过。可以结婚吗？”

“将来结婚，就请主席吃酒。”

1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结束了，沈同正在检查会场，为下午的大会做准备。一个卫士给他打来电话说，主席要找你。沈同立即回到了毛泽东住处，那个打电话的卫士笑嘻嘻地对他说：

“主席叫你是好事。”

毛泽东见沈同来了，也笑着说：

“把你的小王找来，我们一起吃饭。今天就为你们结婚，我做主婚人。”

沈同感到太突然了，有些着急地说：

“主席下午要开会，吃过午饭要休息一下，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毛泽东认真地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终身大事嘛！不会耽误开会的，快去办！”

沈同知道，毛泽东决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再说也没用，只好转身出门，准备去向领导报告一下。那个卫士告诉他说：

“这都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还请了董老、杨主任和叶子龙等几位同志来一起吃饭。你就不用去汇报了。”

这天午餐时，工作人员特意为毛泽东摆了一个大圆桌。沈同请毛泽东、董必武和其他领导人入座。毛泽东让沈同和小王坐在自己的身边。沈同、小王端起酒杯为毛泽东敬酒，毛泽东说：

“要敬大家嘛。”

沈同便举着酒杯说：

“同志们，今天主席很高兴，为我们俩主婚。主席很快乐，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就请大家同吃一杯快乐酒，敬祝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端起酒杯，对沈同和小王说：

“**祝你们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说罢一饮而尽。大家见毛泽东干了杯，也都一一干了杯。毛泽东又嘱咐沈同说：

“要祝大家健康嘛！”

于是，沈同和小王笑嘻嘻地又给各位领导和同志敬酒，祝大家身体健康。毛泽东很快就吃完了饭，站起身来笑着说：

“很好，今天给沈同完成了一件大事。你们多吃一点吧，还不到开会的时间哩。”

沈同不便挽留，只好说：

“那就请主席休息一会吧。”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95%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

“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使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3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

邓小平插话说：

“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快到了，4月22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

毛泽东说：

“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

“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是日晚，毛泽东同周恩来一起步入上海艺术剧院，观看了《小刀会》。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上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

毛泽东回到锦江俱乐部，接见了上海歌剧院领导和部分演员。他对饰演女主角周秀英的演员郑韵说：

“《小刀会》很好嘛，是反帝反封建的，可以到北京去演，那里的人民会欢迎的。”

后来，舞剧《小刀会》果真赴京演出，还赴朝鲜演出，颇为轰动。

1月18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接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海因里希·劳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海因里希·劳在谈话中说：

“总理阁下，中国能否让印度一下？你们不能老吵下去。”

周恩来说：

“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反动的一面，而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方针。”

海因里希颇带忧虑之色，他说：

“尼赫鲁是国际上的知名人士……”

周恩来对客人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微微一笑，又说：

“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我们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和缓一下，收缩一下。”

1月26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乘专列离开杭州去广州，途中停在湖南衡阳周家坳铁路专用的仓库支线上，吃住都在专列上。

他在杭州期间已经患了感冒，现在还在发烧，带病接见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要张平化通知衡阳地委书记宁生、市委书记杨兴洲及驻衡阳的415部队政委等负责人，到专列上开一个座谈会。

宁生一进专列车门，迎面看见毛泽东，非常激动，几乎是扑过去，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向他问好。众人落座后，宁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农田基本建设和人民公社的情况，其中说到衡阳县英坡公社有7户农民搞“一家班”养猪，**有一对青年夫妇带3个小孩，全家养了207头猪。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你看过没有？”**

**宁生说：**

**“这是县里报上来的材料。”**

毛泽东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杨兴洲汇报了衡阳市工业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衡阳过去我去过多次，当时住江东，那时是个什么样子啊！破破烂烂，是消费城市，现在是生产城市了嘛！有了这样多的工厂，有了工业基础，以后就好办了。”

宁生等人把毛泽东送到郴州，已经是大年三十了。**回到衡阳，宁生马上要了一部车，赶到英坡公社，查看了那一家养猪的实际情况，确实是真实的。宁生感到没有对毛泽东说假话，这才放了心。**

1月27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成员到了广州白云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陶铸、胡乔木也参加了在白云山的读书活动。

毛泽东和在广州机颈坑疗养院疗养的徐海东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只有几十米，他每次夜间乘车外出，都要司机把汽车从坡上滑到坡下，然后再发动机器。他对司机说：

“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

在白云山期间，毛泽东收到了别人送给他的一套根据《东周列国志》改编的小人书。以前他是从不看小人书的，这次看了以后，很感兴趣。由此，促使他重读了一遍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古白话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他在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没有写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那上面的颠覆活动可多啦。还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的，我也对照了《左传》，完全正确。可让你们的秘书去找这本小人书。”

他还说：

“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毛泽东看小人书一看就是几百本。卫士尹荆山觉得很有趣，便问他说：

“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

毛泽东说：

“小人书不简单啊，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

毛泽东接着就给尹荆山讲起了赤壁大战的故事，说孙权刘备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曹操的战船和营盘，结果烧出了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他又讲了蜀汉和东吴之间彝陵之战的故事，说刘备伐东吴，犯了一个错误，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死在了白帝城。

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摘要发给你们，请即转发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加以研究，参照办理。

**目前，在我们的工业和交通企业中，手工劳动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大的，积极推行半机械化、机械化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件，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所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市委，都应当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像太原市委那样，立即做出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规划，井且付诸实施。

在进行规划的时候，应当从各类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可能的条件，实事求是的进行。对于大跃进以来新建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中、小型企业，要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以至机械化。对于老企业，要继续有计划地改进设备，消除薄弱环节，使费力的手工劳动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对于新建或者改建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也要在改善工艺、改进设备、改进生产线、改善劳动组织、提高设备利用率等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有人认为，技术落后的企业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技术先进的企业不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例如哈尔滨的量具刃具厂是一个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现代化工厂，最近由于采用了土洋结合的方法，组成自动化生产线，就提高劳动效率好几倍。总之，**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都应当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土，主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来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中央 1960年1月30日

1960年2月8日，毛泽东在和学习小组成员谈话时说：

“**存在是第一性的，观念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观念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笔者注）。说观念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说观念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2月9日，毛泽东在广州终于结束了持续两个月的读书活动。**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一系列谈话，经邓力群等人整理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下面仅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藉’、‘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钱。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2月15日，毛泽东用红色铅笔在宣纸上给罗光禄写了一个便条：

罗光禄同志：

请在今天到广州书店买一本书，叫作《哲学研究》杂志，1959年11月—12月综合号，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15日上午5时

此后，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人订一份《哲学研究》。

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2月24日《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希望各地也认真抓紧办好食堂。**我们对待公共食堂的原则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办好食堂是贯彻执行节约用粮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一个关键，也是解决粮食不足时更有计划地用粮的最好办法。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口粮分配原则是：指标到户，实物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这是办好食堂的先决条件。食堂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贫农、下中农手中，食堂范围大小要因地制宜，太小了不便于机械化半机械化，也会占用更多的领导力量和劳动力，食堂必须自己种菜、养猪、养家禽等等，力求自给有余。**

　 中央 1960年2月26日

2月27日至3月6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文稿正文，同他一起审读的还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他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的谈话。

1960年3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广东省委在2月25日发出的关于人民公社工作的5点指示中说：1、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2、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3、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4、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5、各级党组织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看罢这个文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华东区，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5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3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5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5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中央建议这些同志想一想、分析一分析这样实际存在的两个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5年至10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地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商业流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今年春季，建议各省、市、自治区都由党委领导，开一次4级、或者5级、或者6级的干部会议，会期10天至14天，如果是6级，则省、地、县、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到人，第5第6两级在一个公社内只到穷队富队的代表各一人，如1959年3月间开的那样，但是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5个问题。如有余裕时间，也可以讨论一些别的重大问题。**春季会议，最好在3月30日以前开完，因为3月除两广外还不是农业大忙的时候，4月就大忙了。**这种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今年共开两次。广东省委已经发出通知，在3月上旬召开这种会议，讨论上述5个问题。

此件及附件，可在党刊上发表。（附广东省委文件一件）

中央 1960年3月3日

3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上批示道：

“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

3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再次为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起草的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央已于2月26日批发给各地。现再将毛主席3月4日关于转发这个报告代中央所拟的批语，发给各地。批文如下：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中央 1960年3月6日

3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和康生等人最后审读完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全部文稿。

3月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在北返途中，专列进入湖南郴州境内。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于明涛到专列上汇报工作。毛泽东问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

“你是哪个地区的？”

陈洪新说：

“我是郴州的。”

“哦，郴州，我去过的。郴州有块‘三绝碑’哟，你去看过没有？”

毛泽东所说的“三绝碑”，别说是陈洪新，就连在座的所有人都有点茫然。众人面面相觑，都不做声。毛泽东见陈洪新和其他人没有应答，便说：

“在郴州的苏仙岭上，有一块由北宋文学家秦观作词，苏轼题跋，后由米芾书写的碑刻，人称三绝碑，那可真是三绝啰。”

吸了一口烟，他接着说：

“秦少游很有才华，《踏莎行·郴州旅舍》这首词写得非常好。”

说罢，他便朗声吟诵道：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众人闻之无不惊讶，想不到毛泽东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不但知道有个“三绝碑”，还晓得这么清楚。只听毛泽东又郑重其事地说：

“那碑可是个好宝贝，要保护好哟！”

毛泽东又对陈洪新说：

“过去郴州是个瘟疫之地，文人骚客多贬谪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

陈洪新激动不已，对毛泽东说：

“现在很好，我在这里工作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

毛泽东走后，陈洪新等人到处打听“三绝碑”的踪迹，确实无人知晓。后来，他和单泽周等地委一班人终于在苏仙岭一片满是苔藓且为古藤荆棘覆盖的崖壁上找到了字迹斑驳、依稀可辨的“三绝碑”，便修了一条可直达“三绝碑”的公路，还建起护碑亭一座，重拓原迹，树碑一块，并新铸秦观铜像，恢复了秦观寓居过的“郴州旅舍”原貌，使其成为湖南省重点保护文物。

再说毛泽东的专列离开郴州境内后到了衡阳。

3月10日，专列从衡阳到株洲暂停，毛泽东会见地方干部后，驶往长沙。

3月11日晚8点，毛泽东在省委张平化、周惠、胡继宗和长沙市委书记孔安民陪同下，前往长沙汽车电器厂视察。

坐落在长沙烈士陵园旁边的汽车电器厂，热闹非凡，工人们兴冲冲地拥向厂门口，一层又一层地站在厂区大道两边，迎接毛泽东。突然，有人激动得大声喊道：

“来啦，毛主席来啦！”

毛泽东在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笑盈盈地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在厂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向厂区走去。来到金工车间门口，他望了望门上的3个字，慢慢念道：“红旗门”，赞许地点点头，走进了车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十分细心地观察着由冷墩机、铣槽机、搓丝机组成的螺钉生产自动线。厂领导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是工人们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协同配合，奋战3天建成的我厂第一条生产自动线。”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

他走到青年钳工刘孝安操作的钻床前，对自动退刀和进刀很感兴趣，只是感觉还需要工人用手送料，就说：

“这是半自动，应该全自动。”

毛泽东从金工车间来到冲压车间，一边看着16吨的冲床在生产，一边听着有关改进这部冲床的汇报。如今这部冲床实现了自动喂料，工效提高了两倍，他说：

“很好，应该大搞。”

毛泽东看到冲床冲过电枢片的边角余料，一条条、一片片散落在地上，就弯腰拾起一片，拿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问站在他身边的那位厂长：

“这些下脚余料还有用吗？”

厂长未假思索，随口答道：

“没有用了。”

毛泽东说：

“不！应该还有用，至少可以回炉。”

他走进总装车间，看了工人们革新的自动线后，问工效提高了多少？厂领导说：提高20倍。他说：

“好，很好！”

毛泽东走到一位参加劳动的女绘图员身边，微笑着问：

“你能锉，我也能锉吧？”

说着，他就接过锉刀，锉起感应线圈外壳来。感应线圈小组一个青年工人想和毛泽东握握手，可他一看到自己手上沾满了油污，马上将手缩了回去。毛泽东见他如此，便把手伸过去，紧紧地握着他那劳动的手。

毛泽东要走了，轿车就停在工具车间门口，可他坚持不上车，一直步行出厂，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向工人们挥手告别。他顺便来到了长沙烈士陵园，观看革命烈士生平展览。省公安厅厅长李强介绍说：

“烈士陵园记有76425位烈士的英名，第一位就是杨开慧烈士。”

毛泽东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谢谢你！”

李强介绍到郭亮烈士时，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是一位年轻的烈士。”

是日晚，毛泽东应邀观看了湘剧团的演出。

3月12日，专列从长沙去江西。毛泽东一路巡视过去，在专列上住了两个晚上。

3月14日，毛泽东视察浙江金华双龙洞人民公社后，又来到南京部队某部高炮3连。指战员们欢呼着拥上前去，向毛泽东致敬，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在战士们簇拥下来到营房，在走廊上，他看到墙上挂有信袋，随手取出一封还没寄出的信，仔细看了看，微笑着说：

“这字写得很好。”

他把信放回原处，察看了指挥班的宿舍，又来到驾驶班的宿舍，数了数床铺，问了排里的人数，笑着说：

“你们的床铺是两层，上面还睡一个人，晚上睡觉小心掉下来。”

说着，他俯身用手按了按铺上的棉垫和被子，瞅着驾驶员小张说：

“你们晚上睡觉暖和不暖和？”

“很暖和。”

小张回答道。毛泽东说了声“很好”，就随身坐在床铺上，又问：

“你们的津贴费，有没有节余？”

炮手小王说：

“有节余。”

“寄回家没有？”

“家里需要就寄回家，家里不需要就存入银行。”

“这样很好。公家发的鞋袜够不够用？你们的牙膏、牙刷、肥皂是自己买的吗？”

正说着话，刚值了勤回到宿舍的小万激动得叫了声：

“毛主席！”

毛泽东闻声站起来，同小万握了手，又摸着他的棉袖，笑着说：

“你们穿得多厚啊！你们现在穿得这样好。我过去也当过兵。那时候，我们吃的比你们差，都穿破的，脚上穿的是草鞋。你们要艰苦朴素啊！”

３月16日晚６时许，毛泽东的专列到了宁波，徐徐驶进宁波火车南站。他身穿银灰色大衣，头戴前进帽，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走出车厢，来到了站台上。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他介绍了前来迎接的宁波地委书记处书记阎世印、周效儒，宁波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葛仲昌和东海舰队航空兵部队副司令员李建国等。毛泽东微笑着与他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到宁波的原计划是要到镇海骆驼桥附近靠近公路的一个生产队等了解农业生产、察看春花作物生长情况，还要到几家工厂了解生产情况。可是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来电报告说，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来华访问，到了杭州，提出要见一见毛主席。这样，毛泽东便改变了计划，取消了到农村、工厂视察的安排，但他坚持要去“看看宁波市容”。他和几位领导人分别上了3辆轿车：前面一辆是开导车；中间为主车，由王芳、阎世印、鲁冰陪同毛泽东乘坐；后面一辆坐的是省、地、市委领导人。

此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轿车从火车南站出发，由共青路，经陆殿桥横穿月湖，到镇明路转入中山西路、中山东路到东门口，前往宁波当时最繁华、最热闹的江北老外滩轮船码头。毛泽东透过车窗观察着市区夜景，询问了宁波市的规模、人口数量、群众生活和社会治安等情况，阎世印等人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了宁波三江口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

宁波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一批像王应麟、王阳明、黄宗羲等一类杰出人物，还演绎了戚继光浙东抗倭、张苍水反清复明，黑水党击毙洋枪队头目华尔、镇海口抗击英法入侵军和四明山抗日烽火等壮烈事件。毛泽东深谙历史，他不无感地说：

“宁波是个英雄的城市，我总算到了五口通商的地方了。”

车队又从原路返回三江口，行驶到江厦街灵桥边。毛泽东看到横跨在奉化江上的弧形钢架大桥，就问：

“这是什么桥？”

王芳回答说：

“叫灵桥。”

毛泽东颔首笑笑，轻轻地重复了两遍：

“灵桥，灵桥。”

他在灵桥边下了车，稍作停留，举目转望着宁波城市，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领导人说：

“这里的地理环境同上海有着相似之处，你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港口城市的优势，要把宁波建设好！”

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内政和司法大臣乌帕德亚亚。中方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潘自力。谈话内容摘要如下：

毛泽东：我们同印度有过一些别扭，不要紧，马上就会过去的。我们的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9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我们侵略你们尼泊尔没有？你们尼泊尔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可以订个边界协定，立上界桩，是不是这样？

柯伊拉腊：是的，我已同周恩来总理谈过。

毛泽东：你们赞成不赞成？

柯伊拉腊：需要正式划界。

毛泽东：需要划一下界，划定了之后双方可以有一段地区不巡逻，这段地区多宽可以商量。印度同巴基斯坦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它们双方不巡逻的地带很小，只有1公里。我们曾向印度提议，双方不巡逻的地区为20公里，我们不去，他们也不要去，他们不干。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在条约上订一条，不巡逻地区多宽可以商量。如双方各20公里就是40公里，如双方各10公里就是20公里，如双方各5公里就是10公里，这依你们之便，是不是可以这样？

柯伊拉腊：可以考虑。

毛泽东：可以考虑一下。行政管理可以由双方在各自地区的民政人员管，是否可以搞一点警察、民兵，由当地人民组成。就是不要正式军队，双方正式军队隔开一段，双方都安心。划界、不巡逻等都是为了永远保持边界和平友好，使双方安心，不怕对方侵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像我们同缅甸一样，订个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订了条约，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就输了理。我们是大国，从来不怀疑你们会侵略我们，但你们可能怀疑我们会侵略你们。如果订了条约而我们破坏了条约，那就是我们犯了错误。**

柯伊拉腊：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友好条约草案，我们将把它带回去同内阁商定，可能还要作个别修改。等周恩来总理4月底访问印度后到尼泊尔时在加德满都签订。

毛泽东：很好。我们已先后请你们两位总理来了，我们的总理也应该去，这是平等的。我们很感谢你们。今年我们就要在你们的首都建个使馆，这很好。你们在我们这里也建个使馆，人不要多，三四个人、七八个人就行了，花不了多少钱。你们800万人中还抽不出来几个人吗？

柯伊拉腊：准备派的时候，人不会太多，因为派不起。

毛泽东：听说你们修一条公路直达我们国家？

柯伊拉腊：没有。两年前曾要修一条路，后来没有资金，进行不下去。现在正由苏联技术人员帮助勘察，准备修一条由东到西的公路。

毛泽东：你们来我们的国家，要经过外国。

柯伊拉腊：不经过，尼泊尔同西藏有山口可以通行，但不是正式公路。

毛泽东：1年、10年、20年，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有一条直通的公路。

柯伊拉腊：我们国内正在修公路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有前途的地方。全国计划修900英里（约合1300公里）。

毛泽东：很好。

柯伊拉腊：这次我曾邀请尼赫鲁和周恩来总理去加德满都会谈，结果未能去成。

毛泽东：因为尼赫鲁要我们总理去他们的首都新德里。开始我们主张在仰光谈，而尼赫鲁不同意。现在我们已同意去新德里，所以也不能到你们那里去。谢谢你的好意，这是很好很好的好意。缅甸总理也是这样想，要中印两国总理去仰光，而尼赫鲁说他不方便，我们也就让步同意了。

现在缅甸总理邀请我们总理去仰光，首相阁下邀请他去你们的国家。这次周恩来总理先去缅甸，后去印度同印度总理谈判，然后再去你们的国家。他要去的第4个国家是柬埔寨，人家请了几次，我们欠了人家的债。还要去一个国家，就是胡志明的国家，一共5个。这样，去年反对中国的浪潮可以渐渐平息下来。

我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我们同你们，同缅甸、锡兰、柬埔寨没吵过。**真正同我们吵得厉害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它占着我们的台湾，还封我们一个“侵略者”的称号，那我们也封它一个侵略者。我们从没有侵占过美国一寸土地，檀香山和中国还隔着中途岛，日本我们也没有去侵占过，而美国却侵占着我们的台湾。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成了侵略者？**

**现在有个国家要同你们“共同防御”我们，听说你们没有答应。对此我们很高兴。你说过，中印两国关系，由他们自行解决，你们不干涉。印度说我们侵略了你们，你曾发表声明说，没有侵略。**有谣言说我们的军队侵入了你们的国境，到底有没有？

柯伊拉腊：正因为没有，才作这个声明。

毛泽东：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

你们的政策同我们的差不多。我们的大企业是苏联帮助设计、安装的，这样做由1950年到1959年已经10年。在这10年中，我们得到一些进步，现在要自力更生。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是总照抄。我们不懂嘛，只好抄苏联的。到第2个五年计划，我们就不照抄了，1958年、1959年我们自己找出了一套办法。你们也要经过这个过程。在一个时期抄外国的，这是必要的，抄一个时期之后就不要再抄了。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就是抄教员的，几年毕业之后就成了教员。**你们一定有些可以当教员的。真的，这不是假话，没有100年到1000年都当学生的道理。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你们的国家也是这样。柬埔寨也有许多长处。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

**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柯伊拉腊：关于尼中边界问题，到现在还有分歧。以我们的观点，根据最近50年历史情况，我们认为有4个地方有争议，现在是定下来的时候了。

毛泽东：好。

柯伊拉腊：同周总理的会谈中决定了几个原则：一、以存在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定界；二、考虑到边界双方管辖的实际状况；三、对个别有争议的地点，解决了好，解决不了，交联合委员会。

毛泽东：好嘛!

柯伊拉腊：就原则来说是好的，而就个别具体地点来说，双方是有分歧的，这点使我们不是很安心。当我来杭州时，曾告诉周恩来总理，我来杭州不是以安心的心情来的。周恩来总理告诉我应该完全安心。

毛泽东：应该完全安心。缅甸原来很怕我们，现在完全安心了。他们已知道了我们的心。

柯伊拉腊：我来时会见奈温总理，他告诉我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应该坦率地谈。所以我就说出这些话来。

毛泽东：好，那些争议容易解决，那些山口人都没有。关于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分歧，可搞个联合委员会来解决。

柯伊拉腊：对你们来说，目前的争议地点是无所谓的，而对我们来说是有所谓的，是个威信问题。

毛泽东：可以解决，不要担忧。

柯伊拉腊：还有一个问题，是感情的问题。我们叫作萨迦玛塔，西方叫作额菲尔士，你们叫作珠穆朗玛。这个地方一直在我们境内，可是周恩来总理说是在你们境内。

毛泽东：这也不要不安心。

柯伊拉腊：是感情的问题。

**毛泽东：可以解决，一半一半。山南边归你们，山北边归我们。**

**柯伊拉腊：山的顶峰呢？**

**毛泽东：顶峰也是一半一半。不行？如果解决不了，拖一拖也好。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在上面立个界桩。**

乌帕德亚亚：谁去呀？

毛泽东：困难啊！可以写在文字上。我们有人从你们那里爬山时，我们通知你们；你们有人从我们这里爬山时，你们通知我们。

乌帕德亚亚：过去爬山，一直都是要拿尼泊尔的签证的。

毛泽东：如有第三国的人爬山，从你们那边爬，签证由你们那里拿。

潘自力：过去有人爬山是要经过西藏地方政府许可的，也有经西藏境内爬的。

罗贵波：过去有些外国人爬山，是经过我国驻瑞士使馆签证的。

柯伊拉腊：不。

毛泽东：长期的习惯是，从西藏爬山，就得有西藏地方的许可。

柯伊拉腊：还有其他一些争议。

毛泽东：好解决。同你们好解决，同印度不同。同印度的争议是几万平方公里的问题。

柯伊拉腊：我们才几平方公里。

**毛泽东：这个山峰可以改个名字。不叫额菲尔士，那是西方人起的名。既不要叫什么萨迦玛塔，也不要叫什么珠穆朗玛，就叫作“中尼友谊峰”。**

这个山峰是世界第一个高峰，8800多公尺。美国、苏联、印度都没有，只有我们两国有。你们内部开个会商量一下，提出意见。如不同意，就拖下来，将来再解决。

柯伊拉腊：是的。还有其他5个争议地点，不过主要有3个地方。

**乌帕德亚亚：问题是边界线靠北一英里，还是靠南一英里的问题。**

**毛泽东：那还不好解决，连人都没有，好解决！**

**柯伊拉腊：如果在北京会谈中还解决不了，怎样再向主席提出呢？**

**毛泽东：不要同我谈了，仍同周恩来总理谈。在他去你们的国家时再谈，他要同我通电报的。在联合委员会里要得到双方的同意。你们不同意，就坚持。你们坚持，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打仗？我们是乐观的。**

柯伊拉腊：我们也是乐观的。

**毛泽东：我们要得到你们的友谊，你们也要得到我们的友谊，这是问题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是不是？**

柯伊拉腊、乌帕德亚亚：是的。

毛泽东：**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分晓。

东方翁曰：与尼泊尔柯伊拉腊等人的谈话，是毛泽东接待小国领导人的一个典型事例。故此，笔者特将他们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上，供读者细细研读和体会。毛公对待小国客人从来都是像一位慈善的老人对待小朋友一样，友善而认真。这次也是一样，他对柯伊拉腊等人既待之以礼，又维护了国家主权，还不厌其烦地晓之以理，循循善诱，释其歧义，引导他们与中国结为友善之邻。堪为后世之典范！

**第5章**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

**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

**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

**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

**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话说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一文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一件，《经济消息》第10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等7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3、4、5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1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央 1960年3月18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2月2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年，1961年，1962年这3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党组会议上，在本年3月内，至迟4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2月2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它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3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年，要为卫生工作开会4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4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遗误。**

中央 1960年3月18日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建筑工程部党组3月9日《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同意建筑工程部党组《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参考。

**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处理利用得不好，就会污染地面水体和地下水源，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和鱼类繁殖；处理利用得好，则不但可以免除废水危害，而且可以回收石油、酚，氰化物、碱等工业原料，价值很大。**过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重视不够，这是一个缺点，从现在起，必须加强注意，加强领导。一方面，**凡是现在已经存在这个问题的城市，都应当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密切协作，采取土、洋并举的办法，积极进行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另一方面，今后新建企业，都应当把废水处理利用做为生产工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设计和建设中加以保证。**特别是一些大企业，更必须重视这件工作。

（此件发至各工矿区域的中、小城市党委）

中共中央 1960年3月19日

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关于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情况报告》上写了一个极具理性和预见性的批语，题目叫《关于反华问题》，全文如次：

附件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3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5%吧，最多不过占10%。假定说，100个人中有10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27亿人中，不过只有2亿7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24亿3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1949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6亿5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10%，即是说，不过6千5百万人而已。**而5亿8千5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350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90%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1946年全力大进攻，只有3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10%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90%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10%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10年，甚至会有整个20世纪的后40年。如果给我们40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10%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2000斤至3000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泽东 1960年3月22日

后来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批语及附件《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情况报告》发到公社党委和相当于公社党委一级的其他党委阅读，帮助全党干部在国际反华浪潮中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

3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转发由鞍钢总工程师马宾执笔写出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10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2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央 1960年3月22日

后来，毛泽东见到马宾时曾经戏称：

“苏联有个‘马钢宪法。’，咱们中国有个‘马宾宪法’。”

3月22日、23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山东省6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先后写了两个批语：

　 一

此件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12000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6个人，这种办法似较好。

毛泽东 1960年３月22日

二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3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4月上海会议18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作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6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1960年3月23日

3月23日晚，毛泽东终于到了天津。自从离开广州后，他时行时停，历时15天，沿途与各地省市委负责人和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还有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上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有中南5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3天会，有华东6省1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1、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2、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80%的人在食堂吃饭。

3、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4、农村人民公社的5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5、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12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笔者注）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和畜牧业要并重。

6、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7、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8、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9、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10、《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11、除四害。**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给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

12、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13、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14、**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15、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16、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17、**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我在浙江只讲了15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17个问题。”

3月25日，毛泽东为转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1960年3月16日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 1960年3月25日

3月2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17个问题。

这天下午，邓小平在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边听边议。关于人民公社的5个问题，毛泽东说：

“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

关于农业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关于工业问题，讲到1960年钢材分配情况，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得感叹起来，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个一点。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那么多，很少。”

邓小平提出一个托拉斯（托拉斯，英文trust的音译。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的问题，他说：

“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它多行，搞托拉斯。”

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

邓小平接着说：

“在3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

“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说：

“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毛泽东说：

“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

毛泽东最后说：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10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1960年3月下旬根据山东6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3、4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6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4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6级和4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4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6级和4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3月14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5多5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1月1日到3月10日，70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74件，表报599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5多5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5多5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5多5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5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央 1960年3月30日

3月30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072人。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作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向大会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当时国家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问题讲了话。

大会中间休息，老舍从主席台上来到旁边的休息室，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人向休息室走来，以为他们要商量什么事，便起身要走。毛泽东拉着他说：

“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

老舍只好随大家落座，围成一个小圆圈。毛泽东说：

“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

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都很有本事，尤其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的基础。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三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国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这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

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军队，所向披靡。

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

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

毛泽东的这一番议论，使老舍大为惊讶。他回到家中，向家人作了详细叙述，说他完全换了脑子，换了眼睛。自此，他开始着手写表现满族人民的作品，他还想写一部《康熙大帝》，为此，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1960年4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对教育部党组《关于最近四个月来农村扫盲、业余教育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教育部党组在3月4日的报告中说，**1959年10月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之后，4个月来，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进展很快，到1960年2月间，全国农村参加扫盲和业余学习的人数已达1亿3千3百多万人，占农村青壮年总数的66%，比1959年10月召开农村扫盲、业余教育工作会议时的5千万人约增加了一倍半多。在这1亿3千2百万人中，参加扫盲的有6050多万人；参加业余初等学校学习的有8380多万人；参加业余中等学校学习的有770多万人；参加业余高等学校学习的有43000多人。**教育部党组对今后农民业余教育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是：（1）力争在两、三年内，在农村青壮年中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使青壮年中的非文盲达到90%以上。（2）力争在三、四年内，在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中，基本上普及业余初等教育。40岁以上的人有条件又愿意参加学习的，也欢迎进业余初等学校学习。（3）力争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在40岁以下有条件的青壮年中基本上普及业余初级中等教育（包括初中和初级技术学校），并且要求培养出大量的初级技术人员。（4）大力发展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包括高中），积极培养农村中所需要的中级技术人员。（5）积极发展业余高等教育，首先是举办业余专科学校，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最近四个月来农村扫盲、业余教育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望参照办理。

去冬以来，农村扫盲、业余教育工作发展很快，形势很好。八届八中全会指出，要争取大大提前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任务，其中包括有扫盲和发展业余学校的任务。**望各地在保证生产任务的原则下，抓紧农民识字教育，力争在1962年以前基本上完成农村扫除文盲任务，同时，积极发展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培养技术力量，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要使群众学习做到经常持久。**现在春耕已到，请各地按照生产学习两不误和工作学习既紧张而又有劳有逸的原则办理。

　 中央 1960年4月2日

在4月间的一个周六下午，毛泽东的大女婿孔令华在北京郊区黄土岗公社一个月的劳动结束了，回到了中南海的家里。李敏看到丈夫脸晒黑了，头发长了，胡子长了，皮肤也显得粗糙了，就是身体还不错。马上帮助他收拾好东西，对他说：

“你赶快到外边去理发，刮刮胡子，早点回来和爸爸一起吃晚饭。”

正巧毛泽东来了，他高兴地看着孔令华的模样，笑着说：

“莫到外面去嘛！”

“我让令华到外面理发，很快就会来，误不了全家吃晚饭。”

“莫走，莫走。叫小周为他理发。”

李敏和孔令华感到很意外。平时，毛泽东家里的男孩和孔令华，都是到中南海外边大街上的理发店理发。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只能为他一个人理发。他说过：“他们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到我身边来的，你们谁也没有权力让他们为你们办事。”

“还是到外边去理吧，外边人少也快。”

李敏说。毛泽东又一次说：

“莫去，就找小周来理！”

他转身对卫士吩咐，通知伙房师傅，吃饭时间往后推迟1小时。李敏和孔令华只好服从了。孔令华理完发，李敏看看手表，还差几分钟不到1个小时，两人走进餐厅，全家人都到齐了。这顿晚饭吃得很热闹，大家有说有笑，一派温馨的家庭气氛。毛泽东还不时地往孔令华的碗里夹菜。

“你们也应该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向令华学习。劳动光荣嘛！”

毛泽东笑着说。李敏也故意说：

“爸爸，您莫偏心，怎么光给他夹菜呀？”

“我这叫赏罚分明。不劳动者，不得食嘛！”

毛泽东说着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周日这天，毛泽东拉着女儿李敏到中南海瀛台参观技术革新的展览会。李敏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往前挤，所以，她总是跟在后面。

原来，李敏上一次跟着爸爸去参观，一不小心稍微走得快了一点，占了一个工作人员的位置，把工作人员挤到身后了。毛泽东看了她一眼，李敏以为是自己衣服不整，或者不干净，有伤大雅。可她低头看看，没什么不妥呀！于是，她就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动。毛泽东又扭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是严厉的。李敏向后边看了一下，她突然明白了：爸爸的眼神是说：“娇娃，你该走开，那个位置是他们的！”她马上悄悄退到了工作人员的身后。爸爸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

“有工作人员在我身旁的时候，你莫要随便站到我身旁把他们挤走，这是他们的岗位，是他们的工作，这是党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这是组织的安排。他们如果不在我的身旁，那就是失职，失职那是要挨批评的。”

李敏正在想着心事，毛泽东拉过她说：

“娇娃，想什么事哩？”

“没有，没有什么……”

毛泽东拉着女儿，要她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参观工人的革新成果。随行记者马上摄下了这一珍贵镜头。

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决议批准了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向大会作的报告。

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正式文件公布。这个农业发展纲要更趋完善和系统。

会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决议批准了谭震林副总理向大会作的报告。

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审查意见。

4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看了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令人十分兴奋。这个报告是对前一阶段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有材料，有分析，很有说服力。报告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带有普遍性，对目前阶段所提出的几项工作也完全适合其他各地区。**现将这一报告发给你们，请好好地读一读，并可转发给各城市和工矿企业党委。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对征服技术落后的迫切愿望和极大的积极性，蕴藏着创造新事物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坚持自力更生、土洋结合、由土到洋的方针，就一定可以找到一条高速度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道路，一定可以使我国的技术面貌迅速改观。**

在伟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不但要研究、掌握这一伟大运动的发展规律，而且还要研究并且学会掌握技术发展的规律，创造新的技术科学。上海市委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成就，除了像报告中所提到的双水内冷发电机，印染工业中用“低、湿、冷”新工艺代替“高、干、热”旧工艺等以外；其他如太原市出现的热压焦，冶金部门的炼铁大风高温操作，以及机械、采掘、化工、轻工等各部门出现的种种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虽然有的还刚刚出现，有的还不那么成熟和完善，但是已经足以说明：**觉醒起来的6亿人民，不但可以很快地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能够从我国的具体条件出发，创造和发展世界上还没有的新技术，找到一条多快好省的、中国式的技术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决不能低估它的意义。**目前正在向前推进的伟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除了不到10%的企业以外，已经普遍开展起来，形势极好。目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加强领导，提高领导水平，使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地发展；对于少数干部中存在着的右倾思想和自满情绪进行不断的批判和克服，使一切企业、部门、科室、车间、工段的群众都充分的发动起来；与此同时，考虑**选择一个时间，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进行一次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群众性的检查、评比和总结，肯定成绩，及时地发现和解决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以便在巩固、提高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把运动推向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的更高阶段。**上海市委提出的几项工作，各地可以参照执行。

　 中央 1960年4月10日

4月20日，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了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

4月2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一文。

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主持起草的《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

上述3篇文章都经过了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尔后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而成。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些文章都没有公开点名批评苏联领导人，而是以批判南斯拉夫的名义来批判赫鲁晓夫。文章中没有引用一句赫鲁晓夫的话，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很多都是抄袭南斯拉夫的。陆定一的文章中说：

“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

这3篇文章从本质上揭露了修正主义的要害问题，所以，文章发表后，赫鲁晓夫很恐慌、很恼火。

毛泽东在组织人起草《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的时候，就开始组织反修文稿的写作班底，广泛搜集研究资料，准备和苏联修正主义打“文仗”。

这个班底有外交部、中联部、中宣部、中调部、新华社、《人民日报》、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红旗》杂志社、全总、共青团、妇联等十几个单位，他们广泛搜集马恩列斯对当代问题的论述、各国党特别是苏共赫鲁晓夫的言论、中国领导人的论述，以及美、英、法3国领导人的言论。先后收集了近千万字，分类编成摘录，弄清敌、我、友3方情况，为中苏大论战做好了准备。

4月2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转来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内部刊物4月22日编印的《意共〈再生月刊〉载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存在》一文上作了一个批示。

该文摘录了意共中央机关刊物《再生月刊》1960年第一期刊载的《资本主义社会内有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中的主要观点：1、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结构应开始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并且是夺取政权的前提。2、**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工厂、股份公司、生产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形式。**3、**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要去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使之爆炸，从而夺取政权，而是要解决这个矛盾。**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伯达、定一同志阅后，退小平同志。毛 24日

他又在下面批道：

此件可看。**典型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走狗的论点。**

4月25日，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可也没有忘记这一天是杨老太太的90大寿，他写信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向老太太祝寿。他在信中写道：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90寿辰，无以为敬，寄上200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200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

问候！

毛泽东 1960年4月25日

4月29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的陪同下，登上专列离开北京，又一次开始了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第一站到了天津。

4月30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正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及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他问道：

“国内国际比较1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

谭震林说：

“好得多！”

“怎么好得多？”

“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

谭震林又指指刘子厚说：

“他们这里的大名县也叫作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8两、12两，而是吃1斤（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将以前各国不一样的老称统一为16两1斤的称。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新称保留市制：“市制原定16两为1斤，因为折算麻烦，应当一律改为10两为1斤。”谭震林的话还是16两为1斤的老说法——笔者注），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8两粮食的样子。”

**毛泽东说：**

**“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里的人也不清楚。”**

**谭震林说：**

**“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

**毛泽东说：**

**“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

尽管毛泽东听到的是好消息，但他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

“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8两、9两、11两、12两。”

毛泽东感到很安慰，说道：

“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

廖鲁言说：

“今年大概6千亿斤。”

“保收多少呢？”

“保收6千亿斤。”

“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6千亿斤了？”

谭震林肯定地说：

“超过。”

廖鲁言说：

“今年多了1亿5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2亿。”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来到天津市海河北边的五一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

据石坚在回忆文章中记载：“永远难忘的是1960年4月底的一天，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把我叫去说，毛主席要和天津人民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经省委研究，这次宣传报道由省市新闻单位联合采访，你统一组织。他一再叮嘱我，这次报道一定要搞好。我当时刚刚从新华分社调到《天津日报》社，怀着既兴奋又感到压力的心情接受了任务。”

“5月1日上午，一列列的庆祝队伍，穿着节日的盛装，从四面八方来到 “五一广场”，期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12时55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和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等党政军首长陪同登上主席台，全场立刻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刘子厚讲话后，毛主席检阅了游行队伍。”

毛泽东还观看了文艺表演。

下午5时，毛泽东在杨尚昆等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

5月2日清晨，毛泽东抵达山东济南。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他首先询问了山东的旱情，要舒同等好好搞水利。他又问目前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

“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

**毛泽东说：**

**“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

**毛泽东知道山东缺粮，又问舒同：**

**“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

舒同说：

“中央答应1亿。我们今年调出去3亿5。”

毛泽东说：

“你们搞3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好一点？”

舒同说：

“今年的麦子原来140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100亿，少则90几亿，去年是80亿。”

毛泽东说：

“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

舒同说：

“那就好了，还有希望。”

5月3日，毛泽东在济南会见了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及代表。他们是：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巴西全国公务员工会和巴西全国银行职工联合会代表团；塞拉勒窝内和坦噶尼喀的妇女代表团及巴苏陀兰妇女代表；古巴、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的妇女代表团及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巴拉圭、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波多黎各、马提尼克的妇女代表。各国朋友见到毛泽东，纷纷上前同他亲切地握手，并和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和这些朋友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向他们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古巴以及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目前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他说：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表示对即将召开的4国首脑会议的支持。这些国家的朋友们也都谈了各自国家当前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及民主的斗争情况，并表示了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会见结束时，各国朋友热情地、依依不舍地唱着刚刚学会的“东方红”歌曲，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将客人们送到门口，向他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在济南一共住了三四天，与舒同谈了3次话。有一次，他与舒同谈到山东缺水时，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李贺《梦天》中的诗句：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旁边有人插话说，李贺的诗不好懂。毛泽东说：

“有些还是容易懂的。”

毛泽东还与舒同讨论了先秦齐国的历史，还说到了曹植封东阿王、陈王的事情，为了印证他的观点，随口背起了谢庄的《月赋》：

“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

毛泽东吟诵了一段，又说：

“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数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

欲知毛泽东离开济南后下一站去向哪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由鞍钢总工程师马宾执笔写出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的批示，请读者不妨多读一遍。这个批示也像毛公所说的《报告》那样：“**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从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非常善于抓典型，尔后以点带面，全方位地推动各地“**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方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样的事例在本传中数不胜数，而一些人却无端地吹嘘某某人是党内的经济专家；还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建国有功，治国有罪。这些荒谬的言论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可以休矣！

**第6章**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

**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

话说1960年5月6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郑州，河南省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劈头就问：

“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

杨蔚屏说：

“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

毛泽东问：

“单位产量呢？”

杨蔚屏说：

“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800多斤。”

毛泽东又问：

“有那么多没有？”

杨蔚屏肯定地回答说：

“他那里好。”

5月7日下午1点5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在二楼一个房间里休息，等待着会见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共54位朋友。他们是：索马里兰、塞内加尔、塞拉勒窝内、苏丹的社会活动家和和平人士；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代表团、刚果全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几内亚工人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喀麦隆劳工总联合会代表团、马达加斯加工会代表团、马里联邦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摩洛哥劳联代表团、桑给巴尔劳工联合会代表团和塞内加尔工会代表、法属索马里兰非洲人独立工会联合会代表；阿尔及利亚青年代表团、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团、喀麦隆青年代表团、桑给巴尔青年代表团和刚果青年代表。

2点30分，非洲客人们来到了省委招待所，毛泽东下了楼，站在接见大厅门外迎候。刚走下车门的一位非洲客人一眼便望见了毛泽东，他非常激动，高声叫道：“毛泽东！”其他下了车的客人也看见了，一边跟着高呼：“毛——泽——东！毛——泽——东！”一边拥上前去，争着和毛泽东握手。有几个客人喊道：

“注意秩序！”“排好队！”“不要乱！”

在礼宾人员的协助下，客人们按顺序排成单行，依次和毛泽东握手问候。宾主步入大厅，毛泽东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讲台，向客人们频频挥手，高兴地说：

“欢迎朋友们。”

客人们见毛泽东要讲话了，这才坐下来，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毛泽东接着说：

“我没有去过非洲。今天请朋友们当老师，给我上一课，讲讲非洲的主要情况，讲讲非洲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客人们一听便楞住了，他们面面相觑，想不到毛泽东是这般的真诚和谦虚。但很快就有十几个人举起手来，请求发言。毛泽东说：

“很好，这么多朋友愿意给我上课，我很高兴。”

一个客人说：

“我们不是作为教师给您上课，而是作为学生向您汇报非洲人民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

接下来，1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各自派代表发了言。毛泽东又说，请没有发言的朋友讲一讲。一个客人说：

“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多钟头，不应该再占用您的时间，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荣幸。请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教导我们如何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毛泽东站起身来，亲切地说：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接下来，他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高度评价了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世界意义和古巴人民的抗美斗争。

一个客人提问说，您对5月16日将在巴黎召开的美苏英法4国首脑会议有什么看法。毛泽东说：

“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我相信朋友们都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避免打世界大战。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要两条腿走路。4国首脑会议，或者大国协商，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了。我们支持4国首脑会议或大国协商，同时我们更支持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力反对他们的压迫。”

接着，他谈到了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和斗争策略问题。他说：

“**我们很高兴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有10年、8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完全破除迷信，站起来，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

毛泽东还对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克里姆说：

“**美国给戴高乐提供军火飞机侵略阿尔及利亚，是要把你们消灭掉，把我们灭掉，甚至把戴高乐也灭掉，只剩下它。戴高乐同美国又合作又有矛盾，在斗争中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我们与法国没有关系，只要有可能就会支持你们，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如果武器能够运到也可以支持。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举起手中的茶杯，说道：

“祝贺我们的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客人们纷纷起立，热烈鼓掌。

毛泽东请客人们到门外一起合影留念，尔后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送走客人，毛泽东来到临时办公室，要秘书去请熊向晖。据熊向晖记载说：

主席送走了非洲朋友，我去食堂吃饭。刘宁一忽然匆匆走来说，主席指示，今天会见非洲朋友要发表消息，等你去写。我跟着刘宁一走进主席办公室。主席靠在木制大躺椅上吸烟。我向主席问好。主席说，不握手了，坐吧。今天让你做“秀才”，桌上有烟，自己抽，增加点“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即灵感——笔者注）。

我坐在办公桌后的长背木椅上，刘宁一和杨尚昆坐在单人沙发上。

主席说，人家要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就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3号在济南开了一次，今天又开了一次。**这些小国、弱国的人民不简单，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信，比赫鲁晓夫高明。天下事千奇百怪，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硬是迷信帝国主义。**列宁不是讲过吗？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制度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赫鲁晓夫不赞成列宁。他说，现在有了那么多原子弹，能够毁灭全人类。所以，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避免战争，保持和平。他说，避免战争、保持和平必须依靠大国、强国的首脑，首先依靠美、苏两国的首脑。只要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信任，友好合作，达成裁军协议，就能让一切国家化剑为犁，天下就能永远太平。

主席说，赫鲁晓夫去年9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谈。他宣扬艾森豪威尔是爱好和平的。他9月30日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大放厥词，一吹他的美国之行如何如何成功，要我们不得破坏和平气氛；二吹他的裁军主张如何如何美妙，要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我们国庆10周年招待会上，他含沙射影，污蔑我们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主席说：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前年，他要在中国建立什么长波电台，搞什么潜水艇联合舰队。我们说，这涉及中国的主权，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他原来答应帮我们造原子弹，还签了协定，后来他说不帮了。不帮就不帮，我们不稀罕。中、苏两国之间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坚持原则，在内部对他进行批评，同时照顾大局，不由我们公之于世。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恐吓，说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会引起世界大战，必须马上扑灭。他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实际上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今年4月22日列宁诞生90周年，我们发表用红旗编辑部名义写的《列宁主义万岁》，对国际上的重大原则问题正面说明我们同赫鲁晓夫不同的观点。我们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注意维护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篇文章的内容不错，就是太长了，引经据典，书生气太重，一般人不爱看。所以在四大国首脑会议之前，我先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3号在济南，我同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工会和妇女代表谈话，尚昆没有参加，刘长胜和曹孟君参加了。我说，要发表简短消息。我有些“官僚”，没有看稿子。第二天报上登出来，虽然简短，内容有些不妥，写了人家唱“东方红”。写这干什么？大国沙文主义!今天再发表一次消息，写上非洲朋友讲话的要点，写上我讲话的要点，要表明我们的反帝立场。不要长，要快，半个钟头够了吧。

我说，我就试试。我稍微考虑了一下，用圆珠笔在拍纸薄上写。写完后看了一遍，作了个别增删。一共写了4段：

第一段：“新华社郑州7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他们是：（代表团名单容即增补）”

第二段：“在接见中，各个代表团都作了热烈的发言，介绍了他们多少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榨取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介绍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表达了他们争取彻底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并且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于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

第三段：“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完全支持。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主义斗争。毛主席感谢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祝贺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伟大团结，祝贺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第四段：“今天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刘宁一”。

我把稿子交给刘宁一。他和杨尚昆传看后，改了几个字，请主席过目。卫士打开躺椅后的立灯，把木板架安置在躺椅上，把稿子放在木架上，主席一边吸烟一边看。在审阅过程中，主席问：

“‘代表团名单容即增补’，增补了没有呀？”

我说：我正在搞。主席继续审阅，说，对非洲朋友的讲话，概括得还可以，有一句要不得。他让卫士递给他一只圆珠笔，划去了几个字。又加上几个字。

主席问：代表团名单搞出来没有？我说，搞出来了。主席要我递给他，他看后问：名单为什么这样排？我说明理由。主席说，排名单要能讲出道理。搞不好，人家会有意见。这个排法我赞成。我说，主席真细致。主席说，在济南做了一次“官僚”，现在“辞职”了。

主席要我从头到尾念一遍。我发现，杨尚昆、刘宁一把原稿最后一句的“祝贺”改成“并且确信”，“彻底”改成“最后”；主席把原稿第二段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划掉了；在第三段最后一句“并且确信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在“取得最后的胜利”前面加上“一定会”。我念完后，主席说，就这样，下点毛毛雨，捅出去吧。刘宁一说，已经让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在招待所等。我说，我就去办。

我回到餐厅，把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雷行找来，他看了稿子，要拿回发。我说，稿子上有主席亲笔修改的字句，我要留作纪念，让他另抄。这时，刘宁一赶来了，把稿子拿走，说，主席还要再看看。

雷行说，他马上给北京新华总社打电话，报告这件事，总社要通知全国各大报，留出明天头版的版面。

不一会，刘宁一又匆匆来了，说，主席口授，他笔录，加了一段，内容非常好，主席让你再去谈谈。我随即跟他回到主席办公室。主席仍靠在躺椅上吸烟，我看到在原稿第二段“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正义斗争”之后，刘宁一笔录了以下一段话：

“他认为：南朝鲜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这种斗争，表明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将会有更大的兴起。这个斗争对于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将是一种支持。主席说，所以，全世界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我看完后说，刚才宁一同志对我讲，主席加的这一段非常好。的确非常好，把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的主要内容突出出来了。

主席说，找你来，不是让你讲“非常好。非常好”。我临时想了这几句，来不及推敲，你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我又看了一遍，说，在文字上有几点小建议。开头的“他认为”，改成“主席认为”，这样，前后比较连贯。主席说，可以。还有呢？我说，在“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之后，加上“风暴”两个字。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几次讲了“风暴”，“斗争风暴”比“斗争”更有气势。赫鲁晓夫经常鼓吹，现在国际关系晴雨表的指针，不是指向暴风雨，也不是指向阴天，而是指向晴天；改成“斗争风暴”，也是间接驳赫鲁晓夫的。

主席微笑着说，你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倒有点研究。还有什么要改的？我说，最后那个“所以”似乎可以不要。主席说，我常说“所以”，有点习惯了，刚才不知不觉说了出来，刘宁一就记了下来，这里不必要形成文字。主席风趣地说，所以，“所以”两个字可以删掉。

主席又让我把这条新闻稿从头到尾念一遍，念完后，主席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杨尚昆说，很好了，没有意见了，早点发出去，再迟，新华社就难办了。

我说，我这就去办。并说，今天人民日报第5版的新闻很重要，请主席看看。主席说，今天还没有看报纸，有什么重要新闻？我说，美国一架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打下来了。

主席说：美国的侵略行动搞到苏联头上，赫鲁晓夫还在幻想“加强普遍和平”。我看，我们将来应该出赫鲁晓夫全集。

主席对杨尚昆说，通知北京，帮赫鲁晓夫一把，公开表示我们支持苏联打下美国的飞机，支持苏联对美国的抗议，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美帝，对苏联挑衅就是对中国挑衅，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挑衅。

主席说，时间很晚了，大家散了吧，我也要回火车去了。

5月8日下午2点30分，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代表，共25位朋友。他们是：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代表团、哥伦比亚石油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哥斯达黎加工会代表团、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和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秘鲁的文化、教育、政法等界的著名人士。同时接见的还有古巴军队总督察威廉·加尔维斯·罗德里格斯少校和他的夫人。

据熊向晖记载：落座后，主席首先说，欢迎朋友们。拉丁美洲距离中国很远，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很不容易。利用这个机会，请朋友们向我介绍拉丁美洲的主要情况，并且欢迎朋友们对中国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几位外宾分别发言，主席坐着认真听取，有时在拍纸簿上记下要点。一位外宾说，我们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到中国的，现在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主席站起来说，我讲一些情况和意见，不是作指示。主席在详细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后说，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有中国的条件。经验不能照搬，只能参考。还希望朋友们作分析，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有哪些是成绩，有哪些是错误，现在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我们用整风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和批评。**中国犯的错误，你们研究也有意义，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主席针对外宾们提出的反帝斗争的问题，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的问题，作了生动的深刻的阐述。

主席送走拉丁美洲朋友后，我回到卧室。不久，刘宁一来找我，说主席指示今天还要发消息，等你去写。我随他走进二楼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非洲朋友们很热情，拉丁美洲朋友也是这样。弱国、小国人民会议开得好，有共同语言。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们就宣布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领土主权决不容许别人侵犯，谁来侵犯，我们就要自卫，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对我们进行建设有利。我们也同帝国主义打交道，譬如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同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还在继续。我们坚持原则，不抱幻想，同赫鲁晓夫不同。对世界大战，我们说了两条，第一，反对；第二，不怕。**赫鲁晓夫和我们半同，半不同。他反对世界大战，又害怕世界大战，越怕越有鬼，越怕世界越不和平，如今连苏联的领空也不和平了。世界为什么不和平？怎样才能和平？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赫鲁晓夫完全依赖大国协商，我们强调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小国弱国的人民同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以，还要发消息，让世人听听小国弱国人民的声音，听听我们的声音。照昨天的规矩，不要长，要快。

根据昨天的经验，我事先作了考虑，并且已写好第一段的导语，听完主席的指示，我着手写正文。写完交给刘宁一。刘宁一同杨尚昆、孔原传阅商量后，作了一点改动，送给主席。主席先让我念一遍。我念道：

“新华社郑州8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朋友们。接见中，毛泽东主席首先表示了对拉丁美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朋友们向毛泽东主席谈到在中国参观访问的观感。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称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赞中国人民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贡献。他们还谈到了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日益发展的友谊。他们说，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介绍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并和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主席说，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正在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主席说，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主席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主席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主席说，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斗争也帮助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

我念完后，主席要我递给他，卫士安放了木板架，主席摆在上面看，亲笔作了修改，让卫士送还我，**我发现主席改动了3处：把第二段中“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改成“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在这段最末一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之前加上“一定会”；把第三段第一句“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中的“称赞”改成“友谊”。**

主席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后两处，主席改得非常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只表达了可能性，主席加上“一定会”，就表达了必然性。“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太庸俗，主席把“称赞”改成“友谊”，含意和格调就完全不同，非常亲切、得体。只是对主席对第一处的改动，我不理解。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昨天写了非洲朋友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他们的原话，主席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删掉了，说是“要不得”。今天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刘宁一说，主席的指示很深刻，我们要好好学习。这篇新闻稿这就样定下来吧!

主席又要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当念到“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时，主席说，这里有点突兀，在“一定会”前面加上“这样”。我照加了。主席想了一下又说，加上“这样”，语气有些散，改成“就”字，“就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你们看怎么样？大家都说好。我涂去了“这样”，加上“就”字。

杨尚昆说，今天的新闻稿比昨天的更有分量，就这样发出去吧。主席点点头。我辞出，把主席审定的新闻稿交给已在宾馆等候的雷行。

5月9日下午2点30分，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西亚3个国家的代表团，共23位朋友。他们是：伊拉克文化代表团、伊拉克工人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团和塞浦路斯劳工联合会代表团。

据熊向晖记载：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指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正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蒋介石、李承晚、岸信介、巴蒂斯塔、赛义德、曼德列斯之流，或者已经被人民所推翻，或者将要被人民所推翻。这些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主席说，日本人民正在行动起来，现在广大的日本人民正在举行比过去规模更大的示威，反对岸信介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签订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

主席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主席说，**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

**主席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应当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蒋介石为什么被赶出大陆？因为他脱离群众。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他们是生产者，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生活。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还有别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知识分子——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少不了的。他们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主席指着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他是一个穆罕默德，今年53岁，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开会，我们不能脱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他信穆罕默德，又不是共产党，那没有关系。他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而且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那更好办事。有各色各样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只有1300万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力争团结六亿三千七百万非共产党员。被打倒的阶级，譬如地主阶级，我们也要改造。主席说要战胜帝国主义，不是短期的事，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外国来说，只能有选择有分析地来对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外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我所讲的话，只供朋友们参考。

接着，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3国外宾各有一位代表简短发言，感谢毛主席的接见和谈话，并表示要加强本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最后，毛泽东举杯祝贺世界人民的进一步的团结，祝贺日本人民斗争的胜利，祝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胜利。

主席送走西亚3国朋友后，刘宁一把我找到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晚上我有事，今天没有请亚洲朋友多发表意见，他们不会见怪吧？刘宁一说，不会。今天的气氛和前两天一样热烈。**主席说，这次在郑州，用3个下午开了3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3次讲话大同小异，发表消息每次有一个重点。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今天要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主席让我快写，我写完后照例送给刘宁一，他照例给杨尚昆传看后，送给主席。主席改了一个字，其余未动。

主席从躺椅上起来，说，我要回火车去了。

趁主席整衣的机会，我把新闻稿交给雷行。回来时，主席已走出办公室门外。主席说，都不要送了。主席同刘宁一和我分别握手，在杨尚昆和卫士的陪同下，离开了招待所。

5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

“地方要搞铁路，搞汽车，通河流的地方要搞轮船，空中要搞运输飞机。”

他问起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

“去年从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3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1942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一部分地区欠收，对灾情估计不足；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今年准备好好总结总结，接受教训。明年有可能不犯头两年的错误，不过还不能大意。**”**

毛泽东说：

“对于事物，首先是认识它，然后才能改变它，而认识要有个过程。我们中央、省这两级做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选一点要点去看一看，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

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连地委也是不甚了了。**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

他又问：

“河南现在有多少人？”

吴芝圃说：

“5100万。”

毛泽东说：

“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到南水北调问题。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由吴芝圃等陪同到郑州东郊人民公社燕庄看小麦生长情况，又接见了河南省和郑州市的直属机关的干部一万人左右，还参观了河南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展览会。

晚8时左右，毛泽东离开郑州，南下武汉。

5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

5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要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如下：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之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也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自从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6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根据现有情况看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它证明了中央对于农村基本情况的分析，是正确的。

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和原则，中央在上述两个指示中已经有所规定。总的来说，就是：“**三反”运动一定要搞，搞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犯有错误而不严重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那些错误极其严重、民愤极大的人则应该坚决惩办。通过这一运动，主要地达到两个目的，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为了推动“三反”运动更好的发展，中央再提出以下意见，请各地注意掌握：

一、**必须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忠心耿耿，朝气勃勃，艰苦朴素，敢想敢干，并且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觉悟。**正是这些同志，带领了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完成党在农村中的各项工作任务。在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人思想作风上虽有某些缺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好干部。另外，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对于这种总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只有这样，在开展“三反”运动时，才能避免发生偏差，才不至使打击面过宽，才能不让坏分子乘机钻空子，才能真正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是他们所犯的这类错误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这类错误所以存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干部队伍的侵蚀。“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不及时地进行这种斗争，这类资产阶级思想蔓延开来，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在这方面，同样地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把运动搞深搞透；必须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只有这样，才能大大的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更迅速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对一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对于犯错误的人，则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情节的轻重和态度好坏，区别对待。目的是团结和教育极大多数，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

根据已有的材料，犯错误的人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共产主义觉悟不够，在经济手续和工作作风方面，有某些毛病。虽然他们占了一些小便宜，挪用一些公款，有小量贪污，或者在有些事情上犯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错误。但是他们基本上仍然是好同志，对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是坚决的积极努力的，作了不少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工作的。在犯错误的干部中间，这类同志占很大的比例。以贪污的情况为例，**湖北有个材料说，犯有这类错误的人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23%。他们平均每人贪污40几元；贪污100元以上的只占百分之几，多数是二三十元。**对于这样的人，应该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一般不要给以处分，不戴贪污帽子，主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使他们今后能够更好的工作。另外一类，是犯有较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这类人比前一类的人数少得多，大体上只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几。对这些人则必须坚决地进行斗争，给以必要的组织处理。其中少数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应该坚决撤换（是党员的，应该开除党籍），以至逮捕法办。

**在运动中，必然会揭发出隐藏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和蜕化变质的分子。这些人都应该一律清除出去，已混入党内的，应该清除出党。罪行严重的，应该给以法律制裁。**

这次“三反”运动中，对于那些犯错误的人，处分的面一般不宜太宽，大体上以控制在3%以下为宜。其中受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处分的应控制布1%以下，逮捕法办的更应该是极少数。

二、在农村基层干部中，需要进行“三反”检查的，应该是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和财贸系统的基层干部，特别要注意公社一级和公社直接经营的企业单位。对他们，“三反”运动应该以反贪污为重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铺张浪费也必须反，但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有什么反什么。**至于没有担任干部职务的农村党团员，需要作检查处理的，一般只在党团组织内部进行，不在群众中公开批判。某些社员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也应该另选时机，通过正面教育，引导他们自觉改正错误，不要把它同“三反”运动纠缠在一起。**

对于那些犯有贪污、多占、挪用等错误的人，各地在处理时，还必须注意以下的方面：**不论什么人，不论贪污、多占、挪用的数量大小，都必退必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回，对贪污数量大或贪污行为恶劣的人还可以用强制劳动的办法补偿；计算的时间，除了少数严重的大贪污犯以外，一般地从一九五九年算起，而不要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算贪污和不算贪污的界限，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处分面的控制比例，分别规定，一般不宜过低，大体上以二百元、三百元为宜。**瞒产私分的行为，不在“三反”运动范围内清算。**

三、**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因此，“三反”运动必须紧密地结合生产、利用农事间隙时间来进行，使它成为推动生产的力量。**各地在开展“三反”运动时，都必须很好地掌握这一原则。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由各省（区）市自行安排，中央不作统一规定。

“三反”运动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进行，要有始有终，不要一轰而起，一轰而散。在运动中，应该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以当地的党的组织为领导核心，依靠贫农、新老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应该充分发动群众，并且广泛地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应该尽可能运用原有的社员代表会议、社员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同时，**在运动中必须坚决防止任何违法乱纪的作法，反对逼供信；严格禁止干部压制群众，打击报复；不许打人骂人或采用其他的变相肉刑，来对待犯错误的人。**

四、必须了解，**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问题才可能基本解决。**为此，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定期地开展“三反”运动。同时，还应该订立必要的制度，以加强党员、干部同群众的联系，并且在工作中，加强群众性的监督。中央要求全国各部门各地方，认真地、进一步地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采取具体措施以防止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此外，中央还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贯彻执行下列的规定：

**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各级机关和党的组织，除招待外宾外，都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

**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时间，由各省、市、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

**在最近几年以内，所有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不得盖大礼堂、办公楼、招待所或进行其他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抓紧生产小商品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需要多种多样的小商品，例如日用小百货、小五金、零星的生活用品、家庭用品和一些小农副产品等。这些小商品供应得充分，人民生活就感到方便；供应得不充分，人民生活就感到不方便。**小商品在社会商品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大体估算，约占社会商品流通总额的30%至40%。因此，**抓紧小商品的生产，不仅是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有关吸收社会购买力，稳定市场物价的重要问题。**去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以后，各地党委对这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小商品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去年第4季度和今年第1季度小商品的供应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据有关部门的反映，最近某些小商品的生产，又有减少的趋势。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某些地区最近没有抓紧小商品生产，以致有些原来使用于小商品生产的原料材料，又被其他方面挤掉了，有些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又改产别的东西了，小商品品种不全的情况已经开始在市场上有所表现（**如蝇拍子、卫生球和仁丹等夏令小商品已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如果不及早注意抓紧，再过一个时期，小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还会更加显著，因此，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小商品生产问题加以注意，认真地进行一次讨论，切实安排原料材料，切实安排制造能力，**务必做到各地的小商品生产，在品种上和数量上，比去年第4季度和今年第1季度不仅不减少，而且还有增加。同时，还应当继续抓紧废品回收工作和“小夏收”、“小秋收”运动，一年4季都要抓，丝毫不要放松。**

中央 1960年5月16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对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请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报告中所提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安排。

**两年多的经验证明，钢铁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小洋群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对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和改善工业的地区分布，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打破了人们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成为技术革命的开路先锋，**同时也是支援农业的一个重要关键。**为了更好地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为主而且以小洋群为主的方针，进一步破除主观的片面的贪大贪洋的意识形态，改变那种认为发展小洋群是一时权宜之计的观点，明确树立发展小洋群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随着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人们对大型企业的观念也需要改变，过去设计是中小型的企业，生产效率成倍的提高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型企业了。而“小洋群”配成套升级后也就成为中型的企业了。**对于这种新的情况也必须充分重视，从而使各行各业的小洋群企业获得更为普遍与发展。

　 中央 1960年5月16日

5月17日，毛泽东离开武汉。

5月18日，毛泽东到了长沙，专列停在大托铺专线上，他接见了省委常委以上干部。

毛泽东在同张平化谈起韶山滴水洞的地理形势时，又提起了想在那里搭一茅棚的愿望。

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相继来到湖南，与毛泽东会合。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轿车游览长沙市容。车子行驶到橘子洲，毛泽东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回忆起青年时代与同学们纵论天下大事的情景，不免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诗句。

“‘橘子洲头……’”他深情地吟罢，又对周恩来解释说：“这橘子洲又称橘洲，水陆洲，水鹭洲，长岛。**还有人也曾用这水陆洲之名写过一幅楹联**。”

说至此，他不由得灵机一动，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恩来，我出一上联，你能对下联吗？”

周恩来说：

“主席请讲。”

毛泽东吟道：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周恩来一听，知道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将眼前穿梭般的船只与千古不移的江洲自然融入一联，而且，此联中动静相对，意境悠远，3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自己一时也难以想出合适的下联，正在思索间，车子已经开到了天心阁，他看到天心阁石柱上镌刻着刘策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道是：

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水陆洲，洲泊舟，舟流洲不流。

顿时高兴起来，心想：主席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将下联易了5个字作上联，我何不将上联易一个字来对你的上联呢！想罢，他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的下联有了。你的上联是：‘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我的下联可对：‘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毛泽东此时也正在观赏着在湖南一师时的历史老师刘策成的这一楹联，听周恩来如此一说，甚是佩服他的机巧与灵敏，二人会意地相视而笑。

5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途经株洲，他和刘少奇等人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美国U-2型间谍飞机5月1日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击落。5月16日，苏、美、英、法4国政府首脑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苏美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是好的。

5月20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20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

5月21日，毛泽东经九江到达杭州，下车后在南屏游泳池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举行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

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使世界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了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想就此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他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说赫鲁晓夫在1955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

“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10月3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5月1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5月2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

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5月22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17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

陆定一说：

“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

大家认为，对苏共的方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一下。毛泽东说：

“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

在谈到赫鲁晓夫时，毛泽东还说：

“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12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吗？**”

扩大会议还讨论和制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说：

“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的手里，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介石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总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后来，周恩来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说，台湾回归祖国后，可以行使自治权，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还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对台湾的关系。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对毛泽东在1960年5月7、8、9日三次接见外宾的情况，作为和小国朋友交往的特例，尽可能地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毛公说：“**这次在郑州，用3个下午开了3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3次讲话大同小异”。“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今天要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请看，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讲话，竟然像写文章一样，不但有条有理，而且层次分明，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思想，实在是高明！

**第7章**

“**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

**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

**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

**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

话说1960年5月24日，毛泽东开始审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

5月24日这一天，英国退役的73岁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中国政府由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出面接待了他。

5月25日上午10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与蒙哥马利进行了会谈。

5月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蒙哥马利进行第2次会谈。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蒙哥马利，出席作陪的有陈毅，还有溥仪、荣毅仁、杜聿明等。周恩来依次为蒙哥马利作了介绍。当介绍到杜聿明先生时，周恩来诙谐地说：

“这位是杜聿明将军，他同陈毅元帅作过战。”

陈毅也走上前去，与杜聿明亲切握手，微笑着告诉蒙哥马利说：

“他是我的对手。”

蒙哥马利饶有兴趣地问：

“政治上的对手？”

陈毅说：

“军事上的对手。我们在1948年打了一仗，打得昏天黑地，很凶啊！”

蒙哥马利问道：

“你们最后谁战胜了？”

周恩来指着陈毅说：

“他获胜了。”

蒙哥马利问杜聿明：

“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

杜聿明回答说：

“100万。”

“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蒙哥马利耸耸肩膀，摇了摇头。杜聿明指着陈毅说：

“你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他有200万，我的人都跑到他那儿去了。”

众人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5月27日，毛泽东从杭州到了上海，会见来上海的蒙哥马利元帅。

当蒙哥马利走进毛泽东住所时，毛泽东正从一个宽大的沙发上站起来，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二人握手寒暄后，分宾主落座。毛泽东和这位曾经的军事统帅谈到了中国的历史人物。蒙哥马利说：

“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说：

“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有很多好东西。”

蒙哥马利问：

“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13篇。”毛泽东点了一支烟，突然转变了话题，问道：“你知道你是在与一个侵略者谈话吗？你是在与一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

蒙哥马利回答说：

“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过去在这方面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

毛泽东闻言，朗声笑了起来。蒙哥马利也跟着笑了起来。这笑声缩短了“东西方距离”。蒙哥马利问：

“请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世界形势的看法吧。”

毛泽东从容地说：

“国际形势很好，没有什么坏的，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哥马利不解地说：

“这是很坏的。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泽东说：

“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点点头说：

“是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再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紧张。”

毛泽东说：

“美国在全世界有250个军事基地，300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又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哥马利说：

“**是的，我想是可能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我愿意从事使4国能在一起的工作**。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道：

“**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让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3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中国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哥马利问：

“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3条原则：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说：

“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蒙哥马利将话锋一转，谈到了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他还说：

“中国人民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已经迸发出来了，并找到了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出路，伟大的力量正在推动中国迅速前进。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和巨大力量的强国。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50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地改善，教育问题和建房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看新中国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听完译员的翻译，“哦”了一声。他知道蒙哥马利早在1958年的时候就在回忆录里写道：“在远东，倘若各国恐惧外来侵略的话，那是中国而非俄国，我们必须这样看待问题，并据此推行健全而一贯的政策。”于是，他便看着蒙哥马利，略带嘲讽地说：

“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要向国外进行侵略了？是不是？”

“我并不愿意这样设想。”蒙哥马利耸耸肩，接着说：“但是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它就要向外扩张领土，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我的国家，再看看美国就知道了。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

毛泽东说：

“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180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哥马利略带疑问地说：

“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吸了口烟，缓慢而认真地说道：

“这种事情不可能确切地说它就会出现在中国或世界其它国家，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不可能知道了，因为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那时会有新的领袖出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中国绝不会越出边界侵略别人，也不企图将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至少50年以后，玉皇大帝所管辖的范围还是960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了人家一寸的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了。**在一切边界纠纷中，我们主张采用谈判方式，决不对其它国家进行侵略。**”

他停顿了一下，又真诚而坚定地说：

“中国自己遭受过如此深重的外国侵略和剥削，今天的中国无意使任何其它国家遭受这种屈辱，中国只要求别人不干涉它的事情，让它从过去受别的国家侵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如果遭到攻击，它将以一切力量保卫自己。”

毛泽东还说：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我们不感到英法是个威胁，我们希望英法强大起来。**中国愿意和西方国家友好相处，尤其是同英国人民的亲密关系比任何东西都宝贵。”**

蒙哥马利歉意地说：

“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泽东说：

“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现在，只剩下个别问题。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负责人的接见。”

蒙哥马利马上说：

“这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苏、中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和戴高乐很熟。戴高乐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泽东说：

“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也很大。他把法国的一半军队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会谈就要结束了，蒙哥马利很友善地对毛泽东说：

“很可惜，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闭门的社会，这种社会，使西方人不能很好地了解中国，造成了许多曲解。”

他还说“闭门的社会”对中国对世界都不利。

这次会见，毛泽东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哥马利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与毛的会谈》的文章，文章中说：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后，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了杭州，继续审阅《毛选》第4卷的注释。

5月29日，林伯渠因病逝世。

5月30日，毛泽东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尊敬的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

我很高兴会见了您的战友、古巴起义军总督察威廉·加尔维斯·罗德里格斯少校，非常感谢您托他带来的热情的友好的问候。

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英雄的古巴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独裁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你们又英勇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进行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繁荣民族经济所必需的土地改革和其它改革。**你们是在最接近美国的地区进行正义的革命斗争。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的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从你们胜利的斗争中，大大增强了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中国人民和我本人，一直非常关心您所领导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长期生活在革命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斗争，感到特别亲切。相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相互支持、相互鼓舞的。你们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进步和胜利，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你们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每一次侵略、轰炸和破坏，都使我们极其愤怒。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是共患难的战友。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胜利斗争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来支持你们的正义事业。

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结局，已经确定无疑了。这是不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采取和准备采取各种穷凶极恶的手段，以图挽救他们的灭亡。在我们两国人民面前和世界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古巴和各国人民今后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复杂的、曲折的。但是，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我们坚定地相信，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最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正义事业的彻底胜利。

请您，尊敬的古巴总理，接受全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崇高敬意。祝您健康！祝中国和古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祝古巴人民革命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 1960年5月30日

1960年6月2日，毛泽东审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题解和注释工作全部结束。

在第4卷的题解和注释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到彭德怀。田家英就彭德怀的名字和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这一敏感问题，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明确指示说：

“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

6月2日这一天，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

6月7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推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

6月8日至9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

会议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

6月1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推迟布加勒斯特代表会议的意见；提出在兄弟党会晤中初步交换意见，确定代表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同时就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做任何决定。信中还建议：代表会议除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党代表以外，最好还要有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参加。

6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2个五年计划后3年的补充计划。

6月13日，毛泽东读报有感，写了一首七律，用辛辣的语言讽刺了赫鲁晓夫，诗云：

托洛斯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青云飘下能言鸟，黑海翻起愤怒鱼。

爱丽舍宫唇发黑，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6月14日，毛泽东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做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订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订高了，就是棉、油、糖。”“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100个，结果是360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1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1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此时，毛泽东获悉了一个有关台湾海峡的重要信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把台湾变成侵略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在6月17日至19日亲自访问台湾。毛泽东当即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并发表由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

毛泽东在《告同胞书》中写道：

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们：

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同过去的杜勒斯一样，向来对你们不怀好意。一年多以前，杜勒斯到你们那里去，对你们施加压力，要你们服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把台湾完全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当时，我们打了炮，你们抵抗了美国人，杜勒斯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是我们的敌人，也是台、澎、金、马一切爱国同胞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的名声越来越臭。不久以前，艾森豪威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受了美国很久很深的压迫，对美国的反抗也最猛烈。艾森豪威尔这次从太平洋东边跑到太平洋西边来，就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侵略阵地，加强它对亚洲各国人民的压迫。对于这么一个“瘟神”，人们是知道应当怎样“欢迎”他的。这次艾森豪威尔宣布要“访问”的地方，到处掀起了反对的浪潮。艾森豪威尔是硬着头皮来的。**切不要以为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多么厉害。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起来一轰，就叫美帝国主义手忙脚乱，就把美国的两个忠实走狗李承晚、曼德列斯赶下了台。**美国在日本驻扎了重兵，岸信介卖国政府死心塌地要跟美国订立军事同盟。可是日本人民不答应，一次斗争接着一次斗争，闹得天翻地覆。艾森豪威尔被英勇的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顿下马威，他自己也吃了闭门羹。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已经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强盗旅行。台、澎、金、马的爱国同胞，你们当然不能容许艾森豪威尔在你们头上耀武扬威。**3年前，你们捣毁过台北的美国“大使馆”，这是反美爱国斗争的光荣记录。当美国的忠实走狗，随人俯仰，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知道，你们并不甘心忍受美国的欺侮。美国人在你们那里策动“台湾自治”，制造反对派，已经使你们伤透脑筋。事到紧急关头，美国人不会对他的走狗讲什么义气。李承晚、曼德列斯，就是前车之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人，看了这种情况，能不寒心？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团结起来，同美国侵略者坚决斗争。

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一切不愿意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台、澎、金、马爱国同胞，一定都会赞成。为了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特此事先说明。**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呆在安全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

1960年6月17日

福建前线部队政委刘培善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立即组织了炮3师、炮6师7团、40团、28军、31军、福建省军区所属炮兵部队和41军、60军炮兵团各一部，共35个炮兵营的420余门火炮，准备实施炮击。

6月17日，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

是日晚8时，福建前线反对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的示威炮击开始了。此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军舰，已经驶抵台湾火烧岛附近，他一听说解放军正在打炮，就埋怨说：

“中共不加选择地炮击。”

他命令军舰即刻加速驶向基隆港。

是日晚11时，福建前线再次向金门进行了40分钟的炮击。

在此次炮战中，福建前线共发射炮弹30000余发。金门仅向大陆上的莲河地区，打了28发炮弹。美方对此甚为不满。

后来在6月19日早晨，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台湾，福建前线部队于6时和8时半，两次开炮示威。每次炮击50分钟，发射炮弹38000余发。大、小金门国民党军向大陆打了千余发炮弹。

6月18日清晨，毛泽东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了《十年总结》一文。后人将该文的部分内容以《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为题，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今抄录如下：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1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2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这天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就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他说：

“后3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周恩来说：

“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说：

“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预料的情况果然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会议上向各国党的代表团散发了所谓的《通知书》，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

6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周恩来、柯庆施在座。据曾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的白土吾夫回忆说：“1960年，我随以野间宏先生为团长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一开始，毛主席就问：

‘你们这里面谁最年轻，最没有名气？’

我当时坐在后面，举手说：‘我。’毛主席笑了，风趣地说：

‘我年轻时，没有名气，但工作做了不少。现在有点名气了，工作就不像以前那样做得多了。大量的工作是那些没有名气，默默无闻的人干的。但**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人民服务。’**

我本来很紧张，毛主席的这番话，使我的精神放松了，同时也暗下决心，要默默无闻地为日中文化交流干一辈子。”

毛泽东在会见时的谈话中说：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胜利斗争，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同前几年比较起来，日本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广大的日本人民群众都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民的共同敌人。在这次斗争中，从它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以及持续时间之久说来，是以前难以设想的。看来，日本人民已经找到了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反对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美国军事基地、赶走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好办法，这就是团结一切除了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全民性的群众斗争。

我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外国人统治。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很有希望的。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取消美国军事基地，日本的独立与和平就会有保证。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

毛泽东祝日本人民在反美爱国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对于在抗议运动中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的英勇牺牲表示尊敬。他说：

“桦美智子已经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

后来，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成员之一的竹内实回国后也曾撰文记述了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情景和一些谈话内容，该文发表于1960年9月号的《新日本文学》上，后收入1978年日本新泉社出版的竹内实著《毛泽东笔记》一书中，其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1960年5至6月间，日本首相岸信介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抗议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毛泽东的谈话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毛泽东说：

“美国在日本有许多军事基地，怎么才能让这些基地撤走？这是很伤脑筋的事，跟他们打仗不行。不过，现在日本国民想出个好主意，这就是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中国以前基本上也是采取了这种方法。中国还有武装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没有武装斗争。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外国的条约——巴黎和约，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两年后，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最初，人数很少，只有几十个人。当时是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后，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那是1926年。

当1927年与国民党合作进行的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蒋介石反对共产党了。那时，我们没有内战的准备，来了个突然袭击。党内出了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我们是迫不得已同国民党打内战的。这场内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我们在山上同国民党打了10年。那以后同日本的军国主义、日本军阀打仗。同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们又与国民党合作了，那是1937年的事。**我曾经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起这段历史，一些日本朋友向我们道歉，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很不好。我告诉他们，侵略当然是坏事，不过也不能只看到坏的一面，日本还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哩！如果没有日本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民也不会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要感谢日本‘皇军’哩。就是说，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在谈到中日两国的不同时，毛泽东说：

“当然，日本受压迫的历史不长，只有15年。中国受压迫的历史很长，达100多年。你们日本的工业、经济和文化比我们发达，我们还是个落后的国家。现在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落后的痕迹。因为人口太多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日本已经普及中等教育了吧？所有人都能受教育吗？”

当代表团成员回答日本已经实行初中（即9年）义务教育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经过若干年后，工人农民也会达到像你们一样的程度。当然，社会制度不同。”

毛泽东问日本客人：

“日本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代表团成员回答说有。毛泽东说：

“这个阶层是需要团结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的资本家谈一谈嘛。”

谈话中，毛泽东在询问了代表团每个成员的年龄后说：

“你们的年龄都比我小，有的相当年轻。**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年轻人干的。有几个条件，年轻人、不大知名的人、地位低的人和没有钱的人做了许多事情。**如英国有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他是个工人。**大多数发明创造70%以上都是那些不大知名的、地位低的、没有财产的人搞出来的。**1958年，我曾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过这个问题。后来又作了调查。近300年来，全世界有发明创造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从统计的结果看，70%以上是年轻人和不知名的人。日本的情况如何？我不大相信事都是年纪大的和地位高的人做的。”

毛泽东还谈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我的觉悟也是逐渐提高的。我在中学读书时，还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我的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子，第二阶段是进学校学资本主义。我曾相信康德的观念论和二元论。客观形势促使我和我周围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也是这样。**我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因为拿不出学费，而且环境也不允许我继续学习。所以我只在中等师范学校学习了，当时想当小学校的教员。实际上，我确实当了几年小学教员，也当过小学校长。**那时一心想当个好教员，并没有考虑想成为共产党。当时的斗争是反军阀、争民主、抵制日货。那个时候，我读了《新青年》，这不是最早的共产主义杂志。后来教员也当不成了，最后只好搞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在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学习双方的优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当代表团成员问到，不知您有没有写新的哲学著作的考虑时，毛泽东容光焕发，表情里充满力量。他质朴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总是没有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许能再写一本。因为《矛盾论》是1937年写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可能需要总结一下那以后到现在中国的经验，但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

毛泽东谦逊地说：

“因为有了名气，我的创造性就少了。这也是自然规律嘛，因为年纪大了。”

6月22日，彭真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赫鲁晓夫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见，会见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

6月23日，**苏共代表团将散发的《通知书》改为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所署日期仍是6月21日，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团。信中内容全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的观点。这是苏共中央挑起全面论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一天，苏共中央还给中共中央代表团送来了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24日开会讨论。

彭真立即致电中央，报告了苏共信件的要点。毛泽东在上海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抄件。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柯庆施也参加了会议，讨论苏共的信件。从这一次开始，一连5天，毛泽东4人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讨论、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赫鲁晓夫的斗争。

6月24日至26日，在各国党准备约定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交换意见会议上，由于赫鲁晓夫的挑动，一些与会者对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了围攻，他们谩骂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

彭真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了反击，单批赫鲁晓夫，批评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会谈公报草案，逼着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后来彭真提出了中共中央的修改草案，建议会议进行讨论。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一个各国党都同意的公报。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火，但他也只好暂时忍耐。消息传到国内，刘少奇说：

“赫鲁晓夫很像高俅，就是恶霸兼流氓。”

“他比不上高俅，他只能当个蒋门神，就是《水浒》里的蒋门神。高俅的吃客。”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豢养的一只狗。他还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之间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6月26日下午3时，毛泽东派人用车将他湖南一师数学老师王正枢的二儿媳吴启瑞接到了锦江饭店。

此前，无锡市统战部部长徐中孚在6月21日夜晚冒雨找到退休后住在娘家的吴启瑞，说是要派人将她送到上海。第二天，吴启瑞便乘坐统战部的专车来到了上海。陈丕显接待了她。陈丕显说：“毛主席关心你们，要亲自接见你，了解你家的情况。”“啊！毛主席要接见我？”吴启瑞非常惊讶，回想10年前和毛泽东通信后，一家人已经受到了莫大的恩惠，没想到自己还能亲眼见到他老人家。她见陈丕显肯定地点了点头，便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

“毛主席要接见我了！这不是做梦吧？”

6月26日下午，工作人员将吴启瑞领到毛泽东临时办公室的门口，她看见毛泽东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着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圆口黑布鞋，正坐在一张沙发上看报纸。毛泽东见吴启瑞来了，便放下报纸起身迎上去，拉着她的手亲切地问候道：

“吴老师，你好！”

“毛……毛……”

吴启瑞在招待所盼望了三四天，一直考虑着见到毛泽东该说些什么，可她如今真的见到了毛泽东，一激动竟将原先准备好的一肚子话忘了个干干净净。毛泽东见吴启瑞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就请她在沙发上坐下，说道：

“王正枢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是我的老师。在先生的教育下，我是受益匪浅啊！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学数学，但先生并不由此而歧视我。1927年，你继母到武汉时我才知道先生已经谢世了。记得先生的生辰是1867年8月19日，算来当时再差6天，先生便可享60大寿了！”

毛泽东所说的王正枢先生谢世是在1926年。1927年初，吴启瑞丈夫王人路的继母曹懿娥带着王正枢的小儿子王季能到了武汉，那时毛泽东正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杨开慧又快要分娩了，因此她曾在都府堤41号为毛泽东料理过事务。

“吴老师，请喝点茶。”

毛泽东为吴启瑞的茶杯添了点水，又问起她几个孩子的情况；吴启瑞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了，他诧异地问道：

“吴老师，你不是有8个子女吗？刚才你只谈了7个。”

吴启瑞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还有一个女儿在师范学校读书。毛泽东说：

“正枢先生是教师，他的女儿是教师，儿媳也是教师，将来他的孙女也要当教师，你家可称是教师之家了。”

吴启瑞却说：

“搞教育工作没有搞工业吃香。”

“不！”毛泽东认真地说：“**教育强国，教育是立国兴国之本**。没有昌济先生和正枢先生这些教师，我毛泽东哪会有今天？现在明夏（王正枢的二女儿——笔者注）在北师大附中当教师，我女儿李讷就在她那里读书，我是支持她将来当一名人民教师的。”

“主席说的是。”吴启瑞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又说：“您对我家真是太熟悉了。”

“我和你家可是世交啊！正枢先生有9个孩子，老七轶南生伤寒早年夭折，其他8个我都见过。现在你也是8个孩子，上有8兄妹，下有8侄辈，这也算是一桩巧事哩。”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吴启瑞不便多坐，就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披上一件银灰色中山装，说：

“好，我们到外面去散散步，就算休息休息。”

吴启瑞随着毛泽东来到园中，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搬来两张椅子，招呼吴启瑞坐在自己身旁，说：

“我们拍张照片做个留念。”

摄影师照完后，毛泽东穿好中山装，又对吴启瑞说：

“来，我们站着再照一张。”

摄影师又“咔嚓”一声按动了快门。吴启瑞该走了，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吴老师，多保重，请代我向你母亲和孩子们问好！”

吴启瑞上了汽车，毛泽东还站在门口向她挥手致意。

6月28日，彭真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

6月29日，毛泽东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北上。

欲知中苏两党关系如何发展，请诸君继续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见微知著。他在1960年6月上旬鉴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的动向，向党内发出警告说：“**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果不其然，苏共中央代表团在6月21日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各国党的代表团散发了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老人家的预见真是太神奇了！

另，毛泽东在6月中旬指示福建前线司令部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前，先发《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再于6月17日和19日炮击金马。此种战法，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事先将自己的行动告知于敌，尔后玩敌于股掌之中，既不打跑蒋介石，又要使艾森豪威尔于日夜之间永无宁时。万炮迎送“瘟神”，几近儿戏，实有深意。制敌之机，神乎其神！

**第8章**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既要尽最大的努力增产粮食，又要切**

**实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布，节约用钱，**

**储蓄起来，应该成为社会的风尚和美德。”**

话说1960年6月底，毛泽东让刘思齐带邵华一起去大连看望毛岸青，并捎去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邵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地接待她们。听说你同邵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邵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

本传前边已经叙述过，邵华于1938年10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她是张文秋和革命烈士陈振亚的亲生女儿，与刘思齐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刘思齐和邵华长大后，经常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玩。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经常骑车到邵华家里玩。毛岸青心粗，鞋子坏了，袜子掉在鞋里也不在意，张文秋经常帮他整理整理，还经常帮他兄弟俩洗衣服，做好吃的给他们吃。毛岸青于1957年10月在苏联修完学业归国后，从北京去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在闲暇时与姐姐刘思齐一起到大连去看望毛岸青。1959年秋，邵华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不久，毛岸青开始与邵华通信，他们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升华。

邵华此次青岛之行，最终接受了毛岸青炽热的爱情。她回到北京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转学到大连师范学院继续学习，同时照顾毛岸青的生活。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1960年这一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主持下，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事，没想到自己在33年前的一句戏言，竟然又成就了一对小儿女的美满姻缘。他没有去参加儿子、儿媳的婚礼，只送给了邵华一块手表、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作为对他们新婚的贺礼。后来，毛岸青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工作，担任俄文翻译。他先后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

再说1960年7月2日，毛泽东到达天津。这天晚上，他在专列上听取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

7月3日，毛泽东由天津直达北戴河，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此时，毛远新高中毕业了，由于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被学校保送录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来到北戴河，对伯父说明了此事，毛泽东摇摇头说：

“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立即说：

“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着说：

“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后来，毛远新凭着自己的真实成绩，还真的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7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

7月8日，彭真向会议报告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和中苏两党分歧问题。

7月16日，**赫鲁晓夫为压服中共中央，以苏联政府名义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7月18日，李富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国内经济问题作了报告。

毛泽东在插话中说：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他还说：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7月2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情况。

7月25日，苏联政府不等中国政府对7月16日的照会做出答复，又通知中国政府说：**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1390人，撕毁343份专家合同书和257项科研合同书，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而且还逼着中国政府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使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所折算的13亿美元债务。**

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使中国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并没有屈服，他说：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

“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 “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后来，**苏联在1961年逼迫中国在原协议规定的期限之前，偿还债务，主要是抗美援朝时期13亿美元的军火债务**。毛泽东说：

“一个钱也不赖，欠多少还多少。”

他还深情地说：

“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

7月2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最突出的粮食问题。

7月28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粮食问题，讨论尖端技术问题。

7月30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政府撤回专家照会的答复稿。

7月31日，中国政府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中央工作会议。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由周恩来作了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的报告。

1960年8月1日，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开英同志：

久不见，甚以为念。你的情况好吗？有暇望告。

祝好！

毛泽东 1960年8月1日

毛泽东又在信封上写道：交 杨开英同志 毛寄。就让工作人员发出了。

杨开英自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收到毛泽东写给她6封亲笔信和赠给她的数笔款项。毛泽东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她感到非常感动，荣幸终生。1973年，杨开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宣武区医院去世，终年58岁。

8月10日清晨，住在北戴河别墅里的胡志明因昨晚总想着中苏关系的问题，没有睡好，就起得很早，想和毛泽东谈谈。可他见毛泽东房间里静悄悄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去海滨散步。

胡志明是为了调解中苏矛盾在8月7日与黄文欢、阮春水一起来到北戴河做说客的，8月8日，他们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进行了会谈。胡志明希望中苏两党停止争论，先召开中苏两党双边会议，再举行有各兄弟党参加的多边会议，共同努力，消除分歧，恢复团结。

毛泽东与胡志明一样，也是一夜没有怎么睡，起床后想去看看胡志明，当他听工作人员说胡志明去海滨散步了，便也来到了海边，与胡志明聊了起来。他说：

“苏联不喜欢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搞完整的全套。但什么都靠别人，有时靠不住。外国援助，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经济建设上不能强迫人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

毛泽东显得有点激动，他列举了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做法，批评这种做法是父子关系。同时，他也表示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对待苏联。他还说：

“我们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怕，天是不会掉下来的。”

毛泽东对胡志明这次来为中苏两国劝和，给予充分肯定，称赞他是和平的使者。胡志明表示原则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又说：

“中国同志有时采取的方法，似乎不太了解西方同志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说得好，我们也要注意批评方式。”

胡志明见毛泽东同意自己的看法，就随手拿起一盒烟，举在眼前说：

“以请人抽烟为例，把烟递过去请人家抽，人家乐意接受。如果往桌子上一扔，说：‘抽烟吧！’有人就不乐意了。其实还不是一样，但各人的习惯不同。西方人对后一种方式总会不乐意。批评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讲话的方式使人不乐意，效果就不好。”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要用科学的语言，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批评。不粗暴，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胡志明补充说：

“加上同志性。”

这时，太阳已经跃出地平线，把浩瀚的大海照得璀璨夺目。毛泽东、胡志明脱去外衣，并肩走下海，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中。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穿好衣服，与来到海滨的黄文欢、阮春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一同进餐，边吃边聊。胡志明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越南参加国庆纪念活动和越南党的代表大会，他还风趣地对毛泽东说：

“明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一定要去，他欠的债明年春天还。毛泽东同志也一定去，这笔债也要还。时间你自己定。”

“你们那里冬天怎么样，最低气温几度？”

毛泽东问道。阮春水在旁边回答说：

“12摄氏度。”

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冷。可以偷偷地去，游一下红河。”

胡志明笑着说：

“不公开，不秘密，用你曾说过的方式，非正式访问。至于红河嘛，水可能太浑浊，不好游呀！这要到时再说。”

后来，胡志明一行于8月11日离开北戴河去了苏联，准备与苏共领导人就中苏关系问题举行会谈。

8月10日下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小时的讲话。这是他在一个多月的会议上唯一的一次讲话。他在会议期间心情沉重，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我很忙，文件多，生活上请你们多照顾一下。

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说：

“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说：

“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说：

“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说：

“少看文件。”

邓小平说：

“这样比较好。”

康生问：

“《毛选》第4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说：

“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说：

“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问题。”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8月10日）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是这样写的：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保粮，保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工业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

我国的粮食生产，10年来一直是上升的。1958和1959两年的粮食产量，按最近核实的数字计算，增产的幅度也大大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1959年遭受到大面积的空前严重的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今年又有5、6亿亩农田连续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和风灾、涝灾等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在抗灾斗争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轻了灾害的损失，今年的夏季收成大体维持去年的水平，或者稍多于去年。事实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当前政治的和经济的形势是很好的。对于这个主要的方面认识不足，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还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粮食生产的指标偏高，估产不实；又由于粮食消费安排得不好，主要是用粮计划太高，管理不善，浪费不少，前松后紧，“前方吃了后方粮”；因而，1958和1959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而且，应该指出，今年的夏收已经到手，但是，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还没有过去，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出口计划也完成得很不好。这种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保证钢铁生产的同时，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粮食生产，并且做好粮食的征购调运工作，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保证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发生严重的粮食问题，保证必要的粮食出口计划的完成。为此，**中央要求，全党全民，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一、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解决农业劳动力紧张的根本办法在于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应当加紧实行，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目前农业生产还几乎完全是手工劳动。**由于两三年来抽调了相当大的一批劳动力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和临时工、合同工，或者搞短途运输，一般是需要的，合理的，但是其中也有不合理的部分；又由于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战线拉的过长，占用的劳动力过多，社办工业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用人过多，又事事强调专业化，不按照农事忙闲灵活调配劳动力；财政贸易、生活服务、文教卫生和行政管理人员过多，脱产的青年少年学生增加过猛；再加上强弱劳动力的搭配使用又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结果，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质量也降低了。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解决劳动力问题是当前保证粮食生产的中心关键。办法是：立即从县和人民公社着手，充分发动群众，从各个方面实行精减，该停办的停办，该缓办的缓办，该减人的减人，该调换的调换（以女代男，以弱代强），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切实整顿县社工业、精减人员，一切县社工业都应当真正做到为农业生产服务。县社工业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除了一部分必须维持常年生产的以外，一般都必须同农业生产季节相结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这才是最合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县、社办的文工团和球队等等，脱产的一律停办，业余的在农忙季节也一律根据需要可停止活动，全力搞农业生产。县以上各级办的文工团也要大减，文艺会演在两三年内停止举行。农村学校应当放农忙假。农业中学不要发展过快。农村小学根据需要可采取二部制。能够参加辅助劳动的少年，在劳动力紧张的地区，应当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已达劳动年龄的超龄小学生都应当回到生产岗位，参加业余学习。同时，基本建设战线缩短了，合同工和临时工应该精减一批回农村生产，运输砖瓦沙石占用的劳动力、畜力和运输工具都应该大减，常年的基建队伍也要精减，坚决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去。在两三年内，各行各业都不允许在计划外到农村中私自招人，应当在技术革新和革命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解决增加生产和新建厂矿所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并且节约出一部分劳动力派到农村中去。中央、省、专、县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必须大刀阔斧地精减。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严格控制。为了保证钢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应当首先从精减的职工中解决，不足之数，秋收以后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农村中临时调用一批。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除了为建立少数大豆、棉花和橡胶基地所必需的以外，一般暂停几年。总之，**必须从城乡，从公社内外，尽可能地挤出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加强粮食生产，保证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的至少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0%以上。**

二、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从根本讲，**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在同水旱灾害做斗争和增加农作物产量上，水利也确实起了巨大作用。**这应该首先肯定。水利建设一定要搞，但是，一定要分期分批，讲究质量，讲究实效，并且要同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统一安排。去冬今春水利战线拉的过长，300个大型工程同时上马，材料分散使用，人力物力都来不及，许多工程搞了一半，有的主体工程完工了，不配套，不能发挥灌溉效益；还有少数工程因急于抢修，质量不好，被洪水冲垮了。这种做法并不是多快好省。而且，占用劳动力过多，最高额曾达到7000万人，既增加了粮食消费，又影响了冬季积肥和田间管理，甚至到农忙季节，有些水利工地上的民工还下不来，影响了春耕播种，影响了当前的粮食生产。基本建设必须同当前生产统一安排。这一点，在农业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饭是天天要吃的，绝不能单纯强调水利等基本建设，而削弱当前的粮食生产**。因此，中央决定，在今冬明春的100天中，调离本包产单位、不在本食堂吃饭的参加水利建设（包括水土保持）的民工，全国总计不许超过1000万人，只搞续建工程和配套工程，新建项目一概不上马。而且，续建和配套工程也要先后排队，能够早发挥效益的尽先施工，不能一齐都上。不脱离本食堂和本包产单位的施工力量，也要适当控制。公路、航道、土铁路等等基本建设，都必须按照同样的精神坚决压缩，在今冬明春的100天中，上工人数最多不准超过300万人，工程项目也要按轻重缓急排队，不能齐头并进。非生产性的农村基本建设，一律坚决停止。

三、**鼓足干劲，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丰收**。现在正是大秋作物的盛长期，田间管理的好坏对秋季收成影响甚大。锄草、除虫和追肥，是当务之急，必须集中力量抓紧进行。草荒现象必须消灭。大力开展夏季积肥运动，保证秋收作物的追肥，准备秋冬播种的基肥。商业部门应该协同工业和外贸部门把计划供应的化肥尽快地调拨下去。局部地区的旱灾还没有解除，另一部分地区又遭到涝灾和台风的袭击，必须继续发扬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保证秋收。无论在遭灾地区和丰收地区，都要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抢种荞麦等晚庄稼和秋粮**，尽可能地减轻和弥补灾害的损失。

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进行秋收、秋耕和秋冬播种的准备工作，广泛动员群众，认真讨论三秋工作的安排，按生产队按地块落实。安排好劳动力，准备好工具，保证精收细打，颗粒还家。还要准备好秋冬播种的种子和基肥，真正做到随收、随耕、随种，不违农时。必须估计到，今年秋收以后，将不得不抽调一批劳动力突击运粮，所以，更要及早做好三秋的准备工作，统一安排好三秋和运粮的劳动力，保证做到两不误。秋冬两季，各地就地开荒必须积极进行。基本建设多占地、早占地、占好地的现象必须制止。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保证明年春播用地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扩大秋冬播种，多种一季。必须认识，就明年来说，小春和夏粮的丰收，对于缩短青黄不接的时间，度过粮食困难，关系特别紧要，所以，今年秋冬播种，特别是冬麦和夏收杂粮必须多种，种好，种得适时。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同时并举。

四、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等经济作物也必须重视。棉花、油料、烟、麻、糖等主要作物的集中产区，必须尽力增加这些作物的产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必须坚持。**农业的“十二个字”要统一安排。林牧副渔也要发展。当前正是种植饲料和采集野生饲料的大好季节，一定要抓紧时机，大搞饲料，储藏青饲料，发展畜牧业，发展猪、羊和大家畜，特别是养猪积肥运动必须继续坚持下去。积极多种瓜菜，搞好副食品生产。还要做好准备，开展一个比去年规模更大的“小秋收”运动。农产品加工和其他副业生产，今年冬季应当比往年搞得更多更好。这既有利于稳定市场，安排城乡人民生活，也可以增加公社的收入和社员的收入。**增加社员收入，也就更有利于把农村劳动力稳定在农业生产上。**

五、保证粮食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单独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思想应当成为全体干部全党全民一致的认识，并且真正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工业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国家计划指定用于农业的钢材，应当由农业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掌握，不许挪用。尽可能地迅速提高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小合成氨厂的设备制造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制造农药和生物药品的重要原料也要列入国家计划，按计划生产，保证供应。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基础上，按照自觉自愿和不降低待遇的原则，动员一批技术工人下乡，把农机具的修配网迅速地搞起来，帮助农业技术改造，这是工业支援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当在市委的统一安排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支援农业，为农业、为粮食生产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的安排上，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妨害粮食生产的事，都必须禁止。

六、**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安排好人民生活。**安排粮食，必须从6亿几千万人口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口粮标准必须从低，其他消费标准也必须从低。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只有如此，才能既保证吃好用好，又节约粮食，留有余地。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任务必须坚决完成，城乡粮食销量必须严格控制。有调出粮食任务的省区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种子、口粮和饲料等留粮也必须落实，保证按低标准留够。国家、集体和个人，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3者的需要都必须落实。

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应当由基本核算单位统收统支，统一管理，全面管好。积极办好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公社和生产队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增产节约的粮食，也归社队储备，鼓励社队增产节约，储粮备荒。丰收地区，更要反对浪费粮食，努力增加粮食储备。食堂必须有自己的菜地，保证一年四季都有菜吃。食堂必须养猪，每10人最少养一头。

城市人民生活也必须妥善安排。今明两年城市粮食的供应标准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于必须保证出口，还可能有所减少，同时，由于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应标准因而有所降低；因此，除了必须向城市人民进行充分的解释以外，各城市党委还必须注意加强各伙食单位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尽可能地节约用粮用布，并且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地解决一些副食品的困难。大的厂矿、机关、学校，应该有一个副职人员或者党委负责人管理生活。城市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社办福利事业，要分期分批地逐步发展，不要一下子发展过多，以免增加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

七、认真抓紧粮食调运工作，保证城市工矿区和必需出口的粮食按时供应。要把运粮放在运输的第一位，决不允许发生粮食脱销现象。必须努力做到，大中城市经常保持3个月，至少1个月的粮食周转库存。要求在征购粮食的同时，有计划地把准备外调的粮食集运到交通沿线。在今年秋收以后，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短途运粮运动，事先安排好人力、畜力和运输工具，到时候突击运输，保证粮食调运任务的及时完成。粮食部门要事先安排好粮食调运计划，并且对于粮食外调任务大而运输工具又很困难的地区，在运输工具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援。

八、**要保证搞好粮食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还必须坚决肃清官僚主义，首先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农村中的“五多”，主要是从上面来的。表报已经成灾，有的公社甚至要用几十个人专填表报。开得好的现场会议本是一种好的领导方式，开得过多，则势必流于形式。**有许多现场会议无准备，无领导，到会人数过多，大吃大喝，欢迎欢送，变成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的典型，必须坚决纠正。**不深入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徒尚空谈的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必须完成。三反运动不能占农作时间，应放在农闲时间去做。各级领导机关和农业部门，都要紧紧抓住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重点产区，首先是粮食的重点产区，了解它的情况，帮助它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各级干部都必须到第一线去，深入田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对于生产领导的好坏，第一是不妨害下面，尽量不占用农作时间和睡眠时间；第二是帮下面的忙，要帮得好，帮得是“火候”，帮在“刀口上”，就是说，及时地帮助下面解决生产关键问题，就是好的领导。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按照这个要求，来检查和改进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加强队为基础的3级所有制，至少在5年内不要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加强公社的经营管理，认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把劳动力组织好，使用好，做好秋收分配，继续肃清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把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保证农业生产，首先保证粮食生产。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既要尽最大的努力增产粮食，又要切实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布，节约用钱，储蓄起来，应该成为社会的风尚和美德。**一定要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保证粮食不脱销，保证必要的粮食出口，并且保证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出现粮食严重紧张的局面。中央尖锐地指出当前粮食困难的严重性，同时指出这种困难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大好形势对于搞好农业生产是十分有益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不向困难低头，不松劲泄气，继续鼓足干劲，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更多的增产粮食，把人民生活安排得更好，更有力的支援工业，更好更全面的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证国民经济更好更全面的继续跃进。

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

8月14日，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内容如下：

**目前摆在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立即在全国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李富春同志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意见和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关于1960年第3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意见，各级党委应该立即根据这两个文件迅速地切实地布置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动群众，使所有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部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

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事业都在继续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很多。钢、铁、煤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以上，都完成了全年生产指标40%以上。在农业战线上，虽然在去年的特大灾害之后，今年又遭了严重的旱灾和部分地区的水灾，但是由于全体农民的艰巨努力和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援，仍然取得了抗旱抢种的巨大胜利，并且使夏季作物保持或者略为超过去年的产量。**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了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日益显出它的优越性。**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正在稳步发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以增产原料、材料和燃料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有了新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它们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在我们胜利前进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遇到了一些困难。今年第二季度，在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其中11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造成工业生产有某些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在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大跃进的情况下，产生了盲目乐观和松劲情绪；另一方面是由于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和一部分的工业力量，投入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影响了一部分小土群、小洋群的工业生产。由于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放松了生产管理工作，一部分生铁、转炉钢、煤炭等产品的质量，也有所下降；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不断发生。在基本建设方面，由于不少地方、部门违背了中央多次强调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把战线拉得过长，人为地造成了原料、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运输的紧张。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还没有在各个部门全面地认真贯彻，而水利建设、社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又占用劳动力过多，以致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因此，完成今年农业生产的任务，还是极为艰巨的。如果今后水旱灾情继续扩大，而我们的工作又没有充分抓紧，农业收成甚至还有比去年减少的可能。此外，在连续取得两年大跃进的胜利之后，我们一部分干部中滋长了一种盲目乐观、不重视具体困难、不深入下层研究具体措施、不及时抓紧和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不良风气，滋长了一种追求形式、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一部分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也有所增长。以上这些困难和缺点，虽然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但是，如果不认真努力加以克服，今年粮钢生产指标和其它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就有完不成的危险。

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钢的增产问题。目前粮钢的供求之间的矛盾是很紧张的。在连续两年的大跃进中，粮食的产量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凡是能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紧张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建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一般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工业用粮增加，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农业基本建设队伍用粮增加**，种籽、饲料等也增加很多；**特别是全民用粮计划定得太高，加以管理不善，前松后紧，浪费不少；因此，粮食供应仍然十分紧张**。两年来钢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半以上，但是，由于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钢是工业的“粮食”，也是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基本建设的主要“粮食”。因此，必须首先调动一切力量和积极因素，保证粮钢的增产，并且厉行节约。这是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

当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就是要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亲自动手，全面安排，立即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地鼓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反对盲目乐观和右倾松劲思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踏踏实实地、千方百计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粮、钢和其它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而奋斗。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除了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中央另有指示外，在工业、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方面，应该作好下列工作：

一、**立即发动群众检查今年前七个月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讨论今后五个月增产节约的指标，和实现这些指标的具体措施。**（以下文字略，下同——笔者注）

二、**继续深入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略）

三、**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生产任务，都要在省、市、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根据国家计划，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略）

四、**干部要立即下去，亲临生产前线。**（略）

五、**大量精简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略）

六、**加强企业管理。**（略）

1. **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反对本位主义。**（略）

八、**所有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都必须进一步加强支援农业。**（略）

九、**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略）

现在已经是8月，今年只剩下5个月了。时间是紧迫的。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立刻行动起来，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保证在8、9两个月内钢产量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在第四季度再接再厉，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污蔑、攻击和阻挠，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的义愤，使全党全民鼓起更大的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革命干劲，创造出更加伟大的成绩。中央深信，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全国人民，一定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团结一致，展开一个空前规模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本指示发到所有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的基层党组织，并由党委在全体党员和群众中进行传达、动员和组织讨论，立即把群众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

8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这天从苏联返回北京的胡志明、黄文欢、阮春水，听取他们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介绍。胡志明还情真意切地表示，希望中苏两党尽快举行会谈，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挽救面临危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胡志明的真诚深深感动了毛泽东，他紧紧拉着胡志明的手说：

“谢谢胡志明同志，为团结奔走万里。感谢你！”

8月24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说：苏联在华专家已经全部撤离回国。毛泽东大手一挥，大声说：

**“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8月30日，毛泽东嘱咐办公厅秘书室给原湖南一师数学老师王正枢的二儿媳吴启瑞写一封回信。

此前在7月19日，吴启瑞写信给毛泽东，寄来了她全家的合影照。信中还说她在无锡很难买到《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让秘书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样书和5张在上海拍的照片一并寄给吴启瑞。秘书在给吴启瑞的信中写道：

吴启瑞同志：

你寄给毛主席的信和照片，我们已送主席看过。主席送你一部《毛泽东选集》和5张照片，我们已另交邮局寄去，请查收。此复。即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0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报告中提出的**今后纺织工业发展的方针，即实行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同时并举、家生纤维与野杂纤维同时并举、专业生产与多种经营同时并举、原材料的开源与节流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这个方针，就可以大大增加纺织工业原料的来源，加速纺织工业的发展。

今年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已经经过调整，该停办的项目应该坚决停下来，把腾出的资金和材料，用于增添改进产品质量的设备和**发展人造纤维**。人造纤维所需的原料材料，国家经委应该进一步安排落实，按时拨给。**对大量利用棉秆纤维急需解决的棉秆剥皮机，各地应该抓紧时机，迅速赶制，所需钢材应优先调拨，生铁、焦炭等由地方根据中央计划，统一给予安排。为了适应今后国家少出口棉花、多出口纺织品，多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的需要，纺织部门应当迅速改装和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

今后，在安排纺织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的原则，以便更好地组织生产和保证市场供应。

　 中央 1960年9月1日

9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吴启瑞，他写道：

启瑞同志：

7月19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选集及照片，已寄出了，收到时请告。祝你健康！

毛泽东 1960年9月2日

9月7日，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一、**北方早秋已经开始收割，南方早稻和早熟杂粮已经收割完毕，中稻也接近收完**。9月下旬和10月是北方地区进行三秋工作特别是大种冬麦的最忙时期，各地必须立即集中力量做好三秋和农产品收购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切实安排好全年的生话。有关国际问题的传达、学习和讨论，如果来不及开始和结束，可以推迟到秋收、秋耕和秋种以后再来补课。

二、今年夏收以后，还有很少数的地方，生活没有安排好。据中央财贸部第25期工作简报反映，**河北省新乐县灾区夏粮估产偏高，征购以后，留粮不足。**又据新华社8月31日和9月2日的内部参考反映，**山东某些地方在麦收以后，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偷青吃青现象很严重。**在夏收以后仍然出现这种严重问题，是极不应该的。据我们所知，**夏粮估产偏高、留粮不足、偷青吃青、人口外流的现象在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也有发生，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在个别地方也发生过。**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灾区的灾害损失估计不足，估产偏高、留粮不落实，开始夏收时又多吃了一些，因而口粮接不上秋收了。今年夏收，绝大多数基本核算单位的估产是接近实际的，有的可能偏低一点，按照他们的估产来分配粮食，征购粮、种子、口粮和饲料粮都能够落实兑现。**问题在于某些县和公社，特别是连续两年的重灾区的某些县、社，他们不听基本核算单位的话，主观主义地高估产量，结果粮食安排中的各种毛病和后果就不断出现。**虽然在全国说来这是极少数的地区，在一个省来说也是很少数的县、社，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引起全党注意。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检查有无这种现象，一经发现，立即解决，不容丝毫忽视。

三、**各地在安排全年生活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今年全国粮食生产的总情况：由于春旱严重，受旱面积有6亿亩，有的是从去冬以来一直干旱；入秋以来，部分地区的旱灾还没有解除或者发生秋旱，另一部分地区又发生洪涝灾害，水灾面积达到1.2亿亩，再加上虫、风、雹灾，全国总计全年受灾面积达到9亿亩左右，其中减产3成以上的成灾面积约在3亿亩以上，比去年大得多，给粮食和其它农作物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现在看来某些省区，粮食势将比去年减产。全国夏收粮食和稻的产量，包括小麦在内，比去年还少一点。全年的粮食产量预计可能达不到北戴河所估计的4500亿斤（自留地等零星土地收获不包括在内）。面对这种情势，各地必须继经努力防止松劲，抓紧后期的田间管理，丰收区要力争更大丰收，灾区要力争弥补损失，减少损失。正由于灾害的损失，夏粮征购和粮食销售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夏杂粮的征购超过一点，小麦的征购差得较多，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入库139亿斤，比去年同期的190亿斤少51亿斤；在同时期内，销售152亿斤，比去年同期的139亿斤，增加13亿斤；一出一入为64亿斤，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包括6月底以前的库存减少数在内）。辽宁省要求增加粮食调入的数量，个别重灾省不仅不能调出，也要求调入一点。因此，**全国必须立即采取压低城乡口粮标准的方针，要求农村少吃，城市也要少吃，丰收区少吃；灾区更要少吃；灾区减少征购任务，丰收地区则必须多购，**各个丰收的省份要比在北戴河所商定的全国上调粮190亿斤的总盘子中所分摊的数量更多调出一点；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歉收省份的任务，而又保证上调粮190亿斤任务如数完成。同样，在一省，一县，一社之内，都要实行丰收的单位多购一些的原则，支援灾区。

四、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遭灾的地方应当更低些。**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的和为支援灾区而增加外调的粮食任务以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原粮380斤，最多不能超过原粮400斤。**在吃的时候，还要厉行节约，应当采取湖南的经验，一年的粮食分做13个月吃，以免在明年青黄不接时发生粮食紧张，使大家有备无患**。凡是超过400斤标准的要降下来，这自然要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并且必须做好商品较多的地区的商品供应工作，以便把余粮更多的卖给国家。**淮河以北地区的口粮标准，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00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各地社办企业的职工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口粮应当同本社一般农民的标准完全一样，不能提高。如果全国农村不照这样做，丰收的地方不能多购，遭灾的地方又要多销，结果势必一方面完不成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另一方面又突破粮食的销售指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粮食工作上就一定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并在政治上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要求全党立即动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些省区对农村口粮标准的安排是比较克己的，另一些省区则标准较高，必须下降。

当然，在农村中，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口粮，是完全必要的。**在粮食安排中必须保证这种最低标准的落实。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全年合290斤）加上2斤到2斤半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希望各地党委都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粮食安排的依据。**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某些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分口粮。县级党政机关和社队的干部应当同当地农民吃一样多的粮食**，以身作则，带头压低口粮标准。**社队干部必须在公共食堂入伙，干部小灶必须撤。**在压低口粮标准的时候，这样做是尤其重要的。

五、在压低农村口粮标准的同时，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地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商品粮）。城市的粮食供应必须认真加以整顿，坚决消灭浮支冒领，取缔“黑人口”。城市近郊区和一般农村的口粮标准，差别不能大，远郊区应当向一般农村看齐，压低城市人口粮食供应标准的具体办法，由粮食部另行拟定。**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机关正在带头节约用粮**。

六、实行压缩城乡粮食供应，必须走群众路线，做政治工作。在城市居民和职工中广泛进行口头的宣传教育，说明今年灾荒的损失、压低城市粮食供应、支援灾区的道理，说明城乡团结、工农联盟的大道理。**在乡村中，特别要宣传以丰补歉，支援灾区，并且要把压低城市粮食供应这件事向农民讲清楚。无论在城市和乡村中，进行压低口粮标准的教育时．都必须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结合起来，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既讲清楚生产的增长，又说明灾情的影响，说明粮食生产的增长虽然还赶不上大多数人生活提高的需要，但是只要安排早、安排好，群众的生活仍然可以过的不坏。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3700亿斤，而日子过的还比较好，就是一个证明。**在宣传解释工作中，应当注意提高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避免引起群众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怀疑和误解。尤其要防止松劲泄气的右倾思想的滋长。

最后，再重说一遍，各地应当抓紧全年生活的安排，通过全年生活的安排，带动三秋工作，首先带动当前的田间管理和秋粮的收购工作。

　　　　　　　　　　　　　　　中央 1960年9月7日

欲知此后全国各地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生活出现了什么状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录入的1960年8月10日《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8月14日《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9月1日转发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的批语、9月7日《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是难得一见的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主持起草的重要文献，故立此存照。老子云：“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天灾、人祸（**抗美援朝时期13亿美元的军火债务**）的灾难降临之际，正是以“烹小鲜”的精神，周密地筹划着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以至于具体到耕种收割、一日三餐这些细节。尽管如此，还是难免有几个跑堂的摔了盘子、砸了碗，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歪嘴和尚念经”，会生出“信阳事件”（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大面积饥荒、饿死人事件**）一类的问题。由此可见治国之难，治大国更难！

**第9章**

“**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

**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

**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

话说1960年9月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对苏共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9月9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答复书》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

“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吴冷西谈话，《答复书》最后定稿。

这一天，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把《答复书》交给了他。《答复书》一方面对苏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达到团结的5项建议。

邓小平还通知契尔沃尔科，中共中央参加由胡志明提议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代表团，将于9月15日动身去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9月13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9月17日至22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共举行5次，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

9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

9月28日，中国和古巴正式建交。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一天，缅甸总理吴努和参谋长吴奈温将军率领由370人组成的友好使团来华访问。

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周恩来送审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在这个报告里，国家计委党组首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上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中央基本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据此编制计划草案，并在10月底以前送交国家计委和各中央局计委汇总研究，编出1961年计划草案报告中央。

附：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和控制数字附表各一件。

中央 1960年9月30日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29日来华访问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代表团。他在会谈中说：

“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法国不承认我们，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支持你们，为什么不同你们往来。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另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远道而来的非洲客人在10月1日参加首都人民欢度国庆的活动。

1960年10月1日上午，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热烈庆祝新中国诞辰11周年。

毛泽东和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缅甸总理吴努和吴奈温将军、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等，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也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斯诺是在1942年2月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触怒了蒋介石，被迫离开了生活13年的中国。1942年，他又两度来到中国，但未能见到毛泽东。在50年代末，斯诺曾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访华。在中美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请廖承志通过群众团体，以艾黎的名义邀请斯诺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后来，已经移居瑞士的斯诺在1960年6月间获得了访华的签证。6月28日，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第一次赴新中国访问，首先到了北京。中国发生的一切他都很感兴趣，先后在北京、包头、上海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还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重逢时，紧紧地握着斯诺的手，亲切地说：

“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多久了？”

斯诺说：

“21年了。”

他们一边交谈着，一边观看着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欢庆节日的群众游行队伍。庆祝活动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斯诺过一段时间到中南海他的家里作客。

10月1日下午，周恩来和吴努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10月2日，首都各界10万人民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它争端的良好范例。”

10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批的《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给所属大中企业党委，组织干部认真阅读和研究。

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了一长制，坚持执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这一套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地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最近时期，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按照中央的指示，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已经和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效果。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就是这种经验总结的一个好的典型，特别是他们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面的新经验，很值得各地重视。希望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认真加以研究，并参照他们的经验和作法，结合当前企业的中心工作（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和增产节约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总结自己的经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

在总结经验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就是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必须坚决执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使集中和民主正确地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偏废。**目前有些企业在正确地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强调发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经验的时候，对于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和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注意不够，因而出现质量下降，事故增多，管理工作相当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有些企业在注意抓质量，抓安全，整顿规章制度的时候，又出现简单恢复旧章，片面强调专业管理和行政命令，而忽视依靠群众和发扬群众参加管理经验的重大意义。各地必须根据各企业的不同情况，研究具体措施，改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克服或多或少存在的各种倾向。总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须有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彻底，因此，在我们领导和管理企业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经验的时候，根据中央既定的原则，总结已有的经验，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是彻底肃清一长制残余的根本办法，同时也就是保证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开展和生产持续大跃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各地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中央 1960年10月4日

10月5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同志：

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4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2本，1本给你，另1本交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5日

10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艰苦朴素”。

10月9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缅甸文化代表团的专场演出，缅甸语翻译程瑞声负责为他解说节目内容。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问程瑞声：

“缅甸人名中为什么常出现‘貌’、‘吴’？”

程瑞声回答说：

“缅甸人只有名，没有姓。‘貌’是男子对自己的谦称，‘吴’是对其他男子的尊称，‘郭’则是男子平辈相称。以吴努为例，他自称‘貌努’，别人则尊称他‘吴努’，关系密切的平辈又称他‘郭努’。”

毛泽东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饶有兴致地与程瑞声聊了一会儿。

10月10日凌晨，毛泽东看到湖北和福建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他写道：

富春同志：

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10月10日上午1时

10月17日上午，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要亲自见见她。

王海容，出生于1938年，195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开始在家自学，准备继续考大学。1958年，因受大跃进运动的感染，她放弃了高考，不顾家人的反对，到北京化工厂当了一名徒工，一干就是两年。1960年7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到她的经历后，约她写一篇经验体会性的文章。王海容有感而发，写出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文。她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便在8月1日给叶子龙写了一封信，连同那篇文章一起寄给了叶子龙。她在给叶子龙的信中写道：

“叶伯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去当通讯员。早几天，他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需要一些关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为社里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当过徒工的，对徒工生活也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徒工早日改变上述不正确的态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写一写关于自己对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稿子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但感觉许多地方重点不突出，内容也欠佳。我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帮我修改一下。”

王海容同时在信中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没有时间”代她修改，就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来。可是在文章和信寄出后，两个多月了，既没有消息，文章也没有寄回来，现在突然接到通知，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几分期待。

这天下午3时许，王海容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厚厚的一沓稿子，有20页之多，正是自己早先寄给叶子龙的稿子，忙叫了一声：

“主席公公！”

毛泽东见王海容来了，招呼她坐下来，将手中的稿子递给她，顺手拿起了一支香烟。王海容忙起身为他点着了火，然后回到座位上一页一页地翻起稿子来。在稿子的第1页上，毛泽东写了两行大字，不仅为她拟了标题，还给她起了一个笔名，那两行字的第一行是“我的经验”，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再往下看，文章中有几段文字完全是毛泽东重新改写的：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11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王海容看完了稿子，毛泽东又和她谈到了工厂，谈到了学校，谈到了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下午5点多钟，当王海容辞别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时，大街上已经是华灯初放，她的心情显得格外清朗和舒畅。

后来，王海容的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发表时，编者们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将毛泽东修改的几段话引出来，作为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

10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关于战犯第2批特赦和减刑名单的报告上批示道：

“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在书记处通过照办。”

此后，在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5批战犯。这是后话。

10月22日，斯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菊香书屋作客，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一隔就是21年。”

斯诺高兴地说：

“你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却故意说：

“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

斯诺强调说：

“从那时以来，你的窑洞稍微扩大了一些。”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说：

“这次你去延安，看了当时我住的窑洞。听说是扩大了。”

斯诺说：

“我是指的全中国。”

“那是要比窑洞大多了，情况好了一些。现在是要把中国搞得进步一点才好。”毛泽东微笑着说。他吸了一口烟，又关切地问：“你的女儿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给过我她的照片。”

斯诺回答说：

“她今年9岁了。”

“怎么才9岁？”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个妻子离了婚，西安是我第二个妻子的孩子。”

毛泽东说：

“我收到你的一次还是两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时，周恩来总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

斯诺说：

“我在1950年写过一封信，那是通过陈翰笙转交的，我想到中国来，想写主席的传记。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打算。”

毛泽东说：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记起来了。那时时机不好，正当抗美援朝的时候。这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的事还没有解决。”

接下来，他们的谈话转入正题，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主要内容如下：

毛泽东：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1939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12年，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1950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泽东：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诺：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和尼克松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泽东：看了一些。

斯诺：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泽东：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诺：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泽东：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两年前的声明。

斯诺：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11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1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11月6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泽东：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诺：直到明年1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泽东：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诺：很可能。

毛泽东：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11年了，比方再过两个11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11年了，又过11年，再过11年，不是33年了吗？也许在第32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诺：**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3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泽东：**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3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诺：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11年，甚或22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泽东：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诺：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泽东：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1937、1938、1939年还给我们发饷，从1940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诺：我记得在1939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几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泽东：就是这个道理。

斯诺：你在你的一篇文章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泽东：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诺：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泽东：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诺：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泽东：我在北京一年顶多4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诺：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泽东：（对马海德）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67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97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诺：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97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泽东：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4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5年就可以了，那是从1946年7月算起。结果3年就胜利了。

斯诺：我记得在保安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诺：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5年？10年？当时主席说至少10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泽东：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12年多。**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70%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20%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10%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10%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80%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诺：**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10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泽东：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诺：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10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2000美元，也就是说5000元人民币左右。

毛泽东：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185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185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170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诺：10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泽东：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10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诺：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10年到20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泽东：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诺：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泽东：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诺：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后来在11月15日，斯诺带着丰硕的成果离开了中国。1962年他出版了《大洋彼岸》（社会上流传的实体书名为《大河彼岸》。斯诺在美国出版此书介绍新中国，名为《大洋彼岸》似更恰当）一书，以后曾被翻译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在这本书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分析了美、苏、日等国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再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

此前，毛泽东收到了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送来的一份特殊“食物”，是用榆树皮磨成的“面粉”烙的饼子。

原来，邓宝珊到河西下乡调研，看到老百姓处于严重饥荒中，勉强用这样的食物维持生命。他忧心如焚，特意向群众要了几个榆树皮面饼带回家，一方面想让省委领导了解甘肃饥荒的严重情况，另一方面想用这样的食物教育自己的子女。后来，他又萌生了将这种“饥民之食”送给毛泽东的想法，让毛泽东也了解甘肃老乡处在饥荒之中、苦度饥饿的真实情况。甘肃省委主要领导反对邓宝珊的想法，他们说：

“你把这东西送给毛主席，影响不好，轻则挨批评，重则受处分。你已经是到了右倾边沿的人了。”

邓宝珊则坚持说：

“我是不是右倾得由中央决定，不是省委能定的。我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问题，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什么大事，人命关天，群众的吃饭问题是大事啊！”

邓宝珊把榆树皮面饼带到北京，通过中办转交毛泽东。毛泽东收到邓宝珊送来的食物后，十分难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在陕北见过这东西，很难吃。我们的人民吃苦了。”

说着，他的眼圈红了，接着说：

“只有邓宝珊敢给我送此礼物。”

他立即责成国务院尽快解决甘肃饥荒问题，抢救人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受命到甘肃、青海实地查看农村饥荒情况，并与邓宝珊交换意见，及时部署救灾工作，缓解了灾情。

10月24日，也就是在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的第二天，李富春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监委李坚等）**4名干部10月21日上报的第二次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毛泽东的秘书组。

关于“信阳事件”的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天灾**。据原信阳专区专员张书藩说：“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100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张书藩的秘书余德鸿也说：1959年“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后继续干旱，全年缺水率达49%左右，不少沟河断流，塘堰干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无墒播种或未能适时播种，已**种者有三分之一的绝收，三分之一的严重减产，**三分之一的收成较好。”**二是人祸**。其一是，1959年信阳专区秋粮实际产量为10.035亿公斤，**信阳地委却高估产**为32.085亿公斤。按上述产量全区安排征购秋粮5.2亿公斤，相当于实产的50％。在粮食征购计划难以完成的情况下，信阳地委又执行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发动了“反瞒产私分”斗争**。其二是，有部分基层政权掌握在一部分**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分子**手里，他们疯狂地**实行阶级报复**。

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处理问题，据有关记载称：“**我们（李坚率领的中央调查组，时间在1960年4月**）**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

“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到信阳调查了3个月，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字为60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汇报了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当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回到北京后，“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

‘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

刘少奇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另据李坚本人说：“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3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4个人。”他们这次调查的结果是**，病饿和被打等原因致死的人数是100万**。

调查结束后，李坚等4人写的调查报告，就是李富春报送毛泽东的那一份。

10月26日凌晨，毛泽东看到了李富春报送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他的心在颤抖，当即批示道：

“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工作人员看到毛泽东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都扭过脸去，偷偷地擦眼泪。毛泽东看看大家，声音哽咽着说：

“全国不少地方遭了灾，许多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们带个头好吗？”

卫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见大家面有难色，就解释说：

“人家逼债，我们少吃一点肉，争取3年内把债还清。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

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6日下午，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会议讨论了问题严重而又暴露得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吴芝圃看隐瞒不下去了，便汇报了信阳事件的真相。**大家十分震惊，纷纷对他进行批评，指责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是坏人当权的结果。他说：

“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这一回发现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地区阶级敌人报复，就可以预见到若干年内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叫马克思主义。”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度过难关，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最后一部分内容，基本上把“信阳事件”的发生原因、调查经过及处理等概况说清楚了。从中可以看出**一部分歪嘴和尚在灾前、灾后以及在调查处理过程中的表现，是难以令人容忍的。**本传在第七卷中**关于毛泽东反对农业生产估产过高的事例讲了很多，关于正确处理“瞒产私分”的话，他也是从1959年2月就开始讲起，以后为反对“共产风”，又反复说过不要反对“瞒产私分”话。**可他的那些部下从上到下都当做耳旁风，最终酿成了灾祸。“信阳事件”发生后，在有关方面从1959年4月到10月间调查处理的半年多时间内，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里，看到10月26日李富春送来的调查报告后，立即采取措施，这才使灾区的善后工作得以迅速展开。后来在毛泽东身后，一部分人正是借“信阳事件”一类灾祸大造其谣，说什么3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还有人说是“饿死3600万”（已有多个有识之士曾著文批驳之，后边还要讲到），以此来妖魔化毛泽东时代。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由此看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表演是何其恶毒也！

**第10章**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

**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

**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话说在处理“信阳事件”以后，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向工作人员郑重地宣布了两条要求，一是自力更生，一是艰苦奋斗。他说：

**“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大家都说：愿意。毛泽东严肃地说：

“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我不吃猪肉，也不吃鸡蛋，用猪肉和鸡蛋出口换机器。我呢，有米饭、青菜、盐和油就够了。**”

他给自己的饮食做出了新规定：

“不吃荤菜，只吃米饭和青菜。”

护士长吴旭君劝毛泽东增加营养，改善伙食，毛泽东说：

**“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也不舒服啊！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度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吴旭君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只好每天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增大素菜的量。毛泽东还是不让，每顿按照他的指示，只炒一个青菜，两样小菜，还是照样吃原来用大米、小米合做的“二米饭”。

有一次，毛泽东带机要秘书罗光禄等人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他叫工作人员同他一块儿吃中饭。毛泽东发现餐桌上有一盘肉，立即叫来管理员问道：

“大家都没有吃肉，为什么给我们搞肉吃？”

管理员解释说：

“前天招待外宾宴会，按规定准备两桌菜，因为临时人数有变动，省下一桌菜，剩下2斤肉，才让主席和同志们打打牙祭。”

毛泽东听说大家都分吃了一点，就没有话说了，他吩咐照章付款。

有一次，毛泽东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不得不嘱咐厨师添了一盘红烧肉。毛泽东要高智陪客，高智给客人们夹了红烧肉，给毛泽东也夹了一块。过了一会儿，高智又夹了红烧肉给客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吃红烧肉了，于是又给毛泽东夹了一块，谁知毛泽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高智再也不敢给他夹肉了。

这个时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讷每月口粮只有27斤，根本不够吃。在一个周末，江青塞给女儿一包奶粉，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是下不为例，以后不许再往学校带东西。据卫士尹荆山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北大看李讷，见李讷脸色不大好，就问她说：

“是不是生病了？”

李讷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尹叔叔，我饿得难受……”

尹荆山听了很难过，回到中南海就向李银桥做了汇报。李银桥想办法搞到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讷送去了。李讷接过饼干，看看四周没人，抓起两片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几下就吞了下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包包好，藏了起来。毛泽东知道李银桥去看了李讷，就把他叫进屋里，盯着他问道：

“去看李讷为什么不事先说一声，你给她送什么了？”

李银桥不好隐瞒，只得照实说了。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

“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李银桥小声辩解着。毛泽东把桌子一拍，高声说：

“我的孩子就不许送！”

李讷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这是为了能让她有机会和爸爸妈妈见见面，也是借机为她改善一下生活。大师傅每到做这顿饭时，都要加两个好一点的菜，让她稍稍解解馋。自从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人实行三不政策后，李讷周末回家，大师傅照例加两个菜，可质量却明显地下降了，连油花也见不到几滴了，那味道跟学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许多。餐桌上甚至连毛泽东最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在李银桥送饼干不久的一个星期六，尹荆山利用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说：

“主席，李讷回来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微笑着说：

“嗯，那好，那好。”

尹荆山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稍一犹豫，小声说：

“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这一顿晚餐，炊事员搞了4菜1汤，还有辣子、酱豆腐等4个小碟，他还得意地说：

“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此时，李讷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和爸爸谈话，她说：

“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哩。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

毛泽东轻声说道：

“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他还开玩笑说：

“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呵。”

说罢，就拉着女儿来到饭桌旁。饭菜已经摆好了，毛泽东说：

“嗯，今天一起吃饭。”

李讷刚坐下就抓起了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嗅了嗅，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做成的，她深深地吸吮着香气，说：

“啊！真香啊！”

她望着父母粲然一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江青望望女儿，又望望毛泽东，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毛泽东望着女儿，说：

“吃吧，快吃吧。”

李讷往嘴里扒饭，饭太烫，她嘴里含着饭，咝咝地向外吹热气，吹了几下就咽下去，烫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

“吃慢点，着什么急。”

毛泽东轻轻地笑着，笑得很不自然。李讷瞟了一眼旁边的卫士，腼腆地说：

“在学校里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

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很低，脸上已经变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

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那白皙的脸色已经有些苍白了，目光直直地望着女儿吃饭。李讷在父母面前从不拘束，也无须保持形象，她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抬一下眼皮，目光匆匆扫过桌面，看看饭菜还剩多少。卫士们看着看着眼睛酸了，喉咙也堵塞了。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啊！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个样子？

毛泽东开始还陪着女儿慢慢地吃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渐渐地，他不说话了，终于停下了筷子，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

李讷的嘴终于离开饭碗，诧异地问。毛泽东说：

“哦，人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青年人。”

他说着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抓起报纸，侧着身子看报。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看一眼毛泽东，把剩的半碗米饭倒进李讷的碗里，瞟一眼毛泽东，起身离开了。卫士们看到她眼眶里已经溢满了泪水。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了一块番薯……”

毛泽东还没讲完，李讷的心思只在吃饭上，也没注意父亲说什么，就说：

“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打扫完。”毛泽东好像不敢看女儿，用左手在桌子上点了点，说：“‘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李讷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在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地夹起朝嘴里送。她说：

“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哩，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吃3个。”

她比划了小碗口那么大。毛泽东没有看，还是盯着报纸看。

“今天的饭菜真香啊，可惜……”李讷望望盘子，又望望尹荆山，说：“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尹荆山猛地转过脸去，泪水夺眶而出，朝着厨房跑去。

“唉，李讷这孩子也真受苦了。”

炊事员嘴里念叨着，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馍头。尹荆山等不及在火上烤，便拿来给了李讷。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爸爸，掰一块馍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瓶，将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了让她喝。毛泽东的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了两声，站起身，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他站在院子里凝视着那7棵古老的柏树，久久一动不动。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的卧室，估计她是为李讷的事而来的。尹荆山忙退出来，在外面侍立。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了。尹荆山想了想，便进去替毛泽东倒茶，借机说：

“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他断然地说：“和全国人民比起来，她还算是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毛泽东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无忧伤地说道：“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正是：国家有难，人民苦情，领袖律己与民同。

不忍见饿儿竟有这般吃相，卫士落泪，父母动容。

谁个不怜膝前女，只缘我是毛泽东！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大师傅想办法弄来了一条鱼，可是这条鱼看样子只有半尺来长，身子又扁又平。他还特意说了一句：

“主席好长时间没有吃鱼了。”

一家几个人都不动筷子，想把鱼留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奇怪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

“吃呀，吃鱼啊！”

他见几个人还是不动筷子，便把筷子伸向放着鱼的盘子，招呼道：

“吃，我来带个头。”

李敏、李讷、毛远新只好慢慢地吃了起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后来，李讷因为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毛泽东说：

“这比起在井冈山的一段生活来，也还算不错了。当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败时，有人就沮丧，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年轻人，嘴上还没有毛哩，我比你们的年纪大。我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难道你们年轻人都不想？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

不久，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体重已经下降到了75公斤。

再说1960年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11月3日清晨，毛泽东审阅修改完了《紧急指示信》，他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1961年算起，至少5年不变”的“5年”改为“7年”，并加了一句：“在1967年我国第3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的“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将原稿中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之“有利的”3个字前边加上“极为”二字，成为“对于发展生产是极为有利的”；将原稿中“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在原稿中“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在现阶段”之后，加上了“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一句。

毛泽东将修改稿退还周恩来，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定稿。”“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

11月3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这12条指示是：

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他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11月5日，在聂荣臻指导下，以张爱萍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中国自己制造、使用新的推进剂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1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并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委员会，对苏共的错误观点提出修改意见，为代表团做好理论上准备工作。

后来在11月10日至12月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主持召开有81个国家兄弟党参加的会议，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会议。苏共中央利用这次会议，公布了一份长达60000多字的信件，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暴露出苏共中央要控制一切、指挥一切的态度和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和错误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苏共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批评。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有所缓和。

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批评不得、一切由苏共说了算的局面。

11月15日晨，毛泽东看了关于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了两个重要批语。

此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在11月10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说“中央一级机关单位，在听了总理的报告以后，对抽调万名干部下乡的工作，决心大，行动快，迅速地掀起了申请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由各单位提名，经过各‘口’、两个机关党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反复审查，确定了下放干部的名单。”

据11月9日统计，中央初步确定下放干部共10176人（不包括调给各中央局的干部），占中央机关138000多名干部的7.33%；其中17级以上党员干部1673人，占中央机关16800多名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9.95％。

毛泽东在上述《报告》中写的批语全文如下：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

　　 毛泽东 15日晨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5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5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3级下决心（坚决地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12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1960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指示中所说的“12月上旬或中旬”的会议，就是后来在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1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访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日本、墨西哥、秘鲁等7个新闻代表团和古巴革命电视台摄影记者何塞·塔皮奥·帕耳马。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毅，还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金仲华，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康茅召，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

在和这些新闻界朋友合影时，陪同外宾一起来的安岗怕毛泽东太劳累，建议他和大家一起合拍一张照片。毛泽东却说：

“合影有个谁排在前面，谁排在后面的问题，还是一个团、一个团的照吧。”

11月18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上述新闻代表团，安岗出席作陪。

11月19日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代表团。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王芸生，书记处第一书记王揖，书记处书记安岗、李炳泉等作陪。

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辽宁省委《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转发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很及时很正确的，要求各级党委也像辽宁一样切实安排市场，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中央提请你们注意，辽宁省委所提出的问题，各地都有，带有普遍性。**农业受灾减产固然是生活用品缺乏的重要原因，但是许多同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日用必需品，例如，食盐、煤炭、火柴、灯泡、糊窗纸、缝衣针、炉筒子、眼药水以及锅，碗、盆、筷等等发生脱销现象；修理、缝补、理发、洗澡等服务行业也发生排队现象，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

我们党是一贯关心群众生活的。近3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在不断跃进的形势下，稳定国内市场，安排好6亿5千万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央在1958年提出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群众的干劲越大就越要关心群众生活等一系列明确的口号。**必须指出，能不能保证国内市场的继续稳定，能不能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定性条件。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切实安排一次市场上的问题。**在工业生产上一定要把生活必需品安排上去，保证必要的燃料、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绝对不要把生活必需品挤掉，在服务业方面，一定要调整充实并且适当发展，便利人民，不要有丝毫忽视。**在商业部门应当注意商品的清查和调整。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生产需要，又要考虑生活需要，不得偏废。因为这是关系到多快好省执行党的路线和高举三面红旗的问题。中央相信，只要各级党委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快下决心，断然处理，市场供应情况一定能够扭转过来。你们打算怎么办？请速报中央。

　 中央 1960年11月24日

11月28日，毛泽东看了《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为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抄录如次：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做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道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太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候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3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1960年11月28日

这一天，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发表的论文《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后，立即要求《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给作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6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6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毛泽东 1960年11月28日

后来在《红旗》发表时，毛泽东在信末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12月6日”。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自11月21日出现钢、铁、煤及运输生产逐日下降的情况，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如果完不成生产任务，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号召下，这一年的钢产量到年底最终达到了1866万吨。

12月17日，毛泽东要学习英语，他给秘书林克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林克：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毛泽东 12月17日

1960年年底，一部分省份老百姓的艰难困苦生活已经让毛泽东寝食难安了，可就在此时，他身边也发生了一些让他不高兴的事儿，菊香书屋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整风活动。

这次小整风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据高智说，他知道的几件事有：一名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书房打扫卫生时，看见书架上有那么多的书，没有给毛泽东打招呼，就拿了一本回去看。毛泽东一生极珍视书籍，在战争年代什么都舍得丢，唯有书籍丢不得。这一次，他发现少了书，非常生气，就对这位工作人员发脾气说：

“不懂规矩！”

他又交代汪东兴：

“不要他在这里干了。”

于是，这位工作人员就被送到了农场。后来，毛泽东问起这位工作人员的安排情况，当得知是被送去农场参加劳动，很不满意，就说：

“他还是个娃娃么，怎么能这样搞呢？”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这位工作人员又被送到了空军，不久入了党，成为了一名部队干部。

还有一件事，有人反映，叶子龙的老战友请他吃饭，他就带上高智等一些人一道去吃。这就成了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而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极复杂的人际关系。鉴于这些情况，毛泽东找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谈话，说他发现身边有老鼠，要求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清除老鼠，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于是，汪东兴立即召开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小整风活动。汪东兴在一次会议上指责一些人说：

“你们到了外地，到处要东西，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

他又转向高智说：

“高智，你是不是跟武汉的同志要了肥皂？”

高智见汪东兴点到了他的名字，就把事情的原委叙述了一遍。

原来，高智在上半年跟随毛泽东到武汉，听张管理员说厨房的肥皂不够用，就问武汉的负责人能不能买一点肥皂？那时候供应很紧张，武汉的负责人听高智这样说，就非常支持。张管理员从他们那里买来了肥皂后，对高智说，别的同志都买了，你不买点？于是，高智也买了一条。高智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检讨说：

“向武汉的同志买肥皂时，我没想到政治影响……”

汪东兴依然不依不饶，要高智提到高度上认识错误。高智说，我再也提不到什么高度了。汪东兴就狠狠地批了高智一顿。

汪东兴和高智的矛盾，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有一次，高智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汪东兴来了，说要看看毛泽东的文件，高智一口拒绝了。高智心里想的是：

“主席早有交代，这些文件连江青都不许看，主席批给她的文件她才敢看，不是批给她的她就不敢看。你是警卫局负责人，你怎么能随便看？”

可他嘴上却说：

“杨尚昆主任和叶子龙主任没有交代，我不能给你看。你要看，得有他们的批准。”

汪东兴闻言，一脸愠色，扭头就走了。此后，他俩的矛盾就越来越深，高智一忍再忍。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就站起来指着汪东兴说：

“一条肥皂，我提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肉？还有菜籽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一斤菜籽油，你这是啥意思？”

汪东兴见高智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儿，恼羞成怒，指责高智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高智是又急又气，大声说：

“你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这是胡说！”

两人争论的这件事，起因是有人起草了一个如何做好毛泽东的秘书、安全保卫工作的文件稿，征求高智的意见，高智提出可以把顺序改改，那安全保卫一条放在最后。汪东兴见高智不认账，就质问他：

“你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卫放在最后，机要秘书为啥不放最后？”

高智也不示弱，他说：

“机要秘书是我的日常工作！”

在小整风中，像这样的争论尽管不少，但是争论归争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小整风结束后，毛泽东根据大家谈出来的问题，统计了一下，从他的稿费中拿出近万元，派专人下去，从天津开始，然后是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一退赔并道了歉。

欲知小整风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变动，待以后再作详细交代。

东方翁曰：1960年正是3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数月不吃肉，不吃鸡蛋，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着实感人。他不但严于律己，而且对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最心爱的小女儿李讷也严格要求，从不给予任何的特殊照顾。本章所叙述的李讷周末回家吃饭一节，我是边写边流泪，改一次哭一次，以至于泣不成声。由此联想到一些盛世权贵的儿女们，有几个不是被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深造”、去镀金呢？人们常说两个社会两重天，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吧！

**第11章**

“**西德钢产量去年（1960年）是3400万吨，英国2400万吨，西德1960年**

**比1959年增加15%，法国是1700万吨，日本是2200万吨。但他们的生产**

**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1800多万吨。**”

话说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有3项：1、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2、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这个会议一直开到1961年1月13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听取了5次汇报，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12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12月25日午时，毛泽东坐在床上看文件，他小声招呼卫士封耀松说：

“小封啊，我起来吧。”

封耀松就照顾他穿好衣服下了床，坐在沙发上。他望着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实际情况的报告，心情十分沉重，靠在沙发上点燃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被一团弥漫的烟雾笼罩了。封耀松说：

“主席，我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香烟，划燃火柴。他吸着烟，重新靠在沙发上，说：

“小封啊，你去把叶子龙、李银桥、高智、王敬先、林克和汪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他身边的7个人，一起在过道里围在桌前吃饭。既没有酒，也没有肉，就是米饭和几样蔬菜，只是在菜里多放了一点油而已。毛泽东的筷子伸向菜盘，没有夹菜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扫视着众人，说：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了一下，又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不好，要经常下去。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听者都无声地点着头，神情肃然。毛泽东问道：

“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叶子龙、李银桥表态说愿意下去。高智也说愿意下去。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李银桥，说：

“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叶子龙和李银桥说：

“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着封耀松，问道：

“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那好。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6人都下去，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毛泽东接着讲了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他说，人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不能成大事的。他又讲到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他的排挤，他说：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8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和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别人也吃不下去了，纷纷放下了筷子。

这天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为毛泽东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他喝下去，然后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悲凉地说：“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铅笔，又给叶子龙7人写了一封信，一共写了3页，他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7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6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讲，如何用药。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做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8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改他那豁达开朗的性格，变得寡言少语了。他身边的人，再也很难听到他那乐呵呵的笑声了。

据林克回忆：叶子龙一行人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说：

“你们要过好3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你们下去的同志要组成临时党支部，你担任支部书记。”

林克考虑到在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也有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战士，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他说：

“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

毛泽东说：

“你是否怕承担责任呢？”

林克说：

“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看你行，就这样定了。”

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了13个人，林克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担任支书，由他担任副支书，毛泽东表示同意。行前，毛泽东还特意同这13个人合影留念。

据林克回忆说，他们一行人于1961年1月16日出发，到河南后，河南省委说重灾区信阳专区已经到了整社工作的收尾阶段，安排他们去了情况稍好一点的许昌专区，参加了鄢陵县马栏公社的整风整社工作。

这正是：老圃无芝民墨面，浮夸共产天下先。毛公忧民派“钦差”，竖子故伎敢欺天。

再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他插话说：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它财产等，凡是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4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将要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事先特意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一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天傍晚时分，王鹤滨一家4口人到中南海来看望毛泽东。

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毛泽东刚起床不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接待了王鹤滨一家人。

王敬先是一个个头瘦小的人，他的面部黝黑，有两只大眼睛，一看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告诉王鹤滨说：

“毛主席说不陪你们了，叫你们吃好饭后，再去看他。”

说罢，王敬先就去陪着毛泽东到紫光阁参加辞旧迎新晚会。李银桥领着王鹤滨一家来到小会客室里。王鹤滨不住地打量着已经改建过的房舍，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了双层玻璃，感觉不但宽敞多了，而且灯光也格外明亮。李银桥介绍说：

“修缮这些房屋时，没有经过主席同意，趁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才修缮了这所房屋。主席回来后，一见就大发脾气，拒绝在这新改建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住在了中南海游泳池附近的房子里，以示抗议。”

李银桥所说的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因在游泳池旁，人们就通称为“游泳池”。游泳池旁的房屋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就住在游泳池之侧的室内。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王鹤滨听着李银桥的叙述，回忆着毛泽东那极为简朴的住所和办公室的房子。那时，对毛泽东来说虽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他却一直喜欢那样的明清建筑物。

说话间厨师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李银桥把饭菜提了进来，他一边在餐桌上摆着饭菜，一边解释说：

“主席指示不要给他吃猪肉，等经济好转了再吃。所以，你们来了也没有准备猪肉给你们吃。你们可要吃饱啊！饭后，我带你们去看主席。”

说罢，他便走出了小会客室。王鹤滨感到咽喉有些梗塞了，他心想：毛主席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国家再困难，也能有他吃的猪肉啊！王鹤滨吃着饭，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饭后，李银桥把王鹤滨一家带到了晚会的会场。这个会场是靠近中南海北门的一处不大的平房，在紫光阁的西侧，游泳池的北侧。由于会场比较小，所以参加的人员也不多。

毛泽东看到王鹤滨一家很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还热情地邀请王鹤滨的爱人叶阿莉跳舞。一曲终了，毛泽东坐下来，招呼王鹤滨坐在他身边。他侧头看着王鹤滨，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比你在的时候还好吧！”

“很好！主席。”

王鹤滨说罢，打量着毛泽东：看上去他确实很健康，身体瘦了些，正合乎健康的要求，去掉些臃肿，显得精神了。毛泽东见王鹤滨高兴地观察着他，又满面春光地说：

“肉少吃了点，加上经常游泳，体重跌去了几公斤，但精神很好。”

王鹤滨也说：

“主席，游泳是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到锻炼。”

毛泽东听了王鹤滨回答，也加重语气说：

“游泳对身体的益处很大。”

1961年1月4日上午，何其芳正在文学研究所办公，办公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一听，是毛泽东的办公室打来的，说是要他立即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要和他谈《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修改问题。

此前，何其芳得知毛泽东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的部分故事，便请毛泽东为该书作序，毛泽东要他先起草一个稿子。何其芳遵嘱起草了序文，几经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

何其芳到了菊香书屋，见两位中央负责人正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看见他来了，就招呼他落座，让汇报者继续讲下去。那位负责人说：

“现在农村的辩论会，名字叫‘辩论会’，实际上成了斗争会。”

“以后叫商量和讨论会，大家都可以讲话。”毛泽东说罢，转向何其芳问道：“你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

何其芳说：

“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现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够工作下去吗？”

何其芳说：

“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地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够辨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信。”

“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毛泽东高兴地看着何其芳，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把话题转到序文稿子上，他说：“你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接下来，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到国内形势上，他说：

“《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现在要稳定下来。”

谈到逻辑学，毛泽东说：

“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学哪能管那么多。”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诗，他说：

“最近我写了两首近体诗。不过，现在还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我60岁才学作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

何其芳看谈话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为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起身告辞。他刚走出卧室，毛泽东又叫住了他，交代说：

“你把序文改好后，再送我看看。”

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主要是小商品）生产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报告中所提的各项意见，切切实实地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工作抓起来，并且一直抓下去。

**最近时期许多地方日用工业品产量下降，供应紧张，甚至人民生活中每日不可缺的一些必需品和用具，如食盐、火柴、锅、盆、碗、筷之类，也买不到。**这些商品的缺少主要是领导上没有抓紧安排，它同农业的歉收并没有不可分的关系，只要好好地安排，狠狠地抓紧，就完全有可能迅速地增加上去。应当指出，**在目前农业连续受灾，吃的穿的主要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大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缓和市场紧张情况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以高度关怀人民生活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把这件事办好，一定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显著的成绩来。**

（发至县团级）

中央 1961年1月7日

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了在农村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为减少货币投放和市场压力，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要分作两步走，即在两年内完成。

**1961年拿出10亿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62年提高棉花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国家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大集体下要有小自由。

社员的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12条紧急指示信“规定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贸易要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应放开农村集市贸易，不要过多地加以限制。

1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83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23位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个对工作会议和全会承上启下的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样的情况。譬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30%是好的，50%是一般的，20%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20%的，有不到20%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很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本文中这一类符号笔者目前还查不出真实名字——笔者注）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真正把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大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要派大批干部去，深入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找出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方法，否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且有很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底了。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20%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

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1961年）钢只定××××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6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顿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1947年4、5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别人的眼睛），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言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们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它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派人下去搞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改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党委书记、委员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作，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有30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3个队就行。

**做工作要有3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有底。呱哩呱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本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1951年到1960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各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过去是黑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现在这种黑手起家是掠夺来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调，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它的同盟者──农民。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说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作得差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30%，共产风刮了一下，停得早，1959年3月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得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改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1960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的问题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后来改过来了。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年3、4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得不够彻底。现在省委、地委同志认识比较深刻了。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10年，从1960年到1969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有逸，决议文件也不多，开会也不是一直开。过去决议文件多了不灵，少了也可能不灵，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1960年）是3400万吨，英国2400万吨，西德1960年比1959年增加15%，法国是1700万吨，日本是2200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1800多万吨。**今、明、后年，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增加规格、品种，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1957年我们职工有2400多万人，现在有5000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做，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30个人，英国26个人，苏联6个半人，我们只有3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4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住，准备顶它10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20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就不注意去摸情况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坏话，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改了，就要欢迎人家。**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全会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了邓小平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见到了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你只要认识问题，改了就好。”

舒同是在1960年10月下旬被撤职的。柯庆施在山东干部会议上宣布，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其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现在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后来在1961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谭启龙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仍回安徽省委担任第一书记；舒同仍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暂时下放到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舒同被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八届九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此期间，陶铸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黄克诚，他劝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一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后来，黄克诚思之再三，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理论高度认识问题等等。

1月18日，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重新看到了他在30年前写的一篇名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

这篇发黄的石印小册子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大燮村的农民赖茂基珍藏的，他在1957年2月献给了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后来在1959年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阅到这本小册子，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转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

1月1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全文如下：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并决议如下：

一、**1954年**，当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1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加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时，为了解决中央一级和大批新建厂矿的干部需要，**中央决定撤消了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

二、在第1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以后，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连续大跃进，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工业；全国的经济布局也日益趋向合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基本建成若干个以一定区域为单位的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更合理地调动和利用各种人力、物力的资源，来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从战略上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基于以上的实际需要，从1958年起，各省、市、自治区就已开始按照中央决定，分别举行过多次的区域性协作会议，随后又成立了协作区委员会。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表明，协作区在拟订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工作的协商机构，工作范围和权力都有限，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现在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6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三、上述6个新设立的中央局，都是中央的代表机构，它们分别代表中央领导下列各省、市、自治区：

中央华北局——北京、河北、内蒙、山西4个省、市、自治区；

中央东北局——黑龙江、吉林、辽宁3个省；

中央华东局——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东7个省、市；

中央中南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个省；

中央西南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4个省、区；

中央西北局——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5个省、区。

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其主要任务。它应当随时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同时，它应当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组织等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领导和统一安排，从各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组织建设，并按照地区特点，规定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发至省市委书记处和中央部委党组成员。）

在上述6个中央局中，由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3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3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3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月20日下午4时

此信给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1月20日（农历腊月初四）晚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来自家乡的表侄贺凤生。

贺凤生是毛泽东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的二儿子，在家乡担任生产队长。他对湖南的浮夸风、共产风意见很大，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进京，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情况。1月14日（农历十一月廿八日），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

腊月初四晚上，毛泽东一见到贺凤生就微笑着说：

“你是我请来的客人，到了几天啦？习惯吗？”

贺凤生说：

“我已经到了几天啦。”

“坐下嘛，”毛泽东招呼着表侄：“有话尽管说，慢慢说嘛。秘书告诉我有一位家乡来的亲戚要见我，我估摸就是你来了。我告诉秘书，请你今晚来谈谈。接来的客人嘛，岂有不见之理。何况你贺凤生还有50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

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完了又说：

“1927年我与你的父亲贺晓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非常感谢你的父亲锋芒不减当年。你的父亲还健在吗？我还欠了他的光洋呢。”

贺凤生说：

“我父亲今年十月初八（此时还是农历腊月初，故贺凤生说“今年十月初八”，即1960年11月26日——笔者注），在岳阳我大哥贺林生家里去世了。那时，我还在长沙治病。”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听说表弟刚刚去世，立时责怪起贺凤生来。他点了一支烟，又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命相救，我毛泽东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站了起来，说：

**“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他缓了缓自己的情绪，又问道：

“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

原来在1960年下半年，贺凤生因搞农田水利建设，在推车运土时不慎摔倒造成骨折，曾有一段时间在长沙治病，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十分困难。贺晓秋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家中的情况，毛泽东先后两次寄去钱为贺凤生治病。

“收到了。一次200元，一次100元。”贺凤生回答后又问道：“那些钱是您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当然是我个人的啰！那都是我的稿费。”毛泽东说：“我不需要更多的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毛泽东说完，向警卫人员做了个手势，警卫人员退了下去。会客厅里只剩下他与贺凤生两个人了，他说：

“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今天只我们俩谈心，主要想听你们那里的情况，听听你家里的情况，好的坏的都可以告诉我。给你一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

贺凤生也不客气，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对毛泽东说：

“我想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快饿死人了！”

“好一个开头炮！”毛泽东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亲的锋芒如今也传给你了**。讲下去，讲下去，我说过，**不管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可以。**”

“**下面真有人骂娘呢。**”贺凤生说：“**刚解放的时候，农村开始了土改，老百姓分得了田地，感到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后来肃反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年一个新花样，一年一个新名堂，农民的劲头可大啦，总感到生活日新月异，幸福美满，像芝麻开花一般，社员们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毛泽东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不要尽唱赞歌了。”

“才不呢！”贺凤生说：“大跃进来了，情况就变了。‘**吃喝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刮得不像话，**老百姓心中直叫苦哩！”

毛泽东说：

“有12级台风那么厉害吗？”

“它可比12级台风还要厉害。”贺凤生说：“大跃进刚提出时，社员劲头可大啦。可是**一搞公社化，上面来了命令，要建居民点，要搞乡村规划，农民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土坯墙要捣碎了沤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墙，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这还不算，大办食堂、大办钢铁可就更惨了。**刚办食堂那阵子，社员积极性很高，都认为幸福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集体食堂饭喷香，社员心里喜洋洋’。可是好景不长，浪费太严重，吃着吃着就没得吃了。**餐餐萝卜、红苕（根茎类食物，近似红薯），没得几个油花花，吃得男子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小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

毛泽东越听面色越凝重，大口吸着烟。贺凤生见他听得很认真，喝了一口茶水，接着说：

“**饥荒起盗心。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家人饿死。胆子稍大一点的人只好跑到田里扯萝卜菜吃。可一旦被干部抓到，一根绳子把你吊起来大半天，弄得你半死不活。**”

“你这个生产队长怎么样？”

“生产队长还不也是个普通社员，**如今只有司务长、火头军、保管员不会饿肚子**。有饱饭吃我就不来找您了，反正食堂不解散我就住在这里不回去了。”贺凤生越说火气越大：“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实际上是浮夸卫星。不实事求是，搞假场面的是英雄，还可以升官。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地里的稻谷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好吃好喝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贺凤生喝了口茶水，问毛泽东：

“您不是说党和人民是血肉关系吗？现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

毛泽东沉重地说：

“不是腰河里发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一点，责任在中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一年多时间，全国就化开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备了条件，有些只是为了跟形势，还有些没有具备条件，是一阵风刮起来的。下面有些情况，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有些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中央却有责任，真是愧对人民，愧对为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民。”**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又告诉贺凤生说：

“中央准备近期开个3级干部会议，大约六七千人。华容县领导也要来，叫他们来，要好好讲讲这个问题，刹一刹这股风。”

贺凤生见毛泽东心情如此沉重，也缓和了许多，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老人家汇报，不知该不该说。我们那里不少地方，现在把人家的祖坟都挖掉了，说是为大跃进改造产粮田，也不事先出个安民告示，有些坟挖出来了没人管，尸骨乱丢。我娘的坟就给人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气愤，站起来大声说：

“**共产党也讲人道嘛，也是爹娘养的嘛！国民党挖我的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他顿了顿接着说：

“**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我给你两个权力：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我也清楚，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看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掉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顾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

贺凤生关切地问：

“那食堂散不散呢？”

毛泽东说：

“**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还是要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上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准搞假家伙。**你们华容县那个钱粮湖围湖造田工程，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但下雪吃雪，落雨淋雨，使农民兄弟受苦就不对了。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我向他们道个歉。”

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秘书第3次来催毛泽东吃“晚饭”。毛泽东留贺凤生跟他一起吃饭。菜端上来了，贺凤生一看，是普通的4菜一汤，最好的一盘是炒鸡块儿。厨师说：

“这一份是主席特意吩咐给你加的。”

吃过饭，在北京化工实验场工作的文炳璋来了，他是毛泽东通知来接贺凤生的。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贺凤生，告诉他说，他反映的情况，已经和刘少奇、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党中央、国务院进行过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毛泽东还说：

“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

贺凤生临走前，毛泽东叫来工作人员，送了客人一盒大中华香烟，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条上海产羊毛围巾，一顶东北狐皮帽，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一个带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笔记本，另外还有25斤全国粮票和50元人民币。毛泽东说：

“见面礼怎么样，满意吧？钱不能给的太多，给多了对你贺凤生不利。”

说罢，他拉着贺凤生的手说：

“走，我送你出新华门。”

“嚓”，闪光灯亮了，眼明手快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非比寻常的场景。

据工作人员回忆说，自贺凤生走后，毛泽东忧心如焚，曾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本章上面所引入的贺凤生向毛泽东反映的现象，的确是当时农村中的真实情况。笔者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对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那些制造“人祸”的“歪嘴和尚”也是深恶痛绝的。至于饿死人的现象，本传前面已经尽可能地说清楚了，的确应该成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但是在毛泽东身后，它却被“国粉”一类人无限制地夸大，成了否定大跃进和反对毛泽东时代的口实。这股妖风的风源到底在哪里呢？请看以下事实。

据2018年3月27日“红歌会网站”发表署名李书农的文章：《“饿死三千万”原来是蒋经国出资100万美元炮制而成的，你还当它是个宝，脑残才信》一文说：“早些年，公知们合力吹捧‘饿死三千万’这则海外大谣言，使尽所有造谣手法，肆意蛊惑年轻人憎恨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如杨继绳还真是把‘饿死三千万’当个宝，正儿八经的去‘考证’，搞了本《墓碑》，结果被孙经先先生扒了皮：《墓碑》里数据基本是伪造，它**将死亡人口都当成饿死人口、将迁走的人口户籍也都当成饿死人口**……然而，当时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情报就狠打了公知们的脸，这份情报表示：毛泽东时代大跃进时期，大跃进没饿死三千万，反增5000万！看来，真是‘黑毛主席靠谣言，粉蒋介石靠谎言’。你可以不喜欢毛主席，但请不要用造谣、传谣、信谣等历史虚无的下三烂手段去攻击、中伤、丑化他！经过人民群众揭发，许多关于毛主席的谣言已被澄清，‘饿死三千万’这个世纪大谣言也已被揭烂批臭了，如果还当它是个宝，那真是脑子进水。然而，对于这个谣言，除了将之打倒，这里还要狠狠地踏上一脚，使之永远不能翻身。实质上，3年‘饿死三千万’最早是出自香港大学荷兰籍教授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这本书里面的内容通篇造假，其无耻谣言更是登峰造极！”“冯客写的这个《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是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多万美元雇冯客为刀笔炮制而成的。那么问题就一清二楚了，蒋经国基金会就是台湾国民党对外‘反共反毛’、搞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组织，他们造谣黑毛主席、黑毛泽东时代虽是卑鄙，但人家是被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者给打败了的呀，而你中国公知们生长在共和国里，成长在五星红旗下，竟然还信这种境外的谣言，竟然还拿过来作为反共反毛反华的‘武器’，实在是很不应该，良心何在呀？这里贴一下，冯客炮制‘饿死三千万’这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所使用的下三烂手法：该书的封面和一些配图，都使用了民国时期大饥荒的照片（冯客大胆地将饿死2亿人的民国大饥荒的照片一遍遍拿来冒充所谓‘大跃进’饥荒照片。图片上的人物、衣着一看都是民国相，‘大跃进’几个字还是在翻拍时加上去的），其数据也大都是主观臆断，而残渣余孽们依此认为‘饿死三千万’铁证如山。”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从来都不说真话的“国粉”一类人，信奉的是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果真如此吗？还是请他们想一想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吧！

**第12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

**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

**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话说1961年1月下旬的头一个周日，毛远新从清华大学回到菊香书屋，他对伯伯说：

“我在清华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下学期转到那里去学习，行吗？”

毛泽东同意了毛远新的转学请求。此后，毛远新便在新一学期里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到了寒暑假，他就回到毛泽东身边。

1月23日下午，何其芳接到了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毛泽东要见他。何其芳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见已有4人在座。毛泽东示意何其芳坐下来，说道：

“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

说罢，他把那一段文字念给大家听，然后又让大家传着看。稿子传到何其芳手里，他认真看了一遍，发现毛泽东除了在文章的最后加写的一段以外，还在好几处地方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了这样的内容：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见何其芳看完了，就对他说：

“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不过还可以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内容。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毛泽东还说：

“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他接着将话题转到美学问题上，他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有人插话说：

“问题在于也有一些相同的。”

毛泽东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一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

谈话结束了，何其芳在告辞时问毛泽东：

“把主席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

毛泽东说：

“再送我看看。”

1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他们的谈话记录被收集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全文如下：

毛泽东：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对浅沼（浅沼稻次郎）先生遇难，我们表示哀悼。

黑田寿男：浅沼先生作为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来中国，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继承浅沼的精神并继续发扬他的精神。

毛泽东：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论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

**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在中国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在你们国家就是岸信介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

黑田寿男：去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反对“安全条约”运动，代表垄断资本的政府站在同我们相反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用暴力通过了“安全条约”。在这期间，中国举行了很大的游行集会支援我们，我们表示感谢。

毛泽东：我们彼此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你们是处在最前线。前年浅沼访华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即使一时没有多数人同意，但等到人们了解的时候，总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要有这样的信心。过了一年，即到了1960年，日本就发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反对“安全条约”的运动达到那样的高潮，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贸易也停了。我同浅沼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武汉东湖会见时，就说过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贸易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变化，政治方面还不一定。政治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三木、高碕、河野、石桥，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你们看这话是否有点道理？

黑田寿男：反主流派今后如果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对反对“安全条约”更坚决一点，那时就可以说是间接同盟军。

毛泽东：欧洲国家同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同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世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你们对非洲、拉丁美洲做什么工作没有？

黑田寿男：我们有亚洲团结委员会，以这个团体为中心在开展活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拥护和平的斗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我们愿意今后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这一活动。

毛泽东：非常有必要。

黑田寿男：今年在亚洲，主要的问题是老挝问题。老挝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美国就利用日美“安全条约”，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最近日本各工会、各政党、各群众团体和文化团体等开了大会，反对美国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并且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干涉行为，也向日本政府示威，要求日本政府不让美国使用日本基地。

毛泽东：这很好。

黑田寿男：现在日本政府同韩国政府在进行谈判，把南朝鲜政府看作是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这就妨碍了朝鲜的和平统一。美国利用日韩谈判加强南朝鲜、台湾、日本的军事力量，加强东北亚军事同盟。进行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正在反对日韩谈判。

毛泽东：反对很有必要。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可是，有人感到现在运动搞不起来了，有些悲观埋怨；也有部分人可能进行指责，说你们左派过去的斗争搞错了。在这样的时候，用我们的话来说，左派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例如，中国辛亥革命以前，1911年4月黄兴在广州领导的军事暴动失败了，牺牲的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失败之后连黄兴本人也跑到了香港，认为失败了，不行了，没有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政府。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10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我看你们的历史中也会找到这样的事例。

**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么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7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7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捉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么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

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捉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他们怕老百姓起来。例如有许多日本友人来中国访问，政府不能禁止；我们去日本，他们也不能禁止，但可以给予种种限制，因为日本政府同蒋介石有外交关系。另外，他们也怕共产党。高碕邀请廖承志同志去访问日本，廖承志同志，你什么时候去？

廖承志：现在还没有定。

毛泽东：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黑田寿男：完全同意。今年民间交流会更多起来。不管池田政府是否愿意，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会多起来，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一定会签订友好条约。

毛泽东：很好，有发展的前途。

黑田寿男：我们年初就来中国，也是为了两国人民的亲善。我们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许多有益的话，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表示感谢，并祝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请向日本社会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1月24日晚，毛泽东把何其芳送来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又认真看了一遍，在他加写的“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一句话中，又作了重要修改，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特别强调了斗争在事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尔后，他在清样上批示道：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

1月25日，王观澜与夫人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经闭经4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信写好后，王观澜郑重地把3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他说：

“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来信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3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3天后，毛泽东亲自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

“你们的信收到了，谢谢。”

1月26日到1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到南京，一路上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3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他在听汇报中曾先后插话说：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

“水是混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1月20日《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

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很好，很重要。中央同意报告中提出的1961年卫生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项措施，**请你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迅速查明病情，采取有效的、因地制宜的具体措施，认真解决目前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力争在二、三个月内控制浮肿病、妇女病、小儿营养不良病及其他主要疾病的发展，大部分治好现有病人，严防各种季节性传染病流行，以保证有足够的健康的劳动力投入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促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央认为，**在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人民体质有所减弱的情况下，防治疾病，保护劳动力，保护人民健康，应当成为今年全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各级党委今年至少必须抓4次，灾区应当每月抓一次。各级卫生部门应当鼓足干劲，从实际出发，努力做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在整个文教战线上，今年应当把卫生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各级党委要选派得力的干部去充实和加强卫生部门的领导，率领卫生医疗队伍支援农村、支援灾区。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商业、粮食、轻工业、化工、民政、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同卫生部门，切实解决治病防病所必需的药品、物资、经费和器材等具体问题，务使件件落实。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应当向广大干部普遍进行一次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教育，大兴为群众办好事之风。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决走群众路线，才能把卫生工作做好。**各地在防治疾病工作中，还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解决医务人员（特别是农村医务人员）的口粮、夜餐粮和工资等具体生活问题，切实注意医务人员的健康。**基层卫生队伍的整顿问题，今年应当认真地抓一下，但要注意以有利于当前的治病防病为原则，具体做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

中央 1961年2月1日

2月2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给吴启瑞写了一封回信：

吴启瑞同志：

毛主席嘱：写信转告你，1月25日的来信他已看过，很感谢你，并寄上1000元，以济眉急，作为赠送，不要还的。祝春节好！

徐业夫 2月2日

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还曾嘱咐小女儿李讷请自己恩师王正枢的二女儿王明夏邀集吴启瑞、王人旋、王雪华、王人艺、王人美等同辈老人到家里相聚。不久，毛泽东又嘱咐秘书高智打电话询问吴启瑞的家庭生活情况。文化大革命中，王雪华身患重病，毛泽东安排将她下放在山西的女儿调回身边，侍奉汤药。1973年4月，毛泽东安排将在干校的王人美调回北京治病。

正是：滴水之恩涌泉报，毛公高风说到今。近观竖子多沐浴，反将国父作仇人。

且说2月初的一个早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员小李，给毛泽东送来了文件，她正要离去，毛泽东问道：

“小李同志，你有没有参加民兵组织？”

“参加了。”小李回答说：“我是去年参加的。去年国庆，我还参加了民兵方阵游行呢！”

“嗯。早上我看到工作人员组成的民兵出早操，挺精神的哟。好，我来考考你，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

“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对，大办民兵，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促进人民公社劳动军事化，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效果不错嘛。”

小李想起她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有一张参加民兵训练时拍的照片，便取了出来，说：

“我还有一张扶着枪的照片呢。”

毛泽东接过照片，饶有兴趣地仔细端详着，只见小李身穿藏蓝色西裤，白色棉布衬衣掖在长裤里，齐耳短发，右手持步枪，昂首站在一株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

“好英武的模样哟！”

小李不好意思地说：

“照得不好。”

“哎，我看蛮好嘛！”

毛泽东放下照片，点燃一支烟，望着窗外，沉思了一会儿，把手中的烟在烟灰缸里弹弹，顺手拿过一本他读过了的介绍地质常识的小册子，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对小李说：

“给我拿支笔来。”

小李递过一支铅笔，毛泽东手执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首七绝，题目叫《为女民兵题照》，诗云：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放下铅笔，他微笑着说：

“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

小李又惊又喜，忙接过小册子看了一遍，激动地说：

“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那配得上……”

毛泽东说：

“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哟！”

此后，毛泽东南下到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田家英向他做了汇报。田家英说：他带领的小组在浙江嘉善县农村，通过对比调查，发现有一个生产队没有天灾，而是“五风”造成生产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难。田家英还说，他发现农民对食堂强烈不满。

2月6日，毛泽东在驻地汪庄听取了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的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插话说：

“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11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会见了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后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谈话中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毛泽东说：

“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关系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

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军事学说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运用。据（阿尔及利亚）阿巴斯总理对我说，法国军人也在看我的军事著作，在学习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人运用某些学说对付法国人，这样他们都运用我们的学说来进行斗争。但是，我们的学说对被压迫人民较容易运用一些，而压迫者却难以运用。我们运用游击战对付日本的时候，日本人也学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我们同蒋介石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也学我们来对付我们。他们想以敌人的东西进攻敌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2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召见江华、林乎加、薛驹谈话，田家英也在座。他劈头就问：

“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

毛泽东所说的指标，是指江华原来汇报的1961年浙江产粮160亿斤。他不等江华等人回答，又接着说：

“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退赔上，他问：

“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说：

“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4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江华说：

“剥夺农民的思想是反动的。”

毛泽东说：

“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

“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3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历史，引申到理论，系统地论证了很多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精神准备的问题，他说：

“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6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10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3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1927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1942年，1943年，1944年，还有1945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有109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

**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2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前往江西，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说到了公社和生产队规模太大的问题。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2月11日，毛泽东到了湖南。

此前，胡乔木带领的小组在湖南长沙县、湘潭韶山和湘乡白田、大坪等公社，已经进行了调查。

2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及调查组的胡乔木谈话。毛泽东说：

“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1个社划成3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

胡乔木插话说：

“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好？毛泽东说：

“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3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3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3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第三个方案，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多少生产队？”

胡继宗回答说：

“1万5千个。高级社时是5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1万6千个生产队。”

毛泽东说：

“你们大体上还是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5万个。”

胡乔木说：

“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泽东说：

“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

胡乔木汇报说：

“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生产队，那个生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

毛泽东说：

“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2月12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张平化、胡乔木单独谈话。张平化说：

“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5万多个大队；现在的1100个公社可能变成3000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

“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15项工作。**就叫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上面叫生产大队，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

张平化说：

“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

“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

胡乔木建议说：

“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公社。”

毛泽东说：

“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

胡乔木说：

“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

“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正是：三省奔波好作风，群策群力胜孔明。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探索顺民情。

单位要小不要大，毛公胸中已成型。生产小队不要“小”，因为它是最基层。

接下来，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毛泽东提醒他们说：

“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胡乔木说：

“**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

“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又问：

“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

“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5个食堂，以后并成3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5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毛泽东问：

“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说：

“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毛泽东说：

“烤火问题要解决。”

张平化：

“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毛泽东想到在浙江的调查，就说：

“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毛泽东说：

“那何必呢？”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的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

张平化接着说：

“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毛泽东又问：

“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

**张平化说：**

**“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10%，办得差一点的占20%。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

**胡乔木补充说：**

**“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听到的湖南对食堂的这种基本肯定，与在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15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春节一过，他就通知3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来广州。

2月19日，陈伯达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报送给毛泽东。这是他在得知毛泽东此前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后，为广东调查小组起草的一份材料。《调查纪要》中写道：

“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作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作生产队，有的地方叫作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

“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毛泽东非常重视广东调查小组的意见，而且从中还受到了启发，几天后便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在广州与广东、湖南、浙江的3个调查组部分成员会合。

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召集陶铸、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赵紫阳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

“有的省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好处。”

还有人发言说：“大”还是个方向。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就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说：

“**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指定，以陶铸为组长，陈伯达为副组长，由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也参加起草工作。要求他们在3月10日写出初稿。

再说与毛泽东南巡调查研究的同时，刘少奇在八届九中全会后，也回湖南老家宁乡县搞调研，他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后说：

“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

**刘少奇还说，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而此时的邓小平，也乘着专列到了京郊顺义调研。在专列上，他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着他打桥牌。然后，他让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集一些材料，写成调查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报发给正在南方的毛泽东。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3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毛泽东讲完后，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就汇报了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毛泽东接着说道：

“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3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提出了一些顾虑：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有影响；现在变动，影响春耕生产；还有国际影响问题。毛泽东说：

“我的家乡湘潭，以前分成上七都、下七都，都还嫌大，后来是21个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21个公社，但现在只有13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1200个公社，湖北只有600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

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200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11个生产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3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这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社、队要划小，他说：

“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又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省参加的是王任重。

3月7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和王任重谈话，他首先问道：

“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

王任重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说：

“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3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他说：

“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

王任重说：

**“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泽东说：

“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40%，农村有20%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说：

“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的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毛泽东加重语气说：

**“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他又问：

“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

王任重说：

“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欲知毛泽东对于人民公社内部体制问题如何决断，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1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毛公所说的这一状况，再次验证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著名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此后的社会实践看，这一类事件还要由于“人为”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花样翻新，不断重演。本章中已经说过，刘少奇在此次调研中回到了故乡，他说：“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他又特别强调**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不知读者诸君嗅出火药味没有？他不仅不像毛泽东那样认真检讨自己，做好自我批评，反而把枪口对准了别人，对准谁呢？请稍安勿躁，越往下看，你就会越明白！

**第13章**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

**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

**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话说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

这一天，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东北、华北、西北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北”会议。

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把他的小册子《调查工作》的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与会者，并写了一个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3月13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其他与会者们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刘、周、陈、邓、彭5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做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10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3天会太少了，至少5天至7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7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做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做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广州

这一天，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给“三北”会议的这封信。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手来。只要省、地、县、社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

关于30年的那篇《调查工作》，他说：

“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4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3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4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10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北京方面的刘少奇等人接到毛泽东3月13日上午8时的信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建议南北两会合在一处开为好。刘少奇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决定两会在广州合开。

3月14日，“三北”会议的4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

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了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为什么要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

“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毛泽东确定这次广州会议讨论3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3月15日，南北两会合一，重新编组，讨论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主张将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材料的标题下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材料是陕西省委关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分析报告。**

**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在食堂、供给制问题上，意见也很不一致**。

**3月16日，毛泽东决定将已经写出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印发给各小组讨论。他还将陶铸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批发给会议讨论。**这个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在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这个办法施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

**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结果，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没有被会议通过，以至于在半年之后的9月29日，他不得不重提此事。**

就在3月16日这一天，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

陈赓在上海从3月份开始，带病撰写他的军事著作《作战经验总结》，原计划准备写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共6章；哪知刚刚写完序言，他的心脏病就复发了，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58岁。他是10大将中辞世最早、寿命最短的一位。

陈赓在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3月19日，广州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开始修改，每个大区选派1至3人为代表，参加修改工作。

这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说：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3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的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业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曾希圣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信，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他认为好处大于坏处。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3月21日，毛泽东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3稿印发会议。

3月22日上午，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由他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出语惊人：

“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还说：

“**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3月22日，**广州会议经过广泛讨论，基本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有60个条文，故称《农业六十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条例明确规定：从《六十条》下发起，原来被叫作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的生产队，统一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去掉“小”字，一律改叫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2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全文如下：

全党同志们：

党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草案，发给全国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

全国农村的形势，在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和广泛开展整社运动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凡是贯彻执行了《十二条》指示和认真整了社的地方，广大农民是积极起来了，人民公社制度有了进一步地巩固。今年的春耕准备和春耕情况，在多数地区都比去年好。但是，为了争取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还需要全党从许多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也还有许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

**第一，在分配上，无论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或者在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的现象。**

**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

**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原名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

**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

**第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以上这些情况，都必须进行及时的适当的改变，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党中央认为，现在急需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讲话和1959年4月党内通讯的精神，以及中央《十二条》指示的精神，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应该怎样作，不应该怎样作，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这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就会有一个大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保证。

现在这个条例的草案，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提出来的。党中央认为，**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是人民公社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通过这次讨论，来提高全体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为了把这个讨论领导好，各地党委和全党同志应该注意以下几件事：

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市委、县委，应该首先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然后领导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二、**要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对于同社员关系密切的地方要特别讲得明白，对于他们的疑问要作详细解答，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三、省、地、县3级党委，要帮助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在本地试行这个条例草案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同广大群众反复商量，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认真讨论，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步骤。无论什么问题，一定要在上级领导下，先在党内和群众中定好新的解决办法，然后才允许有步骤、有秩序地改变老的办法。有些问题现在解决有困难的，可以过一个时候再解决。公社各级的公共财产（牲畜、农具、粮食、蔬菜等），一定要注意保护，不许随便分散。**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特别要慎重处理，绝对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同时，还要防止坏分子乘机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

四、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妨碍当前的生产。省、地、县3级党委，要帮助和鼓励公社各级干部，继续积极负责地领导生产，领导各项工作。要告诉他们，这个条例草案是要他们正确的领导，不是要他们放弃领导。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对当地情况和民族特点的调查研究，可以拟订自己的补充条例。在牧区还需要拟订适合牧区情况的条例。这些补充文件在报请中央局批准以后，也应该发给党员和社员讨论，同时报告中央。在将来，各人民公社还可以根据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本省、市、自治区补充条例的原则，根据本公社的具体情况，定出自己的工作条例。

六、城市中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和其他单位，也都应该领导党员和适当范围的群众讨论这个条例草案，以便使他们了解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讨论的时间和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定。

　 　 中共中央 1961年3月22日

这才是：好事从来都多磨，毛公到此奈他何？众说纷纭多异议，少数历属服从者。

虽然去小已如愿，核算还得从众说。致信全党求贤议，一以贯之不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罗光禄：

“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啦？”

罗光禄说：

“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不完全理解，只是组织上服从，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毛泽东略有所思，点点头说：

“你说得对。代表们走了没有？”

罗光禄说：

“代表们到机场去了。”

毛泽东问：

“叫回来可不可以？”

罗光禄说：

“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

毛泽东说：

“你赶紧办吧！”

罗光禄立即打电话询问代表们的行动情况，对方回答说：代表们刚刚到机场。罗光禄说：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来继续开会。就这样，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又继续进行。

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终于要结束了，代表们经过近两天的充分讨论，大家都说思想通了。这下，毛泽东高兴了。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

附《关于调查工作》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就《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2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1军团4军、3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3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3月28日，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到广州，他们向毛泽东汇报了群众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3月2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他在车上细心观察铁道两旁广东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工作人员下去询问。农民们反映说，他们还是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毛泽东说：

“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3月31日，毛泽东在停在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群众在讨论《六十条》时，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

**“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他又问道：

“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

张平化说：

“群众还是肯讲真话。”

毛泽东说：

“《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5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作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毛泽东说他要立即赶赴武汉，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还说要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要“以下乡为主”。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外国客人。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节约煤炭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军委总后勤部：

现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节约煤炭的报告发给你们。望即布置执行。

燃料缺乏是目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大力开展节约煤炭的工作，是解决当前燃料不足的一项紧急措施，也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从长远看，根本解决我国的燃料问题，必须逐步改变燃料的构成，即增加石油、水电和天然气等燃料动力的建设和生产，减少煤炭的消费。这是我国今后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但是，燃料构成的改变，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建设过程，**在当前解决燃料不足的最有效办法，除了力争煤炭生产的好转，努力增加产量以外，就是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煤炭质量，合理组织供应，降低煤耗定额，力求煤炭的充分利用，来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中央要求国务院工、交、商业各部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上述精神，指示所属制订节约煤炭的指标和措施，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列入今年计划，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有效地开展节约煤炭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使职工群众认识清楚节约煤炭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做好经常的组织工作。中央同意在工业、交通10人小组的领导下，设置一个煤炭节约办公室，由国家计委、经委和煤炭部各指定一党组成员兼任此项工作。负责综合拟订节约煤炭的规划，总结和交流经验，进行督促检查。国务院工业、交通和商业各部，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示所属也应设置人数不多的专职机构或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发至省军级）

中央 1961年4月3日

4月8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又转回长沙。

此时，在省档案局任副局长的毛华初听说毛泽东回来了，就和母亲王淑兰带着宁利、宁科、宁娜3个小孩到省委蓉园一号来见毛泽东。一家人见了毛泽东，王淑兰亲热地叫着三哥，毛华初喊着伯伯，3个小孩子则争前恐后地喊爷爷，好不热闹。毛泽东见了他们也很高兴，吩咐大家坐下。毛华初便和母亲分坐在毛泽东两边的座位上，他说：

“我们来看大伯。”

毛泽东说了声：

“好。”

他问毛华初：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毛华初回答：

“我现在搞档案工作。”

毛泽东问：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搞档案工作？”

王淑兰听出了三哥的弦外之音，连忙夸儿子怎么怎么行，要搞其它工作才好。毛泽东说：

“革命工作都一样，行行有出息。不过，现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多搞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华初说：

“我虽然管档案工作，但省委尽量安排我下农村，多搞调查研究。”

“好！”毛泽东又嘱咐道：“你还是多搞点调查研究好，档案让那些老头子去搞。”

毛泽东问了几个孩子的名字，毛华初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指着他的大女儿说：

“为什么叫宁利？”

毛华初说：

“她是1949年2月生的，新中国即将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就是‘宁利’的意思。”

毛泽东笑着说：

“这些名字取得还很有意思。”

毛泽东热情地款待了王淑兰一家人。后来，他和省委打招呼，要毛华初去韶山参加胡乔木领导的调查组，参加调查工作。

4月9日晚7时半，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刚从乡下调查回来的张平化谈话。张平化汇报说：在讨论《六十条》时，生产队对于粮食定购，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国家的数量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

毛泽东说：

“才不是哩！”

张平化说：

“现在看来不见得。”

毛泽东肯定地说：

“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汇报到供给制问题，张平化说：

“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30%，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10%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毛泽东说：

“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30%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衡，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平均主义问题嘛！就是要恢复1957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正是：平均主义层层查，食堂也是大问题。上下求索非易事，调查研究出真知。

此时，胡乔木从韶山回来了，他向毛泽东汇报说：

“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3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也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3个小队长和这3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

毛泽东问：

“你参加了？”

“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

胡乔木列举出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破坏了。毛泽东说：

“还有，浪费劳动力，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问题。”

胡乔木说：

“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

毛泽东说：

**“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现在马上解散行不行呢？”**

胡乔木说：

“根据韶山公社5个大队的统计，89个食堂，已经散掉50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有些还要维持。”

毛泽东问：

“他要维持干什么呢？”

胡乔木回答：

“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

毛泽东说：

“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

胡乔木说：

“《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

毛泽东说：

**“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

胡乔木说：

“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续自己去解决的。”

毛泽东再次提出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

“现在由生产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生产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生产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生产队。”

毛泽东问：

“比如讲，韶山大队11个生产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胡乔木说：

“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映不多，实际上各生产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半夜里11点20分了。

4月11日，毛泽东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东兴同志：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2人于14日下午2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3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在这次3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毛泽东 1961年4月11日

4月11日这一天，刘少奇从宁乡、长沙县蹲点回到长沙市，毛泽东到刘少奇在蓉园的住处，就湖南农村调查中的一系列问题，和他交换意见，直到凌晨2时。

4月14日下午，毛泽东正在寓所批阅文件，电话铃忽然响了，秘书拿起话筒，是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来的，说是请主席接电话。毛泽东接过话筒，只听张平化在电话中说：

“主席，毛华初现在已经从韶山回来了，带回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及几份材料，让我转呈给您。另外，华初同志还给您写了一封信。他希望能见您一下，有很多情况想跟您当面谈谈。”

毛泽东高兴地说了一声：

“好，快把材料拿来。”

工作人员很快便送来了信和材料，他掂了掂，然后打开毛华初那封信，只见信上写道：

大伯：

您好！我已由韶山回省参加省委3级扩大会议。乔木同志嘱我带回韶山报告及信件，并向您老汇报情况。我在长沙大约有两、三天时间，请您随时通知我来看您老。

此致

敬礼

　　 毛华初 4月14日

毛泽东放下毛华初的信，又拿起胡乔木的信及几份材料一一翻阅。胡乔木在信中提到的那些具体情况及数据，令他大为惊讶，他心里一阵紧似一阵。胡乔木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4月16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因原来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产增2%，即亩产由原包的531斤增包至541.6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3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13.5%），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3年来死亡率都达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3年**约死**3万人，去年**约死**2万人（**请注意，叶永烈在他的书中引用此材料时，在前一个“约死”二字中间添了一个“饿”字，在后一个“约死”中去掉了“死”字，这样，就使此处变成了“**全县3年**约饿死3万人，去年约2万人”。于是，联系上句，“约2万人”也变成了“饿死2万人”，其心何其毒也**——笔者注），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7万人，现已减至1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1958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1961年4月14日

4月15日清晨，毛泽东在胡乔木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4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20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4月15日上午

后来在湖南3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定调王延春到湖南工作，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书记。

4月15日下午4时许，毛华初正在办公楼里翻阅材料，听见电话铃响，他拿起听筒，是省委办公厅打来的，通知他去见毛泽东，电话中说：

“毛主席在蓉园4号楼会见你，车子已在楼下等着，请你马上下楼来。”

毛华初急忙下楼，坐上小车奔向蓉园4号楼。来到毛泽东下榻处，他一脚跨进门，见伯伯正在看材料，便向前一步，习惯地喊了一声“大伯！”并行了一个军礼。

“你来了，华初！”毛泽东朝他笑着，并招呼说：“好，你坐下。”

秘书来给毛华初倒了一杯茶，便退了出去，随后又进来送给毛泽东一支铅笔和一本稿纸。毛泽东问道：

“华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毛华初回答：

“昨天回来的。”

毛泽东说：

“乔木同志的报告和所附的4个材料，我昨天晚上都看过了，今天你再给我谈些乡里的情况。”

毛华初听了，心想：既然主席已经看过材料，那么汇报乡里情况，只需抓住几个关键问题，也就是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就行了。于是，他说道：

“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比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粮食歉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农村经济破坏严重……食堂要解散。”

毛泽东一边凝神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稿纸上画着。他问道：

“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满意，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说：

“主要是群众吃不饱，还有群众认为吃食堂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么多呀！”毛泽东问：“为什么办食堂就吃不饱呢？”

毛华初说：

“因为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过去有自留地种小菜，主粮吃得就少了。另外，一家老小几口人，谁多吃一口，谁少吃一口都无所谓，吃食堂就不行了，吃多吃少心理不平衡，容易产生意见。因此，吃食堂不吃食堂大不一样。”

毛泽东问：

“那么办食堂为什么山林破坏那么严重呢？”

毛华初说：

“因为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毛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大柴火力大，又省事，所以人们上山砍树当柴烧，山上的树也就砍光了。”

“依你看，食堂不办为好啰？”

毛泽东用征询的语气问道。毛华初果断地回答：

“是的！我看，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条件不具备。办食堂，社员不种菜，尽靠主粮，怎么吃得饱啊！”

毛泽东说：

“你们省里有位书记，过去是喊‘公共食堂万岁’的。你们主张解散食堂，不是和他唱对台戏吗？”

毛华初回答说：

“那也许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认识吧！现在他的观点可能改变了。”

谈话时间已经很长了，护士进来催毛泽东休息。毛泽东摆摆手，示意她不要打扰。过了一会儿，护士第二次进来了。毛华初怕影响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辞。毛泽东按了一下手，要毛华初坐下继续谈，问到了他外婆家那边的情况。

“唐家圫那边情况怎么样？”

毛华初说：

“唐家圫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他们都姓文，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加上他们历来有勤劳致富的传统，因此现在虽然生产和生活情况都很一般，但还算勉强过得去。但团结性较差……”

毛泽东听了，脸色沉了下来，严肃地说：

“文家是我的亲戚，应该带头搞好团结，搞好生产。你回去转告当地党组织和政府：请他们教育文家兄弟叔侄好好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勤耕守法。”

他还赞赏地对毛华初说：

“你谈得好哇！今天说了很多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就是要说真话。有人汇报，就是不说真话，尽说假话，报喜不报忧，结果害人不浅。**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啊！”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你回去告诉乔木同志，**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独自作决定，即使解散，也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因为这是关系全国的问题。解散食堂，你们在韶山可先试点，但应注意还会有一些新问题，一定要搞好生产！你回去和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圫要搞好。”

毛泽东和毛华初的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50分钟左右。毛华初回到韶山后，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胡乔木等人。

欲知毛泽东此后去向何方，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调查年”率先垂范，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并力图及时纠正。但从“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以后的广州会议情况来看，并非易事。**广州会议先后否定了他提出的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打破生产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建议，**由此可见党内的阻力是不容小觑的。关于解散食堂问题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尽管如此，在4月15日下午和毛华初谈话时，他还强调说：“**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独自作决定，即使解散，也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因为这是关系全国的问题。”毛泽东的民主意识、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观念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第14章**

“**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

**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

话说1961年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开会，讨论食堂问题。

4月18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了南昌。

4月19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会见了以古巴教育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为首的古巴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座的有邵式平。毛泽东同古巴客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谈话。他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说：

“我们应该争取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我们的事业。”

他还指着身边的邵式平说：

“我们中间有个大知识分子，就是这位邵省长，他读过大学。”

新华社对毛泽东这次外事活动进行了及时报道。报道中说：“毛主席最后在送别古巴朋友的时候，特别嘱托他们向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致以亲切的问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尔后，毛泽东到达杭州，住在刘庄。

此时，浙江的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均已告一段落，浙江调查组的成员随即回到杭州，同毛泽东住在一处。

4月23日，毛泽东找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的问题。

4月25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在杭州的邓小平，他在信中写道：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5月15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5月9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7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处还是归队有好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4月25日上午9时

是日晚，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2时，决定浙江调查组就农村中若干关键问题继续进行调查。

4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将前面说到的胡乔木的那一封关于韶山等地调查研究的信和附文4件转发中央局、全国各省。内容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4件转发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央 1961年4月26日

4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毛泽东在杭州饭店接见了来自几内亚、乌干达、约旦、南非、塞内加尔、怯尼亚（今肯尼亚）、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7国亚非外宾，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斗争你们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支持。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毛泽东还说：

“**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反帝力量，紧紧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

“革命政党的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但是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在五一节前夕，毛泽东从杭州到了上海，在锦江饭店接见了谈家桢，在场的还有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以及负责教科工作的杨西光。毛泽东一见谈家桢就笑着问道：

“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吧？”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高兴地说：“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学校里已经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说：

“好嘛，我支持你。”

刘述周插话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不要怕！”

此时，宋庆龄得知毛泽东已经连续7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了，经常以青菜粗粮充饥，她深为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的身体担忧，就特意给毛泽东带来了一网兜螃蟹，要毛泽东补一下身体。宋庆龄哪里知道，毛泽东岂止是以青菜粗粮充饥，在青黄不接的时节，他竟然一连20多天没吃一粒粮食，只以菠菜和马齿菜等等野菜，维持着他那伟岸的身躯。

宋庆龄的深情厚谊使毛泽东大为感动，可他却指着螃蟹对宋庆龄说：

“谢谢你，我不能收。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宋庆龄坚持说：

“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螃蟹就是螃蟹，你非收下不可。”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不便再推辞，只好收下了。可等宋庆龄一走，他就把螃蟹送给了警卫战士，谁也无法改变他不吃肉的决定。

有一天，卫士长李银桥帮助毛泽东做按摩，发现毛泽东的脚脖子小腿骨那里，一按一个坑，很长时间起不来。这明显是由于缺乏营养出现的浮肿。李银桥说：

“主席，你看，这是缺营养……”

毛泽东还未等他说完，就说：

“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我看是营养过剩了。”

周恩来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过来动员他：

“主席，吃口肉吧。为了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用他那少有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你不是也不吃吗？我们都不吃，共度难关。”

正是：心系人民律自身，野菜果腹实感人。古来可有如斯者？至今读来泪沾襟。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市与各界人士共庆佳节。

这天晚上，曹荻秋陪同毛泽东在锦江饭店接见了周谷城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参加聚会的还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周谷城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周信芳的年龄，又问了沈体兰的年龄。大家自始至终无拘无束，只谈生活琐事，不涉其它，兴致极高，尽欢而散。

晚上10点，周谷城在家里已经睡下，忽然接到了《解放日报》编辑部记者打来的电话，说是希望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明天的报上发表，以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周谷城婉言推辞说，毛泽东的诗词豪迈奔放，纵横千古，本人自愧不如，写不出来。记者却说：

“不要紧，要求不高，只写一首，随便写一首好了。”

周谷城说：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结果，周谷城拗不过记者的软磨硬泡，只好连夜填词一首，发表在5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其词云：

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从报上看到周谷城的词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周谷城，请周谷城到他的下榻处来。

5月3日下午3点，周谷城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在看报，见周谷城来了，放下报纸，开口就说：

“词一首，见到了，怕不只一首吧？”

周谷城回答说：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

“总怕不止一首。”

毛泽东喃喃自语，意思是说周谷城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周谷城忙解释道：

“我当时就对《解放日报》的记者说了，主席是内行，要求不可能不高，他们硬要我写。”

毛泽东摇着手，笑着说：

“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个很小的手势。周谷城说：

“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纯属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着。周谷城却转换话题谈起了古文的字义，他说：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因为‘离’、‘牢’同声。”

毛泽东轻轻点点头，说：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兴致正浓，又发挥道：

“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因为牢罗同声，骚唆也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毛泽东听着周谷城信口引申的见解，并没有表现出诧异，脸上浮着微笑，觉得蛮有风趣。周谷城又说：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

“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说：

“我近来替‘风趣’找到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恐怕还要出丑。”

说到这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

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似乎为这个话题划上了句号。周谷城又偶然提及了邓演达，毛泽东问：

“你认识邓演达？”

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叙述过，周谷城认识邓演达。那还是在1927年春由毛泽东把他介绍给邓演达的。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赏。大概是毛泽东忘记了，故而有此一问。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问，便说：

“我认识他。”

毛泽东感叹道：

“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晚上，毛泽东留周谷城同在一个小方桌上共进晚餐。周谷城告辞回家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旁。

5月6日，毛泽东就陈正人从四川简阳给他来信一事，给李井泉、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5月7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来的电话。周恩来汇报了4个问题：1、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3、社员迫切要求恢复评工记分。4、邯郸旱灾严重，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5月8日，毛泽东收到了胡乔木这一天发来的信，信中报告说：韶山公社食堂由原来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不久都将不再办了。另外，胡乔木在信中还汇报了农村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城市居民食堂问题、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和城市工商业及城市整风问题。

5月9日凌晨3时，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来信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这天下午4时半，毛泽东复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5月15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5月20日到京。”

5月10日，邓小平、彭真将他们在北京近郊顺义、怀柔的调查情况，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中说：

“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5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调整完毕了，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是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生产队下面一般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有很多生产队，由于调整了社队规模，废除了老的供给制，实行了新的供给制（即只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再加上执行和改进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办法，又讨论了前述的余粮分配办法，**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因而发现现在有不少社队劳动力不是少，而是有了剩余；已经**不是队长去催工，而是社员找队长、组长催活、要工了**。”

关于食堂问题，他们写道：

“食堂问题比较复杂，除居住分散的队不办、长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外，对农忙食堂（半年多），群众意见很不一致。”“现在情况还在变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个时期后，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数人要求再办**。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者是自愿结合的。”**

5月11日，毛泽东专门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的寓所看望她，赠送给宋庆龄一条绣有梅花图案的高级红地毯，铺在她上下楼的楼梯上。

5月14日，毛泽东为转发张平化的一封报告信，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先后就毛泽东在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以及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林业、商业、恢复手工业和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刘少奇在会议上曾经发表讲话说：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些错误并不涉及到‘三面红旗’本身，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

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5月28日，毛泽东为戚本禹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并批示道：

“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6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10多10少’**（如“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等——笔者注）的问题。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此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2个批示，他写道：

“**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

5月29日、30日，中央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修改了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作为“修正草案”予以通过。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关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等社员，经过社员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其费用从公益金中开支。

会议最后讨论了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说：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在本年内要减少一千万。**

5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3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10少，避免10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忆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时说道：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3批开会，第一批是1天，最后一批是1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3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3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5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它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就说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毛泽东还说：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3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最后提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还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

6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他在谈话中说：

“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11年了，再等11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笔者注）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苏加诺说：

“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泽东说：

“只能一步走。”

苏加诺说：

“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泽东说：

“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加诺说：

“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泽东说：

“不一样。”

苏加诺说：

“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泽东说：

“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3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6月13日晚，毛泽东给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6月13日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总结了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写道：

“毛泽东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应该成为一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

6月中旬，毛泽东创作出了“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令人百读不厌”（郭沫若语）的一首《七律·答友人》，其词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在有关方面，一度众说纷纭。

据《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吴正裕、李捷、陈晋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披露，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对他的一些诗词进行抄写。林克所抄写的这首七律的标题就是“答周世钊”。《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也明确指出：“1963年他（指毛泽东——原注）亲自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此诗在清样稿上标题原为《答周世钊》。”“随后，作者在这个标题的周世钊名字后加上了‘同学’二字，最后，他将‘周世钊同学’5字去掉，把标题改定为《答友人》。”还有，在1964年1月，毛泽东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其中关于《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友人是周世钊。”另据史料证实：1964年2月，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做了14点解释，其中第8点为：“长岛”指长沙，“友人”是一个长沙的老同学。周彦瑜和吴美潮说，他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问过父亲：“近期外面传言，毛泽东《七律·答友人》是答您的，不知是不是？”老人回答说：“肯定是答我的，但不能往外传。”1992年，吴美潮就“友人”问题请教过毛泽东诗词英译者叶君健，叶君健答复是“我查了一下，《答友人》译为‘答一位朋友’，即Reply to　a　Friend。英文参加翻译的有钱钟书、乔冠华、赵朴初、袁水拍和我，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的。”以上这几种说法是一致的，是比较可信的。

另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老朋友乐天宇、李达和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在长沙闲谈，他们知道毛泽东在5、6月间的北京会议期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失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检讨。他们猜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决定送毛泽东一些礼物。乐天宇将客人捎给他的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给毛泽东一枝；还有他自己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的条幅，落款是“九嶷老人”。李达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的是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九嶷山铭》的墨刻。毛泽东收到老朋友的礼物后，引起了对家乡、老朋友、老同学的怀念，就写了一首《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不久，乐天宇在田家英那里看到了毛泽东诗稿，要求田家英圈掉他的名字。时值郭沫若正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就把乐天宇的意思转告给郭沫若，郭沫若说：“那也好，不如改为《答友人》吧。”于是，后来就成了《七律·答友人》。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规定中说：

“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以后，各地在退赔平调物资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的地方决心比较大，做得比较认真，但是，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彻底的。**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6月22日，毛泽东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于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去三分之一，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3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3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1961年6月22日

1961年7月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000元钱，派人送给病中的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张维。

张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张维的母亲在革命战争时期掩护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张维为新四军运过药品。

7月6日，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和赵迎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陪同，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侧门。

文涧泉是在7月初来到北京的。赵迎是毛泽覃前妻赵先桂的继子，在大坪学校教书。此人粗通文墨，能说会写，见识较多。文涧泉此次带赵迎来京，一是因为赵迎是自己外婆家赵家的亲戚、赵先桂的继子，二来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借重赵迎的见识，同三表弟毛泽东谈论一些乡间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

这一次文涧泉来京，不再像两年前在京时睡门板受冷遇了。他和赵迎到了客厅门前，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到门口迎接，与他们握手。毛泽东问了赵迎的姓名之后，连声说：

“欢迎，欢迎。”

宾主在客厅落座后，毛泽东向两位客人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还说：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有困难，需要克服一下，暂时吃点苦，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了解了一下。组长是我的秘书胡乔木，他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向我写了一个详细调查报告。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文涧泉说：

“主席，我没有读什么书，信写不好，就请赵迎给你多写信吧。他是当老师的，肚里有墨水。”

毛泽东就对赵迎说：

“赵老师，你就做我的通信员，好吗？”

赵迎连忙说：好，好！毛泽东说：

“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办夜校。我过去就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后来，赵迎回到家乡后果然成了毛泽东的“通信员”，他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下的情况。

7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警卫员小李叫到身边，问道：

“听说你要去大庆，是吗？”

小李是从16岁那年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回答说：

“是的，很多同志都写了申请，但又舍不得离开主席，又不想去。”

毛泽东说：

“是啊，你们在我这里10多年，你们不想离开我，我也不想叫你们去，我对你们的感情比对我的孩子还亲，他们还不能天天见到呢！但我不能老留着你们。”

他把小李的手握在自己的大手里，继续说：

“革命不能总在一起的，我这里不是有很多同志都到一线去了吗？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都得服从革命的需要。”

小李禁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劝慰他说：

“已经长大了嘛，不要哭。那个地方艰苦，艰苦的地方要去，艰苦的地方锻炼人！”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部下的指示往往是耳提面命，在开展调查研究问题上也不例外。他在1961年5月6日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中，口气则完全变了一个样。请看：“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这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了！毛泽东还唯恐来信有失，又特别嘱咐：“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由此可见，他要得到“**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的书面报告，是比攀登“蜀道”还要难呢！

**第15章**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

**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人者也’。**”

话说1961年7月1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其间，他与苏联曾签订了《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乘专机离开莫斯科转道至北京访问。

凌晨4时，金日成的专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千群众在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和金日成在欢迎仪式上先后致词。欢迎仪式结束后，金日成在刘少奇、周恩来的陪同下，同乘一辆敞篷轿车进入市区，60万身着盛装的北京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及其党政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交谈。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欢迎朝鲜客人。

7月11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签了字。《条约》全文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深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的发展和加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特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1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尽一切努力。

第2条 **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

第3条 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4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对两国共同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

第5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本着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在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

第6条 缔约双方认为，朝鲜的统一必须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而这种解决正符合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和维护远东和平的目的。

第7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在平壤互换。

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

本条约于1961年7月11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朝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全权代表 周恩来 全权代表 金日成

（签字） （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金日成提出想见见毛泽东。周恩来便决定陪同他去见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

7月13日，毛泽东在西子湖畔会见了来到杭州的金日成一行。周恩来、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高兴地对金日成说：

“条约签订了，我已经看到了。”

周恩来插话说：

“外国对这个条约反映很强烈。”

金日成说：

“签订这个条约，提高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感到有了保障。”

毛泽东点了点头，赞许地说：

“这很好！”

金日成关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局势的状况，谈到了“究竟谁怕谁”的问题。他说：

“究竟谁怕谁？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是怕得那么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

毛泽东还说：

“我们见过3个教员，蒋介石、日本、美国。没有它们压迫我们，不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中国是搞不出来的。我看你们也有3个教员：日本、美国和李承晚。”

金日成说朝鲜族是个少数民族。毛泽东说：

**“少数民族可是厉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过整个亚洲和半个欧洲。你们不要以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历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

毛泽东亲切地看着金日成，又说道：

“美国不同苏、中做生意，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还有个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我们和胡志明，这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没有什么害处。”

金日成爽快地回答。毛泽东豪迈地说：

“我看还有好处。让我们再等它个40年，然后再请客，再进联合国。40年后，我去见马克思了，还留下个周总理。”

说罢，他侧过头看看63岁的周恩来。毛泽东比周恩来大5岁，40年后就是100多岁。到那个时候，最年轻的金日成也有90多岁了。周恩来听毛泽东这么讲，忙说：

“我也去见马克思了！”

陈毅笑着说：

“我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金首相可以，你要保养身体，那时候你可以大请客。”

一句话说得几个人无不开怀大笑。

7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军委，中央组织部，计委、经委、科委、国防工委、国防科委党组，有关部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

**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为此，作出如下决定，请有关部门和国防科委与第二机械工业部共同研究，认真地贯彻执行。

一、加强二机部的技术力量和领导力量。

1、抽调86名高级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骨干。

2、抽调厂、矿长，党委书记14名，处级干部60名，科级干部18名。

以上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于今年10月以前调齐。

3、由教育部考虑确定在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华东工学院指定科系，专门培养有关原子能方面需要的专业干部，在招生安排、学生质量和毕业生分配上首先保证二机部的需要。

4、由三机部调一个技工学校、由电力部拨一个中等技术学校给二机部。

5、由煤炭部调给二机部一个有经验的技术较好的竖井队。

二、关于设备、仪表的生产、试制、配套问题。

1、由国家计委协同一机部考虑决定拨给二机部几个比较有基础的机械、仪表工厂，作为原子能方面专用设备、仪表的试制厂；同时指定一批工厂，在安排任务时首先满足二机部的需要，对于这些工厂二机部可以在业务上和他们直接发生联系。

2、二机部应着手筹划扩建和新建必要的专业性的工厂，以便将来比较集中地制造原子能工业所需要的专门设备、仪表。

三、关于工业卫生和防护医疗问题。

1、批准在卫生部建立放射卫生医疗防护管理局。

2、由卫生部抽调一批医务骨干给二机部，其中约20名为科学研究骨干，约30名为主任或主治医生。

3、在二机部自己专用医院未建好以前，由卫生部从北京指定一个医院接收二机部的病员。

4、由全国总工会拨一座较大的疗养院给二机部。

5、为了保证二机部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的供应，二机部可以单开户头，直接纳入卫生部分配计划，由商业部和卫生部直接划拨。

四、为了确保机密和运输及时，将二机部物资一律列为军运。

第二机械工业部应该加倍努力，加强协作，战胜困难，完成原子能工业建设的任务。

　 　 中央 1961年7月16日

7月17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浙江省3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

7月21日，邓小平在黑龙江视察期间听取哈尔滨市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邓小平传》评语），他说：

“**今后主要讲社会主义好了。按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搞这样高的，再高了就不行。**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

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5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样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1960年，他们已进大学的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196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1961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3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1961年7月30日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战功。江青发现这个部队的第1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200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她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8月15日，北京举行陈嘉庚公祭大会，毛泽东派人敬献了花圈。

8月16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驻地会见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加纳是在1960年7月5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初次访华的恩克鲁玛由黄华陪同来到杭州与毛泽东会面。

晚上，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前往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宾主海阔天空，谈笑风生。

黄华在解放后一直忙于外交工作，难得见一次毛泽东。现在就要陪同恩克鲁玛离开杭州了，在向毛泽东辞行时，他说希望主席给我写几个字，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后来，黄华回到北京后，在外交部见到副部长黄镇，黄镇脸带笑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对他说：

“这个信封你要不要，要就请客吃饭。”

黄华说：

“让我看看是什么信吧。”

他接过一看，是毛泽东写给他的《登庐山》一诗。毛泽东在诗后还特别写了几句对黄华夫妇鼓励和祝愿的话，内容是：

“右诗一首，为王汝梅（黄华）、何理良（黄华夫人）二同志书，并祝你们两位身心健康，工作顺利。毛泽东 1961年8月28日。”

黄华激动万分，忙对黄镇说：

“好！我一定请客。”

后来，他把这份墨宝拿到琉璃厂荣宝斋请老师傅用图案最好的绫子精心装裱，连信封也一并裱上，作为珍藏的无价之宝。

再说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安排政策的意见》，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机关、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等方面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的安排政策的意见》的报告发给你们。

一、**对于民主人士的职务和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的职务，不要轻易变动。除有违法乱纪行为和严重错误的分子外，不要撤换、降低他们的职务，一贯表现比较好和工作称职的，可以根据需要酌情提拔。在此次精简中，不要把民主人士和资方人员当包袱精简推出去。过去下放锻炼已经很久的，应及时调回。**

二、**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对于民主人士和工商资本家，包括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不要进行整风。**如果他们对于工作，对于我们的干部和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应该倾听和欢迎。

中央 1961年8月17日

不久，毛泽东就要上庐山了，他在上山之前，对田家英说：

“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中央工作会议议程。他首先询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了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尔后说道：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3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3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人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12年，也有些，但也只有12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经过大家讨论，确定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和干部轮训问题。由周恩来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作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作关于《国有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作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说明；邓小平作一个总结性的长篇讲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8月23日这一天开始，一直开到9月16日才结束，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在会议期间，余宝山依然在毛泽东身边服务。江西省长邵式平对余宝山说：

“毛主席的衬衣都破了，你去给他做2件。”

余宝山把新衬衣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问：

“旧的补了还可以穿嘛！这衬衣是谁叫你做的？”

余宝山照实说了，毛泽东“哦”了一声，笑着说：

“是邵大哥呀！多少钱？叫银桥付给他。”

于是，卫士长李银桥照数付了钱，分文不少。

有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与卫士张仙朋说起了他的一桩心事，他说：

**“我有3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上留下了一帧坐姿照片，背景是乱云飞渡。这正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8月25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17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立即复了一信。

原来，胡乔木在庐山会议前突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是自己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需要请长假休养。于是，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做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做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8月25日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8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因病在庐山休养的李达。他在谈话中说到李达几十年前写的《社会学大纲》，现在还可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说他精力有些不济，手颤抖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鼓励他带几个助手帮助他修改。李达当即应允。

李达对毛泽东的意见是极为尊重的，他就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

“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

李达接受了毛泽东意见，改变了他原来的“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的一致性”的观点。

李达和毛泽东会谈后，立即终止休养，回学校组织人员，对《社会学大纲》大加修改，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中有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是李达的得意之作。

后来，毛泽东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他认为是“古人讲得太多”。于是，李达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全部删掉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吩咐秘书说：

“到杨尚奎同志家里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

周恩来在车上问秘书：

“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秘书说：

“好像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酒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周恩来笑着点头，说：“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秘书问，是谁？周恩来说：

“廖鲁言。”

这廖鲁言在国务院里喝酒是最负盛名的，据说在一次散席后，桌上还剩半瓶汾酒，他抓起酒瓶子像灌汽水一样喝掉了，还淡淡地说了一句：“别浪费了。”就这位最能喝的部长，竟然让一个弱女子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今天是要向她讨回“公道”了。

“水静，我迟到了。”

周恩来笑着点头致歉。迎出门口的水静带着歉意说：

“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你一时也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

周恩来随着水静进了餐厅，坐下就问：

“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着菜呢！”

“那就不客气啦。”周恩来把手放在桌上说：“我就吃吧。”

水静端上来的菜肴以江西的特色为主，还有杨尚奎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这道菜的雅称，还是毛泽东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命名的。所谓的“月”，就是摆在中间的米粉蒸肉，那4颗“星”是围在四周的4碟小菜，无非是辣椒、青菜、豆腐之类。周恩来见菜肴上齐了，没有动筷子，问道：

“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应了一声，马上取来1瓶茅台酒。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说：

“还有么？有就再拿一瓶来。”

水静忙又拿出1瓶茅台酒，怔怔地望着周恩来。周恩来指指另一个座位，笑着说：

“好了，水静。来，你也坐下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再吃一点嘛。”

于是，水静招呼服务员再取来一套餐具，坐了下来。周恩来将1瓶茅台推向水静，淡淡地说：

“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两人一人一瓶，怎么样？”

水静此时方有所悟：总理是来考验我来了，自己虽说已经陪着邓小平、李富春喝了一些，就再喝这1瓶也不在话下。她心里这么想，可表面上还是忙不迭地摆手，说：

“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周恩来也明白，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便说：

“喝吧喝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他嘴里嚼着一口米粉蒸肉，说：

“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

周恩来说着嚼着，顺手斟满一杯酒，端起来对着水静一举：

“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肴，干！”

水静也不示弱，端起早已斟满了的酒杯，随着周恩来一饮而尽。她为周恩来和自己斟满了第2杯，端起自己的杯子说：

“这些菜都是土特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说罢仰面干了杯，她落杯时，见周恩来微微一笑，也已经干了杯。周恩来一边吃菜一边斟酒，说：

“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

他说着，酒杯又举了起来：

“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水静也不慌不忙地斟上酒回敬：

“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是我们感谢总理。”

周恩来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说：

“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水静也斟满酒，回敬道：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

这二人一来一往，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也一样不少。不一阵工夫，两个酒瓶子都空了。周恩来酒兴正酣，问道：

“还有酒吗？你还能喝吗？”

水静听说周恩来能喝酒，但她担心自己灌醉了国务院总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说：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周恩来知道水静已经陪邓小平、李富春喝了酒，再比下去也不公平，便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水静见他说出了本意，就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问道：

“什么酒量呀？”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周恩来说着，哈哈笑出声来：“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有点不好意思了：“刚才是总理让我喝，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周恩来笑笑，说：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

他说着，放下饭碗，兴致勃勃地提议说：

“舞会还没有散，我们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水静故意摸摸额头，说：“我真有点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周恩来笑笑说：

“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时的宴席上替毛泽东喝酒的豪情壮举，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但他与许世友单独斗酒的轶闻趣事，可能知之者不多。作者不妨在此一并道来，以飨读者诸君。

许世友其人，在战场上是个传奇式的猛将，在酒场上也是个豪气干云的汉子。他把喝酒的多少，喝酒的习惯，往往看做是一个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标志。每当和朋友战友们喝酒，许世友便在桌子中间放一空碗，规定说，洒一滴，罚一碗。他的身后立一卫士，专做监督行令官，执行罚酒任务。即便是和许世友同一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于动手得罪。在那些吃过苦头的将军中，免不了有人向周恩来告状诉苦。

**周恩来历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往往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许世友是一个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彭德怀也都让他三分的人物。周恩来知道对许世友这种人，除非让他心服，否则，说轻说重，都没有用。**

有一天，许世友到北京去参加会议，周恩来对他说：

“许司令啊，今天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

“没事，我没事。”

许世友两眼大放异彩。他本来就敬重周恩来，又久闻周恩来善饮，如今听说要请他喝酒，真是受宠若惊。

是日晚，许世友按约赴宴，周恩来迎候在小餐厅门口，拉着他的手说：

“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饮，你尽可随便一点。”

许世友入席一看，还真是小范围，除了他，没有第二位客人。菜肴是周恩来待客的惯例：4菜1汤。周恩来说：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吩咐服务员上酒，转过脸望着许世友问道：

“许司令，大家都说南京有4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的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说：

“算我大吧。”

“在南京你行，在山东你就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一生不受人激，不管什么事情，就怕人家说他不行。他此时听周恩来这样一说，也顾不上谦虚了，便说道：“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却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上了酒，周恩来接过来放在桌上，以手按着酒瓶，故意用怀疑的眼神望着许世友，笑着说：

“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啦个卖匹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做手势，把他稳住，平静地笑着说：

“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一点。”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又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一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官小，只论酒量大小。许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那二杆子脾气又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终于冒出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3个响头。”

“这不行，我可不会磕头。”

许世友似乎已经赢了，笑着说：

“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

**周恩来说着就要给许世友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先声夺人：**

**“不要斟酒，这一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说：

“怎么办？再给我拿1瓶吧。”

1瓶对1瓶，服务员开启了瓶盖。许世友立起身，说：

“总理，我敬你，立地3杯。”

说着一连干了3杯。周恩来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还不断地问着部队上的事。许世友则是干2杯，歇歇，再干2杯。他要让周恩来看看他许世友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

许世友将酒瓶子朝下，晃了晃，只晃下来1滴酒来。

“哦，我落后了。”

周恩来拿起酒瓶子往杯子里倒，许世友看看吃了一惊，只见从那瓶子里才倒出半杯酒，就空了。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的狐疑，他轰轰烈烈地干了1瓶，周恩来却是不显山不露水地也干了1瓶。会不会有假？可眼见得这2瓶酒都是原装，而且是当场启封，又哪能假得了呢！许世友正在琢磨，只听周恩来慢悠悠地说道：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他朝着服务员直嚷嚷：“去，去！再拿两瓶茅台来。”

周恩来与水静喝酒时，他要第2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周恩来便停了。周恩来与许世友刚喝完第1瓶，就叫停，分明又是一个激将法。许世友哪里是周恩来和水静一般的人物，他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朝服务员高声叫道：“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望，周恩来点点头，说：

“那好，再拿两瓶来。”

**酒上来了，周恩来看着许世友，慢条斯理地嚼着花生米，说道：**

**“许司令，你自己拿1瓶。”**

**许世友已经知道周恩来对自己刚才的怀疑，有了察觉，但他还是忍不住将两瓶都打开，嗅一嗅，这才放了心，嘴里却说：**

**“都一样，我随便。”**

周恩来依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许世友也还是喝2杯，歇歇气，再干2杯。眼看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许世友终于干掉了第2瓶茅台，他不再叫酒了，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将瓶子垂直倒向杯子里，也干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非常柔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很艰难，好像脸上的肌肉都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目光朦胧。服务员第3次上来两瓶酒，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只是抿住嘴笑。这次是周恩来动手开瓶了。**

**“许司令，你要哪瓶？”**

**周恩来声音依然柔和。**许世友点点头，似乎想说话，但他那粗壮的身子却不由自主地仰在椅子上往下滑。他竭力想坐起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反而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的酒意也上来了，他兴奋地往杯子里斟酒，直到酒水溢出杯沿才停了下来，端起杯，挺起身，说：**

**“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

说罢，一口干掉了杯中酒。周恩来所说的这些话，都是许世友以往劝人喝酒的常用语，今天周恩来一一照搬。可是，此时的许世友已经无法再英雄，再仗义，再给面子了。他大口喷着酒气，说：

“输了，我，我给总理磕……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有点站不稳了，竭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脑子还是清醒的，接着说：“总理，叫，叫我死，我，我不活。我听总理的。”

周恩来一看火候到了，就正色说道：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来是好事嘛，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能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不超过半斤。”

后来，许世友果然做到了，喝酒不超过6杯。偶尔逢上个热闹场合，多喝上几杯也不忘记解释一下：

“总理叫我自己喝酒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再说1961年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的10个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

**毛泽东所说的10个问题，其中包括：退赔普遍不彻底；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9月9日，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34周年纪念日。当他看到江青拍摄的一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时，感触颇深，遂题诗一首。

原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江青和毛泽东通话后就上了山。那时，江青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被庐山的自然风光感染了，于是，就在毛泽东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助下，开始学习摄影。没想到还真的拍下了这样一张好照片。

毛泽东吟咏的这首诗，题目是：《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云：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后来，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这首诗，他说：**

**“主席这首诗就是写江青同志的。”**

江青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她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琢磨系统地学习摄影。她还请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她的老师，石少华借故推辞了。江青无奈，就请毛泽东出面帮忙。毛泽东把石少华请到中南海，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肩，请他坐下。毛泽东说：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

石少华激动而又内疚地答应了毛泽东。

后来，江青很快就学会了摄影。她组织人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她的个人摄影展。毛泽东知道后，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计划，注意政治影响。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中朝两国1961年7月11日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条约》中还规定：**“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另据网友称，在1961年8月23日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批准和1961年8月3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批准后，双方又约定：《条约》有效期为20年，如一方要求修改或终止，须在期满前半年内向对方提出，否则《条约》自动延长20年有效期。根据这一约定，《条约》在1981年、2001年两次自动延期，有效期至2021年。而在此之前，有关方面却**自2006年起至2017年，在联合国同美、俄等多国多次通过制裁朝鲜决议案，“禁止朝鲜进行一切与弹道导弹发射有关的活动”，以最大限度遏制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朝鲜军民偏偏不怕鬼不信邪，坚持以“先军政治”为本，频频进行核爆实验，并宣称已经跨入世界核强国之列，且摆出一副与敌同归于尽的架势，天天拉着个导弹到处跑：老子不说打你美国本土，打你关岛总可以吧！不打你美国，打南韩的首尔、摧毁与某大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核电站群，总可以吧！几个回合下来，竟吓得美帝和“小妾”们全都尿了裤子。日、韩更是神经错乱，一连几天都惊慌失措地报道朝鲜发射导弹了。他们不得不在人家那颗小小的原子弹面前放下了屠刀。**这一场倚强凌弱、以众欺寡的闹剧恰恰验证了毛泽东在上个世纪的一个先见之明。**那就是本章讲到的，在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之后，金日成在7月13日到杭州去见毛泽东。在谈到世界上“谁怕谁”的问题时，金日成忧心忡忡地说朝鲜族是个少数民族。毛泽东则热情地鼓励他说：**“少数民族可是厉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过整个亚洲和半个欧洲。你们不要以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历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请再认真看看这一段话吧，这不是在近、现代史上出现的最伟大的一个预言吗？！

**第16章**

**“如果我们要使1962年的农业比较1961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

**我们就应在今年12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话说第二次庐山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毛泽东在整个会议期间，没有在全体会议上讲话，只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

1961年9月16日，是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说：

“这次会议搞了几个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一幅字，后来被不少书法家称为毛体书法的极品。他写的是：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几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只不知“常委诸同志”手捧这一墨宝之时，可曾从中体味到了毛泽东的深意。

9月18日，毛泽东下了庐山，到湖南住了3天，白天到蓉园1号楼休息，晚上回到大托铺专列上办公，批阅文件和听取汇报。

9月21日，毛泽东抵达武汉，同王任重谈到了他念念不忘的《六十条》尚未解决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据王任重9月26日的日记记载：

“21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22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

9月22日下午，熊向晖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向毛泽东汇报蒙哥马利来华访问的情况。

原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9月5日由香港到达广州。此后在访华期间，由李达上将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陪同他参观了许多地方。**在蒙哥马利的想象中，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大国在连续3年歉收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的局面。可他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亲眼见到得却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平和、乐观向上的情绪一直感染着他。**他曾经回忆说：“我更多的看到中国人民，就更加喜欢他们，他们落后而贫穷，但他们勤奋忠厚，富有幽默感。”在延安，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蒙哥马利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架手摇电话，放在耳边停了许久，似乎在谛听毛泽东当年的声音。放下电话，他对李达和熊向晖说：“不可思议！毛泽东带领你们经历了常人生存不了的生存状态下的革命，诞生了不可想象的人类精神。西方人假若曾经看过中国的古代文明和早期工艺，那现在垂涎的应该是这种现代精神。神奇啊！真是神奇的土地和人民。”9月20日，蒙哥马利在李达、熊向晖陪同下回到北京。熊向晖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蒙哥马利在国内访问的情况。周恩来得知熊向晖与蒙哥马利在观看了电影《穆桂英挂帅》后，进行过有关妇女当元帅的辩论，便严肃地说：

“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说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作为一个西方的军事领袖，能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奔波，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难道还不懂得求同存异？你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周恩来又问：

“蒙哥马利喜欢看什么节目？”

熊向晖说：

“杂技，特别是口技。”

“他看了《抢椅子》没有？”

“没有。”

周恩来拿过招待蒙哥马利的文艺演出节目单，发现安排有《木兰从军》，马上以《抢椅子》代替了。他说：

“又是一个女将军，幸亏问了你，不然蒙哥马利还以为我们是在故意刺他。”

9月22日上午，周恩来办公室秘书浦寿昌打电话给熊向晖说：

“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总理要你和我马上坐专机去武昌，让你先向主席汇报蒙哥马利在中国访问的相关情况，我明天给主席当翻译。”

这天下午，熊向晖和浦寿昌飞抵武昌。

是日晚，熊向晖向毛泽东汇报了蒙哥马利在各地参观访问的情况。毛泽东说：

“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即他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

熊向晖又汇报说：

“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他似乎想探询主席的接班人是谁。因为英文里没有与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蒙哥马利就说成是继承人。他曾经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而且多半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我们国家常为争夺王位打仗，现在有了王位继承法，内部就平静了。可是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也许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在郑州，蒙哥马利又谈起了这一话题，他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乏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攫取了政权，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毛泽东听罢，突然问道：

“英文里的‘继承人’是什么？”

“是successor。”

熊向晖回答，并在一张纸上写了出来，双手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一会儿说：

“‘success’这个词我知道，是‘成功’的意思，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

浦寿昌向毛泽东作了解释。毛泽东吸了口烟，说：

“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看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他还说：

“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

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后来，**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作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是个十足的两面派，帮助帝国主义掀起了12级台风，让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这位元帅到底是外国人，他对我们的事情究竟有一些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个穷山沟，洋人的鼻子闻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就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

他看看在座的人，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说：

“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6个，排头的是谁？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了。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毛泽东最后说：

“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就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个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外上下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陪同下，从北京乘专机抵达武汉。

是日晚6时半，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来到武昌的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一走进会客厅，毛泽东立刻迎了上去，微笑着用英语说了句“您好！”蒙哥马利听到毛泽东用英语向他问好，感到很亲切，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寒暄了一番，拿出一盒“三五牌”香烟，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香烟，又用英语说了句“谢谢”。两人便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交谈。蒙哥马利首先说：

“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关于三项原则的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是单独提出的，这次我是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计划提了出来。多年来，我可以说是坐在头排位置上观察国际政治的。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而西方的政治领袖们又找不到摆脱这个泥坑的办法。我的结论是，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

毛泽东插话说：

“不是整个西方，缺乏常识的只是美国。”

蒙哥马利问：

“你对我一揽子提出的三项原则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

“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的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二十次，总可以见效。”

蒙哥马利信心十足地说：

“我要动员世界舆论。离开中国后，我下星期就准备到加拿大去，16日准备在多伦多作一次电视广播演说。回伦敦后，再作一次电视广播演说。”

毛泽东说：

“那好。凡有机会就讲。”

蒙哥马利说：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当你要使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一下子得罪许多人。我这次在中国提出了三项原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我可以在西方推动这件事，但是，我不想在东方再起多大的作用。我在本国有很高的地位，如果我在共产党东方旅行太多了的话，那么英国人民就会说，这个家伙怎么搞的，这将损害我的地位。如果我想推动这件事情，我就必须维持我的地位。”

毛泽东肯定地说：

“你的地位不会动摇。你的基本思想是要和平。”

蒙哥马利说：

“我主张彼此不要干涉内政。西方国家一遇到问题，它们的做法就是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朝鲜就是如此。还有老挝和印度支那。它们以为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不然，我说大家都把军队撤走，让朝鲜人自己来决定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这是唯一合乎情理的做法。”

“对。”毛泽东突然问蒙哥马利说：“元帅今年多大岁数？”

蒙哥马利回答说：

“74岁。”

“哦，过了73岁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蒙哥马利则兴致勃勃地给毛泽东讲起了他的访华观感，赞扬了中国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勇气。他还真诚地说：

“主席先生，你的人民是这样的拥戴你，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和混乱的局面中崛起，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的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说：

“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以活到一百岁。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不过我不想活那么久，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那么我还能活4年。到时候，我就要去见我的上帝了。”

“为什么？”蒙哥马利惊讶地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这太悲观了。”

“不，我要去见我的上帝。”毛泽东将手在空中挥了挥说：“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我也有许多事情要急于同他讨论。”

**“马克思可以等一等。中国人民更需要你。哎——”蒙哥马利叹了口气，又以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一定找到他，同他谈一谈这个问题，告诉他中国离不开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

此言一出，把在座的人都逗笑了。接下来，毛泽东回答了蒙哥马利提出的一些问题：

蒙哥马利：“主席先生，你对解放12年后的中国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

毛泽东：“我们对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致相同。”

蒙哥马利：“在1949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

毛泽东：“1949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蒙哥马利：“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

毛泽东：“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主席先生，你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

毛泽东：“一开始就看到了。”

蒙哥马利：“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光明了，找到一条道路了？”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蒙哥马利：“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口处的一点光亮。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1954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被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经积累了12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

蒙哥马利：“你们在1949年着手经济恢复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

毛泽东：“根本没有。”

蒙哥马利：“但你们得到了苏联的帮助。”

毛泽东：“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

蒙哥马利：“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

毛泽东：“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蒙哥马利：“中国革命胜利已经12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12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

毛泽东：“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

蒙哥马利：“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毛泽东：**“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100年的时间，比如50年到100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

蒙哥马利：“**你们在12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50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

毛泽东：“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蒙哥马利：“主席先生，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却从来不提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毛泽东：“不是。**目前我们从事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各按其所劳与所能进行分配，所以是社会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是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以后的事。”**

蒙哥马利：“当我1947年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时，他对我的解释与你完全相同。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你们要自称为共产党中国呢？”

毛泽东：“**因为我们喜欢把名称与最终目的联系起来。”**

时间已经到了9点半，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共进了晚餐，他又让服务员拿来了一盒中国名茶送给蒙哥马利。蒙哥马利一边接过茶叶，一边意犹未尽地说：

“今天谈话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

毛泽东说：

“很抱歉，明晚我到别处去了。不过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蒙哥马利显得有些失望。

9月24日凌晨4时许，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通知陪同蒙哥马利的中方人员熊向晖、浦寿昌，他要请蒙哥马利吃午饭，傍晚还将一起去游泳。

9月24日凌晨5时左右，浦寿昌告诉蒙哥马利说，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今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蒙哥马利听后，高兴得连声说道：“OK！OK！”这天早晨，蒙哥马利在吃早饭时心情特别愉快，他说：

“毛泽东说过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关于毛泽东在23日晚会见蒙哥马利后及24日午后的活动，王任重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在这天晚上及24日午后，他给毛泽东“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3份材料。24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

且说9月24日下午2时30分，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再次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并与他共进午餐。蒙哥马利问毛泽东：

“作为军人，我对主席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很有兴趣，看得出你对战争，冷战与热战，有丰富的了解。不过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慢悠悠地说：

“这句话还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讲的，现在已记不起确切时间了。”

蒙哥马利说：

“这句话有军人专政的味道。”

毛泽东则说：

**“这句话是说革命中不能没有战斗，有战斗就需要枪杆子。”**

蒙哥马利问：

**“那么在现在所谓的和平日子里，这句话是否仍然有效呢？”**

毛泽东说：

**“当然有效。”**

蒙哥马利又问：

“主席先生对核武器怎么看？”

毛泽东说：

“**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不会用的。我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蒙哥马利说：

“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泽东说：

“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10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1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蒙哥马利说：

“我的看法是，正因为有核武器，才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英国有很多人示威游行，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我对他们说，首先是撤退外国军队，然后裁军，最后一件才是销毁核武器。”

毛泽东说：

“那样好，三项原则实现了，再禁止核武器。实际上，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人民群众。”

蒙哥马利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说：

“起决定因素的应该是领袖，因为人民并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因此决定权在于领袖。”

“革命当然需要一个贤明的领袖。”毛泽东抽着烟，缓缓地说：“但人民的意志是最重要的，当人民信赖你时，他们就会接受你的领导和决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

蒙哥马利说：

“这一点我同意，这正符合我自己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周围的人们和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微微一笑，注视着蒙哥马利说：

“我看得出你很开明。”

蒙哥马利闻听此言，趁机说道：

“主席先生，我认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据我的经验看来，国家领袖们对于指定他们的继承人是很反感的，比如像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德意志联邦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他们都很讳言谈继承人。在中国呢，主席是否现在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之后呢，会不会是周恩来？”

“不知道。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中国这条船不能离开你。”

**“暂时不离开。”毛泽东肯定地挥了一下手。他吸着烟，沉思了一下，目光凝视远方，说道：“不过人早晚要死的，死亡大致有5种方式：第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被病菌杀死。这5条我都准备了。我赞成火化，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蒙哥马利说：

“可是我希望我能活到100岁，我已经过了73岁这一关了。”

“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以上。”

毛泽东为这次谈话画上了句号。他邀请蒙哥马利一起去游泳，在陈再道的陪同下，登上了汽艇，并指着陈再道向蒙哥马利介绍说：

“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书，打仗很勇敢。”

下午5时，毛泽东一众人等来到了长江边，50名青年男女早已兴奋地等候在那里。蒙哥马利因肠胃功能不好，不能和毛泽东一块儿游泳，就坐在船上看毛泽东在长江里游。毛泽东顺流而下，不时地和身边的青年们交谈着。游了将近1个小时，他上船穿好衣服。蒙哥马利问毛泽东：

“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

毛泽东说：

**“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大了。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

蒙哥马利回答后，毛泽东又说：

**“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的，太热。”**

他还说：

“你下次再来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

“好，我们比赛。”

“什么时候再来？”

“1964年吧！”

“好，一言为定！”

“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电视公司的大好机会。”

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送回他的住处——汉口胜利饭店。

9月25日晚，蒙哥马利因为就要回英国了，正在为次日归国整理行装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了蒙哥马利的住处。蒙哥马利非常感动，两人谈了近1个小时。最后，毛泽东说：

“为你送行，送你一件礼物。”

他把自己在凌晨4点书写好并署了名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墨迹，赠送给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接过毛泽东亲手书的“赠蒙哥马利元帅”的墨宝，激动得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毛泽东笑着说：

“不要忘了，我们还将在长江进行游泳比赛呢。”

告别蒙哥马利后，他便乘上专列，向北京进发。

后来，蒙哥马利在9月26日经香港返回英国。他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人，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他还在《三大洲》一书中写道：**“在我的旅行中我清楚地看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可能造福人类，并可能缔造各国普通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世界。”**

再说 9月26日，毛泽东在路过河北邯郸时，召见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及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5个地委的书记。毛泽东问刘子厚说：

“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说：

“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毛泽东风趣而又形象地说：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

说罢，他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6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插话说：

“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要算1128笔账，简单的也要算800多笔账，只能会计搞，许多大队干部文化水平低，弄不懂。”

毛泽东说：

“这是繁琐哲学嘛。”

刘子厚补充说：

**“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4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

**“三包一奖不适应目前农村干部的文化程度。为适应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得实行大包干。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基础，也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了。《六十条》就是缺少这一条。你们把那个公社（指峒巃公社——笔者注）的大包干情况写个四五千字的报告，我批给省、地两级去试一试。”

他还说：

“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生产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我在广州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20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20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20户有八九十人，30个、40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40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42户，有80个到90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第二天，毛泽东把以上谈话内容整理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9月27日，全文抄录如下：

邯郸谈话会记录（1961年9月27日）

刘子厚 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路明 省委候补书记，管农业；康修民 石家庄地委书记；庞均 邯郸地委书记；胡开明 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琦 邢台地委书记；李悦农 保定地委书记；周兴 山东省委书记，管农业；程怀仁 山东农村部副部长。

不行三包一奖，行大包干制：大队有机动粮。这种机动粮，如国家急需，交一部分给国家；再以一部分支援一些遭灾的及生产不好的队（用借的方法）；再一部分作贮备粮。

另有公积金，公益金，一部分管理费，一部分生产费。

**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你看，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账。光定额就有400多个。**

反对意见：**（1）退到初级社；（2）不利于基建；（3）征购辫子太多；（4）有些遭灾队不易支援；（5）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6）要变动时困难太多。**其实，这6条反对意见，都可以回答。

保定专区唐县峒龙公社：11个生产大队。都是大包干。

**名义上对县对区都实行三包一奖，实际上是大包干。被评为“右倾”，他们也不改。群众拥护。**粮食年年增产。牲口比1957年相当，并很胖，猪保持1957年水平。**国家征购一年比一年增多，大队统一交，下死上活**。

4种人：（1）投机商；（2）热心自留地、小片开荒，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3）懒汉；（4）盲流分子。对以上4种人群众最痛恨，要设法制住他们。

大队应管之事：（1）征购；（2）直属企业（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房，粉房等；（3）学校（小学）；（4）必要的基建，如水利；（5）必要的救济；（6）必要的补助；（7）民兵，治安保卫；（8）作物安排（计划管理）；（9）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9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负责人，他在信中写道：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山东省委1961年3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9月25日的报告一份，**9月27日邯郸座谈记录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1962年的农业比较1961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12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9条。如不做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3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7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道是何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 1961年9月29日上午8时

毛泽东在信的开头部分所说的“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是指河北省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1960年12月30日写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信。耿长锁在信中说，五公公社1960年比1959年减产50%多，除了天灾外，还有人为的原因：一是违反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征购任务不断增加，社员的口粮指标下降，使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农活质量普遍下降。对于怎样争取明年丰收过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见：一、把按地头评产的征购政策，改为按标准亩平均征购政策。多产不多征购，少产不少征购，人为的损失不减任务，特殊灾情个别照顾。生产队对小队可采用“四包一奖”的办法，各队之间一般不调剂，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二、坚决贯彻因地制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多作调查研究。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切实加强培根固本的具体工作。四、应促进牲畜的交流，取消各地不让牲畜出境的限制。

欲知毛泽东在上述信中提出的重要建议能否为众人所接受，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读者再细细看一看毛泽东在“1961年9月29日上午8时”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这一封信吧，这是任何人都抹不黑的历史！无需笔者饶舌，只要您真正看懂了这封信，就会弄清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前后后党内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是是非非，还毛泽东一个清白。

**第17章**

**“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的，胜利，失败，再胜利，**

**再失败，经过无数次反复。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

话说1961年秋，毛泽东重读《离骚》，赋《七绝·屈原》一首，诗云：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据有关方面介绍，这首诗是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的。另有毛泽东在1962年的手迹为证（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诗中“手中握有杀人刀”一句，喻指屈原作《离骚》所发挥的战斗作用。在“艾萧太盛椒兰少”一句中，艾萧，即艾蒿，臭草。这里比喻奸佞小人。椒兰，申椒和兰草，皆为芳香植物。这里比喻贤德之士。“一跃冲向万里涛”，指屈原在悲愤和绝望中投汩罗江而死。

从本传前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自1961年起，又进入了一个诗词创作高峰期，本传以后还会及时地将他的作品呈献给读者。正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心境始终是难以平静的。

1961年10月1日，杨步浩应毛泽东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2周年庆典。

此前，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两瓶酒和两块布料。杨步浩也很想再次进京去看望毛泽东，他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主席，我很想念您老人家，很想去看看您，不知您有空没有？”不久，毛泽东就回信说：“我同意，你跟地方上商量一下，只要地方上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杨步浩征求了延安县委的意见，延安县委同意他进京去看望毛泽东。杨步浩高兴得几夜没有睡好觉，同老伴精心缝制了几个白粗布小口袋，装上了延安最好的小米、炒面、绿豆、瓜子、干菜，在国庆前夕到了首都北京。

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杨步浩，他与杨步浩亲切握手，还把杨步浩介绍给外国朋友。

毛泽东在休息室里主动地坐到参加观礼的黄克诚身边，告诉他说：

“你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

毛泽东所说的信，就是黄克诚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写给毛泽东的检查信。黄克诚见毛泽东如此说，便趁机说道：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

毛泽东说：

“可以，可以。还想回军队吗？”

黄克诚说：

“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吧！”

庆典结束之后，毛泽东又把杨步浩请到中南海家里，设家宴款待他。杨步浩把带来的小米、炒面、瓜子、绿豆、干菜等礼物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深情地说：

“谢谢延安人民，问候延安人民。延安人民是有贡献的。”

他详细地询问了延安的建设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当得知杨步浩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是49.5元时，毛泽东就送给他100元做路费。杨步浩告诉毛泽东说：

“延安人民盼望毛主席回去看看。”

毛泽东说：

“我本来想等延安解放了，就回去看看的，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现在也确实想回延安看看，可还是一直不得空。”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看戏，杨步浩来到怀仁堂，在最后一排坐下等候着节目开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在前排没有看到杨步浩，就转身大声问道：

“杨劳动英雄来了没有？”

杨步浩连忙站起来说：

“我在这儿呢！”

毛泽东说：

“你到前边来，和我坐在一块嘛！”

毛泽东一直等到杨步浩走到他跟前，两人才一起坐下。剧场里的观众看到这种场面，很受感动，热烈地鼓起掌来。

10月2日晚，毛泽东叫即将去大庆工作的小李和他一起到怀仁堂参加晚会，他问小李：

“二十几岁了？”

小李回答说：

“29岁了。”

毛泽东说：

“现在你是大人了，你一直在我身边工作，但总不能这样下去，你到大庆去吧！那个地方虽然艰苦，但是个好地方，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去吧！到那里一定要坚强起来，好好工作。你们每天和我在一起，转眼就是十几年了，我和你们感情太深了。今后，要常来信，介绍情况，常来看我，我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什么时间走？都准备好了没有？”

10月4日晨，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彭真，他写道：

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4同志，于5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3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12月就可以做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5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6日会毕，7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泽东 10月4日晨5时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在今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曾经初步考虑过，现在应当重新考虑。**附去毛泽东同志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纪录和河北省的5件材料、湖北省委9月25日对此事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山东省的两件材料，广东省一件材料，请你们参考。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在试行的时候，必须注意使生产资料，特别是耕畜农具，不受损失。**中央准备在今年12月的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11月底以前，把你们调查研究的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

中央 1961年10月7日

10月7日上午1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中国国庆节代表团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以安斋治为团长的日本翻译《毛泽东选集》协商代表团3名成员，以及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共24位日本客人。毛泽东首先拿起一听香烟，给每个客人递上一支，说：

“欢迎朋友们，热烈欢迎。”

尔后，他站在主人位置上开始讲话，他说：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以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

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90%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针对代表团中一些成员对他们在国内斗争处于低潮表示悲观的情绪，说道：

“用不着悲观。斗争是波浪式发展的。高潮，低潮，又高潮。”

他用两只手一上一下的做着比喻，继续往下讲：

“就是这样波浪式前进。目前看起来处于低潮，但这表明大家正在为争取高潮做准备。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的，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经过无数次反复。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要说非常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的。人民本来没有武器，那时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但是，当时大家为环境所迫，所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最初党员只有几十人，参加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仅有12人。12人中现在还剩下的，一个是董必武同志，另一个就是我。中国共产党在那时是受到大家蔑视的。”

“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取决于党是否具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大家研究中国的革命经验，我劝大家研究一下失败的经验。当然，也需要成功的经验，这样才能把两者加以比较。就是说，在研究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政策和军事路线的同时，必须研究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研究中国历史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是必要的。”

“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9个月，7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就叫‘左’倾。如果他已经9个月了，小孩子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到时间，你要勉强办，那就叫‘左’倾。**”

毛泽东说罢，对着日本客人轻轻一挥手，又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光我一个人说，不民主。”

黑田寿男站起身来，准备代表日本客人讲话。毛泽东伸手向前按了按，示意黑田寿男坐下，并说：

“请坐着说吧。”

黑田寿男向毛泽东躬身说道：

“因为毛主席是站着说的，所以我也站着说。”

“是吗？！”

毛泽东笑着说罢，便坐下来听客人讲话。黑田寿男着重讲了时下的日本形势和日中友好运动。当黑田寿男结束了他的讲话时，毛泽东说了声“好！”，便站起身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4折的宣纸，把它展开。这是他书写的一幅书法精品：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诗一首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

整幅作品为竖式书写，行草，共14行。鲁迅的《无题》诗和落款各占7行。最后3个字特别大，“朋友”二字一笔连绵环转，有荡气回肠之感，“们”字独占一行，以纵笔一气呵成，在全幅布局中起到了“重镇”的作用。毛泽东指着自己的作品说：

“中国过去处于黑暗的时代时，中国伟大的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人鲁迅先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诗的意思是说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你们这次到中国来，我们感谢你们，全体中国人民感谢你们。我没有什么好赠送的，就写了这一首鲁迅先生的诗，送给你们。诗共有4句，由于诗不好翻译，就请郭沫若先生翻译吧。”

黑田寿男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个90度的躬，代表大家双手接受了这一珍贵礼物，并向四周展示。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会见结束了，毛泽东和日本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并说：

“向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问候！”

10月1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由彭真、康生等人组成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并亲自将代表团送至下榻的别墅。

10月15日晚，毛泽东把5天后就要去大庆工作的警卫员小李叫到身边，鼓励他说：

“到那里，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团结那里的同志，互相帮助，依靠地方同志做好工作。”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听说那个地方，干得可起劲了。要学习他们的革命干劲。到了那个地方，一定要把那里的情况，经常写信反映给我。”

说罢，他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提起毛笔，写了4个大字：“努力学习”，送给小李。小李眼含热泪，哽咽着说：

“主席，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

10月17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苏共纲领草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接着，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作了总结报告，使苏共的修正主义的观点达到了系统化，即：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

赫鲁晓夫同时在总结报告中再一次批判斯大林，并恶毒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此后，在致贺词的几十个共产党代表团中，有四十几个党围绕苏共的指挥棒，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10月19日下午，周恩来应邀在“二十二大”上讲话，并宣读毛泽东签署的贺词。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就苏共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一严重事态，在讲话中表明了中共中央的鲜明立场，他说：

“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的、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我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具有的立场。”

10月22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等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总结报告中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做法。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致词谈这个问题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们对苏共的批评还是留有余地。周恩来批评苏联一年来对阿尔巴尼亚采取的一系列错误的行动，希望苏共能郑重考虑中共的意见。针对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抨击斯大林，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对斯大林的系统意见，都写在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之中，当时苏共《真理报》还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周恩来等与赫鲁晓夫的会谈进行了6个半小时，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

10月23日晚8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乘专机先期离开莫斯科，提前回国，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前往机场送行。

10月24日中午，毛泽东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记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修正主义观点是这样批判的，他说：

“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

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转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望遵照执行。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处理问题，过去因为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中央决定今后由统战部门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们。**现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

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不要因为现在给他们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层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这点是干部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掌握的方针，不必又普遍展开一次宣传。

二、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3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1959年作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做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

请你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掌握。

中央 1961年10月28日

1961年11月6日晨，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

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来，则更好。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6时

林逋是宋代归隐诗人，被世人称为“梅妻鹤子”。田家英很快便将林逋的诗文集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原来，毛泽东是为了查找一首诗，才要来了林逋的诗文集。但他一查，没有找到那首诗，于是就给田家英写了第2封信：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8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8时半

工作人员刚把信送走，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首诗的前4句，马上又给田家英写了第3封信：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4句是：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4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 6日9时

毛泽东要找的这首诗很快被查明了，它是明代高启的《梅花》9首之一，后4句是：“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毛泽东看罢，立即挥笔写出了：“高启 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梅花 9首之一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毛泽东 1961年11月6日”。一幅龙飞凤舞的狂草间行书毛体书法作品就这样产生了。**诗尾的那个“回”字，他一反前人元卿自右而左自下而上的手法（见《四体大字典》“回”字目），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自外而内，刷、刷、刷，下笔就是3个圆圈圈，恰似钢圈铁环，风卷浪漩，而且疏密有度，断续有致，这一笔下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堪称一绝。**

早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与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过：

“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

大概是高启的这组《梅花》诗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所以他那时才会有这样的评价。

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陶铸建议说，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叫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意见。

1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3个人，省市来4个人，中央局也来4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我要在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它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8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

1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所说的这次会议，就是后来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11月16日这一天，**刘少奇赴广东从化疗养。**

11月17日，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录呈给他的一首诗。

原来，郭沫若于1961年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于25日赋七律诗一首，送给了他们。全诗是这样写的：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了这首诗，认为郭沫若把唐僧当作敌人，说是“千刀当剐”，是不恰当的。于是，他写出了一首很有深意耐人寻味的“和诗”：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1月23日，毛泽东把邓子恢11月9日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是在10月28日到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调查的。他在报告中反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3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中央 1961年11月23日

11月30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惠书收到（两次），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我近日要外出走一遭，不久回来。明年1月内看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11月30日

11月30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先后去上海、杭州视察。

此一时期，毛泽东重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读罢，他掩卷沉思，3年自然灾害和一些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党内由此产生和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也正因为潜藏的人为因素而得不到及时解决，这些使他寝食难安的隐忧一齐涌上心头，联想到国际上帝国主义阵营及各国反动派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大肆攻击，苏共中央修正主义集团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倒行逆施，便将万千感慨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后人久唱不衰的著名诗篇：

卜算子·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一说是在1961年11月间，后来定稿于12月初，后人一般都认为是作于1961年12月。毛泽东最早亲笔手书的自作词“卜算子”毛体书法作品所署的是“1962年1月作”。郭沫若说他“读到主席的词是在1962年1月30日，春节前6天，是康生同志抄示我的。当时康生同志在广州，我在海南岛的鹿回头。”

《卜算子·咏梅》最初在内部传阅时，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

“陆游的北伐主张失败后，投降派打击他，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而作此词。而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却与陆游相反。”

再说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当代表团团长、加拉加斯市议会副议长谈到他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画像时，毛泽东说：

“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12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于是，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了实弹炮击。此后所打的炮弹里只装宣传品。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于是，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打炮演变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炮击与其说是一种对抗，不如说更是一种纽带，一种对话的渠道。

海峡两岸的这一场炮战，从1958年“8.23”开始，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直到演变成此时的宣传炮战，后来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宣告终止，国防部部长徐向前也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才最终停止。双方炮战整整打了21年，可谓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

1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他本来打算听完汇报就走，没想到江苏省的情况吸引了他，就住下不走了。

12月15日，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

他在听取汇报中间讲了一些重要意见。关于形势，他说：

“**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方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他说：

“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变薄为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关于1962年的工作，毛泽东说：

“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这一天，毛泽东给李先念和姚依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先念、姚依林二同志：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们于12月20日或21日到达北京，就可以了。

毛泽东 1961年12月15日在无锡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

12月17日，毛泽东路过济南时，听取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30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3户5户的怎么办？20户规模就是大的。”

谭启龙汇报说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亡，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6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水电部党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同意水利电力部党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和关于水利管理的10条意见，现转发你们参照当地具体情况研究执行。**今后几年内，农业增产的措施仍是一水二肥。**因此，各地应继续认真地抓好水利工作，特别注意抓住今冬明春的水利工作。关于如何继续抓好水利工作的问题，水利电力部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以加强水利工作、保证农业增产为中心，分期分批地完成今冬明春可以过关或者已经过关的新工程的尾工、配套和机电排灌工程，并认真处理移民等遗留问题，特别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问题，**中央认为是对的。**当前水利问题不是再新建多少工程，而是如何巩固已得成就，完成尾工配套（包括平整土地）等工作，使它们充分发挥效益。**各级党委应本这个精神，认真检查和安排今冬明春的工作。

　 　 中央 1961年12月18日

12月19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此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2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还有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

是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邓小平报告说，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1962年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和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党的工作6个问题。他还报告了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

“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在周恩来说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

“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教育有了《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刘少奇说到了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还说：**

**“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很细致地讲了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刘少奇关于《红楼梦》的话，马上转移了毛泽东的思路**，他以极大的兴趣接着刘少奇的话题说道：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上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3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到了卫士张仙朋写给他的病假条，即随手拿起便签给张仙朋回了一封短信。

原来，张仙朋此前患了感冒，如继续上班，他怕传染给毛泽东，便写了一个请假条让值班卫士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小张：

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毛泽东 1961年12月20日

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欲知中央工作会议能否顺利进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对形势的估计是：“**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他认为：**“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而且毛泽东还提出：“**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他定的这个调子的确是很轻松的，如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能及时地拿出会议报告稿（请注意下一章有关叙述），并交政治局讨论，如果与会者人人都做自我批评，认认真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彻底纠正经济建设和体制中的偏差，砥砺奋进，那该多好哇！可是中央工作会议偏偏不能正常进行，而且还有人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要否定三面红旗，还要追究个人责任。奈何？这大概就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另：毛泽东在1961年12月20日看到卫士张仙朋写的病假条后，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短短数语，老人家那柔情似水的一面和他那慈父般的仁爱，便跃然纸上：“**小张：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如此的关爱，怎不叫追随领袖10年、情同父子的张仙朋泪流满面呢？！可这一幕人世间的纯真友谊，在数十年后，竟然被那些丧心病狂的反毛者移花接木，转嫁到张玉凤身上，成了射向伟人的一支毒箭！张玉凤是在1970年才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由此可见，那些反毛者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已经卑鄙到了何等程度！

第18章

“**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

**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

**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

话说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秘书室三科的崔英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就走过去向他伸出手，邀请他跳舞，并自我介绍说：

“主席，我是新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毛泽东握着崔英的手，端详着她的面孔，说：

“新来的？好像见过面嘛！”

崔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回答说：

“您的记性真好！1955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乙区办公，夏天在乙区游泳池游泳时，见过您。当时主席还问过我‘怎么学会浮在水面上仰卧的’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我说见过面嘛，7年怎么就会忘记呢！”

他示意崔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崔英回答说：

“东北辽宁人。”

“那你一定学过日文了？”

“学过7年半。”

毛泽东这个时期也在学日语，他让崔英和他一起背日文的五十音图。崔英因长期不用日语，背得很不熟练，有的发音也不准。毛泽东一边背，一边帮她纠正发音，还说：

“学过7年半，有基础，应该继续掌握这门外语。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

“那么你的爱人是姓张的了？”

崔英闻言，一时愣住了，她不明白毛泽东何以如此说。毛泽东不等她回答，又微笑着问道：

“你读过《西厢记》吗？”

崔英这才恍然大悟，毛泽东是用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逗她的。她会意地笑了笑说：

“我的张生原在中宣部工作，1960年响应号召下放到安徽基层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

毛泽东听了，顿时收敛了笑容，安慰她说：

**“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

他又关切地问：

“你今年多大了？有几个小孩？”

崔英说她32岁，有两个男孩，一个10岁，一个7岁。毛泽东说：

“孩子还小，有人帮助你照料孩子吗？”

崔英说婆婆帮助照料。毛泽东问：

“你一个人拿工资，家中生活有困难吧？”

崔英说国家补助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对婆母也有补助。毛泽东点点，鼓励她说：

“那就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崔英见毛泽东如此关心她这样的普通干部，非常感动，就说：

“太感谢主席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接着，他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撰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撰写的一篇题目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文章，文章中说，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昆剧《李慧娘》这个戏改编得很好。他在文章中还批评了那种把“鬼戏”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无害论”的观点。

不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收到了一篇批评“繁星”那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把文章转给《文艺报》处理了。

1962年1月初的一天，已经下乡调查归来的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封耀松、王敬先5人相约一起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即热情地招呼大家：

“你们来了，坐，都坐！”

5个人在客厅里围着毛泽东各自找位置坐了下来，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下去了一年，脸都被太阳晒黑了。这样好，既了解了情况，又锻炼了身体，还增长了才干，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呀？”

5个人都笑了。毛泽东又说：

“你们写的调查报告和心得体会，我都看过了，写得很好。子龙写得比较全面，高智写得比较具体，银桥写得大有进步。小封和敬先写得很认真，错别字也比以前少多了！林克虽然没有来，但也写了材料；他是秀才，写得最多。”

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神情，叶子龙说：

“在下边，我们别的都好说，就是天天想主席。夜里睡不着觉，我总看着窗户愣神，总想主席这会子准是又在办公，要么就是在看文件，说不准也许在练习着念英语……”

一句话就像打开了放水的闸门，引得大家把这一年来在外边对毛泽东的思念全都倾泻了出来。

“我白天想主席想得最多，”封耀松说：“老是挂念主席吃不好……”

“我也是……”，王敬先说：“我还担心张仙朋和张景芳他们熬不好麦片粥呢！”

毛泽东说：

“他们做得都很好。”

“我夜里想主席想得最多……”，高智说：“有时一觉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想你媳妇了吧？”

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毛泽东问李银桥：

“银桥，你都想么事呀？”

李银桥眼里含了泪花，说：

“我就是想你……”

毛泽东又问：

“你想我什么事呀？”

“什么都想……”，李银桥老老实实地说：“就连主席的拉屎放屁我都想……”

又是一阵笑声。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我也想你们哩！”

1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并同安井郁一行人进行了谈话。他在谈话中就世界的划分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这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德国、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如法属非洲和英属非洲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毛泽东还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思想，他说：

“**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是，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军，因为它们同美国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谦三、石桥湛三、高崎达之助等人，他们不大高兴美国，同池田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英法在亚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有些国家形式上独立了，但英法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代替旧殖民主义。”

1月上旬，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又见到了毛泽东，她在慢四步舞曲的旋律声中邀请毛泽东跳舞，一边跳一边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有许多在反右斗争中划成右派的人在申诉，很多人给您写信，要求平反，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闻言，便停下脚步，说：

“不知道。那些划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

崔英说：

“寄来了。我就是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情况不知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

“详情不知道。”

崔英又报告说：

“**对右派的申诉信件，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地说：**

**“谁说的？真正划错了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你转告秘书室主任，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我。”**

后来，崔英向秘书室领导汇报后，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就被调离了中南海，远离了毛泽东。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61、62 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她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哪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她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3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3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关于为错划右派平反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还记载了另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的错误作法。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再说**1月8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起草的报告稿，才印出了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发给各小组讨论。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1月9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1月9日

**1月9日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终于改出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稿第3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1月10日上午，毛泽东看了中央工作会议报告稿的前两部分，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并告刘少奇、邓小平：

**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还没有看。**

**毛泽东 1月10日**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召见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提出改变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

原来，**按照政治局的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会议所做的书面报告，而这个书面报告是要事先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可是，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进行20天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才刚刚搞出来，毛泽东“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还没有看。”，更不用说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会议开成了这个样子，**毛泽东不得不重提他在1961年11月12日晚“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建议，把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第二阶段“七千人大会”，见前述1961年11月16日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他还说：为了使“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使会议开得更加民主，改变过去中央先做报告尔后讨论的开会方法，将书面报告印发给“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由刘少奇做一个说明，然后分组讨论3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在与会者提出意见后，再组织起草委员会写出报告的第二稿。他说，这样的开会方法，可以使会议民主气氛更浓，使报告写得更好，使与会者感到作用更大。

毛泽东的这一安排，完全打乱了刘少奇的计划。

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紧接着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在北京召开。**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后来，人们习惯地将这次会议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这一天，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稿，由刘少奇作了简单说明，尔后分组进行讨论。

1月12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和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似有所悟，便步其原韵，又和了一首诗，前有小序云：“毛主席的和诗是1961年11月17日作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读了，我受到了很大启发。我当天曾经用毛主席的原韵，又和了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弥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几度来。”

康生在1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将郭沫若的小序及和诗抄呈毛泽东。为此，毛泽东在给康生的复信中写道：

康生同志：

8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做，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请代问郭老好！

毛泽东 1962年1月12日

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组讨论的情况，提议延长“七千人大会”的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在讨论中，各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据杨尚昆1月15日日记记载：“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1月16日，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他在听取了汇报后，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没有表态，还是鼓励要大家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毛泽东还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1月17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1月24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几易其稿，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决定大会在本月底结束。

1月2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问题，决定在27日下午召开“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因为与会者对报告修改稿已经基本上熟悉了，再照本宣科念一遍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在大会上对报告修改稿中涉及的问题，另外作一个口头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提纲。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刘少奇作了口头报告。

关于大跃进问题，刘少奇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1959年以来这3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减产40%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

刘少奇**公开否定了毛泽东曾经以9个指头和1个指头做比喻评价成绩和缺点错误的说法**。他说：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3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3个指头，成绩还有7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

刘少奇还说，在**报告修改稿中提出的4条缺点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

关于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缺点和错误以及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刘少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

“除了我们的经验不够，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能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

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说：

“**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他还公开说：

**“三面红旗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来作结论。”**

刘少奇还提出了关于彭德怀的问题，他说：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有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所有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结束后，毛泽东对后边几天的会议程序作了安排，他说：

“明天，即1962年1月28日，星期天。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28号，我们争取30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31号。如果30号搞不完，那么我们加一个31号。总而言之，31号无论如何要搞完，31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

1月28日，在分组讨论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也同刘少奇一样，提出了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任的问题**，并说出了几句举座皆惊的话，他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真还说：**

**“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都将给我们留下恶劣的影响。”**

陈伯达立即站直了身子反驳彭真，他说：

“**彭真同志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没有想到陈伯达竟敢公开顶撞他，不禁为之愕然。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反刘少奇1月27日的观点，说道：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3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听林彪这样讲，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只是吸烟，并不插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都不插话，整个大会都在听林彪一个人讲：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此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

不少与会者反映，对“林总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感受很深。”还有人说，“林总的讲话，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

来自东北的与会者说：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特别是对林彪所讲的3年“大跃进”的得失问题，付学费问题和坚决跟毛主席走的问题，大家认为讲得十分深刻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另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地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的热烈鼓掌。”

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很不满意，听了林彪的讲话，便说：

“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毛泽东鉴于小组讨论中一些地、县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的情况，**又宣布说：

“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

他的话赢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3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场内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工、农、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1章、第2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21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8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6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的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5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散会后，毛泽东问身边的总参谋长罗瑞卿：

“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

罗瑞卿诚恳地回答说：

“我作不出来。”

欲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有什么重要讲话，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如果读者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七千人大会”前后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采取了暂且宽容和忍耐的态度。

应该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是一箭双雕：一是把矛头对准了“三面红旗”，对准了毛泽东个人，要追究“人祸”的责任（本章中所说的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搜集毛泽东的错误和第二阶段“七千人大会”讨论时的反毛言论，便是此一活动的注脚。倘若没有林彪1月29日那一篇与刘少奇针锋相对的讲话和会场上的强烈反应，倘若再有几个彭真式的人物接着发难，“七千人大会”会不会演变成为第二个“庐山会议”？）；二是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彭德怀果然被激怒了，随后便写出了给党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从而为自己登上党政权力的巅峰扫清道路。

本传在第七卷后半部及第八卷这一部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产生背景及过程已经作了极其详细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待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上，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个壮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他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过，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毛泽东也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但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的。而且**他是在大跃进开始仅仅3个月后，就最先发现了那些缺点、错误，并对其进行了一步步的解决纠正。尽管被“庐山会议”打乱了部署，但在经过了一段反右倾活动后，又连续不断地开始纠“左”了。**而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则罔顾事实，旁敲侧击地强调某些个人的因素和责任，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一议题变为“七千人大会”的主旨。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就这样，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泽东心目中动摇了。后来，他在和外宾谈话中说到产生拿掉刘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是从“七千人大会”后就产生了，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毛泽东这一时期全部有据可查的历史正好相反，站在党、政工作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一时期的历史却出现了空白。据2012年7月号《东方红文萃》署名“可伍”的文章《从公开档案看五风》一文中说，在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整整3年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文献空白！”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竟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近两年的空白！从1960年3月25日开始，又出现了1年零7个月的空白！”笔者要说的是，这种现象说不可思议也可思议，有人要为其“尊者”讳，必然要掩盖其“尊者”的历史。如果把真实的历史资料全部抖搂出来，岂不是要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吗？！

**第19章**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

**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

**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话说1962年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特别重要的长篇讲话**，特录全文如下：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6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7000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21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8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7000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12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4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笫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观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1959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1961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1957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作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作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么，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10个就有10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95%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95%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有3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在会议报告里说，最近4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20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11年了吗？是干了11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50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50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100年，10000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16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100多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300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50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莱、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分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现在，是后4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4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7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7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1700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800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700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90%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7000多人，7000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95%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会议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的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没有指明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95%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形，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长篇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是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篇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同时也是一篇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在当今有人非毛的非常时期，把这篇讲话全部抄录出来单列为一章，是非常必要的。让那些人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自己的形象吧。不是也有一些“左翼”、“毛粉”针对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缺乏民主”等“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社会主义论”吗？那就也让他们好好地看一看吧，毛泽东时代到底缺了些什么？

**第20章**

“**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为什么要劳动？**

**第一，劳动能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

**好关系。他们才会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话说1962年1月31日上午，就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邀请溥仪、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仇鳌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

溥仪是在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上获得特赦的，此后，他在妹妹家里住了半个月，就搬到了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里。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正式参加了工作。

上午8时许，毛泽东对先期到达的章士钊等人说：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钊问道：

“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故做神秘地说：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说话间，一位高个子清瘦的男人，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此人约摸50多岁，举止落落大方。他既不是人们熟悉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章上常有照片登载的著名人士。毛泽东虽然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但他却像老朋友似地迎上前去握手寒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我万没想到能见到您。”

宾主之间寒暄已毕，毛泽东环视各位客人，带着浓重的乡音微笑着说：

“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毛泽东又指着4位老人一一给溥仪介绍。溥仪很谦恭，无论毛泽东介绍到谁，他都鞠躬致意。毛泽东说：

“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泽东最后指着王季范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九哥——嫡姨表兄。”

众人只知道王季范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却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一层亲密关系。仇鳌说：

“王季范先生平时从不向人亮自己的家底，所以我们都不太清楚他是主席的亲戚。”

其他几位老人也说：

“不借主席的威望支撑自己，真是令人钦敬。”

王季范则谦虚地说：

“我沾主席的光太多了，心里有愧。”

毛泽东挥挥手，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亲切地拉着溥仪在自己身边坐下，问他的近况如何。溥仪回答后，又检讨了他过去的罪恶。毛泽东说：

“有的事，你要负责，而有些事不是你一个人所做的。”“你写的《我的前半生》（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反省式自传——笔者注）未定稿，我看过了，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你的。**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反映历史要细些。**”

毛泽东请的这5位客人，除溥仪外，都是他的湖南老乡，因此，他特意交代厨师做了几样家乡菜招待大家，所以，桌面上也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吃午饭时，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他笑着对溥仪说：

“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哩！”

在座的几位老人都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溥仪诚惶诚恐地站起来说：

“岂敢，我是罪人，我有罪啊！”

王季范解释说：

“主席是光绪十九年出生的，溥仪先生当皇帝时，他已经16岁了。”

毛泽东拉着溥仪坐下，他说：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个宣统皇帝哩，是后来才知道的。”

毛泽东用筷子指着桌上的小菜说：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作‘冇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

他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进溥仪的盘内，说：

“尝尝我们湖南的辣椒和苦瓜吧！”

溥仪道声“谢谢”，恭恭敬敬地夹起一块辣椒炒苦瓜吃着。毛泽东看着溥仪很自然地吃了苦瓜，高兴地问道：

“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

溥仪连声说：

“好吃，好吃。”

王季范对溥仪说：

“这是我们家乡菜，一般只能夏天才能吃到。在北京却四季都能吃到。”

毛泽东说：

“这是从南方采购来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喜欢吃苦瓜，采购回来后便作了储藏处理。”

毛泽东见溥仪的鼻尖上已沁出汗珠。就笑着说：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又指了指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

“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最开心。毛泽东转换了话题，关心地问溥仪：

“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说：

“还没有呢。”

毛泽东建议道：

“还可以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考虑一个合适的，因为这关系你后半生的大问题，要成立一个温暖的家庭，还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说有笑。饭后，毛泽东和5位客人合影留念。毛泽东又把溥仪拉到自己的右侧，说：

“我们两个可得照一张相哟！”

于是，新华社记者为毛泽东和溥仪单独照了一张合影像。

过了两天，溥仪接到从中南海寄来的照片后，他在照片下面衬的白纸上题写道：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一会儿压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一会儿挂在屋子正中的墙上，一会儿又放在床头几上。

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在众多亲友、同事的帮助下，溥仪在1962年4月30日与李淑贤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再说1962年2月初，已经毕业分配到工程兵科研部从事技术情报翻译工作半年之久的刘思齐，和杨茂之结了婚。婚礼是在她家的四合院里举行的。

原来，毛泽东一直关心着刘思齐的婚姻问题，多次劝她再嫁。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渔民出身，一米八零的身材，从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毛泽东让刘思齐跟杨茂之见了面。二人一来一往，便定下了婚事。据刘思齐说：“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一样，是个不错的对象。”

毛泽东将自己新作的《卜算子·咏梅》，亲手抄录了一遍，作为贺礼，送给了刘思齐和杨茂之。他还派工作人员送去300元钱，捎话说：

“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刘思齐和杨茂之结婚后，改名为刘松林，住在北京南池子里，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他们婚后生育有4个儿女。

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决定“七千人大会”出气会告一段落。

2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人很看重的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2月5日早晨7点15分，孔从洲驱车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接见。

原来早在1959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2月下旬，孔从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由他负责筹建炮兵工程学院。6月下旬，孔从洲被正式任命为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学院院址临时设在武昌，“边筹建，边教学”。1962年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工程学院迁到南京市。孔从洲在从南京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办完事回程路过北京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5日上午见见他。

这天上午8时整，毛泽东在南海岸边游泳池旁迎候孔从洲，孔从洲身躯笔挺，举手行礼。毛泽东笑容可掬，亲切地拉着亲家的手说：

“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

孔从洲说：

“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不便占你的时间。”

“今天不就有时间了嘛。”毛泽东说着，拉孔从洲一同落座。他先从家庭、子女及其教育谈起，接着谈到了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设，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10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亮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

“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洲。**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要35匹马才能拉得动它**。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式炮闩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的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说：

“现在是仿制。”

“总仿制吗？”

孔从洲立即回答说：

“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专家、教授。你们的学院学制几年？有多少学生？分几个部？”

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

“师资力量怎样？办学校第一是选教员，有了好教员，才能教好学生。**过去有句话叫‘师高弟子强’。没有教员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学生昭昭的。**”

孔从洲说：

“学院的师资力量基本上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教员中一部分是老军工、老教授，他们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员。”

“**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建国初期，我们就采取了兴办速成中学、业余大学，还派遣干部进高等学府或出国深造等各种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道：“**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老知识分子年龄大了，又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这些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孔从洲说：

“知识分子问题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他们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一切。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毛泽东问：

“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要求吗？有无图书馆？教书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要随便占用，要让他们有看资料、搞研究的时间。想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就要多看先进资料。”

孔从洲回答：

“教员的时间是有保证的。有一个图书馆，藏书尚能满足使用。”

“这很好。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

“注入式的教学法不多见了。”

“教学法很重要，有了教员，教学法不当，还是学不好。**我给学生讲课，从来就反对一个人讲大家听。我让学生提问题，有时干脆就让学生回答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样，就使课堂成为讨论学术的园地，学生理解得深，记得牢。**教员是树人的，要抓好对学生的教育，早出人才。”

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的学生从哪里来？工农子弟多吗？有复习时间吗？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强调说：

“学生要有个实习的地方和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

他又问：

“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情况怎样？”

孔从洲回答说：

“基本上能满足工作需要，但在校期间学理论多，接触实际少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毛泽东说：

“要多实习。学校要和部队使用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好教学大纲。教材是老本还是新编的？”

孔从洲回答：

“老教材还是多一点。”

毛泽东说：

“开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充实，逐渐写出自己的。学院要搞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院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联系起来。当院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过去不是办过学校吗？”

孔从洲说：

“是的。上次见面时我在高级炮校，那是一所指挥院校。”

“光会指挥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个完全的指挥员。现在有了炮兵工程学院，你要注意学习，要学点自然科学。”

“上次见面我就说过，我的水平低，数学基础不行，怕担负不了院长这个重任。”

“不会可以学嘛！”毛泽东说：“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吗？要学孔夫子不耻下问，向老教授学习，拜他们为师。不学习和他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多学多问不会影响威信，相反，内行话多了，就不致闹笑话。”

孔从洲说：

“过去有畏难情绪，没学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尽快变成内行，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当孔从洲汇报到指挥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

孔从洲说：

“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

孔从洲立即表示说：

“主席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

话题再次回到指挥仪的问题上，毛泽东听说一些部队的老85高炮还使用“三不变”的指挥仪，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严肃地说：

“这种落后的东西怎么还能在部队使用？敌人的飞机能停在那里不动等你打吗？要加强研究，尽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呀！”

孔从洲汇报说：

“我们现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挥仪，精度比较高。”

毛泽东这才又高兴起来，说道：

“很好，要抓紧生产。”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结束了，孔从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着毛泽东的那些话。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主席的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论断，而且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语言，使我来时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了。”

2月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七千人大会”的团拜会，和全体与会者共度春节。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2月7日是大年初三，周恩来在大会上讲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毛泽东很不满意。他在会后对周恩来说：

“此人我绝望了！”

2月8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视察。

2月11日，毛泽东对田家英2月8日报送的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进行了修改。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指示”稿中原来写的是“例如40年内”。田家英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邓小平“主张把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成20年。究竟写‘40年’，还是写‘至少20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阅后，在指示稿上改写了一段话：

“**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接着，他又给田家英等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

以改为“至少30年”为宜。苏联现在43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毛泽东 2月11日于上海

2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关系到党是否脱离亿万农民的重要问题，对农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前进，而不能大步的或跳跃式的前进”的指示，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主要内容有：

1. 近3个月来，全国各地普遍地进行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已经是势在必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

二、在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就整个农村来说，人民公社的体制，又不应当强求一律。现阶段大体上将会存在两种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仍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管确定哪一种形式，必须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办事。“**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三、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内部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生产大队仍然在全大队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它成为各生产队的联合经济组织，既执行经济方面的职权，还要在公社的领导下，执行行政方面的职权。

1.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主要从生产队体现出来。

五、调整基本核算单位，是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妥善解决下列问题：（１）规模；（２）干部；（３）土地；（４）耕畜、农具；（５）大队企业；（６）林木；（７）水利；（８）债务。

六、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应当争取时间，立即动手，宜早不宜迟。中央要求各地，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把这项工作大体做完。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做细致的工作。要有准备，有步骤。先经过认真的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期分批，逐步推广。绝不能一哄而起。

正是：此事讨论整一年，毛公施政何其难！道旁还有害群马，犹抱琵琶欲别弹。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毛泽东因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

“西楼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经济形势。

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中央在批示中说：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

2月23日，陈云应刘少奇的要求，在“西楼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的插话和结论里说：“**中央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笔者注）**对困难情况摸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后，刘少奇等人商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等人为成员的中央财经小组。

2月24日凌晨，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个条子，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3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毛泽东 2月24日上午5时

原来，毛泽东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田家英在2月下旬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太满意，他要重新整理。

2月25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送来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2月26日凌晨，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短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的），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毛泽东 26日上午4时半

后来，一直到3月20日，毛泽东又先后对这个讲话稿修改了7遍。

2月26日，毛泽东找来田家英，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了解农村贯彻实施《六十条》的情况，调查农村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定了4个调查点：**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花明楼，一个是他的外婆家湘乡唐家圫，一个是1961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长沙天华大队。**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

田家英立即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

毛泽东又派罗光禄和孙勇为正副组长，带领卫士张仙朋、干部队小陈、理发员小钱，组成一个小组去湖南常德专区石门县调查。毛泽东在他们临行前，对罗光禄等人说：

“一般报纸和文件，都是筛选过的材料，是剩下的骨头，肉很少。要真正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说什么，要了解群众的意愿，就要到群众中，到农村基层中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见官，往往不说实话，绝对不能有官架子。”

毛泽东还告诫他们说：

**“我们处处要想到群众，要了解大多数群众想什么，要求什么，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研究决定政策。因此，一定要得到群众的实话。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为什么要劳动？第一，劳动能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好关系。他们才会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计划地下去调查，往来旅费本来应该由公家报销，可是，毛泽东不让公家出钱，他要拿出自己的稿费开支，一般平均每人发给200元或300元。

1962年3月3日，毛泽东接到北京派专机送来的苏共中央的一封来信。

原来在3月1日那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中央2月22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了邓小平。苏共中央在信中指责中国共产党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的所谓“特殊立场”，以及在国际共运中实行的所谓“独特路线”。苏共中央在信中也表示两党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还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3月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来信的估计和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一封复信。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发表意见。陈云提出，**今年的计划要满足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对于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痛痛快快地调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

3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了话，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3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2月26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讲话的批语**。刘少奇说：

“**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邓小平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专程到武昌向他汇报。

3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复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同意他们16日到武昌，汇报会议情况并面商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到武汉，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3月16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了武汉。

是日晚，刘少奇3人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了12日、13日西楼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和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名单：**

“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

3月1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同意转发陈云3人的讲话，同意“西楼会议”后成立的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而**对于刘少奇、陈云等人在“西楼会议”上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结论，毛泽东没有表态，他是有保留的**。

3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返回北京。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中央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现在转发给你们。各地在处理这类具体问题的时候，即可按照这些解释和意见办理。执行中如果有新的问题和意见，望随时报来。

**对于减少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这项工作，各级党委、各企业、事业、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高度重视。**应当看到，当前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仍然是很严重的。**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在于增产节约。但是农业和工业的增产，在近年内还不可能快；而精简节约，则是马上可以见效的。城镇减人和精简职工，既是调整城乡关系、调整工业与农业生产所必需，更是克服当前财经困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要能够迅速地把人减下去，财经方面的困难程度和紧张状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减轻和缓和；反之，**如果容许人浮于事、浪费人力和工资基金的情况继续拖下去，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企业赔本的现象不能克服，通货不能收缩，城镇粮食销量不能减少，那么，财经方面的困难势必还会加重，将使我们面临一种十分不利的局面。**因此，**现在必须主动地、坚决地、有秩序地减人，并且必须力争多减、早减，在这方面的任何犹豫观望，都是有害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同志，都必须认真从大局出发，下狠心减人，不要怕减过头。如果日后生产上、工作上确实需要增加职工，补充起来并不难，那种担心将来补充不到劳动力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全党上下应当认识一致，全力以赴，完成中央1962年2月14日决定中提出的今年的减人任务。

在精简中，**必须切实做好被减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置工作。要向被减人员讲清楚，在国家调整经济工作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必要性，指出回乡生产、加强农业战线，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光荣的事情，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心情舒畅地回乡。**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也要传达中央1962年2月14日的决定，动员他们欢迎城市中被精减的和暂时放假的职工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城乡应当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城市要做好欢送和遣返工作，农村要做好欢迎和安置工作，避免发生精简和安置不好，以致部分被减人员自由流动的现象。安置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迅速安排回乡人员参加生产和切实解决他们回乡后的口粮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在精简人员回乡后的短时间内（例如半月以内）就都解决落实。

为了推动各企业、事业、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做好精简和安置工作，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当组织一些精干的工作组，从城乡两方面加强检查督促，务求使这项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稳当，完成任务又不出大的问题。

　 　 中央 1962年3月20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严禁各地进行计划外工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据建设银行报告，**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地区仍在违反中央规定，进行计划外工程的建设，这种不顾国家困难，继续扩大计划缺口的分散主义行为，应即严格禁止。**

根据今年第1季度的财政经济情况来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还要进一步进行大的调整。中央决定：**今年的年度计划，必须切切实实根据首先保证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其次保证现有设备的维修和配套的需要，最后才能用于基本建设。**因此。计划内的基本建设项目，还要作进一步的压缩，决不允许在计划外用自筹资金或上年财政结余进行基本建设。在调整后的年度计划还没有下达以前，特作如下通知：

一、所有计划外的工程（以国家计委1961年12月20日印发的1962年基本建设安排意见为准），一律停止施工，**特别是楼、馆、堂、所，不论已经建设到什么程度，必须立即停止施工。**

二、**计划外的个别项目，如果确为恢复农业和解决市场商品供应所急需，而且投资不多，又能很快见效的，必须经过审批，纳入国家计划。**大中型项目统应报中央批准，地方小型项目由各中央局批准，中央各部直属的小型项目由国家计委批准。凡未经批准的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和银行不得付款。

三、国家计划内的项目，在调整计划未下达以前，暂按国家计委1961年12月21日印发的《一九六二年基本建设安排意见》执行，不得自行扩大工作量。凡材料设备不落实，或建成后燃料、电力和运输等供应不落实的项目，一律停止施工。

四、所有国家计划以内项目，今年从停建项目调用的材料和设备，一律按价付款，不得无偿调用。计划以外的项目拖欠的债款和虚报冒领的资金，各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它们迅速清理归还。

附发建设银行《关于层层加码核计划外工程的情况仍未停止》一件，请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于4月15日以前报告中央。据我们了解，在建设银行报告的部分以外，还有一些计划外的建设项目没有停止施工，也应当一并调查报告。

中央 1962年3月20日

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将他整理出来的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第7稿，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毛泽东又审阅了林彪在1月29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在给罗瑞卿、田家英的批示中，他写道：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指示，把林彪的讲话转发下去。可就在中央办公厅准备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之时，有人又提出，林彪主要讲的是军事问题，有些机密内容，似不宜下发。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下发。”

3月22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田家英组织的17人的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向调查组提出了6点要求：1、要同湖南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2、不要乱指挥；3、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4、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5、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6、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此后，田家英便带着调查组去了湖南，分别进驻了韶山、炭子冲、唐家圫；而毛泽东指定的天华大队，他们却一直没有去。

欲知毛泽东后来回到北京的工作情况，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改再改，反复征求意见，以至于改出了第7稿。他对此文如此重视，不是没来由的。本传在前边已经叙述清楚了，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形成了肯定三面红旗与否定三面红旗的两种对立意见，这种对立在“七千人大会”上凸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便不得不对建国后的12年特别是最近4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说明和结论。此后的“西楼会议”表明，党内高层的对立在毛泽东讲话后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后来还逐渐地形成了时隐时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真实历史，诸君如若不信，那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第21章**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

**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话说1962年3月26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3月27日，全国人大二届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1962年4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计划会议上说，对1962年的计划要做大幅度的调整，要采取断然处置的办法。减少城市人口要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每个部对企业要进行排队，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一批，缩一批。要控制各种购买力，要进行节约，以弥补市场差额。要控制货币投放，控制外汇。要紧缩文教、卫生部门。

4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的修改稿。

4月7日，毛泽东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邓力群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那篇讲话整理稿的修改意见，批转给刘少奇、邓小平，他写道：

“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

4月9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解决问题。信中还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后来苏共中央在5月3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上述建议只好搁置起来。

4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8次会议的第2次会议。张治中等7位与会者就刘少奇3月21日在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作了发言。尔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道：

“今年1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3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一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总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具体的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做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一辆轿车把周瘦鹃从会议住所接到了怀仁堂，工作人员说毛泽东要单独会见他。

周瘦鹃是在4月初偕同盼望了两年跟他一起进京的老伴俞文英和5岁的小女儿全全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被工作人员领进一间小会议室。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让他在隔着茶几的沙发上坐下，亲自给他点了烟。周瘦鹃望着毛泽东慈祥的目光和温和的仪表，不慌不忙地说：

“记得3年前，主席曾经说过，读了我的许多文章，很想跟我谈谈。我一直在担心，自己写出来的那些拙作，一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毛病，这个还要主席多多批评，多多指教。”

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的散文是写得好的。”

周瘦鹃说：

“主席太夸奖了，实在不敢当！只为平时学习不够深透，怎么写得出好文章呢？”

**“只要群众喜欢读你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周瘦鹃知道毛泽东这样说，是没有苛求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同时更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鲜为人谈的真理**而深深感动了，他说：

“这些年来，我在文艺上、园艺上搞了一些东西，这要**归于3年前主席‘有没有新的东西给我看看’的那句话鼓励了我**。**我认为主席这句话并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是对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说的，要大家都搞些新东西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六亿五千万人民，包括我在内。”**

说着，他又为周瘦鹃点了一支烟，自己却没有抽。周瘦鹃吸了两口就掐灭了，把剩下的一截小心翼翼地放进衣袋里。他想带回去留作纪念。他放好烟，望着毛泽东深情地说：

“为了当年听到主席向我要看新东西的一句话，我胆大妄为地和了大作4首诗17首词的原韵，名为《学步集》，自知功力不足，气魄不大，对主席的思想感情也体会不深，真的是邯郸学步，丑态百出。前年曾冒昧地将初稿寄奉求教，至今未有所闻。后来周总理也要去看过了。苏州市文联为此特地召开讨论会，我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曾经一再加以修改。但是如果不经主席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我好好地修改一下，那是始终不能定稿，不敢发表的。”

毛泽东谦虚地说：

“你是专家，我是业余，要发表就发表嘛！”

周瘦鹃见毛泽东如此说，便把《学步集》双手奉上。毛泽东接过，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末了问道：

“你要带回去吗？”

“不！不！请主席在工作之暇给我批改一下。”周瘦鹃见毛泽东收下了书，又趁机说道：“多年来我老是惦记着主席，真所谓梦寐系之。就是我那5岁的小女儿全全，也念念不忘毛主席。这一回她也跟着我来了，虽然没有见到主席，可她来到北京就像见到主席一样高兴。”

毛泽东笑吟吟地柔声说道：

“你替我谢谢她。”

周瘦鹃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心想，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怎么当得起主席称谢呢？一时间两眼不知不觉地湿润了。就在此时，一位工作人员进来催促毛泽东参加小组拍照。原来半个小时会见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毛泽东对那位工作人员说：

“让他们等几分钟吧。”

周瘦鹃不便久留，便站起身向毛泽东告辞，他说：

“主席，您看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还能为社会主义做些什么？”

毛泽东一边送周瘦鹃，一边对他说：

**“你搞盆景很出色，但别忘了你是个作家，要写些新东西。我等着看你的新作。**”

“主席今天这样鼓励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干下去！”周瘦鹃在门口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祝主席健康长寿！再见！”

周瘦鹃欢天喜地回到住所，忙不迭地向参加政协会议的同仁介绍了毛泽东会见他的情景，他还兴奋地说：

“这次见到毛主席，谈了半个小时，我心满意足了，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现在我就是想多写东西。我的年纪已经68岁了，可我的干劲还像是28岁！”

后来周瘦鹃果然是勤笔勉思，写出了不少好的散文和诗歌，有的还在海外发表了。他的《我的心被拴住在怀仁堂》、《初识人间浩荡春》等散文，记述了毛泽东接见他时的幸福情景，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转载。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游记《行云集》。

再说4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二届3次会议胜利闭幕。这一天，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3月7日的讲话，还在上面划了一些杠杠，但他对刘少奇的来信没有答复。**

4月16日这一天，新疆塔城等地部分居民逃入苏联境内。

此前，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表面化，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也出现裂痕。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在塔城等地活动，煽动中国边民外逃。从4月16日开始，塔城、裕民、霍城3县居民共5.6万人不顾当地政府的阻拦，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值班卫士张景芳对李银桥说：

“卫士长，主席叫你去呢。”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15年了。汪东兴刚刚和他谈过了关于他调离的事情。眼看就要离开毛泽东了，他知道以后再见毛泽东不是很容易了，就立即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背靠栏杆看文件，见李银桥来了，就招呼他说：

“来，银桥，过来。”

李银桥走到毛泽东床边。毛泽东拉着他的手，用另一只手抚着他的背，问道：

“听说你要走啊？”

李银桥难过得说不出话。毛泽东又问：

“听说你要求到石家庄去？”

李银桥忍不住问了一声：

“你听谁说的？”

毛泽东没有吱声。李银桥说：

“我要离开你的话，我不到石家庄去，到天津去！”

“那好。你去天津，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找你谈谈。唉，”毛泽东轻轻地叹息一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你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此时，**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和汪东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泪水马上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毛泽东本来是忍受着感情的折磨，一直控制着，他这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一见李银桥哭了，就再也忍不住了，泪水也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我也舍不得你走哇。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毛泽东流着泪继续说：

**“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炼锻炼，工业、农业，公安，几种事情都干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团结，多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的同志们学习……”

李银桥“呜”地一声哭出了声。他怎能忘记，整整15年啊！自己从恋爱、结婚到有孩子，毛泽东事事处处关心，就像父亲一样，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用手一拉，把李银桥揽入怀中抱紧了，哭道：

“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一次啊……”

李银桥泪如泉涌，他看毛泽东伤心得厉害，怕伤了他的身子，就竭力控制住自己，流着泪说：

“主席，我听你老人家的话，下去要好好干，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擦着眼泪说：

“好，那好，那好。你在我这里工作15年，职位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主席，我记住了。”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李银桥又忍不住哭出了声。毛泽东又说：

“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也不会有卫士长，你就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

毛泽东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袋说：

“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钱。这是800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

“怎么，你是要我摸钱吗？”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就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以后就更不去摸钱。有一次，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他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毛泽东正要看，闻言神色大变，像是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立即把纸袋子扔开了。他严厉地说：

“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如今李银桥一见毛泽东要抓那个钱袋子，忙说：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

说着赶紧上前拿过钱袋子。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讨厌钱。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

“星期六。”

“那好，那就星期六一块来我这里见一见。”

4月19日，毛泽东召见刚从江西劳动回京的高智谈话。

这天下午还不到3点，高智抱着女儿提前来到颐年堂，服务人员告诉他：

“主席一个人早已坐在沙发上等你了。”

高智一听这话，急忙把孩子交给服务科的同事帮助照看，大步穿过颐年堂的小过道，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左边，一边吸着烟，一边亲切地说：

“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到基层去？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想离开到其它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以提出来，谈谈你的意见。”

高智一听，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感情上来说不想离开毛泽东，但一想到像叶子龙、李银桥这些毛泽东的贴身老卫士都要走了，自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也近10年了，还是一起调离吧。于是就说道：

“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

刚一开口，他的眼圈就湿润了，只好低着头继续说：

“可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基层去工作，经受锻炼。”

毛泽东声音低沉地说：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

高智心中明白，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复杂的事情，留下来也有留下来的难处。他想了想，下了决心说：

“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缓缓地说：

“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你打算去哪里？”

高智说：

“到西安。我是陕西佳县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毛泽东说：

“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回到陕西，要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增长实际工作能力。”

高智说：

“那当然好了。不过，到了陕西，不知人家怎么安排，得听当地组织的安排，不能由我自己。”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变得沉默起来。良久，他吸了一口烟，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说：

“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等你爱人生了孩子再说。”

高智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心细，这样关心自己，心里一热，泪水淌了出来，把头垂得很低。毛泽东轻轻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用伤感的语调说：

“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高智看时针已经指向3时40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太好了！”

高智扶着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随着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给他们照了一张像。正好服务科的同事把高智的孩子送来了，毛泽东问高智：

“你女儿几岁了？”

高智回答说5岁了。

“叫什么名字？”

“小妹。”

“为什么叫小妹？”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小妹。”

毛泽东望着孩子笑笑，说：

“你抱着孩子，我们再照一张。”

4月21日晚饭前，毛泽东的卫士张景芳通知李银桥说，主席在游泳池等你们一家。李银桥、韩桂馨和孩子们简单地吃了一点饭，匆匆赶到游泳池。李银桥叫两个孩子在外边等，他和韩桂馨进了会客厅。毛泽东一见他们进来，便立起身同他们握手，问：

“孩子们呢？孩子怎么没来？”

李银桥说：

“孩子们来了，在外面呢。”

毛泽东朝门外张望，说：

“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

李银桥接来孩子，毛泽东鼓掌欢迎，还同孩子们握手，夸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长得漂亮。他还对李银桥说：

“我们站着合影吧？”

李银桥搬来一张椅子，按毛泽东坐下，说：

“主席，您坐下。”

“不坐，不坐。”

毛泽东说着要站起来，李银桥又把他按下。说：

“您坐下好。”

他和韩桂馨站在毛泽东身后，合了一张影，然后一家人环绕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

此前，李银桥曾经请毛泽东为他写一幅字，毛泽东已经写好了，装在一个牛皮袋子里。毛泽东说：

“近来没做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

李银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的《七律·长征》。摄影师吕厚民趁机给毛泽东和李银桥一家照了一张合影像。相片中李银桥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赠给他的那个袋子。

正是：老少深情如父子，师友厚谊相濡沫。人生别离最是难，执手相看泪水多。

自古良莠迷人眼，又见弄臣使拳脚。诸子倘能长留守，身后未必会寂寞。

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对困难要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估计不够就有危险。1、现在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2、**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3、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4月24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曾将他的《词六首》送给臧克家征求意见，臧克家遵嘱在其中作了一些改动。因此，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克家同志：

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5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

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毛泽东 1962年4月24日

4月27日，毛泽东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6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

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毛泽东 1962年4月27日

4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对此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凡是决心大、方法对的地方，进度就快，收效也大。经过甄别平反以后，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内团结大大加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工作和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头，因此，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和干部，也应该采取上述办法平反。

上述办法，曾在军队中和有些地方采用过，它们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最简便最见效的办法。

**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便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了。

以上通知，请你们研究执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中央。

4月29日，汪东兴电话通知在北京参加商业方面会议的吴吉清说，下午2点到中南海，毛泽东要接见他。

这天下午，吴吉清准时来到了中南海，随着汪东兴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面带微笑，握着吴吉清的手说：

“1935年到1962年，27年过去了，小吴变成了老汉。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毛泽东又说：

“你爱人是叫陈罗英吧？我记得她是湖南茶陵人，红6军团的。”

他还问吴吉清在北京开会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吴吉清说，主要是商业上的成本核算，上缴利润和市场安排。毛泽东说：

“**成本是要核算的。你搞商业这么多年了，应该学会做社会主义的买卖嘛。**”

毛泽东鼓励吴吉清要继续革命，要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多做贡献。

4月30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上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对军队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指示，他说：

“关于学习问题，主席说：你们这些人，萧华，杨成武，总部的其他同志，还有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要搞个学习计划，譬如说三五年内，计划读哪些马列主义著作。你和陈伯达同志商量一下，搞个10本、20本的书单子，我帮你定10来本。回到北京后，我和伯达同志商量开了个书单子送给主席，并附了一封信，信上说，除了要反复温习主席的著作外，也要认真地读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昨天下午主席把我找去**，主要是批准这个书单子。主席说，搞10本就可以了，从这个单子上自己去选。主席还说，这个单子缺少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方面的东西。我说，是否还要再开一个单子？主席说，那就不必了，你们自己选好了。

关于学习的方法，主席谈了3点：一个是读；一个是谈，多找干部、群众谈话，搞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多与人谋；一个是想，不要光埋头于事务，要想点问题，包括想后的讲和写。主席说，我的讲话也是在开会中自己边听、边想、边写的提纲。主席还讲，讲和写不能要秘书代替，要自己动手，自己写提纲，这就逼着自己想问题，不然就不想问题了。

我想这是主席逼着我们想问题，我们的同志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要走群众路线，要多谋善断，要打开脑筋。“打开脑筋”这句话，是主席在延安党校讲过的。说“打开脑筋”，并不是要打破脑筋，而是要想问题，考虑问题，不要做不用头脑的思想懒汉。”

1962年5月1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

这个报告草稿第一部分是周恩来在4月25日送来的，他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写道：“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

毛泽东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上批示道：

“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5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5月2日，《人民文学》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经毛泽东同意，在第5期上发表了毛泽东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6首词。郭沫若应编辑部之邀，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对毛泽东的词作了诠释。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加以删正”。

**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小样后，觉得郭沫若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解释不妥，便全部删去了这一部分文字，在小样中以郭沫若的口吻另写了一段五六百字的解释文字，**其中写道：

“**该词是在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后追写的**。南方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当时实际的感受。**”

同时，毛泽东还将郭沫若文中感谢中央档案馆同志的一句话改为“其中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

可惜郭文没有按照毛泽东改过的文字改排付印，至今也没有人弄清楚是何原因。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他这一次的行程是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一直到7月6日才返回北京。

而此时的田家英在湖南调查中碰到一个新问题，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也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战胜经济困难。**

5月初，田家英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反应非常冷淡，他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碰了钉子，只好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湖南去继续搞调查。

5月间的一天，毛泽东与叶子龙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

“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你跟了我20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

他还说：

“我快70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

毛泽东又说：

“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

谈话结束后，他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叶子龙在跟随毛泽东的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毛泽东还破例送叶子龙到门外。

此后，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再也没有去过中南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追查“窃听事件”之时，叶子龙曾因向杨尚昆、周恩来等人“倡议”而受到牵连。

5月7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

5月11日，**周恩来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上面报告中的分析，即从全国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3个五年计划就是个调整期。**

刘少奇在邓小平讲话之后，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发表了总结性讲话，重申了“西楼会议”及其以后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他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住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5月24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经过修改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及他为中央批发这个报告主持起草的指示。

周恩来是在5月19日将这两个文件请李富春阅后，又附上一封信，立即送毛泽东审批的。他在信中写道：“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

毛泽东在这两个文件上批示道：

“退总理，照办。”

欲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期间还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央上层到底有多大影响，从上面这一章已经可以看出问题了。**“‘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刘少奇这句话，是否可以说代表了他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主旨呢？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田家英在湖南调研中提出了一个“包产到户”的问题。不久，这个“包产到户”的主张，竟然在中央上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其结果如何呢？请继续往下看。

**第22章**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

**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话说1962年5月26日，新疆伊犁地区一伙暴徒在苏联领事馆人员策动下，发起暴乱。他们手持武器攻打中共伊犁自治州委、州人委机关，打伤州委副书记、州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抢去一批档案、文件，造成恶性事件。

事件发生后，当地党政军民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动员起来，镇压了这一起反革命武装叛乱。

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一再向苏联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允许被胁迫出境的中国边民返回中国境内，遭到了苏方的无理拒绝。

后来，苏联在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继续恶化之时，声称将集结大兵于边境，随时都有出兵阿尔巴尼亚的可能。毛泽东在卧室里刚起床，得知这一消息，好长时间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顷，他让身边卫士叫来秘书，严肃地说：

“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

工作人员劝他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里去等候苏联大使。毛泽东说：

“不用了，就在这儿见。”

后来秘书偷偷地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他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

自此以后，苏联就再也不敢提出兵阿尔巴尼亚的事了。

1962年6月3日晨，毛泽东给儿媳邵华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岸青和邵华是在这年初春从大连回到了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父亲毛泽东。有一天，邵华向毛泽东提出想继续读书的要求，毛泽东认真地说：

“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毛泽东又笑着对小两口说：

“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此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谋部，毛泽东让他向罗瑞卿请假，带着邵华回湖南探亲。

遵照父亲的嘱托，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了湖南。他们先到板仓，给妈妈扫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回到长沙，看望年已92岁高龄的外婆向振熙和舅舅杨开智、舅妈李崇德，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回到北京后，邵华便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

邵华在北大学习了几个月，感觉学业压力大，心里着急，因之情绪比较低落，就病倒了。她忍不住将自己的病情和烦恼告诉在杭州的父亲。毛泽东为劝慰她，就在回信中写道：

你好！

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 6月3日上午7时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上邪》是西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一，其词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杨成武、许世友等人。杨成武、许世友向毛泽东汇报了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及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毛泽东说：

“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敌人最多来15万人，再多也不可能。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出去。**”

6月10日，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下榻在省委蓉园1号楼。省委安排由胡真负责接待毛泽东的工作。

这天晚上，胡真到1号楼检查对毛泽东生活安排的情况，毛泽东正在乒乓球室打乒乓球，胡真便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查看。胡真一进卧室，看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放着书，在床铺的里侧，也放着一排线装书，枕头叠得高高的。

毛泽东喜欢躺着看书，书放在床铺里侧的床边上，他需要什么书就能信手捡来。叠高的枕头，可作为看书的靠垫，看书看疲劳了，就可以顺势躺下睡觉。

胡真查看了一遍，从卧室里走出来，毛泽东正好从西头走过来。胡真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多次见到过毛泽东，甚至和毛泽东照过两次像，但那都是集体活动，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单独和毛泽东相处过，心里难免有点紧张。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说话了，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真。”

“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这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

毛泽东主动伸出手和胡真紧紧握手，说：

“接待工作不好做，我这次来麻烦你们了。”

胡真说：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是应该做的。”

“怎么不麻烦，这么晚了，你还要来检查工作，看看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切安排得都很好嘛！我要感谢你呢！”

毛泽东这么一说，胡真又紧张起来了，他说：

“毛主席来湖南，这是毛主席对湖南的关心，我们要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又一次握了握胡真的手，然后挥挥手，带着微笑向他的卧室走去。

6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妄图在大陆上建立一块反革命根据地，作为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立足点。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这次军事冒险，对我进行试探。**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如果蒋匪帮敢于来犯，就坚决、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它。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敌人也可能不敢来。不管敌人来与不来，我们都要认真地充分地作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轻率大意和侥幸心理。

二、蒋匪帮这次冒险进犯，可能增加我们某些困难。但是，敌人送上门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歼灭它的好机会。**打胜了这一仗，不但可以鼓舞军心民气，为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还可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气焰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阴谋，有力地支援东南亚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过了长期的和平生活，从全国解放以来已经将近13年，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来已经9年，麻痹松懈的情绪有所增长。年轻的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这次战争，对扫除干部和群众中的麻痹松懈情绪，教育青年一代，考验我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加强全国的团结，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多难兴邦”，这是经验之谈，是很有道理的。**

三、**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冒险进犯，是为了保卫我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是伟大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我们应该打胜这一仗，而且完全有把握打胜这一仗。**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蒋匪帮有刻骨的仇恨，决不允许已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3座大山重新压在自己头上。我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在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就全局来说又是占绝对优势。**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蒋介石是我手下败将，老“运输队长”，兵力有限，士气低落。我们有巩固的后方，强固的国防设施，以逸待劳；敌人是远离巢穴，渡海作战，困难重重。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蒋匪帮的进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在这样长的时期中，是过的和平生活，由于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经济生活中还有暂时的严重困难，打起来以后，还可能增加某些紧张情况，**蒋匪帮的突然袭击，特别在作战地区，敌人可能进行轰炸和空降的地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和困难，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蒋匪帮的进犯，一定要认真对待，弱敌要当强敌打，不要轻敌麻痹。**

四、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已经指定的部队，应当迅速开赴前线。其余部队也应当积极作好参战准备，随时听候调动。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斗意志，发扬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战斗作风，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保证坚决而迅速地完成歼灭敌人的战斗任务。

五、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宣传教育。各级党委应当立即根据本指示的精神在党内进行传达和解释。**中央即将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蒋匪帮进犯我沿海地区的阴谋。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后，各地应当立即在群众中讲清这次作战的意义、目的和有利条件，彻底揭露卖国贼蒋介石的罪恶历史和这次进犯的阴谋，激发群众对蒋匪帮的新仇旧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备观念，坚定必胜信心，克服麻痹松懈情绪。**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邀集民主人士座谈，讲清形势，鼓舞信心。**要教育群众识破和制止敌人的谣言，防止少数坏分子煽动闹事，并且注意保守军事秘密。要通过这次战备宣传教育，鼓励群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认真贯彻精简工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更好地完成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这次粉碎蒋匪进犯的斗争，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本年度的新兵征集工作，大力加强军工生产，满足前线需要。

六、东南沿海准备作战的地区要立即做好战备动员工作，大力支援军队作战。这些地区，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战备和支前工作，保证军队作战需要的粮食和柴火的供应；动员医院、交通、邮电等部门为前线服务；组织短途运输，组织担架队，做好战地救护；组织沿海民兵准备支援和配合军队作战，帮助军队送情报，搜捕空投特务，消灭空降匪军，保护工矿企业、仓库、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进行防空教育，组织群众防空。**在岛屿和前沿地区，要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控制。对于制造谣言、煽惑人心、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1962年6月10日

6月1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新华社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电讯稿，他在上面加写了一段话：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

尔后，毛泽东要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将电讯稿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6月18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湖南去武汉，他在长沙召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谈话中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10亿斤。

6月18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内部印发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电讯稿的内容，“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6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对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处理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在今后5年以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采取的方针，也是适当的。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发给你们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检查一次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必要的。各有关党委和政府，应当在最近期间经过检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干部。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不看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就势必要犯错误。**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民族工作中所以发生问题，就是因为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有关的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方针政策，并且要经常认真地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务使同志们切实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得在党的方针政策以外另出点子，另兴章程。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忽视了的要恢复，经常工作也要恢复起来。凡属方针、政策、重大问题和重要计划，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减，干部太弱的，要适当加强。**

**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对于汉族人民信仰的宗教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参照这个精神加以处理。

在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应当仿照此次中央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的办法召开会议，并且切实解决问题，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中央的批示连同乌兰夫、李维汉等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发至自治县委和有少数民族杂居的县委。《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意见》发至自治州党委和有关的地委。

中央 1962年6月20日

6月22日，毛泽东改变原打算23日离开武汉去青岛的主意，他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7天至10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汉谈话。请你安排。”

也就是在6月22日这一天，彭德怀把他用了数月写成的8万余字的长信，呈送给毛泽东。他在信中回顾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叙述了建国后和外国人交往的情况，要求中央查清“里通外国”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不能因为捏造了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做这个申诉！”

“若是为了我彭德怀自己，写不写，申不申冤，都没有多大意思。我在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说。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么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大了，离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可以派人调查吗？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前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

6月24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

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

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了回顾。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6月23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6月27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23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7月3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3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再说6月3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他在北返途中，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河南的麦收还不错，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中，了解到山东的“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错，麦收42亿斤，比原来估计的29亿斤多了13亿斤。

**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在湖南的调查，回到北京。他立即将调查情况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作汇报。他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确是个好办法。**田家英的汇报刚开了一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

**“现在情况已经明了啦。可以按照农民的要求，实行分田到户。”**

刘少奇分析了国内的严峻形势，他说：

“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道：这个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此后，这个曾经投靠过彭德怀如今又投靠了刘少奇的**田家英，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个旨在分田单干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十大政策》允许维持农户的个体经济，允许农户之间可以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允许雇工，允许借贷，允许自由贸易**。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有人说：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据陶铸、柯庆施讲，主席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彭真闻听此言，立即表态说：

“讲困难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

邓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说：

“我倾向这样。”

在大家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说：

**“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5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取了刘子厚的汇报后，他说：

“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预料。”

7月6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他突然问道：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又问道：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见毛泽东如此严肃，知道事关重大，就不敢提他曾经向刘少奇汇报一事，自然也不敢说是刘少奇的意见了，**他说：

“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天，陈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据《陈云年谱》记载**：1962年4月，陈云到上海疗养。6月间，他收到了田家英到湖南韶山等地农村调查后所写的材料，这个材料反映了关于“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要求”。陈云看了这份材料后，称赞其“观点鲜明”，十分赞成这份材料中的观点，结合自己所调查了解的情况，经过反复思考，于**1962年6月下旬，**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回复说，他们与陈云的意见完全一致。**陈云心里有了这个底，便于7月6日致信刚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他在信中说：

“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此前，毛泽东曾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并且对此很反感。陈云也知道毛泽东有这个意见。但他仍然顶着冒犯毛泽东的压力，要找毛泽东当面谈清自己的意见。有人劝陈云不必急于去向毛泽东提自己的建议。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的领导职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他坚持要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见了陈云的信后，同意与陈云谈一次。

7月6日下午，毛泽东约见了陈云。陈云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用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他还说：**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存在。**

**陈云申述了他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另一个理由，他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4年，否则需要8年。**

据邓力群回忆：听了陈云的建议后，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了对陈云的不满，并严厉地批评了陈云。当时，**毛泽东批评陈云所说的话是很重的，这对陈云的打击很大。**几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邓子恢、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搞修正主义。**

此后，陈云于7月28日又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提出：由于自己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请求不参加北戴河会议。7月3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

7月6日这一天，江青看了吴晗撰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说：

“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决禁演这出戏。”

原来，《海瑞罢官》是吴晗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之邀撰写的一出新编历史剧。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有一句唱词是：“将我罢官理不平”。1961年1月，《海瑞罢官》剧本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时由北京京剧团公演。

此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有的文章说海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失败了再干，要“有朝一日重整纪纲”等等。

**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和报刊上的文章，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的。**

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读《海瑞罢官》的剧本，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田家英看了剧本后，对毛泽东说：**

**“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如果硬要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对之进行批判，以后就没有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了。”**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

“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止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他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找河南、山东、江西的负责人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还表明了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最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就这样，由刘少奇、邓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旨在分田单干的那个《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不用提交政治局讨论就流产了。**

7月9日、1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7月10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说：

“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此时，毛泽东点名要胡耀邦到湖南带职锻炼，“做点实际工作”。不久，胡耀邦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胡耀邦离京前，毛泽东嘱咐他，要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跑跑，搞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上来。胡耀邦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7月17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早在5月间，邓子恢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调查后，给邓子恢来信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那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邓子恢便在5月24日向刘少奇提交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刘少奇说可以试行。随后，邓子恢在6月间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4场报告，指出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

7月17日这一天，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在5月24日向刘少奇提交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寄给他的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在邓子恢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几次提出问题，他都不作回答，只管讲他自己的意见。邓子恢终于讲完了，毛泽东这才说上了一句：**

**“把你的意见和符离集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这次谈话使毛泽东非常不愉快，以至于耿耿于怀，在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此事。**

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

“最近，有的地方报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公开讨论了‘包工到户’、‘包工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并且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今后，关于这些问题，一般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关于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加强生产责任制的一些作法，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但是不要涉及人民公社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改变问题，更不要在报纸上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因为敌人会用这些材料来反对人民公社的。**”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杨尚昆谈话。据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杨尚昆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重述了他昨天向杨尚昆谈到的那两个问题。

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在23日、24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泽东同准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8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4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还批示道：

“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7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他决定将这一草案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后来一直开到8月24日，整整1个月。

邓子恢到北戴河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之前拜会了毛泽东，再一次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好处。他说，包产到户不牵涉到所有制问题，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管理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毛泽东严肃地说：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波兰闹自由化，还不敢公开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毛泽东不高兴地说：

“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北戴河95号楼会议室，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说：

“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出现的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

**“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

他转向三北地区的负责人问道：

“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当**毛泽东在反对分田单干问题上处于少数派地位之际，当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的时候，他要先与地方上的负责人分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先“吹吹风”。**这是毛泽东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据保留下来的不完全的谈话记录记载：

1962年8月2日，毛泽东在钱让能写给他的“保荐书”上写了一个批示，印发与会者。

原来早在5月底，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长达1.8万字。他认为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办法不能改，所以就在报告中极力向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办法。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其他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说：

“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100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8月3日，毛泽东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也在座。毛泽东说：

“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在讲到分田到户问题时，他说：

“**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请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了3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我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极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

“形势问题。也要谈一谈。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情况如何，以后再说。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谈了3年，1959年——1962年，4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现在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20%？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

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的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毛泽东还谈到了积累与消费、集中与分散、民主与集中以及敌我之间的矛盾。

欲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有哪些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事实的确如此。从这一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7常委除毛泽东外，反对单干的只有林彪。周恩来模棱两可，而刘、朱、陈、邓则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绝对多数。新中国建设短短12年，这座社会主义大厦尚未最后竣工，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当此之时，这些人便以困难和挫折为借口，要扯下旗子。一个从党的核心到中央及地方大员（邓子恢、曾希圣等）、到吹鼓手（田家英等）、再到基层政权中的区委书记（武念慈等）为代表的**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革命的“初心”原本是改朝换代而非马列主义）已经显现出来。他们的政治纲领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社会基础是**深受“传统的观念”束缚着的广大农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以安徽、湖南部分农民为代表）。由此看来，再次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后来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决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政治斗争！

**第23章**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

**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

**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话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也叫作中心小组，其成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从8月9日开始到8月20日的12天内，中心小组开了8次会，会后由中央局第一书记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不垮得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

有人插话说，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毛泽东说：

“**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某某揭露邓子恢问题。毛泽东说：

“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5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957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苏联从1921年到1928年单干了近10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1935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插话说：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毛泽东说：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3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16户，我们一个生产队20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党员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28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10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1953、1954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53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1958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2000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3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1957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6月刮起12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1958年算半年，1959年、1960年大跃进。1960年开始搞《十二条》，1961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2000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13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邓小平发言说：

“**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止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发言说：

“**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1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5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5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毛泽东插话说：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8亿斤，全国都增产。”

刘少奇接着说：

“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5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毛泽东插话说：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刘少奇接着说：

“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毛泽东插话说：

“恐怕还是1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20%到30%，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5年到8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5年、8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么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2000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说到在经济上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插话说：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接着说：

**“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它想法。”**

毛泽东插话说：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60%搞集体半集体，40%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8月12日，毛泽东找来1961年庐山会议印发的中央农村工作部8月24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在会议上重新印发，他在一大段批语中批评了邓子恢，而且还算了邓子恢在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的老账以及在1955年砍20万个合作社的旧账。

8月13日，罗瑞卿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到了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毛泽东插话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罗瑞卿谈到安徽太湖县钱让能在写给毛泽东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插话说：

“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10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说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插话说：

**“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8亿到10亿斤。**”

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说是看到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毛泽东插话说：

“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30万人只留下2万8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说，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4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说：

“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做调查，只调查了1个公社的1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1个队，连1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6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8月15日，李富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他还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10年。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1964年扫尾。”

**后来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果然实现了全面好转，实际情况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谭震林在这次会上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则发言说：**过去的13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出现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

8月17日，李先念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讲到了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接着说：

“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540万吨，今年进口470万吨，减少了70万吨。逐年减少。**”

毛泽东插话说：

“减少了70万吨，就是14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2000万，减到2000万，进口还可以再减。”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进口粮食减少70万吨，明年能减多少？”

周恩来比较谨慎，他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70万吨，再看一看。李先念接着说：

**“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4倍。”**

毛泽东说：

“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李先念检讨说：**

**“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

**毛泽东说：**

**“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8月20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说：

“**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指邓子恢——笔者注），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做结论。”“**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7世纪40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还说：

“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陈毅作了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

尔后，历时1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以较大的精力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他的讲话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作了准备。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

8月26日，中共中央开始举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会议后期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6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

预备会议一直开到9月23日才结束。

**1962年9月9日8时32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指挥导弹部队某部岳振华等，一举击落台湾国民党美制U-2高空侦察机，**飞机残骸坠落于距南昌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中校飞行员陈怀生跳伞被俘，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

周恩来给刘亚楼打去电话祝贺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下来了。”**

9月15日，首都北京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庆祝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一时间，此事成为世界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的人认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评价”。有些国家的驻京记者活动频繁，总想弄清楚中国究竟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国U-2飞机的。

9月中旬的一天（应是16日，周日），毛泽东再次派秘书把他的堂弟毛泽荣从宾馆里接到了菊香书屋。

原来，毛泽荣早在1962年8月中旬就到了北京，这是他第4次进京了。（据毛泽荣的养子毛会华说，毛泽荣第4次进京是在1964年春，由他陪他，而且他回忆的进京后的情形与下面的记载也大不一样。他还说，毛泽荣还有5次进京，6次进京，读者若有兴趣，可在网上查阅——笔者注）。毛泽荣自从上次从北京回到家乡后，常常请人代笔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的一些情况，有时也难免被人利用，甚至为“右派”说情。**1957年，曾因“替右派翻案”，他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宴请了许多父老乡亲，唯独没有通知他。当毛泽荣闻讯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求见“主席三哥”时，毛泽东已经离开韶山经宁乡到长沙去了，**毛泽荣唯有叹息不已。毛泽荣这次到北京后，一住就是十几天，还未见到毛泽东。他多方打听并催促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见毛泽东。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他急匆匆地走进会客厅，对着坐在那里等他的毛泽东喊了一声：“主席。”这次他不再喊三哥了。毛泽东起身与他握手，寒暄了几句，便坐下来叙话。毛泽荣说：

“主席，我这次来，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毛泽东说：

“我现在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你还是到宾馆住一段时间，等我稍微得闲，请你来吃餐便饭，我们再好好谈谈吧。”

兄弟俩这次见面仅仅只有5分钟。毛泽荣回到宾馆，一直等着中南海的通知，待他第二次被接到菊香书屋的这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毛泽东家中十分热闹。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小夫妻俩回来了。小女儿李讷从学校里回来了，在医院养病的江青也回到了家中。毛泽东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向毛泽荣作了介绍，并让孩子们向毛泽荣叫五叔。

江青兴致很高，亲自做了饭菜，而且是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做成了湖南风味。毛泽荣满以为三哥请他吃饭，可以开开洋荤。哪知道桌上摆的全是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有炒豆腐、辣椒、茄子、空心菜等等，他心中有些不快。他不知道毛泽东因为全国人民在过苦日子，正在带头不吃肉哩。

吃饭时，毛泽东不停地招呼毛泽荣吃菜，毛泽荣却吃不下。毛泽东吃得挺香，一边吃饭，一边和他拉家常。

“泽荣，你年纪大了，到外边走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况，你不要来京。”

毛泽东认真地说着。毛泽荣却说：

“主席，我本来也不想来打扰您，只是我家有困难，家底子穷，老伴有病，我的眼睛不大好，身边又无儿无女，只有两个孙子年龄还小。所以，我才来北京找您。”

毛泽东放下饭碗，温和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党的主席，我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讲过，你有困难，还是要找当地政府解决。”

毛泽荣听着毛泽东的话，默不作声。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今后还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现在大家都同甘共苦，全党上下全国人民一样，你也不能例外。”

毛泽东说到此处，加强了语气：

“当地人民过得去，你也过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来北京，要经过我的批准。”

饭后，毛泽东一家和毛泽荣合影留念。毛泽东身着呢子大衣与毛泽荣并肩站着，左右两边分别站着李敏、李讷和孔令华。江青亲自为他们照相。而后，江青把照相机交给摄影师，身着呢子大衣，头戴头巾，也站在毛泽东身边，和大家一起合了影。

毛泽荣临走时，毛泽东交代他说：

“你在北京住几天就回去，好好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改善生活。这几天，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叫我的秘书陪你到长城和京城的风景名胜走一走，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家去。”

毛泽荣此次在京，重游了京华名胜。宾馆服务周到，乡下生活哪有这般舒服，因此他流连忘返。毛泽东得知此情，便叫秘书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送给毛泽荣，要他回家。

毛泽东又给杨林公社写了一封信，让毛泽荣顺便带回。他在这封信中嘱咐当地政府说，今后毛泽荣来京，要经他的许可。

毛泽东给堂弟买的这件羊皮大衣，外面是用蓝色卡其做成的，里面铺有纯羊毛，制作精细考究。毛泽荣回到家乡后，每次穿上这件大衣，都会不无荣耀地说：

“这是我三哥送给我的。”

毛泽荣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接到信后，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从他稿费中拿出200元，寄给毛泽荣。秘书室同时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写给毛主席的信，已经主席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你家庭生活补助。此款另交邮局汇去，请查收。主席说，毛泽连夫妇不要来北京。请你转告他们。此复。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2年9月25日

再说9月18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

原来在8月下旬，由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宫川实率领的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到了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最后到北京能见一见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中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谈了一些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经验要点。宫川实团长恳切地要求毛泽东给日本工人题词，以鼓舞他们的斗争和学习，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他还以商量的口吻问：

“那就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日本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好不好？”

宫川实说：

“这一句话是我们来中国20多天感受最深的一点，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

9月19日，日本工人代表团果然收到了毛泽东的题词，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这幅毛体书法作品带标点符号长达近百字，分写在8张宣纸上，前5页属正文，落款占3页。整幅作品文笔雄强豁达，以劲直之笔为主，略带圆转之笔，纵势结体挺拔傲岸。

第二天，即在1962年9月20日，首都各大报都在一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日本工人朋友的新闻和照片，但对题词却没有作任何报道。在时隔6年之后的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题词，刊载了题词的手迹，并发表了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全面阐述了毛泽东题词的伟大意义。《红旗》杂志在10月14日的第4期上同样以超乎寻常的姿态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和手迹。

9月20日下午，岳振华随刘亚楼等人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击落台湾美制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听取汇报中多次鼓掌。岳振华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连声说：

“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9月22日，阎长贵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撰写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这是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一年多来的第一篇习作。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让工作人员印发给八届十中全会筹备会议人员，他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果如何？请继续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20日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事实上，从“七千人大会”前后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党内斗争并非如此轻松。正如本传前面所述，毛泽东硬是凭借着他那无可动摇的权威，在回京后果断地采取了措施，这才扭转了局势：先是在7月8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表明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迫使刘少奇、邓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政治纲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胎死腹中。**继之，他在7月18日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夺回了党的舆论阵地；7月25日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从8月9日开始，**通过中心小组会议争取到了中央和地方大员中的多数人支持**，终于迫使刘少奇等人改了口，开始了暂时的全面退却。

**第24章**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

**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话说1962年9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经过长时间的预备，在北京怀仁堂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现在是10点钟，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陈云同志说明。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的，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1个月，在北京差不多也是1个月。实际问题，在那两个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约3天到5天就够了。27号不够就开到28号，至迟28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3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关于阶级。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3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藏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关于形势。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1959年、1960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搞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1958年10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12月武昌会议，1959年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4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1960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国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后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鲁晓夫来，10月在我国国庆10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然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我们，然后两党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的，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怕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了‘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内外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苏联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老挝武装斗争的胜利，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出现了阿联、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他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1千万人口，法国80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两个多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正，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许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容许我犯错误，容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有个潘汉年，没有杀他。有个王实味，后来杀了。这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把他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中央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但也要看到还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不可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专案调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破坏案，杀人放火的人。在敌我矛盾中，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现在虽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工程建筑。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

毛泽东当场宣读了康生递上来的一个纸条：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所说的“写小说盛行”和康生递上来的这一张纸条，扯出了党内一段围绕着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断断续续地纠缠了20多年的公案。笔者为了说清楚这一公案的历史根源，曾特意在本传第四卷中详细地交代了西北红军中谢子长、阎红彦与刘志丹、高岗这两个派系之间的恩恩怨怨。为了说明上述公案的来龙去脉、是是非非，如今又不得不在此和本章末多费一点笔墨了。

原来早在1956年，署名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应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5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可此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使刘景范产生了错觉。他感觉到毛泽东对高岗的老对头刘少奇产生了不满，**便出面游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他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便批准了小说《刘志丹》公开发表。随后，《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连载。**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8月26日，毛泽东为此召见了康生。**后来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毛泽东那次召见他的情形，他说：“**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账的，是算账派。**”康生说的这些情况，阎红彦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还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李建彤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修改。**这便是对小说《刘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人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且说毛泽东念完康生递上来的纸条后，接着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请少奇同志宣布有哪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5人不参加。”

刘少奇点点头，宣布道：

“常委决定5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接下来，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了说明。

陈伯达谈到在大办人民公社时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产生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

“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

“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说：

“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说：

“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陈伯达谈到了1958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毛泽东插话说：

“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1959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1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196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1961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插话说：

“1961年比较196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2000亿公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正规。”

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毛泽东插话说：

“我刚才讲的两年到3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43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43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毛泽东插话说：

“**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9月25日，李先念在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了说明。此后，董必武作了发言，毛泽东在插话中重提7月17日邓子恢向他陈述“包产到户”意见时的情形，他说：

“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1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1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继董必武发言之后，薄一波、朱德相继发了言。

9月2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全会上讲了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

毛泽东插话说：

“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

刘少奇说：

**“《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

毛泽东又插话说：

**“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

刘少奇接着说：

**“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

毛泽东补充说：

“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9月27日是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等10个文件。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说：

“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7 月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充分地、完整地说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这条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

“全党同志们，全国农民们，你们了解，我们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人民服务，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广大农民是积极拥护集体化的，因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干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援助。这就是事实的回答。”**

“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工业调整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其他经济方面的各项正确政策，加强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团结，加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力量，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的巩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困难，而且不应该忽视困难，但是，只要大家好好工作，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前进道路上较快地战胜困难。在事实上，我们的事业，从来就是在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的。很明白，现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的这个决定，不但完全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农民长远的利益。**让我们全党同志，全体农民，全体工人，全体知识分子，全体爱国分子，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圆满地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而奋斗。”**

彭德怀因为6月22日的申诉信，被认为是要翻案，被全会取消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

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把它写进了全会的公报中。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持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又被高度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说来也巧，蒋介石好像很配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也就是在1962年10月至12月，蒋介石集团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行动。

中共中央立即做了必要准备，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大陆上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求东南沿海军民做好一切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掉。

后来一直到1965年春，蒋介石集团先后组织了5次对大陆的进犯，这无疑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全国人民与蒋介石集团长期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很大的影响和震动，阶级斗争的气氛骤然增加了。

再说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的某一天，江青以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宣部文艺处长的身份约见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等。

原来早在4月间，江青在养病期间遵照医生的意见，参加了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结果，她发现文艺界充斥着封、资、修的东西，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新社会主人的工农兵，则很少有他们的形象地位。同时，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的那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也引起了她的关注。作为毛泽东在文艺战线上的“流动哨兵”，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界的乱象，尔后，便奉命与陆定一等人谈话，她说：

“深刻理解了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后，我认为目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很严重。”

江青提出：要批鬼戏，要批判在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李慧娘》。她还问文化部的领导人：

“还有一个吹捧《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加以批判？”

江青又问：

“你知道《有鬼无害论》作者繁星是谁吗？”

4位正副部长竟然都说不清楚，江青便说：

“繁星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

江青知道这4个正副部长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接着又试探道：

“你们认为《海瑞罢官》怎么样？我认为很有问题，应当好好批判。”

陆定一反驳说：

“对海瑞进行研究，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几篇评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业写京剧剧本《海瑞罢官》，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现在说批就批，这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此事不要草率从事为好。”

1962年10月2日，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他说：

“我今天来，就是想汇报一下有关印度的情况。我的访问看来没有解决问题。”

原来，早在1960年4月至1961年8月之间，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的行动竟然多达17次，他们不断地侵占中国领土。1961年9月，印军又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10月12日，印度政府命令印军要“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于是，印军再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62年9月17日，周恩来得到报告说：60名印度士兵从3面向克节朗河2号桥头的中国哨兵逼近，中国哨兵喊话要他们停止前进。印度军官却命令他们的士兵举着步枪和机枪对准中国士兵，大吼大叫要把中国士兵轰走。因而双方发生了冲突，两名中国哨兵被当场打死。周恩来继续向毛泽东汇报说：

“现在，印度国内的舆论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防部长梅农，他叫嚷要和我们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中，尼赫鲁也越来越强硬。我几次给尼赫鲁去信，希望举行高级会议，解决边界争端，他都坚决拒绝。他强调，会谈的前提是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有争议的地区……”

毛泽东面带愠色“喔”了一声，望着菊香书屋外边，皱着眉头，抽了一口烟，说道：

“这不行！我们都撤出来，让给他，将来还谈些什么？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生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东领土就成了950万、930万，我无法向6亿人民交代。”

他吸了一口烟，又问道：

“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

毛泽东是想听听国际上的动向。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

“英国、美国支持他们不用说了，据可靠情报，苏联也私下支持他们，从我国撤走的苏联专家，有一大部分已转往印度。苏联援助印度建立起来的比莱钢铁厂，如今已经开工生产，钢铁产量翻了一番。据说苏联驻印度大使维列基正准备同印度签订新的经济协定，贸易额还将增长一倍。为了支持印度打一场边界战争，苏联还准备提供40架图-12运输机。”

毛泽东闻言，脸上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说：

“古有明训，生意不成礼仪在么！看来，赫鲁晓夫此公是不讲礼仪喽！”

周恩来拿出一张《真理报》，指着一篇文章给毛泽东看，他说：

“赫鲁晓夫竟然对我们大讲谈判的好处，简直与西方别有用心的观察家一个腔调。”

毛泽东问：

“肯尼迪怎么说？”

周恩来说：

“美国也在大肆吹捧印度扩张主义者。肯尼迪给尼赫鲁打气说：‘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与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经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恩，已经奉命改变了美国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含糊态度。他声称，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

周恩来又分析说：

“印度反华完全是为了获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毛泽东说：

“有道理，有道理啊！**蒋介石的军队就是这样，打一枪，看看主人的脸色。主人赏两块银元，就再打。不赏钱，就泄气喽！**”

他最后叮嘱周恩来说：

“**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印度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为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提高出过力，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他不谈判，不要紧，我们可以等。谈判的大门，不能从我们这边关上。**”

10月5日，周恩来接到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据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当日报道，印度正在加紧备战。在最近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3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印度军队“已决心要把中国人赶回去”。

10月17日凌晨，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军进行猛烈炮击。

10月17日，毛泽东立即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解决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章汉夫、乔冠华、雷英夫等人。

毛泽东要求乔冠华和雷英夫向与会者报告一下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应。于是，乔冠华就先报告了国际上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雷英夫接着汇报了中印边界前线情况和总参谋部制定的反击方案。周恩来说：

“从各个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我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与会者纷纷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一开始不主张打，他见大家如此坚决要打，便说：

“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

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30年的和平。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说罢，他转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问道：

“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很坚定地回答说：

“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

“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与会者都说，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毛泽东说：

“我们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

会议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西藏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委吕义山组成中印边界东段指挥部；由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委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留在拉萨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也成立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指挥的中印边界西段指挥部。

10月20日上午10时许，中国西藏、新疆南疆边防部队奉命立即反击，拉开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序幕。

中国边防军右翼主攻部队在克节朗地区发起反攻，经过一天激战，全部清除了入侵印军在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地的据点。与此同时，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边防军，向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发起反攻，不到一小时，就成功地拔掉了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据点。

10月22日，周恩来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取得巨大胜利的消息，从北京打电话报告在济南视察的毛泽东。他说：

“中印边界反击战开战两天，进展顺利，东西两线的部队都打得不错，印军越境的据点，已大部分被拔除，印军王牌第7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总参谋部的同志请示是否越境作战？”

毛泽东指示说：

**“暂时不越境作战，不但不越境，还要后退20公里。”**

10月24日，中国政府在边防军全线胜利的形势下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3项建议，呼吁双方各自后退20公里，脱离接触，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再进行两国总理会谈。

同时，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做出积极响应。

这一天，印度当局不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反而要求中印边界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的状态，也就是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

10月28日，印度领导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决心同中国长期作战。

10月29日，中国边防部队经过9天的作战，在西段清除了印军侵入中国境内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86%的据点；在东段驱逐了入侵克节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印军，并歼其一部。首战全线告捷。总参谋部遵照中国政府的声明，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对入侵印军的反击。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指挥中印边界反击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八届十中全会在9月27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说：“**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读者诸君看明白了吧，八届十中全会是干什么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上述《决定》等文件，将农业**集体化“是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写入党的决议之中，以此来巩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迫使那些走资派暂时退却的这一阶段性胜利的成果。

另：本章中说到的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来龙去脉，读者诸君已经有了了解。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身后却又出现了两次反复。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秘书李原记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为所谓的“冤假错案”平反时，委托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小说《刘志丹》。后来审读者向中组部报告称，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中组部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认定：《刘志丹》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并认定“冤案”的根源“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8月，中央以（1979）53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为受牵连的习仲勋等和小说作者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了反。这就是第一次反复。

此后，了解内情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中央关于阎红彦的结论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不久，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接着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卷本《刘志丹》。小说再次面世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篡改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原陕甘边（刘志丹）的一班人也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中央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澄清西北革命史。中央便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4月，中央又指定中顾委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和中组部的何载组成5人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5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共8人，**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交换意见，澄清历史，共同协商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澄清。6月初，5人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报告》中肯定：“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说“刘志丹是一位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26军和刘志丹的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报告》再次肯定“郭洪涛确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3年7月，中央以中委（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5人小组的报告及原陕甘边和原陕北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接下来，就是解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了。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刘志丹》这部小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就上述意见做出报告**。1月12日，胡耀邦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这就是第二次反复。

后来在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文章中说：**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1、2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3任总指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与他进行了斗争。阎红彦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3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这便是在毛泽东身后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全过程。谁是谁非，谁在胡说八道，谁在制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吗？**“迫害”说和“冤假错案”论可以休矣！**

**第25章**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

话说1962年11月3日，聂荣臻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菜地里除草，见聂荣臻来了，就放下锄头，招呼他坐下。聂荣臻将《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连手也没有擦就仔细地阅读起来。

这个报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10月30日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只见报告中写道：

“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至迟1965年爆炸第1颗原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要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必要的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

下面是邓小平在11月2日的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毛泽东看罢，连连称赞罗瑞卿的报告，他说：

“好，好！写得不错嘛。”

聂荣臻笑了笑，说：

“主席，等到原子弹爆响那一天，我们真要好好地庆贺一番了。”

毛泽东立即在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后来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贺龙、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及7位部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

11月4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做出积极的响应。

这一天，印度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兵。他们还向国外寻求军援。到11月中旬，印度在边境共部署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大量炮兵、装甲兵等部队，总兵力由22000人增加到30000人。

11月9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其工作职责并于国务院农村工作办公室，由谭震林兼任主任。**

11月14日，印度军队再次向中国边防军发起猛烈进攻。

11月中旬，杨老太太在长沙病逝。毛泽东立即给杨开智发去唁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1962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同时给陈玉英也寄去了500元。

11月16日，中国边防军奉命向印度军队实施反击，**歼灭印军王牌第7旅**。

11月17日，周恩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前线战况。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他说：

“好嘛，基本上是歼灭战！”

周恩来高兴地说：

“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说：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恩来说：

“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你看如何？”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周恩来说：

“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悠然笑道：

“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

就在此时，尼赫鲁急忙向苏、美两国求救。肯尼迪答应派美国航空母舰开往孟加拉湾；赫鲁晓夫也急急忙忙地向印度调运军事装备。于是，尼赫鲁又来了精神，叫嚷要不惜以一切代价打败中国。

周恩来立刻来到菊香书屋，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弹了弹烟灰，朗声笑道：

“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看样子要把整个喜马拉雅山推倒喽!”

在一个不眠之夜之后，周恩来满面倦容地又来向毛泽东报告新的敌情，他说：

“主席，印军的兵力增加到了2个师部、9个旅，武装挑衅也愈演愈烈。苏联的军事装备正往印度调运。”

毛泽东连声冷笑，说：

“老朋友的情面一点也不要喽，看来老是好言相劝是不行吧，人家听不进去嘛。”

周恩来说：

“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开到孟加拉湾，尼赫鲁刚伸出手，肯尼迪就满口答应了，要什么给什么，许多装备还是新的。”

毛泽东说：

“老大哥不是也给了嘛！”

周恩来说：

“我们不仅要对付赫鲁晓夫，还要防止肯尼迪在我们背后插上一刀。正是有了后台，尼赫鲁的腰杆子才硬起来了。”

毛泽东豁然起身，说：

**“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我们有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有！”**

周恩来说：

“印度已经争取到不明真相的39个国家的支持，一些西方国家还企图利用联合国制造对印度有利的舆论，甚至怂恿联合国像朝鲜战争那样出兵印度。”

毛泽东闻言，豪气顿生，朗声大笑起来，他说：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大不了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周恩来闻言吃了一惊，急忙劝道：

“主席，打胜这一仗是有把握的。问题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要打出国威、军威，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说：

“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

11月19日，中国边防军的反击势如破竹，不仅在东西两线粉碎了印度军队的进攻，而且打得印军全线溃逃。

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当即批示道：

**“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18日这种论调。”**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见周恩来、陈毅，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指示。

11月19日晚，周恩来和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约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周恩来说：

“现在我们两国处于一个严重的时刻，亚非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我们看做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而现在，两国关系由于边界冲突而发展到这样的状况，这总是不幸的和不利的。我们这几年来一致努力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为的是使双方不受任何拘束到谈判桌上来，客观友好地解决问题。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但我们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

班纳吉答应马上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尼赫鲁。

11月20日，中国边防军向传统边界线逼近。此时，入侵的印度军队已经无险可依，中国边防军处于有利的态势。美国航空母舰见大事不妙，匆忙溜之大吉。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决策：**中国边防军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扭转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

11月20日下午6时许，**毛泽东下达了关于中国边防军全线停火后撤的命令**。

11月21日零点时分，中国政府因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谈判的建议没有任何响应，便向全世界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中说：

“1、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力，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真诚地期望印度政府，考虑印度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改弦易辙，做出积极响应。”

中国的声明发表之后，印度政府依然没有反应。

11月21日，中国边防军前线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尔后受命在严密监视印军行动的同时，**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它军事物资详细登记造册，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中国边防部队还将已经死亡的印军官兵按照印度的风俗礼仪火化，对受伤的印军俘虏妥善治疗，发给日用品和衣服；组织被俘的高级军官到中国内地参观游览。**

中印边界反击战从10月20日开始，到11月21日结束，经历了两个阶段，历时1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边防军打退了印军的全面进攻，清除印军据点90多个，歼灭印军一部，驱除了入侵的印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抗美援朝以后，在世界屋脊上进行的一次打出国威、打出军威的反击作战。**

后来，中国边防部队在1963年2月28日，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主动撤退计划，不但实现前线停火，而且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4月2日，中方宣布全部释放和遣返俘获的印度军事人员3213人。从此，印度扩张主义者再也不敢挑起大规模的边界争端，中印边界形势逐渐平静下来，友好关系也慢慢地恢复了。

再说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布了《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

《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说：

“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历来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农业是主体，副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为副业提供粮食和原料，副业又为农业积累一部分资金，增加一部分生产资料，支持农业的再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副业还提供不小部分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增加一部分市场需要的小商品，有利于活跃城乡经济。**

全国各地农村的副业生产，品种很多，门路很广，大多数项目是同农业密切相结合的。**农业合作化以来，很多地方保存和发展了这些副业生产，实行了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综合经营。**它的好处是：**能够综合利用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根据农时忙闲，实行合理分工，亦工亦农，做到人尽其才；能够充分利用农作物的副产品和其他自然资源，增加社会财富，做到物尽其用。**这样，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与此相反，也**有不少地方，破坏了原来农副业综合经营的传统习惯，不少公社和生产大队把农村中分散经营的副业不适当地集中起来，在生产计划和劳动力使用上忽视对副业生产的安排；在副业产品的收购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有些产品的价格又不合理，结果造成农业和副业生产都严重下降，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收入减少，生产资金困难，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维持再生产。**因此，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副业生产，成为当前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各地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该根据当地的传统习惯，根据现有的原料、设备、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副业生产。”

**“在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中，正确解决‘归谁所有、归谁经营’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集体经营的副业中，应该以发展生产队的副业为主，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经营副业，这样，可以少铺摊子、少用专业人员，更好地使农业和副业相结合，更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于社员的家庭副业，要加强思想和经济领导，积极采取各种经济措施，鼓励和帮助它继续发展，并且使它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要认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不是‘资本主义’，不应该采取行政手段乱加干涉和限制。”**

《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良种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种子工作，是农业生产带根本性的基本建设，不容忽视，不能放松。建国以来，种子工作的成绩很大。粮食作物的良种推广面积，曾经达到80%以上。棉花的良种推广面积，比例更高。**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地方，不少作物，出现了种子混杂退化、带病、带虫和品种单一的毛病，必须努力迅速克服。首先要求提高种子的纯度，进而恢复传统的优良品种，并且逐步更新优良种子，更换优良品种。提高种子的纯度，主要靠生产队选种留种，这是最普遍、收效最快的办法。一般农作物的种子，需要量很大，主要靠生产队自选、自繁、自留、自用。另一方面，**培育农作物优良品种的科学研究机构（包括农业院校的研究单位），繁殖良种的示范繁殖农场，推广良种的种子站（种子公司），这一套种子工作的机构和科学技术队伍，必须系统地加以整顿和充实。玉米杂交种这一类的优良种子，主要靠专场繁殖。**生产队自己选留种子，种子工作机构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这两个方面要正确地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种子改良工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且进一步适应农业现代化对种子的要求。

二、**在庄稼收割以前，生产队要采取田间“穗选”、“片选”等办法，选留粮谷种子。留种棉，要实行“株选”，单摘单轧。**其他各种农作物，也都要首先选种、留种，然后再安排其他用途。生产队选留的种子，就由生产队负责保管，单独存放，定期检查，不使混杂，不使变质。**播种以前，还要再实行挑选，并且尽可能地经过发芽试验、病虫检验和消毒处理，然后下种。**这样做，既可以节约用种，防治病虫传播，又可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留种量要稍多于实际用种量，晚秋作物的种子更要多留一些，以备遭灾补种。生产队要经过社员讨论，民主评选有技术、有经验、细心负责的社员，担任田间选种和保管种子，给以合理的报酬；成绩显著的，还应该给以适当的奖励。

三、**生产队应该有自己的“种子田”，为自己繁殖种子。**“种子田”，从播种前的整地开始，一直到收割，都要特别加工，精耕细作。还没有建立“种子田”的生产队，第一步可以采取比较简便的办法，就是说，在作物生长的过程中，选择一块长势最好、纯度最高的，划为“种子田”，加强后期管理，收获后留做种子；第二步再建立正式的“种子田”。种子田耕作细，用工多，劳动定额要定得合理，劳动报酬要稍高于一般农田。

四、**农业科学研究单位，要根据各个地方和各种作物的不同条件和不同要求，培育具有不同特性的（例如耐旱、耐涝、耐寒、抗病虫、早熟、耐肥、不倒伏等等）、产量高、品质好的优良品种。**各级农业部门，应该摸清当地的需要，提出关于良种性能和品质的具体要求，要求科学研究单位进行培育。科学研究单位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还要组织区域适应性的试验，经过反复试验成功以后，再经过一定机关的鉴定，然后交由推广单位，在条件相同的地区，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积极推广。农业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要随时注意良种推广中出现的问题，做为进一步研究和培育新种的依据。某些已经退化的优良品种，要积极研究，采取措施，使之复壮。继续坚持党政领导、科学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的原则，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发掘民间传统的优良品种，重视农民群众选种育种的成就和经验，并且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提高。

五、整顿原有的示范繁殖农场，使之更好地担负起试验示范和繁殖良种的任务。其中，**已经转化为机关、企业的生产农场的，应该一律由机关、企业退回来，仍然改为示范繁殖农场。**示范繁殖农场的经营管理体制，仍然恢复以前行之有效的办法。它虽属事业性质，但应该按照企业经营，实行经济核算，试验费用由国家补助。这种农场不属于农垦系统，归农业系统管理，农垦部门所属的一般生产性的国营农场，也可以接受委托，承担一定的繁殖良种的任务。

六、**整顿充实种子站。种子站是良种的经营单位，示范繁殖农场生产的种子和从外地引进的种子，由种子站经营。**种子站又是全县种子工作的管理机关，通过技术服务站，在技术上指导和帮助生产队选种留种，保管种子，以及在播种前进行种子的消毒处理等等。种子站还要帮助生产队串换种子。地区之间调运种子，一定要经过检验，证明不带病虫，方可调运。地区之间，生产队之间，调剂串换种子，都应该实行等价交换。种子价格应该适当地高于粮食价格。调剂串换种子时候，一般应该实行以粮换种，找补差价。种子站要有一定的基金和设备。种子站也可以同示范繁殖农场合为一个机构，不单独设立。

七、**粮食、商业部门收购农产品的时候，必须切实保证留足种子，不许把种子当作一般的粮食和油料收购起来，顶征购任务。种子第一，不可侵犯。应该免除示范繁殖农场的征购任务，它繁殖的优良种子，交种子站经营推广**。某些作物，历来是用外区种子的，用当地种子，则退化减产；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又历来就是供应某种良种的基地，这种传统的供求关系，应该恢复。粮食、商业等部门，在规定收购任务的时候，必须照顾这种需要。收购种子，必须优质优价。

八、**为了加强棉花良种的繁育、推广工作，重点棉区的良种轧花厂，要由商业部门交回给农业部门经营，以便集中掌握棉花良种。**一般产棉区，也要根据生产队自轧留种棉的需要，由手工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负责安排轧花机和维修零件的生产供应，保证生产队自轧留种棉；或者由棉花收购站附设小型轧花机，由轧花厂单辟车间，为没有轧花工具的生产队单轧留种棉。留种棉，只收购皮棉，不收购籽棉。要切实保证棉种的纯度，不使混杂。

九、**粮食部门，还要从购进的粮食、油料和棉籽等农产品中，选择一批纯度比较高的，质量比较好的，留做备荒种子，准备供应缺种的灾区。**备荒种子，也要单独保管，避免混杂。备荒种子的选留、保管和动用，由农业部门和粮食部门共同负责。备荒种子地区间的调剂，也要遵守区域性的限制，并且经过检疫，切忌乱调大调，传播病虫，造成种子混杂。

《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中说：

“**大牲畜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和肥料来源。**按照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后，大牲畜也是不可缺少的辅助动力和肥料来源。**尽快地发展大牲畜，是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一项根本措施。”**

“**坚决把大牲畜（包括散畜）全部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并且长期稳定下来，30年不变**。少数情况特殊的社队，大牲畜仍归生产大队所有的，个别归公社所有的，也必须把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固定给生产队，并且按畜作价、保本保值，今后繁殖的幼畜归生产队所有。”

“生产队必须认真做好保护和繁殖大牲畜的工作，这是巩固集体经济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认真保护和发展集体所有的大牲畜的同时，应该允许和支持社员家庭或者几户伙养一两头大牲畜。**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社员愿意养、有条件养的，生产队可以把多余的和老、弱、残的大牲畜卖给社员饲养，或者与社员伙养，收益分成，社员也可以到市场上买回大牲畜来饲养。社员私养的大牲畜，除自己使用外，如果生产队需要，可以给队出工，生产队应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付给合理报酬。**社员私养的大牲畜，可以自由出卖。**”

“**有计划地、有领导地开放牲畜交易市场，恢复历史上传统的交流关系和流转规律。**打开省、专、县、社的界限，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议定。”

1962年12月2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苏共中央和其他国家的党进行还击。

原来，苏共中央在“二十二大”以后，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十分罕见的。到1962年11月及其以后，苏共中央先后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匈牙利工人党“八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2月2日的意大利共产党“四大”上，苏共又带头并怂恿各国党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如此，苏共还唆使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或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不得不进行反击了。

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

“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指陶里亚蒂——笔者注）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邓小平还说：

“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安徽省委11月26日《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在责任田推行不到两年中，已明显暴露出许多严重的恶果：**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暴发户越来越富，困难户越来越穷，出现了严重地两极分化。雇工、放债、出租土地、投机倒把等剥削行为随之发生。**”

12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杭州修改《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他觉得题目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一个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写道：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

后来一直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对苏共中央和其它国家党的攻击，进行了必要的驳斥。此是后事，容笔者在后边慢慢细述。

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鉴于最近几年来放松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中央和国务院认为有必要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重申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并作如下指示：

一、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认真加强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地进行讨论和检查。卫生、商业、化工、民政、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和妇联、青年团、工会等团体，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供应和科学研究等项工作。**各地方报纸和卫生部门、工会、青年、妇女团体的刊物可以适当地登载一些有关计划生育和避孕方法的文章，中央级的报纸不进行宣传。**

二、**做好计划生育的宣传与技术指导**。宣传内容，主要是讲解计划生育对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对个人和家庭的好处。宣传工作必须注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情况，从实际出发，区别对象，防止庸俗化。**目前应着重在城镇厂矿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进行宣传。**宣传对象主要是已婚的青壮年男女职工、公社社员、城市居民等。**对未婚的青年男女职工、艺徒、高等院校学生和公社社员，也应当进行关于严禁早婚，提倡适当推迟结婚年龄的宣传。**在高等学校中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倡集中精力学好本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要过早恋爱和结婚，以致妨碍学习，加重自己的负担。在宣传方式上，要以口头为主，小型为主。**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口稀少或自然灾害严重、妇女病很多的地区，以治病、生产救灾为主，不作普遍宣传；但对个别生育过多过密，有节育要求的男女职工和社员，也应当作好技术指导工作。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应该恢复和建立避孕指导门诊。基层的医疗、妇幼保健组织、助产员等，应开展避孕知识的宣传与技术传授。这种宣传和传授必要时可由卫生部门发行内部小册子，不要在报刊上公开介绍。

三、做好避孕药品、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化工部门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商业部门要改进供应办法，扩大供应网点，便利群众购买。避孕药品、用具的价格，一律不予提高。

四、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问题。**首先必须向群众讲清人工流产是有害妇女健康的，节制生育有效的办法是实行避孕。**目前由于避孕知识尚未普及，避孕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为了防止群众因不能进行科学的人工流产手术而私自堕胎，造成终身疾病或伤亡，卫生部门应制订具体办法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进行人工流产或施行绝育手术。

12月22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材料《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转给柯庆施，要求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与会者。他在批示中写道：

“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生了病，发烧到38度。机要秘书罗光禄怕影响到他休息，就没有给他送文件。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床上问罗光禄：

“罗秘书，你怎么不给我送文件呀？”

罗光禄说：

“主席，您发烧了，该休息一下。”

毛泽东说：

“没关系，你送来吧。”

罗光禄只得把文件送进毛泽东的卧室，但他又忍不住劝道：

“主席，发烧很难受，我们年轻的都抵抗不住，您烧到38度了，要打针吃药，注意休息。”

毛泽东接过文件就看，嘴里还说：

“这不要紧，我可以到39度。”

罗光禄听毛泽东这样说，内心一阵激动，眼睛也湿乎乎的，忍不住当面“表扬”毛泽东说：

“主席，您这种精神真了不起，我非常感动。”

毛泽东则说：

“这算得了什么？**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坚强的精神是办不好事的。”

12月25日夜，毛泽东在杭州看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宝罗为他清唱的《朱耷卖画》。

按照剧情要求，演员必须在演出中当场作画。宋宝罗随着剧情的发展要求，作起画来。他提笔疾若惊蛇失道，迟若渌水徘徊，不到十分钟，一只精神抖擞的大公鸡便立在青石之上，昂首引颈，高吭晨曲。

“好一幅雄鸡报晓图！”毛泽东情不自禁，站起身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叫到：“落笔很准，画得好！不错么！”

他踱了几步，吸着烟，将右手有力地往前一展，对宋宝罗说：

“这画，你可题‘一唱雄鸡天下白’么！”

宋宝罗见毛泽东这么赞赏他，就把这幅5尺长、2尺半宽的《雄鸡报晓图》大中堂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

“这画我很喜欢。”

后来，这幅画一直被毛泽东珍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在事隔8年之后的1970年夏天，毛泽东到了杭州，还曾经问起那位“会画大公鸡的宋宝罗”。

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一九六三年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决定说：

“**吃饭和穿衣，是关系到6亿5千万人民的两件大事。**现在，**国民经济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吃的问题有所改善，穿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发展棉花生产，解决穿衣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必须根据中央十中全会的决定，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生产，必须像抓粮食一样，把棉花狠狠地抓起来。”

**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他那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国际国内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的豪情壮志，依然使他久久不能休息，在辗转反侧之际，便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胆略和气魄，写下了对国际上的“虎豹”、“熊罴”和国内的“苍蝇”的宣战书——《七律·冬云》，诗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2月29日，邓小平把《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信中写道：“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标题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

12月30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连夜看完的社论稿上批示道：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凌晨，毛泽东阅读了12月11日《文艺报》刊登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3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为纪念《国际歌》的词曲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所作；他又阅读了《文艺报》第12期刊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撰写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2篇文章，感到很满意，就给江青写了一个简短批语：

江青：

这里有3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毛泽东 12月31日上午4时半

1963年1月4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1月4日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读了秋水篇”，是李讷在给爸爸的信中汇报说：她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已经读了《庄子·秋水》一文。《庄子·秋水》篇里说：河神河伯，平日里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到了北海，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毛泽东觉得爱女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盲目自大了。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目前穷队的特点和支援办法》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办公厅地区工作组整理的一个材料《目前穷队的特点和支援办法》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同样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拟定解决办法。

**1963年，国家支援穷队专款2亿元，另有长期无息农业贷款4亿元，主要也是支持穷队的。这6亿元应该适当地集中使用，采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按照先易后难的步骤，改变一批穷队的面貌。**各地应有计划地争取在第3个五年计划期内，基本上解决穷队的问题。

解决穷队的问题，主要靠加强领导和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经济上的支援只能是补助的。**只有调动穷队社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再加上必需的经济支援，才能又快又好地改变穷队的面貌。**

中央 1963年1月5日

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挎田里见、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罔正芳一行，他在谈话中说：

“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了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党。”

毛泽东还说：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

“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

毛泽东在谈到论战问题时说：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

毛泽东又说：

“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

1月8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载的郭沫若为贺新年写的《满江红·一九六三年元旦书怀》。其词云：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不看则已，一看便想起了苏共中央1月7日在《真理报》上刊登的攻击中共中央的《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文，激愤之余，诗兴大发。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凝眉沉思，时而昂首吟哦。忽然，他停住脚步，坐在桌前写上几句，又摇摇头，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在不断地吟哦写作中，这首名篇诞生了。次日清晨，工作人员发现，纸篓已经装满大半。”

1月9日凌晨，毛泽东展纸挥毫，书写了新得佳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他又在词后题写道：“书赠恩来同志。”并细心地附笔告白：“郭词见1月1日光明日报。”尔后将作品装入大信封里，上写“送交周总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全文见下一章）**。

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了杭州。

1月13日，毛华初为奉调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一事，正忙着整理行李、移交工作，忽然接到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打来的电话，说：

“毛主席来电，要你尽快去上海。”

毛华初兴奋不已，当即打点行装，与爱人韩谨行一起带上小儿子毛宁亚，于14日赶到上海锦江饭店。

时值寒冬，上海下着大雪，银装素裹，把锦江饭店打扮一新。锦江饭店主楼共有15层，毛泽东住在9楼。毛华初夫妇被安排在锦江饭店南楼。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来问毛华初说：

“你这次来向主席汇报，打算谈些什么事？”

毛华初说了自己的想法。秘书说：

“你可以搞一些百分比，汇报时简练一些。主席打算分两次接见你。”

毛华初说：

“我爱人和小孩来了，他们也想见一见主席。”

秘书说：

“主席会安排的。”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

根据许多地区的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这件事应该引起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严重注意**。请各地的县一级以上党委，立即进行一次检查，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纠正。

**中央已经多次指出，不仅在人民内部的教育运动中，绝对不允许采取打人、罚跪、捆、吊这类粗暴办法，对于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也应该依法惩处，而不要用打人等办法对待。**

**凡是已经发生打人现象的地方，由上级党委负责，进行严肃的处理。对犯有这种错误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责令认真检讨，情节严重恶劣的，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并且向群众进行适当的解释，消除群众的怀疑误会。**

现在将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第472号摘录刊载的湖南、湖北的两个材料发给你们参阅。

中央 1963年1月14日

1月1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德州地委《关于常玉等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德州地委关于前德州市委第一书记常玉、书记张金星等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转发给你们。

德州市委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严重事件。**当前，在我们党的干部中，确实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不少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在生活上的腐化，必然要导致革命意志的消失和政治上的变质。如果容忍这种错误倾向在党内泛滥，就会使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肌体受到腐蚀，以至使党的组织变质。各级党组织必须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经常地同党员干部中的这类错误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对于已经蜕化变质的，必须采取断然手段，坚决将他们开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性，才能使一些人觉悟过来，得到挽救。姑息迁就，只能助长他们的错误，并使更多的人变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选择典型的案件，在一定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不登报）**，教育党员干部。

要使每个党员明确认识，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不是更宽，而是更严。**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必须永远保持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共产主义者的高贵品质，永远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中央 1963年1月15日

1月15日晨，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1月15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行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预言，又一次神奇地应验了！他说：“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事实证明，在中印边界反击战后，中印之间数十年的和平相处局面，的确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乞求来的！应该说，毛公的至理名言，完全可以作为后来人的座右铭！

**第26章**

**“现在有人反对我，解放以来，我讲了40万言，这么**

**多话，真正照我讲的去做的不多了。”**

话说1963年1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叫毛华初一个人到毛泽东那里去。毛华初从南楼出来，乘电梯上9楼，电梯门口早有工作人员在等他。他们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等着呢。毛华初问候道：

“伯伯，您好！”

“好。”

毛泽东点点头，站起来和他握手，叫他坐下。毛华初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形势有所好转，总产量达300亿斤。这是他从省委书记王延寿那里问来的。毛华初又说了一些落实《农业六十条》、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和调查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对下面的情况了解不多，有些干部不熟悉，你给我介绍一下省委同志的情况好吗？”

“好。”毛华初说：“张平化同志有理论水平。王延寿同志有实践经验。两人配在一起，是很默契的。**华国锋**同志是南下干部，**从山西调来的。我从东北调来。到湘潭后，他当县委书记，我当副书记。**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是小商人出身，简易中学毕业**，在解放区当过区青年干事、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有实践经验。”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汪东兴把毛华初送到楼梯旁，毛泽东说：

“东兴，看样子湖南只换了两个人，工作是有起色的，面貌有所改变。”

毛华初说：

“中南局准备调我去工作，行李都打包了，可前两天，省委又打来电话说，省委决定我继续留在湖南工作。已经上报中南局。”

毛泽东说：

“你的工作调动，我不干预。你调广东也好，留湖南也好，我不管。但你在广东就要研究广东的问题，在湖南就要研究湖南的问题。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央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毛华初要走了，毛泽东又说：

“李敏、李讷、远新都来了，江青也来了。你们过去很少见面，今晚看戏，让你们见见面。你们应该认识认识。”

晚上，毛华初领着妻子、儿子来到剧院，见到了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泽东和江青，还有柯庆施坐在前排。李敏、李讷、毛远新坐在后一排。毛华初夫妇则被安排在剧院左中央。毛泽东往后环视了一会儿，好像看到了毛华初，朝他眨了眨眼，又摇了摇头。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又约毛华初到他下榻处谈话。毛华初刚进门，毛泽东就不无遗憾地对汪东兴说：

“昨晚安排不好，你们大概没搞清楚，让华初坐在后面，没让他们见到面。”

毛华初落座后，毛泽东说：

“你那个报告我看过了。”

毛华初是在伯父来上海之前，寄给他一份反映农村人民公社金融管理、自留地和市场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又问毛华初：

“你的文化是怎么提高的？”

毛华初回答说：

“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慢慢提高的。”

“你能不能写文章？”

“大的报告不能写，能写写工作报告总结之类。”

毛华初在说到《六十条》时说：

“出工一条龙，误工很大。”

毛泽东说：

“《六十条》刚刚发表，再看一看，看一两年再说。”

**毛华初说出了他的担忧，他说：**

**“我们现在搞和平建设，和平环境问题未暴露。一旦发生动荡，有人就会枪口对内。”**

**“是的！”毛泽东似乎被这句话打动了，他颇有感慨地说：“现在有人反对我，解放以来，我讲了40万言，这么多话，真正照我讲的去做的不多了。”**

毛华初说：

“不会，谁敢反对您啊！”

此时，毛华初的爱人韩谨行带着孩子来了，毛泽东和她打了招呼，继续和毛华初谈话。毛华初问伯父说：

“主席，现在搞调查研究，主要调查什么？”

毛泽东说：

“现在《六十条》出来了，以《六十条》为依据，多下去调查执行的情况和效果啊。”

韩谨行见毛泽东点起了一支烟，两人的谈话有了停顿，便对毛泽东说：

“伯伯，过去我虽见过您几面，但不管多少次，一有机会，我总想看看您。”

毛泽东笑着说：

“小韩，过去见面，有别人在场，我没有机会向你做调查，对你了解不深。今天我要调查你的历史。”

于是，毛泽东问到了韩谨行的学习、工作和经历以及家庭生活，韩谨行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满意地说：

“你是个干工作的。你几个小孩？”

“4个，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韩谨行说着把亚宁拉到毛泽东跟前，说：

“这就是我们最小的孩子亚宁。”

她转脸对儿子说：

“快叫公公。”

“公公。”亚宁用清脆的童音叫了一声。毛泽东拉着亚宁的手，又摸摸小侄孙的头。韩谨行说：

“亚宁昨晚发脾气了。”

毛泽东问：

“为什么动气？”

韩谨行说：

“昨晚看戏，亚宁想看主席，特意跑到您的跟前，警卫人员把他拖开了。他回来后不高兴，撅着小嘴说警卫叔叔不讲理，不让他看主席公公。”

韩谨行说完，见亚宁倚在毛泽东身上，她担心毛泽东受不了，连忙叫亚宁过去。毛泽东说：

“没关系，让他看够噢。”

韩谨行见毛泽东喜欢亚宁，便开玩笑说：

“伯伯，这小孩留在您身边算了。”

毛泽东也笑了，说：

“他还小，我没法带，还是你替我带吧！”

正在这时，护士李文惠进来了，招呼道：

“主席，休息时间到了。”

毛泽东见汪东兴也进来了，就指指韩谨行，又指指毛华初，对汪东兴说：

“她是他的夫人，他是她的丈夫。她是韩幽桐同志的侄女。”

韩幽桐是韩谨行的姑妈，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的夫人。张友渔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汪东兴对张友渔夫妇是熟悉的。毛泽东在汪东兴与二人握手后，又把韩谨行的经历对汪东兴介绍一遍。说她高中文化，参加革命后当过镇长、区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专区妇联主任、县委副书记、省委农村部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地委农村部副部长。现在，还在省委农村部工作，经常下乡。毛泽东最后又说：

“她是个干工作的。”

韩谨行暗暗佩服伯伯的好记性。毛泽东向韩谨行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韩谨行就把她在湘西自治州保靖县梅花公社蹲点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说：

“深入基层蹲点好。关于当前的工作，中央开了会。最近已下发指示。具体指导有中南局和省委。”

毛泽东提到阶级斗争的时候，韩谨行说：

“我蹲点的梅花公社还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谈到纠“左”问题时，毛泽东说：

“**有些人把核算单位越搞越大，认为越大越好，有的地方就是纠正不过来**。我不主张办公共食堂了，办食堂饿死了一些人。”

他顿了一下，突然说：

“谨行，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办一下。”

“什么事？主席尽管吩咐。”

韩谨行、毛华初齐声说。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

“我有一个护士，叫李文惠，家在常德，她从小死了母亲，是外婆把她带大的。她有个哥哥，已经找了对象，哥哥是个老实人，听说与对象有些矛盾，需要协调一下。她想回去一趟，我看她一个人回去不方便，跟你们一起回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到了长沙，你替她买张车票，让她回常德。我过几天到湖南去，等到了长沙，再带她回北京。”

毛泽东又说：

“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和庐山，你们愿意去玩玩吗？去的话，可乘我的专列一起去。”

韩谨行说：

“华初工作很忙，庐山我们就不去了，跟您到杭州看看，就回湖南去。”

毛泽东叫来秘书，说：

“他们是我叫来的，来往的旅费由我出。你看他们3个人要给多少钱吧？”

汪东兴说：

“300。”

毛华初，韩谨行赶紧说：

“不要，不要！我们的路费回去由公家报销。”

毛泽东说：

“你们在路上花了一些钱，算给你们的补助吧。”

该告辞了，毛华初恳切地说：

“伯伯，您要保重啊！”

毛泽东点点头，也说：

“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在毛华初等人离沪的前一天，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了火车票和300元人民币。

1月21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邓小平呈报的中央转发《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批准《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现在把这个《纪要》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讨论一次，并且结合你们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一、党要管党。党的建设，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这是天经地义。党不管党，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实现，党的组织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党的建设的业务部门。关于加强党的监察工作，中央已有决定。现在，还必须自上到下地把党的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切实地加强起来。各级党委，都应当定期讨论和检查它们的工作，并且按照实际需要，适当地扩大它们的编制，抽调一批条件合适的干部，进一步充实它们的机构，使它们真正能够担负起自己的任务。

二、**现在党的队伍中有一些不合格的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中央认为，有必要在重新教育党员的基础上，对党员普遍地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关于这一工作，中央将在适当的时机，作出专门的决议。当前，各级党委都应该着重做好教育训练党员的工作，做好有重点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该参照《关于重新登记党员试点工作的意见》（附件一），抓紧时间，进行试点。在试点中，一定要实事求是，及时地进行检查和总结经验。

为了进行教育党员和登记党员的工作，需要组织一支专业队伍。中央决定，专列一项临时的干部编制，总名额为四万五千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名额，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分配。

三、**在进行登记党员试点的地方，可以结合进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试点。**在重新登记党员时，势必要有一部分党员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一些人，虽然不具备党员条件，但并不是坏人，他们是拥护党、对党有比较深厚的感情的。对这一些人的处理，更要十分慎重。既不应该降低党员条件把他们留在党内，又不要伤了感情，使他们同党对立起来。在他们退出党的组织以后，**可以参照《关于试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附件二），吸收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

四、必须把党的基层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各级党委，可以根据中央组织部草拟的关于农村、工业和商业等3个方面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附件四至六），进行试点。在试行一个时期以后，再对这些条例进行修正。

五、管理党员和管理干部，是党的建设中的两项主要工作。其中，管好干部，对于党的建设，关系尤为重大。近几年来，对干部管得不严，漏洞不少，这是一个大缺点，已经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今后，必须切实纠正。

干部管理制度，应当同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相适应，应当同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要求相适应。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几点意见》（附件三），请即遵照执行。

中央 1963年1月21日

1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邓小平呈送的中央转发中宣部、中组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的批语。

《报告》中说，到1962年10月止，全党轮训干部11.4万人，其中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9.7万人，占计划轮训干部的57%。今后的意见是，轮训干部主要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提高全党干部的思想觉悟，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和矛盾问题。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是这样写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你们按照执行。**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干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准备需要继续加强，**各地党委必须认真作好干部轮训工作，帮助干部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

中央 1963年1月22日

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

此前，毛泽东在武汉审阅了这篇社论的草稿，他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1963年2月3日，陈伯达将《红旗》杂志编辑部起草的《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的前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原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在引言中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他还在引言部分的“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语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2月5日，毛泽东将《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一连书写了两幅，其中一幅为定稿，就是现在人们可以看到的那一幅大气磅礴、力沉势雄、如铁戟似烟云的毛体书法精品。

后来在1963年12月，毛泽东的这一佳作发表在《毛主席诗词》一书中。全词敬录如次：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2月11日，毛泽东委派田家英到故宫博物院借阅明清名人书画作品26件。

2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等负责人13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在前两年调整的基础上，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抓阶级斗争、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和经验。**

原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视察和了解了11个省的情况，其中，只有湖南、河北两个省，结合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抓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会议印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

这两个报告汇报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在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方面的四清经验。报告说，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报告还说，这些活动对于克服管理混乱、纠正部分基层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兑现年终分配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根据湖南、河北两省总结的“**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迅速消声匿迹”，“经过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的经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他要求各省市的领导要认真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

2月1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修改后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引言清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2月15日，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张国华讲的“两不怕”。

那是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时说的话。张国华说：“这次边境作战部队的表现好得很，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一不怕苦，从上到下没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仆后继，倒下一个马上有人顶上去**。这两方面的事例都多得很。”

毛泽东听罗瑞卿讲了一遍，非常高兴，他说：

“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岳飞还有两句话：‘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就是饿死也不能抢劫，冻死也不能拆房子烤火。看起来，岳飞治军是有他的一套的。所以那时金兀术不怕别的，只怕岳家军。他说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接着说：

“谁要撼我们解放军，那就更加困难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2月17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第8部分初稿上加写了一大段话，不指名地揭露赫鲁晓夫等人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2月18日，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第8部分再做修改，他将这部分的小标题改为《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又用3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2月19日，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

“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3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4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

2月20日，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引文和第8部分，他在批语中写出了少有的满意评价：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至此，**毛泽东先后5次审改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老人家对待一篇文章如此认真，如此严谨，实在令人佩服！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互联网上却传出了毛著中多数文章是他人代为捉刀的弥天大谎。这正是：

毛公为人改文章，煌煌史书多昭彰。后世有个卖国贼，名叫罗冰早逃亡；

曾言乔木为枪手，代为毛公写文章。小子只知美元好，信口雌黄吠日光。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

2月22日，毛泽东应《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之邀，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大字，并在后边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的一位班长，原名雷正兴。乳名庚伢子。他于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塘（今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雷新庭，父亲雷明亮，母亲张元满，哥哥雷正德从1943年到1947年相继悲惨致死，弟弟又饿死在家中，年仅7岁的他从此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艰难地活了下来。1960年雷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平日里苦练军事技术，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曾多次立功受奖。雷锋在《日记》中写道：

“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解放的事业，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钢。迎着困难前进，这也是我们革命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

“凡是脑子里只有人民、没有自己的人，就一定能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威信。反之，如果**脑子里只有个人、没有人民的人，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才是幸福的。”

1960年，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王良太下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雷锋的先进事迹，就亲自布置搞好雷锋事迹的宣传工作，并多次找雷锋谈话，对他进行培养教育。1961年5月，雷锋作为全团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2月19日，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1963年1月7日，国防部为表彰雷锋的先进事迹，批准授予他生前所在班“雷锋班”称号。2月22日，《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决定出一期合刊，全面宣传雷锋事迹，并刊发《雷锋日记》。他们恳请毛泽东为雷锋题词。

秘书林克为毛泽东拟了几份题词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毛泽东对林克说：

“**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说罢，他挥毫写下了风靡全球的“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毛体行草书大字，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在第5、6期合刊（学习雷锋专辑）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手迹。3月6日，《解放军报》独家发表了周恩来等人为雷锋题词的手迹。周恩来写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再说在2月22日晚，在上海休养的江青到红都剧场观看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在中场休息时，江青说：

“这个戏很不错。”

她不想惊动剧团，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

其实，江青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戏。那还是1958年的时候，哈尔滨京剧院新编的一出现代题材京剧，叫《革命自有后来人》。如今她看了沪剧由《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红灯记》，觉得比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还要好，便找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向他推荐了《红灯记》剧本，建议改编成京剧。林默涵看了剧本以后也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改编。

阿甲原名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他集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阿甲接到江青推荐的剧本后，与翁偶虹合作，共同改编剧本。

2月23日晚，正患感冒的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苏共2月21日来信问题。尔后，他在卧室里又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毛泽东首先回忆了1949年底到1950初他第一次访苏期间对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火及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原因，而后说道：

“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目前中苏关系问题上，他对契尔沃尔科说：

“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毛泽东针对苏共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反问道：

“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

他指指周恩来说：

“就是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4月7日回你们2月22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的，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

**一连5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43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43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国际会议做准备一事，毛泽东建议说：

“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26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

2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当刘少奇说到苏共中央2月21日的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插话说：

“实际上是因为20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代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这正是：斯言至今亦惊人，十年之后果成真。

**美酋朝圣传佳话，毛公谈笑能攻心**。

再说刘少奇在会议上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又插话说：**

**“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插话说：

**“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2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23日晚会见契尔沃尔科时的谈话内容，发表了题目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的社论。社论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2月28日，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等文件，**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从5号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4篇文章，苏联又是4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90%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3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接下来，毛泽东讲到了国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跑了那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湖南，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了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90%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5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

毛泽东问王延春：

“只要5个晚上，是不是这样？”

王延春说：

“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

毛泽东接着说：

“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1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增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说：

“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为了保证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的好转，使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的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

“我们在改进经济管理工作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无论在国营企业或者合作社企业中，无论在生产过程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问题，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例如，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原料、材料、燃料、劳动力的浪费很大，设备维护不善，生产的次品、废品过多，工程质量低劣；在商业和物资管理方面，中间环节过多，物资调拨和商品流向不合理，货不对路，验收、管理不严格，许多物资霉烂、变质、报废。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其他事业单位中，也存在着许多浪费现象。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十分有害的。对于这些不良现象，必须雷厉风行地加以克服。

当前党内、党外干部的作风，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从总的方面来说，都是好的。在各个战线上，涌现出了大批的先进分子和模范人物。有很多党员、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在过去几年的严重灾荒和经济困难面前，信心十足地高举着三面红旗，保持着饱满的斗志和干劲，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照顾大局、一切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愧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干部，不愧是光荣的社会主义战士。但是，**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尤其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狂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这些，已经严重地障碍着我们事业的前进。**一切同社会主义利益不相容的现象和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是一次成功的意义十分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的胜利，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情况的好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的推进一步。”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4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的建议，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文章共分为8个部分，计11万字。

3月5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苏两党会谈问题的意见，他说：

“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这就是中共中央在第一轮论战中发表的第7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在发表的7篇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既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公开点名批评，又同意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并宣布从3月9日起，暂停发表论战文章。

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若昂·阿马索纳斯，他向阿马索纳斯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他还说：

**“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中心转向了哪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作于1962年1月8日、定稿于2月5日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是讨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檄文，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几个苍蝇，包括中国国内的苍蝇**）的宣言书，是彻底埋葬各国各地区一切反动势力（**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冲锋号。如此煌煌大作，至今令人百读不厌！

**第27章**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话说1963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时，觉得标题太平淡，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将题目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地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2%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1962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62个，公社级每人平均82个**。他们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

中央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中央 1963年3月23日

3月2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祈鉴谅。为学校题字，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你到京时，我适外出，未能晤面，深致歉怀。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仑？）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已收到了。顺问

安吉

毛泽东 1963年3月24日

3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文化部党组在给“中央文化部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国传统戏曲中，原有不少出现鬼魂的剧目。解放初期，在党的戏曲改革方针的指导下，具有严重毒素的‘鬼戏’一般均已停止上演。但是，有一些思想内容比较好、表演艺术又较有特色的剧目（如《焚香记》、《钟馗嫁妹》、《位子都》等），仍继续演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的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虽然最近我们在戏剧工作者中间进行了反对‘鬼戏’的讨论和对‘有鬼无害论’的批评，但对于剧团、特别是农村剧团上演‘鬼戏’问题，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致‘鬼戏’还在流行，还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在剥削阶级的长期压迫下，受迷信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近几年来，城乡人民中烧香、拜佛，以至盖庙宇、塑菩萨等迷信活动又有所滋长。不少地区农村中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还以迎神、还愿等名目，邀请剧团大演《目莲戏》和其它‘鬼戏’。事实证明，‘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助长了迷信活动，毒害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妨碍了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也就利用群众的迷信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提出了责难和批评。

戏剧界对‘鬼戏’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不一致。对于思想反动、形象丑恶恐怖的‘鬼戏’，大家都认为不能演出；但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精神的‘鬼戏’，则觉得还可以演出。我们认为，这两类剧目虽则有所不同，但不能否认无论哪一类都首先肯定了人死变鬼的迷信观点。**即使有的‘鬼戏’有它的好的一面，对于缺乏科学知识、还有浓厚的迷信思想的广大群众来说，还是存在着助长迷信的副作用。**这是和当前我们要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各种落后思想和落后习惯的任务相抵触的。”

江青曾看过这份报告，她说：

**“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毛泽东在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文化部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党组，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请通知有关的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照此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直接告诉文化部。

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中央 1963年3月29日

1963年4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一系列观点，并建议以此信中的观点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组织人员起草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稿，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4月初一个周末的晚上，空政文工团里年龄还不到15岁的小学员孟锦云，第一次来到中南海“春藕斋”的舞厅，和文工团团员们一起陪首长跳舞。

10点钟，毛泽东来到了舞厅。孟锦云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机会陪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问她：

“你是新来的？”

孟锦云说：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武汉人。”

毛泽东笑着说：

“噢，武汉人，你是我的半个小老乡。你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么？”

孟锦云避开毛泽东的话头，问：

“嗳，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黄鹤楼？”毛泽东也不正面说他去没去过黄鹤楼，而是吟诵道：“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毛泽东问起孟锦云在文工团的工作情况，孟锦云说她12岁就来到了文工团，一直在学舞蹈。毛泽东问她：

“练功累不累？”

孟锦云说：

“开始练功，累得我真不想再学舞蹈了。您知道，夏天不用说，就是冬天，练功流的汗能把衣服湿透了。”

毛泽东说：

“噢，流那么多汗，可得多喝点糖水，不然可损害身体。”

孟锦云“嗨”了一声，说：

“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怕苦怎么行。”

毛泽东说：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流泪’。旧戏班子有这么句话，你知道吗？看来，你们也是这样。”

陪毛泽东跳舞的另一个女孩子邢韵声，看到生活俭朴的毛泽东连一块像样的手表也没有，就将自己的新表赠送给了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在客厅里请孟锦云、邢韵声几个女孩子吃饭，不住地劝她们：

“你们多吃点，多吃点。”

他还笑着说：

“人家说：‘人是铁，饭是钢’，我认为，‘人是铁，烟是钢，一次不抽闷得慌’，饭可以不吃，烟可不能不抽噢。”

饭后，在送别客人的时候，毛泽东叫住了邢韵声，他说：

“小邢呐，你是个大方人，我也不能小气哟。”

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叠练书法的诗稿，说：

“这首《七律·长征》就送给你吧。”

邢韵声非常高兴地接过诗稿，小心翼翼地放进裙子口袋里，由于口袋太小，诗稿有一截露在外面。毛泽东一看，说：

“噢，这样不行。”

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诗稿包了起来，递给邢韵声，说：

“要放好，不要让人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你的。大家都没有，你有，人家会嫉妒你的。”

4月4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起草中共中央对苏共复信的问题。

钓鱼台的“秀才班子”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的观点。草稿写出后，被毛泽东否定了。他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他说：

“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张燮林和庄则栋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风格截然不同：庄则栋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擅长防守，号称“攻不破的长城”。

4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有王力、范若愚参加的写作小组重新起草的对苏共的复信稿，参加讨论的有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

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讨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稿。

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后边所说的杭州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此前，毛泽东已经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书记们写的20件报告，他看完以后，觉得对农村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摸清了。

毛泽东指定由彭真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后来让陈伯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文件定名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对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4月10日的报告和河南刘建勋4月15日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2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2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15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150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中央 1963年5月2日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1963年5月10日”。

5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来自友好国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团，欢迎你们。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独立的或没有独立正在斗争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两亿吧！还有拉丁美洲两亿人口、亚洲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

你们的党（几内亚民主党——笔者注）是很好的党，是一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领导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捣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捣你们的鬼。**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

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颠覆活动，应该把他们赶走。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不要被人颠覆掉了。你们站住脚我们高兴，你们倒台我们不高兴。因为你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你们的政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经过你们，可以在非洲许多国家做工作，使它们得到解放。你们也有这个责任，不要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我们也一样，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些困难，给予的帮助不大。再过5年、10年，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那时给予的帮助可能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而是能够克服的，正在采取措施克服。**我国的经济、文化同你们差不多，几乎是在没有什么遗产的情况下搞起来的。过去，你们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是遭受几个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

我们和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们谈得来，没有感到我欺侮你，你欺侮我，谁都没有什么优越感，都是有色人种。**西方国家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它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谁给造成的？我们经济、文化水平低是它们造成的。管理国家，过去是它们代替我们管理的。英国人讲，你们管理是可以的，但要学，学多少年，慢慢来。可是你们不是慢慢来，而是一下子就取得政权。我们也是这样，夺取了政权再学嘛，不会管理慢慢就会管理了。有错误就改嘛，难道只有我们有错误，西方国家没有错误？它们的错误比我们更大，它们犯了反革命的错误。我们根本上没有错误，我们是进行革命，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地提高。”

5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经江青和上海的柯庆施组织、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执笔撰写的。文章根据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禁演“鬼戏”的报告的精神，**公开点名批判了昆剧《李慧娘》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所写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5月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草稿提出了一些指导性修改意见，又提出了一些有关“四清”、“五反”方面的意见；尔后和大家一起进餐。

**毛泽东把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上的反修斗争同时展开，精神上是异常亢奋的，所以他举杯祝酒说：**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接着，他又说：

“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5月8日，毛泽东向与会者印发了湖南的报告；又向全党推荐了河南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和湖北《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以及湖南《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个材料，他在批语中写道：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 1963年5月8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彭真汇报了他们前一天晚上讨论的情况，说文件没有写好，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

“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

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

“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7个材料我都看了。”

**彭真汇报说，对阶级斗争的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深入。**毛泽东说：

“**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里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说，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5%，6%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有人说到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毛泽东又说：

“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

5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是要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跃进”号货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它的载重量为15930吨。“跃进”号货轮于1958年9月开始由大连造船厂按照苏联设计图纸建造，11月27日建成下水。1963年4月30日，“跃进”号载着1.3万吨玉米从青岛港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5月1日中午，“跃进”号货轮触礁沉没在苏岩礁。5月2日深夜，“跃进”号船员从上海集中乘机飞往北京。周恩来接见了三副、三管轮以上的管理人员，与他们一起座谈，了解情况。）的处理情况，还想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就征求将要离去的各中央局书记的意见，他说：

“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

大家都说愿意留下来等周恩来。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主要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稿。

5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这7个材料是：1、中共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廖锡龙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2、钱天镇写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3、章轶仲写的《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4、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娄秉宜写的《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5、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写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6、中共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7、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

毛泽东在转发这些材料时写了一个1300多字的批语，全文如下：

浙江省这7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4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3月23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4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它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3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么，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泽东 1963年5月9日

5月10日、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先后在4个改写稿上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其中在《决定》草案的第10条里加写了一句名言：**“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又将他撰写的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放在《决定》草案的前边，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全文如下：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5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5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了柳宗元，他说：

“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10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毛泽东说：

“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

周恩来对《决定》草案中所讲到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提法提出了疑问，他说：

“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95%以上？”

李井泉建议说：

“是否写95%以上好些？”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95%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问：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

毛泽东说：

“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5月12日一清早，毛泽东又召集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

“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后来在5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此时，毛泽东又全力投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的复信。

在5月19日稿上，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在关于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问题上，他写道：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毛泽东将这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最后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此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从5月下旬起，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征求他们对复信稿的意见。同时，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对复信稿讨论几天。

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杭州会议制订的《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批分期地有步骤地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进行新“五反”运动，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开展。

5月26日，毛泽东给张干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写道：

次仑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 早日康复。

毛泽东 1963年5月26日

毛泽东将自己稿费中的2000元通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送给张干，这就是他信中所说的“薄物若干”。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5月12日清晨召集各中央局书记谈话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你看，毛泽东考虑得多么周到啊！可谁会想到，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竟出了一个“桃园经验”。于是乎，一场争论，一场新的斗争，又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第28章**

**“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

**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

**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

话说1963年6月1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起草对苏共复信稿的经过，他说：

“这个文件，原来21条，后来一改，变成22条，23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3段，成了25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6月10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复信稿，并决定将署为6月14日的复信稿于6月15日交给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进行广播。

6月15日，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毛泽东指导、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当面交给了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

这个《建议》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有不少地方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原话。《建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6月17日，中国国内各主要报刊全文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指责复信中“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6月19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18日的声明。

这天晚上，毛泽东决定将苏共声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写道：

“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6月25日、28日、29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有关问题。

6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将要发表的声明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将于7月5日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声明还责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要坚持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7月4日，苏共中央针对中共中央7月1日的声明，再次发表声明，公布了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还表示要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意见。

7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一个简短、但措词强硬的声明。

7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7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配合两党会谈，由《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拟定题目的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7月14日，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出人意料地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逐条辩驳，并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挑起了两党之间新一轮的公开论战。

苏共中央的这一封《公开信》，是由几个人分头在一天一夜之中草草写出来的。所以，《公开信》中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成体统。这就为后来中共中央对其批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要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将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并再一次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让群众去分辨。他说：

**“什么叫孤立？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孤立。”**

毛泽东在审阅声明稿时，加上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广播苏共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称苏共的这一封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

7月19日，中共中央以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说：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

这一天，邓小平奉命向苏方的苏斯洛夫提出两党会谈暂时休会的建议。

7月20日，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双方决定休会。双方在两党会谈的公报中宣布说：“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一个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

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回京。

北京西郊机场上红旗如海，锣鼓喧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5000余人迎接中共中央代表团归国。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人步入机场休息室，他远远望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书城、章士钊等早已等候在这里，便赶忙走上前去，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请参看网文：王诚宏著《照片“毛泽东与章士钊亲切交谈”拍摄时间考证（2）》）。他首先握着李书城的手说：

“李老先生，您好！您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党，您的私宅就是中共的产床，我代表几百万党员，向您这位革命的‘保姆’问好！衷心祝您龟鹤遐年，永远年轻不老。”

毛泽东肝胆相照的话，使李书城老先生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了。章士钊赶紧插话说：

“主席还是没有忘记晓园先生，先生的公馆确实是党的摇篮，李老为革命功不可没，劳苦功高。”

毛泽东握着章士钊的手说：

“行严先生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小，您一生同情支持革命，慷慨解囊谁不知晓。我至今还欠您一大笔债，要是算利息，该不知道多少了。”

年逾9旬的张难先接过话头说：

“主席记性真好，日理万机，还没有忘记我们这几个行将就木的老朽。”

毛泽东马上握着他的手说：

“义痴老说得不对。**诸位不是老朽，而是百年之后要永垂不朽。**”

毛泽东一句话说得3个老人开怀大笑。待众人落座后，毛泽东又说：

“吃了木耳不能忘树蔸，这是我们湖南老家的一句话。义痴老和晓园先生都是辛亥元勋，民国政要。行严先生学贯中西，学界巨擘，三老都对中共支持不少。中共能有今天，实赖以诸老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鼎力相助。我代表全国人民祝三老健康长寿，宝刀不老。”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全面开展批驳苏共中央公开信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写文章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其他负责人转到抓工业方面去。**

后来从9月6日开始，一直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经过中共中央常委讨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称“九评”。这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条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详情容后细述。

7月25日，**美、英、苏3国代表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原来，在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两党会谈的同时，从7月15日开始，苏联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与美英两国政府代表也举行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条约很自然地使人想到了**苏联要和美英勾结在一起，企图垄断核武器，阻止正在研究核装置的中国拥有核武器。**

7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一连3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经毛泽东审定的一个声明，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应该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这正是：叛徒色厉内荏，阴计频施，造谣耍奸假马列；

毛公正气浩然，寸步不让，有理有节真英雄。

就在毛泽东全身心地指挥一班人马进行反修斗争的时候，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原来在1963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用一辆平板车拉着一家3口的全部家当，搬出生活了14年的爸爸的家，开始了他们的独立生活。毛泽东说，他以后每个月要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30元钱，资助女儿、女婿。

李敏和孔令华的儿子是去年出生的，毛泽东和孔从洲为给孙子起名，还都费了一番心思。毛泽东提出了几个原则：一是虎、豹、彪，二是杨、柳、松，三是牛、马、羊，一律不用。可以用马、恩、列、斯名字中的字，但不许用毛泽东名字中的字。孔从洲说，用马字不好排字，用恩字与他人有重，列、斯又都不适合人们的习惯，就用列宁的“宁”字吧。毛泽东知道了亲家的意思后，就说：“好，就叫他长大继承我们的事业吧。这叫后继有人，就叫孔继宁吧！”

李敏离开爸爸的家以后，开始自己动手做饭，米饭焖不好，不是米多水少夹生了，就是米少水多成了粥。蒸馒头更是个大问题。后来，他们就干脆到食堂买主食，自己在家做一点菜。在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李敏去看爸爸，在卧室门口见到了爸爸，叫了一声“爸爸”，就扑进了爸爸的怀里。毛泽东也紧紧地搂着女儿，用温厚的大手抚摩着女儿的肩头，说：

“娇娃，爸爸想你呀！”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

李敏坐在爸爸身边，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她知道爸爸不喜欢爱哭爱掉泪的孩子。毛泽东望着女儿的脸，又摸摸女儿的手，许久不说一句话。后来他问起女儿的衣食住行，李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爸。当她说起做饭的情形，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笑了，他说：

“我的娇娃可比你妈妈当年有水平，冇得出洋相哟！”

接着，毛泽东就给女儿讲起了她母亲贺子珍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北山，如何将燕窝连毛一块儿煮了招待朱德的故事。逗得李敏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敏再一次回到中南海时，毛泽东高兴地望着女儿笑，上下打量着她。

“坐。坐。”

毛泽东让着女儿。李敏边坐边问道：

“您看什么呀？”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本事了没有？”

毛泽东依然笑着。李敏也挺高兴地报告爸爸说：

“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双手什么都能办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说罢，他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建军节这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

早在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驻守上海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8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官兵学习“好八连”。毛泽东看到“好八连”的事迹后，非常高兴，挥笔写下了《八连颂》，其词云：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8月上旬，河北省中部开始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不少河流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以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

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派出副总理李先念，到灾情最严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农村了解情况，增调粮食，保证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在此后的7个月里，毛泽东先后3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他问得很详细，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样？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人口有多少？

毛泽东还指示说：你们要做好宣传工作，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

再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苏陀兰大会党代表团、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以及科摩罗、津巴布韦、肯尼亚的非洲朋友。廖承志、刘宁一等人在座。毛泽东在会见中说：

“我代表中国人民欢迎所有的非洲朋友。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借这个机会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美国歧视黑人的问题。我们起草了一个《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要不要全文读一读？”

在翻译读了声明全文后，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只是美国国内一千几百万的黑人受歧视的问题，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他向非洲朋友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接着说道：

“可以证明，**人民革命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是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据《李敦白回忆录》（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曾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45年来到中国，1946年前往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居住在中国）记载：“1963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些非洲游击队的领导人时，一个来自南罗得西亚的使者站了起来，他是个肩宽膀阔、身材魁梧的二十几岁年轻人。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毛主席，’他开口说，‘每天晚上，当我躺在丛林里，我很担心。您知道我在担忧什么吗？我并不担心那些白人殖民者，不担心狮子和犀牛，我担心的是，以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上那颗闪闪的红星，以前苏联总是会资助我们。但是现在，夜空中再也看不到那颗红星，苏联不再资助我们。相反的，他们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现在我心里担忧的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那颗红星，是不是也会消失？您会不会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遗弃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真的要孤军奋战了。’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说：

‘我了解你的问题。苏联现在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分子，背叛了革命。**我能不能向你保证中国不会背叛革命呢？现在我无法给你这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设法，让中国远离贪污、官僚和修正主义。’**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继续说，‘我们试着教导干部，仔细聆听广大群众的声音。我们运用许多体制，比如要求每个军官至少要当兵一个月，要求办公室的干部每年至少要下乡一个月，使他们不至于脱离广大群众，让他们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也提倡让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这些方法是不是就足以保证我们不成为修正主义者呢？不，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感到非常困扰，’毛泽东继续说，‘当我们和儿孙谈话，却发现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痛苦艰难，不了解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才能换来今天的成就。我们也担忧，他们缺乏将革命继续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苏联发生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

毛泽东又回答了几个问题，接着他转身面向我，我大吃一惊。他说：

‘这里有个我们的好朋友李敦白。李敦白同志，请你站起来好吗？’

我站了起来。

‘现在请大家看着他，’毛泽东说，‘他是个美国人，白人，你们会不会怕他呢？’

听到这句话，大厅里的非洲人都发出笑声。毛泽东也仰头大笑，就和我记忆中他在延安时一样。

‘没有必要怕他，他虽是个美国人，却是我们的朋友。他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他，他是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

我继续站着，毛泽东继续说道：

‘了解这一点，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蒋介石吧？他是个中国人，他也跟我一样是黄皮肤，但是黄皮肤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而白皮肤的美国人李敦白，却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要尽可能地联合更多的朋友，这很重要。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化敌为友，意思就是说，要将敌人的圈子尽可能缩到最小，将朋友的圈子尽可能扩到最大。’”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署名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正义斗争的声明》，全文如下：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黑人共1900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1%。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11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50%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1960年，20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1961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1962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4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6月12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8月28日举行25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30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10%。我深信，在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8月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马克说：

“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

“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4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马克说：

“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泽东说：

**“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8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 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 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提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1960年、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1962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1000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1000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1960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1934年，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第一卷中叙述了毛泽东在少年时期以及他在和湖南一师的同学、朋友们组织新民学会时，已经把“改造世界”、“改造中国”作为他的奋斗目标了，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得不把“改造中国”放在了第一位。自那以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他31年的为改造中国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漫长征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又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极探索，把一个一穷二白、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他一方面致力于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另一方面，继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之后，继续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把注意力放在“改造世界”——反帝反修和支持亚、非、拉人民解放运动上（本章所叙述的诸多外务工作便是典型的事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他的革命目标之明确、之持久、之顽强，是中国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无可比拟的。

**由于中国人有数千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古训，所以许多人对于毛泽东一生中援助、甚至是无偿援助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解放事业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也难怪至今还有一些人把雷锋一类的人物看做是“傻子”了。请看一看马克思、列宁的传记吧，他们在穷困潦倒、放逐奔波之际，何尝不是想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呢？人类的思想品质应当是不断进化的，而不应当是退化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来个人人为己，各扫门前雪，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再有一些人在国际关系中助纣为虐、欺凌弱小，那岂不是与中国老百姓所说的“狗咬讨饭的”一般无二了吗？

**第29章**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

**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话说1963年9月初，也就是在“一评”即将发表的前夕，毛泽东已经着手修改“二评”的9月2日稿了，他将原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并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文字：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结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联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一评”，题目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

9月6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再次确定毛泽东提出的从1963年起坚持继续调整3年，作为第2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3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力争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走上正常轨道，工业各部门搞好配套、协作，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中央工作会议还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9月6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康生和吴冷西送来的修改后的“二评”9月5日稿。他在文章中评价曾经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一处，加上了一段文字：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9月6日的稿子上，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9月11日，毛泽东对“二评”作了最后的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他加上了一段文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二评”：题目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中旬，江青向周恩来提出了举行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的建议。

此后，周恩来指示中宣部和文化部，让他们立即进行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筹备工作。他还特意对周扬等人说：

“**毛主席对这个会演十分重视，特意让江青同志来过问一些事情。江青对文艺可是内行，你们要高度重视，细心布置，一定要拿出好的水平来。**不然，是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的。这次会演，要在1964年春节前后进行，不要推时间，我们还要有其他的安排呢。”

周扬和夏衍等人说：

“现在轮到江青对我们发号施令了，江青我们可是熟识得很呀，我们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

据林默涵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个信号，准确地说，是毛主席发出的一个要破要立的信号。**江青在一天晚上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周扬、夏衍没有把这件事情和党内的政治斗争和什么路线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请示了陆定一。陆定一、周扬这些人看不起江青，于是，就对总理的指示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9月17日，周扬、夏衍搞了一个《关于举行小型京剧现代剧目观摩演出的通知》。江青看到这个通知后，大发其火，她找到陆定一和周扬，质问道：

“**你们这个通知，为什么不贯彻毛主席对戏剧工作的重要指示，根本不提举办这次会演是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为什么你们要把周总理指示的在全国范围内的京剧现代戏会演缩小为7省2市的部分地区的小型观摩？**你们把现代戏的题材范畴扩大到包括近代的历史题材，甚至说反映鸦片战争以来的旧民主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剧目都可以，究竟是什么意思？”

陆定一和周扬一时说不出话来。江青气愤地甩手而去。**陆定一马上把江青批评他们的话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听后，没有说话。**

江青回到家里，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说：

“让总理出面，把这件事情摆平。**中央一定要在这块领域里打开一个突破口，再不能允许这些人继续统治我们的阵地了。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发言权！**”

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9月25日，中国驻苏大使馆给中共中央发回一个对苏联政府21日声明的分析报告。

9月2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三评”，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26日下午，毛泽东翻阅《参考消息》，在第1版上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奇撰写的《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他在第4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报道《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美国记者巴雷特报道《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他又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阅。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第1版、第4版都应研究。

毛泽东 9月26日

9月27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尔后呈送毛泽东审批。这个文件也是10条，所以被称为《后十条》。

9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先让杨尚昆将驻苏大使馆25日发回的分析报告念了一遍，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6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相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作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实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指《前十条》——笔者注），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当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到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中国经济形式已经变化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经济基础。现在，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艺术部门没有变化，如果这些部门不革命，那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963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广场上人潮涌动，共庆祖国生日。

群众游行方队簇拥着模型彩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游行队伍中首次出现了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宣传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里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及其夫人。

石桥湛山是日本著名的记者和政治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战前进行反战、反侵略主义活动；战后当选为日本第55任内阁总理大臣，为恢复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他在1959年首次访华，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访问。

10月5日，刘少奇将经过多次修改的《**后十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即看。**

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他写的是：

曹操诗一首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应石桥湛山先生之嘱为笔，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

这一件毛体书法作品点画雄浑，走笔纵横奔放，浓墨酣畅，浑厚老成。

10月10日晚，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河北、河南、湖北。

10月20日，毛泽东在陶铸、王任重、汪东兴陪同下，来到长沙，住在9所，听取李瑞山、华国锋的工作汇报。

华国锋早在4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贵在鼓劲》的文章，介绍了湖南省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岳阳县毛田区的先进经验和革命精神。他在文章中把岳阳县委书记毛致用在一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的论点，发展为“鼓干劲，必须是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鼓蛮劲”。并且提出，要“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华国锋在这次汇报中给毛泽东背诵了关于毛田区过去生产状况的一段顺口溜：

毛田塅里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得花来不结果，结了果儿不炸花。

他说，经过科学种田、苦干实干，毛田人民取得了种植棉花的成功，不结果的棉花结了果，不炸花的棉桃炸了花，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一大调整。毛泽东听后兴致大发，问毛田是哪个“毛”字？华国锋说：

“是毛主席的‘毛’字。”

他又介绍了毛田区主要是搞集体经济、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在山上植树、田埂种豆、地里栽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

此时，湖南省3级干部会议和省委二届七次会议在长沙召开，毛泽东特地召来岳阳地委书记谈话，询问这里的工作情况。他还在9所礼堂前坪接见了两会的全体代表，准备同大家合影留念。他同前排的省级干部握手后，又问道：

“哪个是岳阳县委书记？”

岳阳县委书记张月桂赶紧回答：

“我是，我叫张月桂。”

毛泽东当面表扬说：

“岳阳的毛田搞得不错嘛！”

10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0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草稿，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之后，10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5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9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1963年5月20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5月20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

一、5月20日的“决定（草案）”，9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2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7个附件，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

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2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

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

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

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

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

七、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

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中央 1963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将略作修改的《后十条》即《规定（草案）》和《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草稿，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说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就在10月26日这一天，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长篇讲话。

毛泽东曾经在周扬这篇讲话稿上做了20多处的重要修改，阐述了许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道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10月下旬，在浙江进行调查研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毛泽东说：

“这叫作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依靠群众专政。**”

他指示谢富治要好好总结这一经验。

10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的第6稿，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1963年11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他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乘飞机到上海商量与法国建交问题。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后，马上告诉在华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毛泽东主席正在上海，我将陪同你们到上海去见毛主席。”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富尔夫妇，乘飞机前往上海。

11月2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富尔夫妇，富尔向毛泽东递交了戴高乐关于中法建交问题的亲笔信。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

“两位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

富尔说，我衷心祝愿中法关系迅速发展。毛泽东说：

“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加强来往。”

他还说：

“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11月7日，毛泽东在张鼎丞、黄火星陪同下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他在谈话中提到了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并**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

毛泽东在谈到改造人的问题时，说到了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初稿的意见，他说：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11月12日，毛泽东第4次来到河北中部灾区视察。他鼓励省地市领导人说：

“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

“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时的事，书经有记载。”**

他掰着手指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4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他还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刘子厚，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要把河北从灾难中救出来，要把水切实的治起来。”**

他问了林铁、阎达开和刘子厚的年龄，深情地说：

**“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已经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

林铁等人提请毛泽东为抗洪展览题词，毛泽东当即答应了。他还说：

**“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11月14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后十条》，并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毛泽东10月25日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通知》中原来所署的时间改为1963年11月14日），同时下发到全国城乡。

后来，毛泽东在11月16日批示：“已阅，退尚昆即办。”

《后十条》中说阶级敌人反对我们的新特点是对干部拉拢腐蚀，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合法斗争。因此，《后十条》强调说，领导干部要亲自蹲点，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揭发斗争。这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界限”。“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扎根串连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

11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李富春在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松辽油田的伟大成就，他说：**

**“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靠进口，现在已基本自给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已经结束。”**

11月17日，毛泽东应邀为河北省抗洪展览会题词，他写的是：

**“一定要根治海河”。**

11月1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五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五评”发表以后，赫鲁晓夫已经受不了啦，不久，他便向毛泽东发出了一封求和信。且待下文详细叙述。

1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长谢富治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11月20日

11月22日，毛泽东与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时说：

“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

他还说：

“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我们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的不同。诸暨县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批发下去，回答两个问题：一、群众是怎么懂得这样去做的；二、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了。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对这些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语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1个批示。**

廖沫沙听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后，和周扬、夏衍这些人都打了招呼，他说：

“毛主席已经给你们打了招呼了，你们赶快要采取一点主动，否则麻烦事情就会出现。”

周扬满不在乎地说：

“没有事啊，毛主席是和大家说笑话呢。文化工作从来都是这样的，说什么的都可以，本身就是要人们充分地发表议论和引起大家的争论嘛。”

后来在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人士30多人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彭真、周扬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周扬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讲到了对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讲了话。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泽东在批示中的说法很不一致，他们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且说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评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说：

“我见过溥仪。我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

他又说：

“溥仪很不满意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1963年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件。信件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

此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全国人大二届第4次会议闭幕式，他让邓小平在会议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来信。

赫鲁晓夫在信中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停止中苏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希望改善两党两国关系，加强两国间的经济、科技合作联系；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他在信中还说：“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对赫鲁晓夫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的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12月11日，毛泽东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于12月9日的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王鹤寿在报告中说，他们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扬《鞍钢宪法》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给薄一波的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2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六评”，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给赫鲁晓夫的复信，毛泽东一直拖到1964年3月1日才发出。详情容后再叙。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关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示，**不少资料都认定是“两个批示”**，并把这个批语称之为第1个批示。实际上，毛泽东在这方面先后作过3个批示，除了前面说到的11月间的第1个批示，这个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2个批示**。第3个批示在1964年6月27日。

12月间，江青到康生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她问康生说：

“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说：

“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笑了笑说：

“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

过了几天，江青再一次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

“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含而不露地说：

“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

康生说：

“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式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

江青说：

“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我们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康生说：

“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

江青点点头，说：

“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方旱3年。我们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说：

“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

12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1963年11月6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作夜郎自大。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和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与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

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体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不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都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

湖南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不做调查研究，主观主义的下达许多指标，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1961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3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中央 1963年12月13日

12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湖南一师一位姓田的老人因生活困难，曾向毛泽东写信求助。毛泽东便通过周世钊来帮助这位姓田的老人。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较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祝好！

毛泽东 1963年12月13日

12月14日，毛泽东在6张宣纸上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并在信封上写了“送交 林彪同志 毛缄”几个字，此件手迹堪称毛体书法中的精品，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

原来在12月5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看到两个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很高兴。毛泽东便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

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11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有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社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700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知已按你的意见布置了没有？**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选择一两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的连队的情况做一些大略的调查。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个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例如几个星期）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做宣讲工作。这样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瑞卿）、萧（华）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毛泽东 1963年12月14日

**曹操有一首题为《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萧华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4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4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它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4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4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4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 12月16日

附薄一波同志给我的信一件。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让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于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非常重视。由此，他提出了“**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并在给谢富治、彭真的批示中说：“**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而刘少奇等人则在《后十条》中强调说：“**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扎根串连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于是，一个与“枫桥经验”和毛泽东“**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正好相反的“桃园经验”，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深入开展之际，被刘少奇等人推向了全国各地！

**第30章**

“**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

**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

**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话说1963年12月16日下午14时37分，罗荣桓因长期抱病工作，积劳成疾，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61岁。他是10位元帅中逝世最早、寿命最短的一位元帅。

罗荣桓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培养的一名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最优秀的政工干部。在10年内战期间，他一直担任红军中的要职；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115师政治部主任、政委、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政委、第4野战军第一政委职务；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

罗荣桓逝世的噩耗传入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心中极为难过。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汇报1962至1972年科技工作10年规划。会前，他沉痛地对与会者们说：

“罗荣桓同志逝世了，请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

大家为罗荣桓默哀后，毛泽东还深情地说：

“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不容易啊！**”

毛泽东称赞罗荣桓是一个**“最正直的人”，“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他又说：

“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打麻将，即使‘清一色’，还有一万、两万、三万的不同。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也可以，不许秘密搞鬼。”**

聂荣臻见毛泽东讲完了，就开始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他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快了。毛泽东高兴地插话说：

“这等于抗日时期何应钦不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10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2期已经出了。”

他问坐在一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组长于光远：

“这个刊物是哪里出的？”

于光远回答说：

“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办的。”

原来早在1956年10月，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就创办了这个刊物，一连出了15期，到1960年夏因政府要整顿和减少现有刊物而停刊。该刊物在1962年8月复刊时，在复刊号上刊登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此事以后详述。

且说聂荣臻汇报说，用20年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插话说：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聂荣臻汇报说，**每年进口国外图书要花400万美元。毛泽东嫌少了，他说：**

**“可以花1000万美元。”**

聂荣臻汇报说，**科学方面的文章和图书稿费比较低。毛泽东当即说：**

**“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

聂荣臻汇报说，**10年科技规划要有30亿投资。毛泽东说：**

**“每年3亿，不多嘛。”**

聂荣臻汇报说，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毛泽东说：

“**死光**（指激光——笔者注），**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攻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的搞。”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又说道：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12月19日，毛泽东带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

在此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都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之中。一天晚上，他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便斜靠在床上写东西。已经是深夜了，护士长吴旭君怕他服的药过了劲，就劝他先睡觉，起床后再写。毛泽东说：

“写得正在劲头上，放不下。”

这一夜一直到天亮，毛泽东才终于写完了。他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不停地独自吟诵着，好一会儿，把诗稿交给吴旭君，叫吴旭君念给他听。吴旭君见是一首七律，还没有标题，便念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念完最后一句，吴旭君说：

“主席，您这么谦虚！”

毛泽东说：

“为人还是谦虚点好。”

吴旭君又问：

“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敬？”

毛泽东从她手里拿过诗稿，提笔在上面半截空白的地方写了个题目：《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后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就跟吴旭君聊天。他在聊天中回忆起往事，谈起他母亲父亲的死，又说到了自己。他笑着说：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

毛泽东又掰着手指说：

**“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12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

“第1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出席会议的李四光听着周恩来的陈述，双眼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会议期间，工作人员找到李四光说：

“李老，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

李四光来到北京厅门口，刚要迈步进门，发现毛泽东在里面，便歉意地说：

“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

“没有走错，是我找你。”毛泽东起身走过去，紧紧握着李四光的手。他还乐呵呵地开玩笑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李四光闻言一愣，心想主席怎么知道我会打太极拳呢？他连忙解释说：

“前几年动了手术，身体不太好，在杭州学过一阵太极拳，但打得不好。”

毛泽东见李四光一副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拉着他坐在沙发上，说：

“我说的是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

接着，毛泽东说起了地质部和石油部协同作战以及开发大庆油田的成绩。李四光恍然大悟，也忍不住乐了，他说：

“主席，这都是遵照您的指示做的啊！”

12月21日，林克遵照毛泽东之嘱，给在西安的高智写信说：

“主席嘱我写信转告你，你前后几次的来信和两次送来的小米都收到了，谢谢你。他因工作忙，未能作复，望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并向你问好！”

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周岁生日。这一天，毛远志约着李敏一起来看望伯伯。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儿子孔继宁，还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爸爸家里。毛泽东一见毛远志就说：

“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写？你的头痛病好了吗？”

毛远志、李敏、孔令华和妹妹李讷围在老人身边，争先恐后地同老人说笑，同老人照相，有的昂着头，有的笑弯了腰，有的拉着老人的手，有的拽着老人的胳膊。孩子们的高兴劲儿，引得毛泽东也乐呵呵地笑着。

“主席哪去了，主席在哪里？”

江青声到人到，她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我也照相，我也照相！”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都提出要为毛泽东做70大寿，毛泽东说：

“这个封建习惯要改，大家都不做寿。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他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

毛泽东诙谐的劝说，使工作人员们心悦诚服，做寿一事遂作罢。

毛泽东尽管不做寿，可老朋友们还是要聚一聚的。这天中午，他让秘书田家英给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叶恭绰4个人打电话，说是晚上请他们吃饭。这次邀请还附带了一个说明，田家英在电话里说：

“主席说很抱歉，今天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个子女。”

是日晚，章士钊带着女儿章含之，程潜带着大女儿，王季范带着孙女王海容，叶恭绰也带着女儿，先后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出门笑语相迎，与客人握手寒暄。

在毛泽东邀请的这4位老人中，只有叶恭绰其人本传中尚未提及，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介绍一下。叶恭绰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广东番禺，字玉甫。他身材短小精悍，在书画方面造诣极深，曾任北京国学馆馆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抗战时期，叶恭绰成功地保护了毛公鼎等国宝级文物，深受国人景仰。1950年，他从香港回北京，历任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常委。

程潜老人身躯高大，白发苍苍。此前，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尊崇，怀着激情写出了12首诗，亲自誊写装帧成册，并请章士钊题写了封面，本来就是准备赠给毛泽东做贺礼的。这12首诗中其中一首题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是这样写的：

灵椿长寿不言寿，至德安仁亦利仁。**道大为公天可则，物穷其极理皆真。**

鵷鶵振翼鸮生妒，海若回潮水共亲。远届八荒齐拜手，堂堂赤制有传薪。

毛泽东同4位老人谈笑风生，评古论今。年轻人则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该吃饭了，毛泽东与客人及亲属和孩子们先后来到了餐厅。晚宴设了两桌，丰盛而不奢华，餐桌上摆满了豆豉、炒辣椒、熏鱼、腊肉、蔬菜等一些家乡菜。江青和毛远志、李敏坐在老人这一桌，李讷、孔令华和女宾们坐在另一桌。宾主大多是湖南人，他们操湘语，叙湘情，吃湘菜，频频举杯，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饭后，宾主来到客厅叙话。毛泽东见毛远志要走，便叫住了她：

“远志，你来。”

毛远志赶紧来到伯伯跟前，坐在他身边，听到老人鼻子有点不通气，便问：

“伯伯，你有点感冒吧？”

“这感冒呀，不发烧就不要紧的。”毛泽东吸吸鼻子，拍着侄女的手说：“人啊，随时都可能死。”

他见毛远志甚是诧异，便转换了话题，一连串的问毛远志：

“你今年多大了？”“还在中组部工作吗？”“现在几个孩子，都在那里？”“远新去看过你吗？”

毛远志一一做了回答，她见伯伯下身只穿了一条棉毛裤，就说：

“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

毛远志摸着老人的手，果然是又暖又软。毛泽东望着坐得远远的章含之问道：

“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

章含之告诉毛泽东说，她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下放劳动1年，又读了2年研究生，1960年开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已经3年了。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那你多大了？”

章含之说，28岁。毛泽东打趣地说：

“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

众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问章含之：

“你教什么呀？”

“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语文学史讲座。”

“你喜欢文学？”

“很喜欢。”

毛泽东哈哈大笑，连声说好。他又问道：

“章老师，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

章含之过去随父亲参加大型宴会，也和毛泽东握过手。但是这一次，她在这种场合下，面对面同毛泽东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她见毛泽东这样问，连忙摇头，说：

“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啊！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哩！”

章含之见毛泽东不像是开玩笑，就恭恭敬敬地说：

“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

毛泽东乐呵呵的，说：

“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章含之还一个劲儿地说不行。章士钊马上插话说：

“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毛泽东满意地说：

“那就好。”

他的兴致很高，最后又和大家一一合影留念。客人们担心毛泽东太累了，请他坐着照，他说：

“站着好，不要紧。有时我不是站一两个小时嘛！”

等毛泽东过完了生日，江青便马上去了上海。

原来，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已于12月25日就在上海开始了，江青是应邀到上海观看演出的。后来，这次活动一直延续到1964年1月22日才结束。

在此期间，江青观看了话剧《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她决定把话剧改编成京剧，并把演出任务交给了上海京剧院。在上海京剧院排演《智取威虎山》时，江青鼓励编导和演员们说：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甚至有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的反对革命，至少是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给顶回去了。”

江青还对排演作了具体指导。戚本禹曾在回忆江青的文章中说：“《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江青指导后，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再说12月27日，分管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推荐第12军1团2连连长郭兴福教学法。他在电报中写道：

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

罗瑞卿把叶剑英的电报呈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在“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像小老虎一样”一行字下面，画了红杠杠。他还说：

“这一条我很感兴趣。”

罗瑞卿向毛泽东、林彪和各位军委副主席建议，搞一次全军比武。毛泽东、林彪和各位军委副主席都在罗瑞卿的报告上画了圈。

12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转来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指示稿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3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它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 12月30日

1964年1月1日，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二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原来，江青在1963年秋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这出戏是根据新四军第6团“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张家浜一带的斗争故事改编的。因为沪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老百姓才能看懂，所以江青决定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这一回，她把改编演出的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二团。她对编导和主要演员们说：

“要坚决按照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后来，江青在京剧二团排练时，特意到后台去见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她对赵燕侠说：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江青还从上海调来了沪剧中饰演阿庆嫂的演员，专门辅导赵燕侠。

1月1日下午，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李四光打电话说：

“李老，主席请你晚上7点半到怀仁堂，一起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

是日晚，李四光按时来到了怀仁堂休息厅。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李四光迎上前去，同毛泽东紧紧握手。李四光简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石油地质工作的进展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笔者注）都有很大的功劳！”

戏就要开演了，毛泽东要李四光坐在自己身边，以便一边看戏一边交谈。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登上舞台，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一起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1月3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现将叶剑英同志参观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后给军委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军委同意叶剑英同志的报告。全军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宣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包括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以使**军委和林总**关于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们的军事训练工作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

军委相信，只要全军共同努力，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全军就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新的“郭兴福”；一定会出现一批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行各业自己的“郭兴福”；一定能够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附去叶剑英同志的报告，请一并加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

军委 1964年1月3日

1月4日上午，章含之正在办公室里准备教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林克说：

“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天就开始。”

章含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支支吾吾地说：

“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也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

林克在电话那一端说：

“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放心地来吧。走中南海西门，我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的。”

章含之晚上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还说自己紧张得要命，害怕教不好。章士钊很是高兴，安慰女儿说：

“你大可不必紧张，我同主席数十年相知，主席很随和的。”

章士钊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毛泽东交往的一些趣事，还说毛泽东曾经要借他的书看，他要章含之带一套日文版的线装书《智囊》给毛泽东。章士钊一再叮嘱说：

“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

1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也不如中国同池田派的关系好。这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而自由民主党是受美国控制的。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英国同美国比较好，但也不是那样团结。法国使美国感到恼火。西德的地位重要起来了，这样一来，势必会同美国发生对抗。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毛泽东还说：

“**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么，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们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贪污、盗窃，做投机倒把，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

“**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1月5日下午，章含之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她就说：

“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

章含之将父亲的《智囊》一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爱不释手，说：

“就是它，等我看完就还。”

章含之说：

“爸爸说了，您爱看，就留在您这里好了。”

毛泽东连忙摆摆手，说：

“那可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几周后，毛泽东果然信守诺言，把《智囊》还给了章士钊，又换了另一套书。自此，毛泽东经常向章士钊借书看，章含之自然就成了毛泽东借书还书的交通员。

章含之是每逢星期天下午4点到菊香书屋帮助毛泽东学习英语。毛泽东每次都是用1个小时的时间读完英语，然后让章含之陪他去院子里散步，然后邀请她和护士长吴旭君一起共进晚餐。

毛泽东和章含之散步时，谈话的内容很广泛。有一次，他问章含之：

“你们学校教学生用什么教材？”

章含之回答说：

“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

毛泽东说：

“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

章含之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二十几岁的她不知轻重，就说：

“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好！”

毛泽东和善地笑了，说：

“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

章含之说：

“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词，好文章。学外文也应该一样多学一点文学啊！”

毛泽东说：

“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

“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好吗？”

毛泽东见章含之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笑了起来，说：

“你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

一天下午，毛泽东学完英语，在等待开饭前，靠在沙发上点燃一根香烟，问章含之：

“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

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

“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要同他划清界限。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闻听此言，忽地坐直了身子，有些惊讶地注视着章含之，大声说：

“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

章含之说：

“是的，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

毛泽东望着章含之，认真地问：

“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

“1957年1月。”

“啊呀！了不得啊！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喽！”

章含之忙说：

“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

毛泽东虽然看出章含之已经面有窘色，但他还是很严肃地说：

“你既然是个党员，你就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角，**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

毛泽东深深地吸着烟，接着说：

“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行老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他见章含之一言不发，态度就和缓了一些，微笑着问：

“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哪？”

章含之顺口就说：

“他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鲁迅先生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他。后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点名批判他。同学们偷偷地拿讥讽的眼光看我，我坐在课堂里可真是如坐针毡。”

毛泽东听章含之数落着她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道：

“就为这个？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和谈。我现在考考你，你知道多少行老的革命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

章含之一下子楞住了，睁大眼睛想了半天才说：

“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

“我的朋友也有反动的呢！不过行老不是。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期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

章含之老老实实地摇摇头。此时，她面对毛泽东这位伟人，才忽然意识到，自己除了读过鲁迅的文章，还从来没有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对父亲的了解竟然如一张白纸。毛泽东没有让章含之太难堪，接着说道：

“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

毛泽东见章含之惭愧得低头不语，点燃了一支烟，笑着说：

“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年轻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他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他问章含之知不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章含之说不知道。于是，毛泽东耐心地给她讲述了《苏报》案故事，然后问道：

“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接着，毛泽东又给章含之讲了他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章士钊劝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故事。他说：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章含之听了毛泽东的一番教导，使她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但她心里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她的身世之谜，她泪流满面地告诉毛泽东，自己并不是章士钊的亲生女儿，而是在出生8个月时被章士钊收养的。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讲述，开导她说：

“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做自己的父母才对。”

章含之后来深情地回忆说：“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亲在晚年间父女温暖信赖的气氛。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有一天，毛泽东读完英文之后，像往常一样，要章含之陪他在寒风中散步。毛泽东体格康健，不戴围巾、帽子，章含之却是“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毛泽东突然问她：

“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完呢？”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和她开玩笑，就笑嘻嘻地说：

“主席欠债？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要是主席欠债，我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

“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是我见到你才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于是，他就把1920年为了湖南的革命运动和送一部分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找到正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请章士钊帮忙筹款的事说了一遍。那时候，章士钊发动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讲完了故事，笑着对章含之说：

“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了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去了！”

章含之像听一个传奇故事，惊讶地说：

“真有这样的事！”

毛泽东点点头，认真地说：

“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

章含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哈哈大笑，说：

“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正是：人生七十不言老，国有疑难细推敲。

毛公一生多趣事，忙里偷闲亦英豪。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还债，请看下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4年1月5日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等人的谈话中说：“**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么，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但将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重心逐渐地转向了国内，同时也说明他已经开始思考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这一重要问题。修正主义“**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这些话无疑是受到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彻底决裂”**的启发，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无数遍，可以说，他的思想完全是和《共产党宣言》一脉相承的。

另：毛泽东和章含之的谈话很有一读的必要。他的那些话，一方面可以作为在建立新中国之际用人不是清一色、而是广泛地把那些有影响的各界著名人士吸收到新政权之中的一个很好的注脚，另一方面，也是为后人在对待历史、褒贬古人、待人处事方面树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好榜样。可以说，和那些类似白开水或者是一根筋似的古今人物相比，毛泽东就是那甘醇的茅台酒，愈久弥香。读他的故事，品他的话语，使人有回味无穷之感。

**第31章**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

**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

**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话说1964年1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民日报》的问题，他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他在谈到历史人物时说：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

1月7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又听取了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他**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

**毛泽东还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1月11日，加纳共和国发生了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

中国为了支持加纳人民的民族斗争，由周恩来和陈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加以前的约定，如期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访问。

周恩来、陈毅前往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打着绷带的恩克鲁玛飞速迎出城堡门外，与周恩来、陈毅等人紧紧拥抱。

周恩来向恩克鲁玛总统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慰问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周恩来对恩克鲁玛说：

“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的慰问电，今天已经广播。”

恩克鲁玛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送来中国朋友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恩克鲁玛设宴招待周恩来一行，他说：

“我以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加纳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加纳人钦佩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革命以来在毛泽东——诗人、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全文如下：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它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代替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一天，中共中央以中发【64】26号文件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谢富治同志和谢觉哉、张鼎丞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很好。他们根据典型调查和这个时期的经验，**对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和说明。浙江省委批转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诸暨县**枫桥区在运动开始阶段，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多捕人（7个公社共有65000人口，有地、富、反、坏分子911名，其中有比较严重地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163名，要求捕45人），在运动过程中，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部和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之后，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他们的经验充分地说明现在完全可能和应该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现在把这3个文件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到县一级党委和检察、法院党组及公安机关，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群众向反动阶级残余实行专政，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要少捕人，少杀人**。在1963年5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要把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经过这一段的实践，很多干部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样做。

但是，目前在各级干部中，主要是在地、县两级干部中，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够。有不少同志不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通过说理斗争，去制服敌人，对他们实行专政，而习惯于单纯依靠公安、司法机关，采取简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有的同志动不动就想把人捉起来，甚至要求多杀几个人来打开局面，推动运动。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这主要是由于对敌我斗争形势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反动势力已经更加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更高了，群众对四类分子的监督和改造的力量更强了。**像建国初期那样，在很多地方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压在人民头上，非关一批、杀一批，群众不敢起来，不能翻身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依靠群众力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条件更好了，可能性更大了。**为了保留这批有用的劳动力，为了在群众面前保留一批反面教员，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为了有利于争取四类分子的子女，为了更大限度地孤立和改造那些迄今还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我们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这样做，比较把他们捉起来或者杀掉，对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更为有利。这样做现在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决不是说人民群众可以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和平共处”，“一团和气”，对于他们的破坏活动可以置若罔闻，不加反对、制裁和镇压，而是要依靠广大群众更有力地对他们实行监督、斗争、教育和改造，也就是有力地对他们实行专政。同时，**对于现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非逮捕不可的，还是要逮捕。对于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民愤极大，确实非杀不可的，还是要在少杀的原则下，经中央主管机关批准，杀一部分。**

在依靠群众力量制服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方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成功的经验。这两篇讲话和浙江省委的文件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诸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请你们把这个批语连同转发的3个文件，在有关干部中认真加以讨论，并且贯彻执行。

中央 1964年1月14日 

1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及李敦白到中南海家中作客。他在和客人们的谈话中，回忆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发展过程和在延安度过的岁月。他说：

“革命者并不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反动派杀了很多人民。”“**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又对斯特朗说：

“你离开我们后，以及我们离开延安后，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以为我们一切都完了。你知道，任何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我们都没有害怕的必要。因为，他们一定会分裂。”

毛泽东接着问客人们：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回答说：

“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泽东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都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的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世界战争的。第1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10个手指按住了10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张开10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谈到了中苏关系，他说：

“至于战争会不会来自苏联？”“不怕他们，他们有核牙齿，我们有手榴弹。他怕得很。苏联不敢打仗，打起来，苏联的老百姓不干。”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1958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1958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1959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转入了反攻**，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他们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3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不死人，第二天不会塌下来，第三山上地上草木照样长，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第五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的一段话。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在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毛泽东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任何反对派、任何政治斗争、任何社会革命都没有了呢？我就不相信。人们总要分化成先进、中间和落后3部分，由先进分子来做政治工作，总是必要的。”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观点大为赞赏，她说：

“不然的话，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枯燥无味了。”

毛泽东笑道：

“是的，不然的话，像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中午，毛泽东与客人们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毛泽东送客人们上车。他对斯特朗说：

“祝贺你编写《中国通讯》成功，没有你，我们无法工作。”

毛泽东建议康生安排有关部门把《中国通讯》翻译成其它文字。

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人民日报》以《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为题，专门发表了毛泽东谈话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有：

“无论如何，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13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被称之为著名的“一·二七谈话”，全文如下：

日本人民在1月26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地方滚出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为题，刊载了“一·二七谈话”全文。

1月27日这一天，中国和法国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中法两国建交，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1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七评”1月28日稿时，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一句话：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其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

他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又加写了一句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1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这一天，毛泽东又会见了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

关于中法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就是使两国互相往来。”“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他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增加学术文章、请求中央增调学术理论工作干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毛泽东 2月3日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主持书记处讨论决定，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也着手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2月3日晚，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演出的节目因为“革命气息不浓，庸俗低级”，受到批评指责。

2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2月4日晚，毛泽东重读《人民日报》所载《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兴之所至，提起毛笔写下了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之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右唐人诗一首。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他把原诗中最后一句的“破”字写成“斩”，“终”字写成“誓”，不知是记忆有误抑或是故意为之。作品中的“穿金甲”3字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不斩楼兰誓不还”一句更是干湿错落，酣畅淋漓。整幅作品如铁画银钩，出神入化，大气磅礴，端的有一派风卷战旗、金戈铁马之战争大气象，不失为一幅难得的毛体书法精品。

2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石油工业部在《报告》中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这个经验是：

1、**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2、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3、**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4、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5、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6、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7、培养一个好作风。8、**全面关心职工生活**。9、全面地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石油工业部还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中号召学习“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1960年他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任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石油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以“宁可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庆大油田”的革命精神，率领全队，人拉肩扛，提前开钻，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被誉为“铁人”。王进喜的革命精神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困难面前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在6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风貌。

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很好。中央一级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以及一些工厂企业的职工同志们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反映很好、很强烈，极大地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现在，中央决定在全国工交、财贸、文教系统和各级机关、团体、部队中，普遍传达这个报告，一直传达到基层单位。

**大庆石油工业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

为了便于组织传达，除了发给你们若干份文件以外，并且把这个报告制成了录音。你们可以组织党内外干部先听录音，然后进行讨论。也可以同时向一般工作人员和全体职工放录音。具体办法，请你们规定。

讨论中各方面的反映，特别是工厂企业基层单位的反映，请你们最近即选一些送中央。

中央 1964年2月5日

上述《通知》中加粗加黑的那一大段文字，**是毛泽东在审阅草稿时加写的重要内容**。

2月5日这一天，甘泗淇上将60岁生日刚过两个月，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辞世，匆匆离开了与他相依为命30年的少将妻子李贞，和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

2月6日，北京雪后初晴，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3位科学家。

竺可桢被工作人员引入毛泽东的卧室，正在看书的毛泽东亲热地招呼他坐下。竺可桢正要问好，毛泽东却先开口了，他说：

“**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读了你写的关于中国气候特点的论文后，觉得也该管天了。”**

竺可桢说：

“那是我去年在杭州地理学会所提交的论文。”

毛泽东说：

“‘**八字宪法’在水、土、肥、密、种、保、工、管之外，还可以加‘光’（日光）和‘气’（气候）两字，**你应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竺可桢十分感动，连连点头，说道：

“我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

接着，他们谈起了碳水化合物合成的经过，对太阳辐射、温度、雨量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分析。说话间，李四光、钱学森也先后来到了，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李四光、钱学森的工作和身体状况，尔后仰靠在沙发上，对钱学森说：

“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呵！”

钱学森微笑着答道：

“我有所闻。”

毛泽东说：

“恐怕不只是有所闻吧？”

钱学森解释说：

“原子弹我实际上是只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毛泽东说：

“是的，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就差不多了吧？”

钱学森说：

“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

毛泽东问：

“那可以到夏威夷了吧？”

钱学森回答说：

“夏威夷的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毛泽东若有所思，轻轻地用手拍着沙发扶手，说：

“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了。”

钱学森说：

“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弹道导弹的方法和技术途径。看来第3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泽东抿了一口茶，看了钱学森一眼，说道：

“有矛必有盾，你们要集中些人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接着，毛泽东与科学家们谈到了地球形成之初的情况，煤和石油的演变过程，动植物如何进化；又从造山运动和冰川作用谈到了地质年代和历代气候的变迁。毛泽东最后还讲了宏观和微观世界，电子和反电子的辩证法。谈话一直到3点多才结束，意犹未尽的毛泽东把3位科学家送到门口，叮嘱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著作，请送我一阅。”

第二天，竺可桢便托人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送给了毛泽东。

事后，李四光对家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现象，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

2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说：

“**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3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题目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中说：大寨大队原是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自从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大寨大队的社员闸坝垒堰，把山沟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100多斤增加到700多斤。

社论中还说，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社论要求每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

2月13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

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春节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共16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

他还说：

“**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搞试点。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要关心溥仪，他说：

“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说：

“**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说：

“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困难。”

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章士钊又把载涛的一个小故事告诉给毛泽东，他说：在一次会议上，载涛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北房东南角塌了个大窟窿，让他赶快回家张罗修房。载涛放下电话，向主持会议的领导请假，大家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载涛说的虽然是玩笑话，可他也确有隐情。他的工资按说不算低，但他是大家庭，人多嘴多，可能一时掏不出修房的钱来。

毛泽东听章士钊如此一讲，便道：

“**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

他还对章士钊说：

“**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我经手借你两万元，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从他的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激动地说：

“毛主席的盛情可领，钱我们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

溥仪又转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就是幸福。”

李淑贤点头表示赞同。经章士钊一再劝说，溥仪方才把钱收了。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派秘书给章士钊送上“还债”的第一个2000元。并让他捎话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接到毛泽东这一笔钱，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要章含之转告毛泽东说：

“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

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微笑着说：

“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他还对章含之说：

“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毛泽东说，过了初五就启程，坐火车到江苏、浙江等地。

章含之回到家中，将毛泽东坚持要还钱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章士钊非常激动，他说：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收下主席的这一片诚意了。”

从这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总要派一位秘书送2000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

2月15日，正月初三。这天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叫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遗憾地对章含之说：

“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

章含之觉察到毛泽东的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但也不好细问。

不久，章含之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准备组织一部分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小四清”，章含之问毛泽东说：

“主席要学英语，我是否可以向学校请假？”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欲知毛泽东在北京还有什么大事要做，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一、第二卷中已经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对旧的教育制度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和他在创办夜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之时的重要改革活动。时隔数十年后，在1964年2月13日同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他郑重地提出“**学制可以缩短”**的问题，这无疑是**“教育要革命”**前奏。请看：他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14年了，这样害死人的学制和教育方针还能够容忍下去吗？毛泽东又说：**“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读书“**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联系不久前他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正在他那智慧的头脑中酝酿呢？！

**第32章**

**“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

**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

**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

**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话说在春节期间，回到菊香书屋的毛远新告诉伯伯说，他在寒假期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感到对“四清”的两个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刻。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

毛泽东认为，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参加一定的劳动，能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思想感情，应当提倡。

春节过后，江青找戚本禹谈话，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对李秀成问题的批示。

《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1961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高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这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李秀成自述》，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1963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得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高，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1964年春天，**毛主席在对新获得的太平天国的资料做了研究之后，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作出了16个字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在此之前，江青派人3次找过我，前两次我去了外地，第3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书沈同告诉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带我去江青家里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还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还拿给我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有16个字的批示，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批示后面还有‘退江青’的字样，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1966年5月那次我因为主席在上海召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总理从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作陪，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8点不到，我赴约去了。总理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就是在这次，总理告诉我他当时看过主席的批示。我原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2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毛主席当年一听说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就很恼火，以至于1966年3月30号，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我想，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再说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从广东送来的报告，反映了当前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提出了取缔高利贷活动的意见和措施，中央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有些可供参考。

中央认为：**结合当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高利贷活动进行一次坚决的打击和取缔，是十分必要的。高利贷活动这种对城乡人民的高利剥削，尽管去年以来已经有所收敛，但是仍然严重地危害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影响着集体经济的巩固，助长投机倒把和其他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这是阶级敌人在金融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必须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

关于打击高利贷活动的办法和措施，除了邓子恢同志报告中所提的意见以外，中央再指出如下几点：

一、必须划清界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划清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分别放高利贷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处理。**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主要按利息的高低来确定，一切借贷活动，月息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高利贷；月息不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正常的借贷。关于清算退息，凡是过去借贷双方已经清结完了的债务，除了属于地、富、反、坏、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所放的高利贷，应当清算退还以外，其他一般地可以不再追究清算，以免牵动过多，打击面过宽。

二、**必须在农村认真整顿和健全信用合作社，加强领导，改进工作，充分发挥它作为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的作用，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的金融阵地，打击高利贷。**关于整顿和加强信用合作社，坚决打击高利贷的问题，中央在1963年10月批转过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有关的报告，各地应当结合这个报告，继续贯彻执行。信用社干部调动越级批准制应该建立。信用社干部待遇要及早解决。

三、必须在城市机关企业和街道居民中，普遍建立和健全互助储金会，并逐步推行互助储金小组。这些互助储金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从职工和居民中自愿地筹集解决。为了使这些组织具有一定的周转力量，在机关企业，可以由工会和行政部门从经费结余、企业奖金或福利费中，酌量拨给一部分作为周转金；对居民互助储金组织，可以由民政部门从救济费中酌量拨给一部分作为周转金。必要时，人民银行也可以对它们发放小额的临时性无息贷款。

四、必须尽量安排城市闲散劳动力从事可能的生产劳动，特别是组织困难户的生产劳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酌量情况，实行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以工代赈办法，使有劳力而无收入或收入很少的城市居民，能够通过这些安排，获得一定的收入。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高利贷的有效办法。对于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互助以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应当给予社会救济，使他们生活有适当的着落。同时还应当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群众中进行勤俭持家的教育，使群众克勤克俭、艰苦朴素过日子，尽量减少开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必须指出，**高利贷的猖獗，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在给高利贷分子以坚决打击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农贷、信用社、储金会、社会救济，以及安排群众生活，安置闲散的劳动力从事生产等。**我们有坚强的国家政权，有庞大的经济机构，国家每年都拿出相当数量的救济款和农业贷款，加上农村的信用社和城市的互助储金会等群众性组织，只要做好工作，我们完全有条件妥善地解决群众的临时困难，**打退高利贷的进攻。这是金融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消灭它。**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最近专门讨论一次有关打击高利贷的问题，并将讨论结果和打算采取的措施，向中央作一次报告。

此件发至县级，传达到有关单位。

中央 1964年2月15日

2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他在同金日成的谈话中说：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毛泽东还说：

“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这时，参加会见的一些朝鲜客人开始悄悄地交头接耳，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喝了茶水继续说：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毛泽东：

“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又问：

“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了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毛泽东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他还说：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谈到“七评”一文的写作过程时，毛泽东说：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18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后来吴冷西在回忆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

再说毛泽东在同金日成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所。护士长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向吴旭君说起了和金日成会晤的事，他说：

“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

吴旭君见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又劝慰他说：

“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叹了口气，开始抽烟，继而又说：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吴旭君见毛泽东这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喃喃地说：

“主席的身体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那可是我的责任。”

“出不了问题，我注意着呢！”毛泽东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的信件。信件的署期是1964年2月29日。

前边已经说过，赫鲁晓夫1963年11月29日给毛泽东的求和信，是由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1963年12月3日送达的。

毛泽东的答复信措辞严厉，实际上是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答复信的最后部分，对赫鲁晓夫停止公开论战的要求，提出了4点建议，其中一点是于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

3月7日，苏共中央复信给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答复信逐条批驳，指责中国共产党“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

复信中同意在北京进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10月提前到5月。

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了北京，希望对中苏关系做一些调解。毛泽东等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作了一些解释。

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6期上，就**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理局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3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3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1964年3月10日

这个批示下达后，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了教学改革的试点工作。

3月16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问题，他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计等不到我们的八评、九评、十评发表，他就会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会发起一个反华运动。**因为他看到罗马尼亚的停战要求被拒绝，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毫不妥协，只有他认错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他能认错吗？他不会认错的。这次公开论战，我们已下决心继续下去，而赫鲁晓夫、苏共中央，这个大概也下了。**苏共中央这样急如星火，就是要开国际会议，对我采取集体措施。这似乎是下决心准备破裂。**信中提出中苏两党会谈，开起草委员会、开国际会议、从5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节）办完这几件大事，显然是要走过场。我们上次在复信中提出了这个会，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决分歧。看来赫鲁晓夫如意算盘一是应付我，也敷衍反对分裂的兄弟党；二是为公开分裂做准备，把分裂责任推给我；三是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苏共3月7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是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看，我们不知道你们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定在今年10月也不行，要推迟到明年5月。来信不是说要在今年5月会谈吗，我们就推迟到明年5月。至于起草委员会，要到明年秋天才能开，后年再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是从来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到复信里边去。**

两党往来的信件要考虑发表，但是要看看赫鲁晓夫对我们这次复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要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7篇文章，再有3篇就10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目，可以写文章**。还有，在最近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里，苏联跟我们的争论越来越频繁。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占多数，但是亚非拉一些国家是赞成我们的，所以争论很激烈。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工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都是这样，世界和平大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说清楚在国际民主组织里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可以写文章。”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哥穆尔卡3月中旬来信中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我们复信里面，要表示欣赏他说我们有权利答辩这一点。至于他呼吁我们停止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跟罗马尼亚党谈了些什么告诉他，用这个办法来答复他。就是说，我们跟罗马尼亚党是这样讲的，跟你哥穆尔卡也是这样讲的。**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是完全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3月17日晚，毛泽东为“八评”写了一段开篇语，他写道：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后来，康生、吴冷西及写作班子其他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的末尾增加了两段文字：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机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3月18日，毛泽东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亨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

安吉！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信中所说的“寄书”中的“书”即后文中的“高文典册”，指高亨的研究著述；“寄词”中的“词”指高亨填写的**歌颂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一词。高亨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山东大学校领导不失时机地将毛泽东写在信封上的“山东大学”4个字，复制成了他们的校牌；这首《水调歌头》也因其境界阔大，气韵雄壮，在《文史哲》上发表后流传很广，在传抄流转中有人便误认为是毛泽东的词作。在1966年初，康生曾当面求证过毛泽东。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是山东大学一位知识分子写的。康生便建议《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水调歌头》，以正视听。196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右上角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并加了一个说明：“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10首的活动，在笔谈中，作者写下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水调歌头

山东大学教授 高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3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堪称毛体书法精品**的回信。

原来，华罗庚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决心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在给毛泽东的信和诗中，他充分表达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身生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风易受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旧胎，才能入得门来。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华罗庚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异常激动，逢人便说：“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我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这一年华罗庚写出了著名的《统筹方法平话》。后来，他还到西南某工地推广“统筹方法”。

3月19日，毛泽东翻阅了中共中央联络部的1份文件，上面载有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的一封信。他在文件上批示道：

江青阅。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 3月19日

3月21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

吴冷西趁机汇报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

他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吴冷西说：

“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

毛泽东说：

“**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大概在此后不久，毛泽东便写出了一首新作《贺新郎·读史》，其词云：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从人类诞生到生产力发展，从阶级斗争到奴隶和农民起义，一直写到社会主义**，纵贯几百万年的历史，而着墨仅仅只有115个字，的确是气象恢宏，古今罕见。

3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党委： 

中央早就指出：**这次“五反”运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也像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是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革命运动。**凡是认真地正确地开展“五反”运动的地方，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大大推进了生产和工作，出现了一派新气象。经验证明：通过“五反”运动，不仅可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一步，而且可以促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更快地全面好转，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方的“五反”运动大有放松的趋势。有的地区和单位对“五反”抓得不紧，使运动拖拖拉拉，进度很慢；有的地区和单位，把“五反”运动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使运动陷于无人负责的自流状态，甚至半途而废地停止了。如果不及早提起注意，这些地区的“五反”运动就有滑过去的危险。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不利的。

“五反”运动是推进工作和生产的一个巨大动力。“五反”运动必须坚持进行，搞深、搞透。凡是放松的或者停顿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重整旗鼓，把“五反”进行到底。必须把“五反”运动同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开展比学赶帮的增产节约**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把它们对立起来和用上述各项运动代替或者挤掉“五反”运动都是错误的。**在“五反”运动中要强调干部自觉革命，认真地洗手洗澡，彻底反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使机关作风革命化、企业作风革命化；要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和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斗争；要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只有把这几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五反”运动才能取得全胜。

“五反”运动能不能搞深搞透，关键在于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引起重视，把这一工作继续抓紧。要全面规划，有步骤地开展运动，力争在1964年搞完或者基本搞完这个运动。要加强运动的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注意总结经验，用具体经验指导运动；要派强的工作组到那些领导力量薄弱、运动开展不好的单位去指导和帮助工作。绝不能放任不管，听其自流。 

现在把华北局《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内完成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和中南局《关于当前“五反”运动的意见》，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对本地区的“五反”运动进行一次检查，作出具体安排。 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大、中工厂、矿山、交通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党委、党组，各大、中学校党委，科学、文化机关党委党组，省、专区、县3级政府党委、党组：

我党从1963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3年到4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3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3月16日的报告，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1964年2月10日的报告（即总政治部《关于全军学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总结报告》、《曲阜颜家村大队根据中央两个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笔者注）。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

3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谭震林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做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上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3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讲到了老粗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3月25日，毛泽东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即“**九篇文章”**）一文，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两个批语，全文如下：

一 刘（少奇——笔者注，下同）、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各同志阅。**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毛泽东 1964年3月25日

阅后退毛。

二 送陈毅同志一阅。退毛。

3月26、27日下午，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搞上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现一点友好之意。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赫鲁晓夫在3月7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开国际会议。看起来也可能是一种讹诈，估计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有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议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的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总理在‘二十二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我们讲过，赫鲁晓夫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是可能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现在中苏会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谈不拢的。与其谈得破裂，还不如推迟谈判。**今年不谈，明年再谈，明年谈不拢再推迟，尽量推迟分裂。**但是我们思想上也得准备，准备赫鲁晓夫贸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推迟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月27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

3月28日，毛泽东途经河北邯郸，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及河北省5个地委的负责人开“四清”工作座谈会。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说，山西全省从去年12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前十条》、《后十条》，在点上的公社里正在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

陶鲁笳回答后，毛泽东嘱咐说：

**“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有人在汇报中说：

“教授下乡搞‘四清’，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懂。”

毛泽东想起毛远新说对‘四清’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的话，便插话说：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有人汇报到一些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

“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前十条》、《后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陶鲁笳在汇报中说现在自留地减少了，毛泽东说：

**“自留地不能太少了。”**

陶鲁笳汇报到水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毛泽东说：

“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

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

“**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

陶鲁笳在汇报中介绍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经验，说陈永贵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深受群众爱戴。大寨党支部有这样一个口号：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毛泽东说：

“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还向毛泽东汇报说，在1963年的抗洪斗争中，陈永贵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硬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他还告诉毛泽东，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陈永贵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问道：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3个字给毛泽东看，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泽东听了十分感慨，他说：

“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指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及《人民日报》社论——笔者注）我没有看。”

陶鲁笳让秘书把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找来，连同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给了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在同陶鲁笳等人谈话中说：

**“看来农业要学大寨。”**

在离开邯郸去郑州的途中，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

后来周恩来指示廖鲁言带领3名助手于4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调查研究了20多天，于5月25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说，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3月30日，毛泽东抵达郑州。这一天和4月1日，他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先后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座谈“四清”问题。他在听取汇报中插话说：

“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地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能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八评”**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措辞也愈加尖锐。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到了武昌。

这天下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他说湖北这一年计划50%的社队要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他：

**“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程？”**

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面对苏共采取的使论战升级的这一步骤，**毛泽东决定，一面继续写“九评”予以反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绝妙的一个措施，就是给赫鲁晓夫发一个70寿辰的贺电。**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越要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态度。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4月5日、6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发表讲话中放肆攻击中国，他说：

“中国认为斯大林好，攻击我在苏共中央“二十二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么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就把斯大林搬走，和他一起生活吧。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就是说，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了就够了。也许在一些炎热的国家里，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给赫鲁晓夫贺电稿的修改及其它问题。他首先说道：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提出了4点意见：1、贺电中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2、在报刊上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3、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修改后再发。到时候可以把去年11月29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4、继续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

4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签署的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

此前，毛泽东特意嘱咐，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欲知毛泽东后来又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细细地琢磨一下毛泽东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提议给赫鲁晓夫写祝寿贺电的那些话，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预言。不久，在苏联高端发生的反赫鲁晓夫政变，以及政变后上台的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态度和他推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无不证明了毛泽东那神奇的远见卓识和他那惊人的预见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第33章**

**“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

**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

话说1964年4月19日，刘少奇在接见朝鲜文化代表团的时候，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文艺上的不同观点。他说：

**“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们的方针，不能绝对化。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这话刚刚传下来的时候，吴晗和夏衍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还是刘主席说得比较客观。当他们正要准备新的活动时，又传下来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

“刘少奇讲的算放屁，他懂得什么艺术和政治，完全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张目。”

这样一来，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动了。

4月20日，《人民日报》为了贯彻和配合毛泽东在工业战线掀起的学大庆群众运动，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合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通讯中报道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祖国抛掉贫油帽子而忘我拼搏的感人事迹：大庆工人以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干和白天干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一个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会战中，创造出了以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铁人精神。大庆工人仅仅用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建成了高产、稳产的大庆油田。国家投资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

《人民日报》还在《编后话》中写道：

“**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此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大庆油田的报道。

4月23日晨，毛泽东抵达杭州。

4月23日这一天，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假休养以来，他已经很少和毛泽东联系了。他写道：

主席：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3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3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选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35——37页），但似并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向江青同志问好。

胡乔木 4月23日

这封信是胡乔木发给毛泽东的第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已经可以工作了。可是，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能“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还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要他做“一二三年”养病的长期打算？所以，这一封试探性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4月24日，毛泽东看了3月4日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期。他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道：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5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  4月24日

4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以及《真理报》配发的反华社论。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等人的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

“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林乎加感觉《六十条》对社办企业劳力的投入限制有问题，他问，过两年是否修改一下。毛泽东说：

“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有了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

4月30日，毛泽东就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问题，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写了一个批语，**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及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他写的是：

“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的预言果然又一次应验了，这个会后来还真的没有开成。**

1964年5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了“五一”节。

5月2日，毛泽东到了上海。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委员会，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按照报告的精神研究执行。 

**克服中小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的思想，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而且是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培养坚强的有文化的劳动的革命后代、发展国家科学文化的根本大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应该在社会上和中、小学校中正确地和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校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注意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切实做到既克服了学生过重负担，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

各级教育领导部门还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好学校和好教师的经验，树立活的样板，做到方向明确，方法稳妥，**防止发生另一方面的偏向，例如因为减轻了学生负担，就降低了教学质量，就重新发生开会过多或劳动过多的现象，就把课外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以致学生不能好好温课和休息，就不安排应该安排的课外作业，就不去督促学生勤奋学习等等。**对于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应该用耐心说服的办法，决不可采取简单急躁、强迫命令的办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信件的日期署的是5月7日。《人民日报》同时还全文刊登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它6封来往信件。

中共中央5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是经过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的。在信中**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关于两党会谈及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问题这3个要点中，后两个要点都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他在复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5月9日这一天，林彪听取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的汇报后，对军队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指示，他说：

“**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要大抓创作。有了好的创作，文艺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才能起到改造人的作用，才能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林彪发出这一指示的时间，仅仅离刘少奇对外宾讲“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这些话，只有一个月。

5月10日，毛泽东离开上海北返，一路上先后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连续听取了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

原来在5月9日，毛泽东接到北京的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给他汇报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第3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就让他们在南京上了专列。

5月10日这一天，李富春等人汇报了第3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它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

关于农业方面，毛泽东说：

“**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针对上建设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毛泽东说：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问题，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它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

李富春等人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

“**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在谈到如何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

“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份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份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给了大家。”

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说：

“**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山东曲阜的一个农业生产集体典型——笔者注）和**大寨。**”

他还说：

**“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4条标准，他说：

**“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5月14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战备为中心的第3个五年计划，一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6月17日才结束。

5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维托和齐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在座。毛泽东和客人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维托：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毛泽东：**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维托：特别我国小，人少更重要。

毛泽东：**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维托：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毛泽东：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维托：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毛泽东：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维托：专政。

毛泽东：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维托：完全同意。

毛泽东：**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维托：还有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的太多，太久了。

维托：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毛泽东正准备结束会见，原本应该参加这次外事活动的陈荒煤因接到通知晚迟到了，工作人员只好把他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毛泽东看了陈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毛泽东说：

“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陈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自从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20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到毛泽东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毛主席记忆力这么好。毛泽东问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陈荒煤汇报说，大家正在学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毛泽东却不高兴地说：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我那个《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注），可就是不执行！”

他转对外宾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没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用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你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之外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毛泽东最后说：

“问题扯得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各党组，总政治部，团中央：

目前全国各方面的形势已经开始全面的好转，普遍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在农业好转的基础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开始出现了新的工农业生产的高潮。各项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来，是健康的、正常的，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作基础上的。有**很多领导机关的干部下去蹲点，深入到车间、生产队参加劳动，进行调查研究，作风有很大的改进。这是压倒一切的主流，是主导的方面、根本的方面。**

但是，同时也发现有极少数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或者企业和生产队，发生一些歪风。**他们不是学习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而是追求表面的华而不实的轰轰烈烈，滋长起一股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他们滥用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滥搞集体业余活动，随便加班加点，浪费、消磨和糟蹋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个别单位，也发现不是根据实际可能和必要，制定积极的而又留有余地的可靠的生产指标，而是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即最后不可能实现，注定会使群众情绪遭受挫折的指标。**这些现象，虽然还是部分的、个别的，或者只是初露苗头，但是如果不及时加以克服和防止，任其发展起来，必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

此外，**还有不少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不下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而喜欢靠没有准备的会议、烦琐的表报和冗长的文件来指导工作，爱开那种多、大、长、重、空（即次数多、规模大、时间长、内容重复、内容空洞）的会议，爱发那种又多又烦琐而毫无用处或者很少用处的表报、文件。每个会议不分有无必要，都要层层传达，好些表报、文件还要层层加码。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衙门化的作风，决不是革命的作风。还有些领导机关脱离党的当前中心工作，乱布置任务，乱提过高过急的要求，样样都想打歼灭战，以致使基层单位接应不暇，疲于奔命。这实际上是要使各项工作，不分轻重、齐头并进地“大办”，分散下面的精力，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和部署，抓住中心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同中央关于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的指示相违背的。**这一时期，中央许多部门召开了过多过长过大的会议，不但加重了下面的负担，而且起了坏的示范作用，中央主管机关对此控制不严，是有责任的。**

现在，摆在全党面前的严重任务是，在群众革命和生产的高潮面前，领导干部要更加头脑清醒、更加注意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高度珍惜和善于运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领导好，使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工作持久的健康的向前发展。

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全党领导干部，首先是中央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请你们注意。

一、精简会议和表报问题。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检查、纠正任务多、会议多、表报多、文件多的现象。一切不是绝对需要的表报，必须全部坚决废除。会议必须尽可能减少，对于中央决定和指示的传达，要有通盘规划，有计划地进行，一切无准备的、没有内容的或者内容重复的会议都不要开，凡是开短会可以解决问题的就不要开长会，参加的人数可以少的就不要多。

二、报刊、广播的宣传问题。**宣传，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要宣传可以普遍推广的先进经验。一切准备公开介绍的先进经验，都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反复核实。**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上的负责同志关于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的讲话，除非经过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批准，不要任意登载。一切可能助长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宣传报道和广播以及文艺作品，必须坚决制止。**

三、注意劳逸结合。**各级领导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的形势下，尤其要注意劳逸结合，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和群众的健康。**现在有些企业随便加班加点、滥搞职工集体业余活动的现象，必须严格禁止。确实因生产需要必须加班加点的，也必须尽量减少，并且经过批准。群众集体的业余活动，不得过多，并且必须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必须保证职工每天能有8小时的睡眠时间，使职工有一定的业余自由活动时间。**

四、参观学习问题。**参观学习是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成功的、有效的方法。**但是参观学习必须讲求实效，要派真正能够把先进经验学到手的人去。**现在外出参观过多，使接待单位苦于应付，招架不了，妨碍生产和工作。**各地在学解放军、学大庆的运动中，要注意学习外地的经验，但主要应该总结本地的先进典型树立标兵，借以推进工作。确实需要外出参观学习的，必须严格控制，人数、次数必须减到最低限度，到外省、市、自治区参观的，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进行。

五、增加编制问题。现在，有些企业要求增加职工，中央一些部门也要求增加本系统的编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总的说来，我们现在的职工人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958年以后乱增职工的教训必须记取，一定不能重犯。**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总编制，非经中央批准一律不许增加。中央主管部门批准增加职工时，应该实事求是地作统盘考虑，原则上应该从严，凡不是绝对必需的都不要增加。少数企业、事业单位要求增加职工的，要由中央主管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派人下去，一个个地深入检查，首先要尽可能通过改进技术、改进设备、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来解决。确实非增加不可的，要经中央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且首先要尽可能从各部门已有职工中调剂，绝不允许不经批准就擅自增加职工。

六、关于“五反”、“四清”和生产问题。**必须继续抓紧进行“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和反修正主义教育。**同时，必须抓紧生产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目前正处在紧张阶段，尤其必需抓紧，**一切工作都应该服从生产的需要，只能促进生产，而决不能妨碍生产。**革命工作和生产工作，必需密切结合，至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为重点，由各省市区党委因地制宜地决定，并且作具体部署。

以上几个问题，主要是向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机关提出的，中央希望你们详细地讨论和研究，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

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地方，应当继续努力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则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并且对薄弱和落后环节加强领导，继续教育、提高和发动群众。一般说来，现在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持久地保持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的干劲用得合理、“用在刀刃上”**，却要困难得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很好地总结和吸取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好的东西要发扬，缺点、错误要防止。**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要做冷静的促进派，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高潮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扎扎实实地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可能和必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还必须注意，各级领导同志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而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工作中的问题。**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要提倡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做老实事，说老实话，既报喜，也报忧，既讲成绩，也讲缺点，领导同志一定要允许下级干部反映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那种不准别人反映矛盾，听到反映缺点就不高兴，因而使得下级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地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思想作风，是错误的、有害的。

各级领导同志应当切实加强运动的领导，如果发现有上述那些问题，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解决。因为**上述各项错误缺点，还只是个别的和部分的现象，而且有些还只是萌芽，因此，现在不要开大会、做大报告、笼统地一般地纠偏，更不能向群众泼冷水，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如果群众有盲目提高生产指标、自动提前上班之类的缺点，应当采取启发、诱导、商议的方式，使他们认识缺点，权衡利弊，自觉纠正。

中央认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只要全党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克服和防止上述缺点，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健康地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中央 1964年5月18日

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

5月28日，毛泽东与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话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1964年6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会议简报上给吴冷西写了一段批语，他写道：

冷西同志：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5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就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6月3日

6月4日，毛泽东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31期。这一期通讯刊载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1964年**5月9日**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汇报的消息及**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他对林彪的那个谈话非常感兴趣，**就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毛泽东 6月4日

6月5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由21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

周恩来在会演开始前夕，以书面形式指示文化部说：

“这次观摩演出和领导小组，应该邀请康生和江青两同志为顾问。”

彭真为此对陆定一、周扬说：

“**堂堂的一个北京市千万不要让江青给指挥了**，我们北京市还是有人才的嘛。**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京剧改革的旗帜夺回来。**”

陆定一和周扬及彭真等人研究后，准备在顾问里加上田汉、阳翰生、老舍、马连良、焦菊隐、陈云卫等人。后来不知道是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打来了电话，他严厉地说：

“这次演出的顾问必须是康生和江青同志，这是报告了毛主席的，你们要是不经请示乱加人，要小心后果！”

这一来，彭真只好对陆定一说：

“算了算了，就按照总理的指示办吧，我们只要在整体工作上加强领导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把会演的整体方向把握好，不要出其他的政治问题和艺术上偏差。”

就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前一天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时还说：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再说6月5日这一天，齐燕铭主持了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式，由沈雁冰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

这次观摩大会盛况空前，有29个剧团计2000多人参加了演出，先后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此前，江青和周扬、林默涵等人之间，在戏剧改革方面曾经发生了不少矛盾。

早在1963年，周扬和林默涵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组织了一个京剧试验剧团，江青建议他们移植豫剧《朝阳沟》，并说一定要在京剧音乐的基础上革新，探索出一条用京剧艺术形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但周扬和林默涵却要另辟蹊径，要探索新的路子，结果排出来一看，却成了一出不三不四的新戏。江青看了彩排，大为恼火，她说：

“京剧《朝阳沟》的音乐不是步子迈大了，而是迈歪了。我是让你们发展京剧，而不是让你们毁灭京剧。这个戏不准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

周扬听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朝阳沟》不好不拿，好也不拿，江青不同意就不好办。”

林默涵说得更清楚：

“这个戏不是艺术上拿不出去，而是江青同志通不过。以后再拿出去，自有公论。”

此外，周扬和林默涵、张庚等人还精心搞了一个《红旗谱》的连本戏，调集了大量的人和物，精心排练。张庚说：

“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红灯记》不是方向，《红旗谱》才是方向。”

江青听到这些，马上调看了《红旗谱》剧本。她说：

“你们这个戏的基调有问题。”

她拒绝看彩排。康生也说：

“我们提倡现代戏，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现代戏。对现代戏也要一分为二，有革命的现代戏，也有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现代戏，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这一来，周扬又去请示彭真和陆定一。此时，毛主席发出了第二个文艺方面的批示，在这种情况下，周扬等在第二次审查时终于忍痛割爱，把《红旗谱》拿掉了。他们说：

“江青已经露出风来，说这出戏是歌颂‘左’倾盲动主义的，我们不能再搞了，再搞会吃亏的。不过，‘左 ’倾盲动主义也是革命，不是反革命的戏。算了，《红旗谱》不搞了。”

这里也不得不说一说《红灯记》剧本改编的事。前边已经说过了阿甲奉林默涵之命与翁偶虹改编《红灯记》剧本，待他们改编好了以后，又由阿甲亲自执导排演。演员的阵容很强大，扮演李玉和的AB角分别是李少春和钱浩梁，扮演李铁梅的AB角分别是杜近芳和刘长瑜，李奶奶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是非袁世海莫属。其间，林默涵带领《红灯记》剧组到上海学习观摩，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一块儿去，观看了两场沪剧《红灯记》的演出。

江青也在《红灯记》的排演过程中，先后于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一天先后2次）、11月5日，先后7次到现场观看，并接见剧组成员。

在排演《红灯记》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对剧情细节的安排问题，对唱腔的设计问题，在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导演之间，江青与演员导演之间，意见相左的事时有发生，见仁见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人记载了不少关于江青对于排练《红灯记》所提出的意见，这里就不再一一附录。

不管在排演《红灯记》中有多少矛盾，都不需拿来说事。但在后来的演出中出现了演员阵容的重大变化，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李玉和、李铁梅的扮演者均由原先的B角钱浩梁、刘长瑜代替了A角李少春和杜近芳。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瑜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3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亮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关于江青和程砚秋的关系，章诒和在《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文章中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她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

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也曾撰文说：在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江青约姚文元一起观看程砚秋主演的影片《荒山泪》，她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了，又和姚文元冒着风雪去看望程夫人果素英，对程夫人问寒问暖，还认真看了程砚秋的剧照。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对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江青还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由于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了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并说：“请江青同志保重，请你为我给毛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言归正传，再说6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他说：

“1、要看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没有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说：

“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陶铸、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说：

**“那没有东西嘛！”**

接着，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

**刘少奇插话说**：

**“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

**毛泽东说：**

**“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插话说：

“现在下边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

毛泽东说：

“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宋任穷同志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大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置，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汇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

毛泽东还谈到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他说：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原来，杨献珍于1963年2月在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又说：“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据曹轶欧回忆说，毛泽东批评杨献珍的起因是这样的：“1964年，有一个叫林青山的人和一个叫艾恒武的人，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发明，这个观点是明显地反辩证法的。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康生对我说：‘**为什么政治上叛党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学术上都要和毛泽东唱反调呢？**这如果不在理论上找到原因，就会使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认识不了当前的形势，就会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此后，康生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来总理，大家都认为应当批判。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后，在中央会议上说：‘康生的意见是对的，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说：‘要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弄清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于是，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了一些人开始写批判和讨论的文章。”

就在这6月上旬，章含之参加完“四清”运动又来到菊香书屋，继续教毛泽东学英语，可她看到毛泽东是越来越忙了，学习英语的情绪也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了。据章含之回忆说：有一天，毛泽东在学完英语后对她说：

“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上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章含之忙说：

“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再学了。”

自此以后，章含之在6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机会再见到毛泽东。

6月11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尔后，毛泽东作了简短的总结，他说：

“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好一个“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不知读者诸君您信不？反正我是相信的，有小诗为证：

戈氏叶氏原形现，苏联东欧变了天。谁言人心死如灰？世道从来有循环。

一从普京评章后，不朽马列上史篇。毛公斯言立存照，留与后人细细观！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批判修正主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3年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1964年又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通过这一系列的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的确使全社会的人们无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即使在那种物质并不发达的条件下，人民群众也都自觉自愿地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克勤克俭，无私奉献，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形成了毛泽东时代人人遵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准则。**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也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34章**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要特别警惕像赫鲁**

**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话说1964年6月13日，也就是在现代戏观摩大会期间，张春桥向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介绍上海创作《智取威虎山》的经验，讲到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映。会后，陆定一在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上大发牢骚，他说：

“**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都是形式主义！不要弄成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一切绝对统一。**当初长征时，红军打到云南，天天吃宣威火腿，开头还新鲜，过了半个月，一见就厌烦，再也不想吃了。**现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捧上了天，成了万能的灵丹妙药**，哪里有那么一回事？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哗众取宠，吹牛皮。有些人没读毛选也是很好的，也有些人读了毛选，还是一塌糊涂。这次戏剧会演，你们也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让一些人把你们的脑子搞糊涂了。”

有人把陆定一的这些话报告了江青，江青冷笑道：

“有人听读毛主席的书，就像抽他的筋似的。让他们喊叫嘛，有本事来大会上来讲，躲在他妈的阴沟里放屁算什么好汉！我就是要给他们念咒，让他们头疼，让他们发抖，让他们鸡叫驴喊。”

6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卡瓦瓦，他在谈话中说：

“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建设历史。它们几百年建成这个样，我们几十年赶上，时间不是并不那么长吗？**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就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说得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比西方更好一些。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是不反对我们的。在美国人民中就有很多人是赞成我们这一方的，如美国专家有一些在我们这儿当编辑、翻译，也有的在我们的外国语学校帮我们教学。我们抗日战争时，就有个加拿大的医生在我们这儿工作，后来牺牲了。要把他们的政府、垄断资本家同广大人民分开来看。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第一条，你们有人民；第二条，你们在非洲是个大国，有很好的土地，可以搞农业和畜牧业；第三条，可能有很多地下矿藏。这几条中，首先一条是你们有人民，有很好的人民。

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不要讲很久以前的历史，就讲10年前和10年后就大不相同。10年前，埃及在1952年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还没有收回。10年前还没有开万隆会议。世界变化相当快。

历史和未来不仅属于非洲人民和亚洲人民，而且属于所有欧洲、美洲各国人民。我讲的是人民，不是那些大资本家。”

卡瓦瓦真诚地告诉毛泽东：

“我们非常欣赏中国对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所主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特别是你们的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毛泽东说：

“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自己还是被压迫者，这就是说台湾还没有解放。自己还是个不发达的国家，去打外国人的主意，像话吗？如果哪个中国人在你们那儿做坏事，你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把他撤回来。你们也可以把他赶回来。

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我们也有跑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去的人，他们看不惯社会主义，想跑，跑一点也可以，我们人本来就太多了。**

**我们之间相互平等，讲真话，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6月15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彭真、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康生、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陪同下，与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领导人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一起，来到北京西郊区射击场，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的汇报表演。

本卷前边已经说过，贺龙、罗瑞卿在1964年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的指示，领导全军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练兵、大比武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了贺龙的汇报以后，他决定亲自检阅一下部队的训练情况。

射击场里，半自动步枪射击表演开始了，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用望远镜观察着。济南军区的射手宋世哲射击完毕，毛泽东热烈鼓掌，连声说：

“打得好！打得好！”

他交代工作人员说：

“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

宋世哲跑步上了观礼台，恭恭敬敬地用双手递上半自动步枪。罗瑞卿接过枪，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半自动步枪，1963年装备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有用过这样好的枪。”

毛泽东兴冲冲地接过枪，端起来做了几个瞄准姿势，开心地笑了，问：

“这枪都好准吗？”

宋世哲回答说：

“报告主席，非常准。”

毛泽东微笑着点头，又问：

“训练苦吗？”

宋世哲回答说：

“报告主席，不苦。”

毛泽东说：

“是的，训练就要不怕苦。**不怕苦，枪才能准，才能打败一切反动派。**”

接下来是北京军区部队表演半自动步枪快速精度射。毛泽东问：

“什么是精度射？”

罗瑞卿说：

“‘少而精’的精，是打得准的意思。”

表演结果是4名射手都是40发40中。毛泽东站起来鼓掌，他说：

“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

杨得志说：

“没有那么多子弹，1颗子弹3个鸡蛋。”

杨勇也说：

“1颗子弹2毛钱。”

毛泽东说：

“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

在济南军区部队表演轻机枪速射时，毛泽东问杨勇：

“枪要夜间打，有夜间的吗？”

杨勇说：

“有，今天请主席看看，夜间打枪打迫击炮。”

毛泽东说：

“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在很黑的夜间搞，什么也看不见。”

杨勇说：

“我们正在突击搞夜间训练。夜晚，15公尺，我们根本什么也看不到，经过训练的战士能看到。”

毛泽东说：

“夜间训练不容易看到。”

杨勇说：

“我们现在每个团都有搞夜间训练的连队，晚上练技术也练战术，但夜间训练还要有个白天的基础。”

毛泽东说：

“是要有个白天的基础。”

他看完机枪速射表演这个项目后，对贺龙说：

“不错嘛。”

贺龙说：

“因为主席来，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

毛泽东说：

“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

贺龙说：

“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

毛泽东说：

“什么叫‘夜老虎’？”

贺龙说：

“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他回过头对杨勇说：

“敌人越凶越不要怕他！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人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他。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他一口，吃不了大的就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1945年七大，我讲了17条困难，其中1条是‘赤地千里’。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要两分法。”

毛泽东来到侦察分队比武场地，杨勇向他介绍了侦察分队的几项主要训练项目。毛泽东问：

“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

杨勇说：

“还没有。”

毛泽东说：

“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河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他来到擒拿格斗场地，在一个画着蒋介石头像的沙袋前停住了脚步，说道：

“蒋介石，久违了。”

说着，他对着这个沙袋连打了3拳，引得周围的人一片笑声。在观看汽车通过铁轨桥时，毛泽东看着一辆汽车沿铁轨倒回去，就笑着说：

“谁说不能开倒车？这不是开倒车嘛！”

杨勇说：

“每个军种、兵种，每个战士都有一套过硬的本领。”

毛泽东说：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这天晚上，毛泽东看了“夜老虎连”的表演，非常满意，表扬贺龙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得好。

6月16日下午，各种军事表演结束了，毛泽东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众人等来到了昌平县的十三陵，他乘兴拉着罗瑞卿一起在十三陵水库游泳，心情极其愉快。

接着，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编制第3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计划设想，他插话说：

“**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3个因素。”**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此后，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二是要搞接班人。”

“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厂。”“省对军队、对民兵要过问，你们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委，多少年不执行任务，只是空头政委，不抓军事，一旦发生问题，就会手忙脚乱。不管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

“要把民兵很好整顿一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整顿，组织上整顿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组织确定下来，有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而且真正起作用。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也要组织起来，一旦有事，拿起枪来就走。有人说，当3个月民兵精神面貌是不同啦。民兵组织要有组织，有兵、有官，要落实。现在许多地方不落实。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有政委、教导员、指导员。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讲清，不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你慌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张了，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就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剥削谁呀！”**

“**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是不行的。**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的，还要搞武的，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得快些，但不要毛糙。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子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总而言之，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没劲，有了准备，不怕，就有劲。**”

关于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和平演变问题，帝国主义说我们的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讲话灵不灵呢？我们希望他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赫鲁晓夫就是第3代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使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3代或者第4代身上的预言彻底破产，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5条：

第1条，要经常观察和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2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中央主席。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3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5个指头，4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24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5朝领袖，第一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个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95%。

第4条，要有民主作风，有事要跟同志商量，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们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泽覃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话有道理。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

第5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3个仗，胜2个，败1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打死、淹死、飞机炸死等等，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后来，毛泽东讲的这5条内容，被写进了“九评”里面。

6月17日，从5月15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毛泽东委托刘少奇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一下调整。于是，刘少奇就要求各省市以地区为单位，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集中工作队于重点县，上下左右同时清理。

6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6月15日的一封来信。毛泽东指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了“九评”再说。

6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到场时，陆定一已经在座，彭真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续到场。毛泽东首先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人民日报》1961年12月发表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做过交代，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对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做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他指着吴冷西，接着说：

“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

《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是100%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6月23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参加现代戏观摩大会的各个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及创作人员，一共有300多名戏剧工作者，并和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座谈会。周恩来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大演现代戏是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一定要把毛主席关于文艺方向的指示贯彻到底，一定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处理戏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康生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现代戏是要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的，要警惕有人搞反革命的现代戏。因为现代戏，革命的人们会使用，反革命分子也会使用，我们不能让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阵地搞颠覆我们政权的活动。”

江青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说：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戏曲应该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应该深思一下，我们的戏曲究竟是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呢？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3000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江青还在讲话中3次赞扬了上海市委，她说：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的。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张春桥也在这次全国性的会议上亮了相，他着重介绍了上海领导创作现代戏的经验，他说：

“我们在江青同志的指挥下，一开始就把排演现代戏的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占领文艺阵地的高度，提高到我们的文艺和戏曲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这就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的方向。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江青同志提出的创作革命现代戏的要求，闯出一条属于无产阶级的崭新道路来。”  
     会后，陆定一和周扬等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人请示彭真等人说，周恩来总理认为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要，我们该如何宣传？彭真等人说，一是不需要在全国广泛传达，二是要求新闻界采取“不宣传、不报道、不讨论”的方针。就这样，他们压下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的讲话。

6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他在谈话中关于人的改造问题说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说：

“溥仪现在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自由了，可以到处跑了。过去当皇帝他好不自由。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人是可以改变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说：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1950年到1953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6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等，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

关于军事理论问题，毛泽东说：

“1936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10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

　 6月24日晚，毛泽东利用王海容放暑假的机会，用很长的时间和她谈了话。

王海容是在北京化工厂当了一个时期的徒工后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她时常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毛泽东在和她的谈话中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同时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见解，主要内容如下：

王海容：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出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文写的，就写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泽东：他写的什么反动标语？

王海容：我就知道一条，是“蒋万岁”。

毛泽东：英文怎么讲？

王海容：Long live 蒋。

毛泽东：还写了什么？

王海容：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还是章含之告诉我的。

毛泽东：好嘛！他多写一点儿贴在外边也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哪？

王海容：不知道他杀人不杀人，要是查出来，我看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泽东：**只要他不杀人，就不要开除，也不要送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给大家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海容：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毛泽东：**你们三千人中最好能有七、八个反革命分子。**

王海容：出了一个就了不得了，还要出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泽东：我看你这个人哪，看到一条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海容：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泽东：**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做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海容：我们学校贯彻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就是干部子弟，军烈属子弟等等。**

毛泽东：你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海容：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都很好，我能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毛泽东：他们和你关系好不好？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海容：我自己认为还不错。

毛泽东：这样就好。

王海容：**我们有两个干部子弟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日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日班里和级里开会，他也不参加，**大家对他很有意见。

毛泽东：你们教员允不允许你们上课看小说、打瞌睡？

王海容：不允许。

毛泽东：**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自己多看。**我看你讲的那个学生，将来有所做为。他只是星期六不参加会，他就只是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二点再回去。谁要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嘛！

王海容：**现在我们这里尽星期天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部会，要不然是级里开会，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会。**

**毛泽东：回去后，你要带头造反，星期天不要回去，开会你就是不去。**

王海容：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天一律都要回去，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毛泽东：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

王海容：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泽东：**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学校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学校应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

王海容：人家会说我，毛主席的亲戚还不听毛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毛泽东：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啦？你就说正因为我是毛主席的亲戚，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这个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6月26日，江青把现代戏剧观摩大会办公室在6月24日为送审她《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记录给她写的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谈京剧革命》的记录稿，在那封信上批道：

已阅，讲得好。

6月27日，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由江青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在报告上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语，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3个批示**。

欲知毛泽东在文化艺术领域还采取了什么重要措施，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3年11月、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对**文艺界的3个批示**（很多书籍和资料只讲“两个批示”），是**向封、资、修文化艺术发起进攻的3颗信号弹。**下一章将要讲到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便是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的行动措施。这个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能够完成“文化革命”的使命吗**？请读者拭目以待吧！

**第35章**

**“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

**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

**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

话说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了成功。毛泽覃与贺怡的儿子贺麓成参与了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工作，他是中国自行培养的一位优秀的导弹专家。

6月底，也就是在周恩来、康生、江青与现代戏观摩大会的代表们举行座谈会一个星期后，陆定一、周扬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大会，请彭真作了一个专门讲现代戏演出问题的讲话。**彭真在讲话中与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针**，他说：

“现在可以把那些古戏稍微搁一搁，放一放，抓一下现代戏。等把现代戏演顺了手，再来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戏。**现在的一部分现代戏，实际上是粗制滥造，非骡子非马，弄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现代戏，**我们要把《箭杆河边》（**由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其唱腔是按照传统曲调安排设计，没有新唱腔——笔者注）这类戏，好好地演出**，**争取得到大家的拥护。**”  
     彭真的讲话，立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并印成了单行本、专集，广泛进行宣传。江青对周恩来说：

“你看看，难不难，毛主席指示请你来挂帅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人家偏偏不买我们的账，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的和我们对抗，和毛主席对抗。北京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呀！”  
     与此同时，**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笔杆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上海演出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戏把原小说的精华部分去掉了，敌人的形象不如小说写得那样狡猾和嚣张，这就使正面人物很难完全树立起来。所以，这个戏的演出无论在剧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中宣部和文化部还在内部刊物**上，以反映情况的名义，对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简报》上，几次**发表文章说，江青的意见简单、粗暴，不足为道。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也发表了许多评价《箭杆河边》的文章，称赞这出戏。**因为江青说过这出戏是 “正不压邪”，所以，署名萧甲的文章就说：“我看这出戏比《芦荡火种》还要细。” 刘厚生也发表文章说：“我认为这个戏不错，有人觉得正不压邪，我倒觉得不太突出，因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错。”

林默涵等人还在演出人员和专家们的座谈中，对江青抓的现代京剧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江青看了听了这些议论，她不动声色地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员说：

“这不是一个艺术的意见，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是坐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到反面人物一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沉默，要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1964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第12期上发表社论，题目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社论赞扬了在北京举行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盛况。

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这个小组开始领导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了整风运动。这个小组又叫作**文化革命5人小组，**因此**，称之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便首先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始了。**

7月4日，毛泽东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后，在给吴冷西的批语中写道：

吴冷西同志：

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毛泽东 7月4日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土金璋等12位来自延安的干部。

据土金璋回忆说：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负责外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纪念馆陈列方案报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后，我们一行12人，由我带领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并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征求意见，以便最后定案。我们到了北京，为了工作方便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确定由我负责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联系汇报事宜，其他同志则每天出去走访老同志，征求他们对陈列方案的修改意见。7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主席办公室汪东兴主任派车将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

“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并问延安有无干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我打听到你从延安来，想请你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一下延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又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紧张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调到延安工作，对工农业生产正处于熟悉情况阶段，随身又未带材料，担心向毛主席汇报不好。因此，我建议说：

“我们一同来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参加主席接见，大家都谈，你一句，他一句，这样谈就全面些，不仅能满足主席了解情况的要求，也能满足主席见到更多延安人的愿望。”

汪东兴说：

“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今天不定，过两天再说。”

7月6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延安来的同志7号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7月7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又来了电话，指名要我接电话，说下午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

7月7日下午5点钟，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从招待所大门驶进，服务员同志礼貌地来到我们坐等的小会议室，兴奋地说：

“中办来车接延安的同志们。”

黑振东、张茂远、刘克廉、黄高谦、冯芝桂和我等12位同志立即上了车。小面包车在奔驰，大家顾不上欣赏窗外的景致，一颗颗焦急的心已早早飞到人民大会堂，飞到毛主席身边。当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们：

“主席正在接见外宾，很快就要来了！”

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6点20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汪东兴带我们到湖南厅前厅。蓦然间，我们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又惊又喜，只见主席微笑着、迈着稳健的步履向我们走来，汪东兴上前告诉主席：

“延安同志来看望您了。”

主席听到后满面笑容地点点头，同大家一一握手。我第一个和主席握手，我仔细地端详着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宽阔的额头，温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无一不显出伟人的风采。握着主席那温暖宽厚的大手，我激动得心呼呼直跳，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汪东兴介绍说：

“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

由于我和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过几次面，这时主席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打量着我，摇了摇头连声说：

“不，不，不。”

汪东兴忙作解释说：

“金璋同志原在钓鱼台宾馆工作，后来调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因延安这几年外宾去的多，陕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

主席听罢，一边点头一边说：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我说：

“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

主席慈祥地笑了，他说：

“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们都在延安工作吗？”

我介绍说：

“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延安党校工作。”

主席又问：

“延安现在怎么样？”

我说延安有不小变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延安的情况。我接着又说：

“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

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远处，缓缓地说：

“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应该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

汪东兴走过来对主席说：

“延安的同志们想同主席照个相。”

主席笑着说：

“好！好！大家照个相留念。”

同志们又热烈地鼓掌。主席连连招手，关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主席，以至于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冯芝桂同志还未将双手放下。照完相，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别，同志们对主席说：

“祝愿主席身体健康。”

主席也笑着说：

“好！好！谢谢大家。”

大伙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毛主席，主席一边招手一边说：

“谢谢你们。”

7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届亚洲经济讨论会后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19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8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8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400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4年仗，从过去120万发展到500多万。蒋介石的95%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5%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30几个国家独立了。1958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1958年到1964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1956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8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80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80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12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胜利了，本·贝拉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3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么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么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25年仗，包括朝鲜战争3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25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20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随后在谈话中，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话。他盯着桑给巴尔朋友，平静地问：

“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他说：

“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说：

“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他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7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第7舰队就占了一半——6艘。它还有一个第6舰队驻在地中海。当1958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6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走。”

7月11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3个批示传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而且使全党为之震动。文艺界又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第二次整风学习。其间，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对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还有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并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邵荃麟曾经认为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在1962年前后提出了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要写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九评”。“九评”原来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后来毛泽东把它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毛泽东原先还指示写“十评”，后来由于赫鲁晓夫下了台，“十评”就没有发表。所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的最后一篇，也是9篇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中把毛泽东近年来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为15条内容；同时又引入了毛泽东在6月16日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

7月14日这一天，刘少奇到了南京，江渭清向他汇报了江苏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接着，刘少奇来到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4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

就在这次江苏省委四届4次扩大会议上，揭发出了涟水县高沟公社曾经发生的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的“高沟事件”，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就“高沟事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了刘少奇的赞赏。

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他还说：

“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

他要求省、地、县3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强调省、地（市）、县委书记，都必须有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后来在7月29日，王光美曾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再说刘少奇在南京期间，批评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对此，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刘少奇说：

**“‘小四清’打了败仗嘛！”**

**江渭清说：**

**“不能这么讲。据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

“**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3年前老情况。”**

江渭清回答说：

“**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

“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刘少奇说：

**“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

江渭清回答说：

**“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

“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笔者注）是不对的。”

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

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刘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出“四清”运动中要反右倾。

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渭清埋下了伏笔。

再说7月15日，毛泽东开始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他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说法，在复信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毛泽东在复信的最后部分，又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还指示康生、吴冷西等人，复信稿在批驳苏共坚持“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他以特殊的责任”这一说法的分量不够，他说：

“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放暑假回到菊香书屋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一开头就问毛远新：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毛远新回答说：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是表面的。”

毛泽东说：

“看来你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九评’你看过没有？接班人5条看了没有？”

“看过了。”

毛远新说。接着，他把《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上所讲的内容简单地讲了一下。毛泽东说：

“讲是讲到，懂不懂？这5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1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2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被敌人拷打，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着想。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中间派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么！怎么能当上左派？”

毛远新说：

“我还是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说：

“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他接着解释5条标准，他说：

“3、4、5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分析第3条时，毛泽东说：

“你们开会怎么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他讲到第4条时问毛远新：

“你是否和群众合得来？是否和干部子弟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常让人家讲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在讲到第5条时，他说：

“现在你已经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在行了。”

接着，他又问：

“你要学习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毛远新回答说：

“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毛泽东说：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要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毛远新回答说：

“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泽东说：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起工农联合政府，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毛远新说：

“据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情况，受到教育很大。”

毛泽东说：

“哪里都有反革命分子，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都混过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分子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所说的陈东平是陈再道的长子，此人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主动与敌特机关联系，案发后被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并对其实行劳动教养。此子终究不成器，后来于1983年在洛阳犯罪，判处死刑，1984年被执行枪决。

再说毛泽东接着询问了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毛远新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多，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毛泽东说：

“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嘛，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

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毛泽东说：

“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怎么能听懂？”

毛泽东要毛远新天天在大风大浪中坚持游泳，他说：

“水，你已经认识它，已制服了它，这样很好。你们骑马吗？”

毛远新说不会。毛泽东说：

“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打过枪吗？”

毛远新说，有4年没有打了。毛泽东说：

“现在民兵枪都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的不会打枪的？”

他还对毛远新说：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习法？只听讲课能学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

毛远新说：

“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同，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泽东说：

“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我已和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去，一个也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5个月四清，而且还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对于社会谈不上有什么了解。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都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

“陈东平是在家休学听敌人广播变坏的。”

毛泽东说：

“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就能看得起他。**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军工才办了10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1927年我们学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毛泽东又问：

“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怎么样？”

毛远新说：

“这次考试我们队用新的方法进行试点，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来了。而且对整个学习方法也发生了影响，有可能学得活了。”

毛泽东说：

“早就该这样办了。”

毛远新说：

“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得不主动。”

毛泽东说：

“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5分。你不要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只得3分半到4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在学校是全优，在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50%，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义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后来，高等教育部将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这次谈话内容，整理成《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转发给全国各地。

欲知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后来产生了什么影响，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时间，大多数资料都写的是7月5日，笔者此前在本传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但细细考证一下，觉得还是有问题的：一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在7月14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怎么会在7月5日问毛远新：“‘九评’你看过没有？接班人5条看了没有？”二是在另一个资料中多了一句对话：毛远新回答说没有看，毛泽东说在我的办公桌上，你去看看。这怎么可能呢？稍微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这个对话是不可信的。毛泽东的办公桌绝对是禁地，怎么会让一个毛头小子去那里翻阅一份尚未公开发表的党内重要文稿呢？因此，笔者以为，“7月5日”说，是不可取的。

另：毛泽东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是最了解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本传就所能见到的有关史料，对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学习和办学经历，已经尽可能地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他从**9岁那年开始**，先后在**7个私塾**里接受了**6年多的旧式教育**；在家里参加了两年劳动后，**17岁又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了**半年的新式教育；**在驻省**湘乡中学读了将近1年书**后，参加辛亥革命军，当了半年的兵，退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半年**，接着，又**在定王台自修了半年**。从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在湖南省第四师范、第一师范读了将近5年的书**。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他还旁听了不少名家的课。他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就**办过工人夜校**，走上社会后，又先后**创办过湖南自修大学、教过小学、中学，办过工人夜校**。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过课**，接着，他又**亲自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红军时期，他还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且在这些大学里无数次走上了讲台。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毛泽东的求学、办学经历，还是他的求学、办学体会和经验，也无论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其它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教育史和教育现状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资历和卓越的认知是无与伦比的**。那些上过正规大学与喝过洋墨水的同代人和晚辈人，在中国教育的认知上，绝对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至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留法、留德、留苏、留比等等勤工俭学镀过金的“海归”们，那就更不用提了。

**第36章**

“**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

**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话说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章中写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后，杨献珍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人，也先后受到了批判。

7月1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7月23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很高兴。他对江青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他还说：

“剧名可以改为《沙家浜》。”

于是，编剧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京剧《沙家浜》。有人提出：

“剧本很重要，是不是让主席过目。”

江青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就把剧本送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几位创作人员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晚上8点要和他们谈谈剧本。

这天晚上，汪曾祺和于会泳等人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于会泳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担任作曲系党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东西方音乐都会并且表现力很强的人物，就大胆地启用了他。

且说毛泽东半坐半躺倚在沙发上，说：

“曾祺，你是会写戏的，怎么忽然变得不会写戏了呢？”

汪曾祺连忙站起身来，说：

“请主席多加指点。”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沙家浜》，他说：

“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戏名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在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关于《智取威虎山》，毛泽东说：

“这个戏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这里面的一句唱词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我看‘春天’还不如用‘春色’好。”

**毛泽东又亲自修改剧本，他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一场中又加写了一段唱词：**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剧中“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曾祺、于会泳在江青指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使之名声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的样板戏。于会泳还是《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

在那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说《沙家浜》剧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她亲自物色的饰演阿庆嫂的B角演员洪雪飞彩排时，偶然发现坐在她身边的A角演员赵燕侠没有穿毛衣，就送了两件毛衣给赵燕侠。后来，江青发现赵燕侠没有穿她赠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赵燕侠赶下了台，换上了B角演员洪雪飞。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的“毛衣风波”。笔者以为，江青送赵燕侠毛衣应该是确有其事；但说江青因赵燕侠没有穿她送的毛衣就一怒换人，正像其它污蔑江青的“假发”“撒泼”等谣言一样，纯属无稽之谈了！诸君若不相信，请找来洪雪飞和赵燕侠的演唱音像，对比一下她们的音质和演唱风格，就明白江青换人的真实原因了。

且说在7月27日，毛泽东召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7月29日，毛泽东为《天津日报》重写了报头，这是他为地方报纸重写的第一个报头。在几个大字下面，他又用铅笔给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写了一封信：

万晓塘同志：

《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毛泽东 7月29日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对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全文。

7月31日这一天，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结束，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在闭幕式上致词，副组长陆定一做了长篇讲话。**小组成员康生在讲话中，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小组成员周扬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报告，他说：

“**在文艺上，文化部曾经提出了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和拜师学徒的口号，这是对的，并不能说成是搞封建主义和才子佳人**。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公开批判的代表人物，我们也要采取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态度，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田汉、孟超不要紧张。”

1964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把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社论对7月31日结束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8月1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各部门干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推广了他的夫人**王光美所总结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

原来，**王光美是在1963年11月底受刘少奇委派，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化名为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去蹲点搞四清运动**。王光美在1964年春节前从桃园回到了中南海。刘少奇和她在春节期间谈了四清问题，这次谈话内容被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题目是：**《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王光美在4月底结束了在桃园的蹲点工作，回到了北京。**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农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桃园经验”。**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的基本方法是：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她工作的结果是证明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桃园经验”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

刘少奇在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讲话中，还强调说：

“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自终的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95%**，共同对敌。”

江青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大为惊讶。她回到家里，对毛泽东述说此事。她还说：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报告反对他。现在你还没有死，人家已经做公开报告反对你了。”

后来，李雪峰在几十年后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揭发刘少奇的材料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我当时认为刘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现在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对四清已经搞了一个《前十条》，在此基础上刘少奇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所谓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主张四不清的干部要倾家荡产搞退赔。胡说团结95%的干部是团结95%的群众的前提。这实质上是要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戚本禹回忆录》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些高层领导人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3次家，第1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2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3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3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3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它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

且说在8月2日，美国政府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入越南海域。

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当然，阴谋也是智谋。”

8月4日，美国派遣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

8月5日，美国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

8月5日这一天，刘少奇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也参加《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去广州的前一天，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

毛泽东在政府的声明稿上曾写了这样一个批语：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批语中所说的行动，是指他原来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考察整个黄河流域，直至黄河源头一事。为此，他在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一边做准备，有空便练习骑马。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使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了。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昆明军区某部泅渡金沙江经验的报告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 8月6日

写罢，又想起要嘱咐罗瑞卿，他写道：

“**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它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漩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

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

8月10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奇袭白虎团》，当听到饰演严伟才的演员道白：“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作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毛泽东笑了，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

“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这个戏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

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起草的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此前，中央军委常委会为保持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曾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到北戴河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减！”

**贺龙又请示说：**

**“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

**毛泽东说：**

**“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

关于军衔问题，毛泽东以前就曾几次说过：

“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后来在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再说8月12日晚，毛泽东观看了山东淄博、青岛京剧团合演的《红嫂》，在演出结束时，陪同人员问他上不上台接见演员？毛泽东爽朗地说：

“省里剧团我上了台，地区来的怎能不上呢？上！”

来到舞台上，毛泽东问剧团负责人：

“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

负责人回答说：

“还有几个道具工人。”

毛泽东说：

“来，都叫来。见见面嘛。”

第二天，李讷到剧组来玩，演员们问她：

“毛主席喜不喜欢我们的戏？”

李讷笑着说：

**“我听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

8月14日，中宣部根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

8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利用戴高乐对美国进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看出我们有这一点。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估计5年、10年之后，他们会要站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大资本家是不会甘愿受美国控制的。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征兆。就连英国保守党中一部分人也不赞成同美国合作得那么紧。”

8月18日，毛泽东对《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自此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开始对《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

刘少奇的来信是在广州写的，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8月16日的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10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毛泽东 1964年8月18日

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

8月18日下午， 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人谈哲学问题，他说：

“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列宁讲过，**凡事都是可分的**。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庄子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一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继续说道：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3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300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又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柳宗元写了《天对》，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不少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错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4大家族：‘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4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8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

“第2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它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中说：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件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来到北戴河，交给了毛泽东。

8月20日，毛泽东召见正在北戴河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征求他们对刘少奇16日来信的意见。李雪峰说：

“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

“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4000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毛泽东说：

“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建议说：

“是否到10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说：

“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他又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8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8月20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李敏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望爸爸。回到家里，她见父亲正在休息，就在外边逗着孩子玩。

“妈妈，小金鱼哭了。”

宁宁看着院子里养鱼池里的小金鱼说。李敏说：

“小金鱼不会哭。”

“它听话吗？”

宁宁说着，伸手就要抓小金鱼。李敏拉住了儿子的手，说：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

李敏抱着孩子走进爸爸的卧室，宁宁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敏哄着宁宁，回头一看躺在床上的爸爸，也吓了一跳。原来爸爸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在北戴河期间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面。宁宁可从来没见过姥爷这样的形象，怪不得害怕了。李敏想给儿子找一点吃的，哄着他不哭，就说：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

“没有点心。只有糖。”

毛泽东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外孙拿糖。李敏说：

“只拿一块，就一块。”

说着，就给孩子拿了两块糖。宁宁拿到糖后，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外公，小手使劲地攥住糖块儿。毛泽东说：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

李敏感到爸爸对外孙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她心里想：“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只听爸爸又说：

“小孩子，莫要惯他。”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有44个国家和地区367名科学家参加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在负责接待工作的周培源介绍到日本代表团团长、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及其物质无限可分的理论时，毛泽东握着坂田昌一的手说：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坂田昌一听毛泽东这么说，十分惊讶和喜悦。

后来于光远在陪同科学家们游览颐和园时，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赞赏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于光远还说，**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感慨地说，可惜我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话，如果早知道，我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

坂田昌一回国后，在《北京科学讨论印象记》、《北京科学讨论会杂记》等文章中，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他还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8月23日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又找出了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坂田昌一的论著《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亦即《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坂田昌一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恰恰与他在1955年的预言相吻合。**毛泽东对坂田昌一的文章十分赞赏，他一边看，一边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

8月24日，毛泽东让林克邀请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到他的住处座谈。

下午1时许，于光远和周培源一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此时的毛泽东刚刚睡醒，还穿着睡衣，靠在床头上看书。他见周培源、于光远来了，就说：

“我习惯在床上工作。”

招呼他们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昌一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的分下去。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别的**。**双十条第一个10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

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

“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于光远又问：

“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

毛泽东说：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任何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这样？**世界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由此组成了世界。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孙中山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政治，成了政治家；鲁迅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文学，成了文学家；郭沫若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历史，成了史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了7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政府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一开始却打了败仗，那时我们不会打仗，就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胜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16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100%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

**世间万物都是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木兰花慢·中秋送月》词中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晋朝的张华《励志诗》中的‘大仪斡运，天回地游’，都包含地动思想。

世界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说到此处，毛泽东转向周培源问道：

“《光明日报》前两天有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周培源非常惊讶，毛泽东竟然对《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讨论文章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的讲义都如此熟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毛泽东见周培源没有说话，又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有水才有生物。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看不到孔夫子，因为他死了。**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不是如基督教所说的那样世界毁灭，而是会有更高级的东西代替他。**李四光说一百万年前有冰期。恐龙熬不过冰川时期，就灭亡了。事物总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也有它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见周培源吃惊地望着他，笑着一挥手，又说：

“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自然也适用。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8月27日，毛泽东就刘少奇19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

他还就《后十条》修正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事，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

“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8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人座谈会。邓小平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提出了“反右倾”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了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曾发生的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的问题。这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江苏省委四届4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的“高沟事件”。**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在座谈会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批评江渭清：

“**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

江渭清回答说：

“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

他马上电话通知省委办公厅查找这个文件。江苏省委办公厅汇报说，确有这个《通知》，是在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部分要求“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说：

“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将这个“通知”作废。

后来在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领导责任。

事情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后来刘少奇又发出了一封答江渭清的重要信件和中共中央关于他们之间来往信件的批示，详情待后再叙。

且说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 ，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教育不能从课本到课本，从概念到概念。**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人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还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5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1964年9月1日，是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通过了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

中央 1964年9月1日

欲知毛泽东处理了华北局、江渭清与刘少奇的分歧后去了哪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刘少奇在8月29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他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8月30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接着，他又谈到了秦始皇时期的儒法斗争，最后还说：“**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刘少奇和那些与会者们听了有何感受？已经不得而知了；而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能够验证些什么，倒是读者诸君可以慢慢看到的。**

**第37章**

**“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

**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

话说1964年9月初，毛泽东写信让秘书借书，他嘱托说：

“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30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9月7日，毛泽东到了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他在谈话中再次对岳阳县毛田区的生产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要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他还说：

“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5%、不依靠95%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9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农垦部党组《关于党组扩大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讨论意见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 

农垦部党组扩大会议报告转发各地，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督促各国营农场执行。**一些国营农场经过初步整理已有进步，1963年比1962年增产35%，商品粮增加一倍，今年又可以增产14%。国营农场增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很大，只要加强领导，还能继续大幅度的增产，提供更多的商品粮。**

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上，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1. **必须彻底改正硬搬苏联单一经营方针**，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

二、**必须改正只把18岁到45岁算作劳动力的办法，这种规定是错误的，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任何地方的农民，都不是把17岁以下和46岁以上的劳动力除外的，即不是不算作劳动力的。**各地应当把一切可以参加劳动的人都安排他们的劳动。**在农场不应存在就业和失业问题，不采用退休和开除办法**。对于犯罪分子由司法机关判刑，由原单位进行劳动改造；不须判刑的由群众监督劳动。

三、农场在农闲时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不管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只要是用自己的闲余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就不计算在基本建设费用内。农场利用自己劳动力进行种树、修田间水利工程、平整土地、保持水土、修路、修晒场、修仓库等都不算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费在基本建设费内开支。**农场自己繁殖的幼畜作为增添的固定资产，这种固定资产到使役后才折旧，每年报销一次幼畜饲养费，不作基本建设费开支，过去把这种开支作为转群费列入基本建设项内的制度是照搬苏联经验的，是极不合理的，应当取消。**

四、**职工利用农闲时间自己修建或修理房屋，应当鼓励，并给以支持，过去对于这些修建工程都按基本建设加以控制是错误的，应当改正。**

五、**国营农场应当建立自己的小型的粮、油、糖加工厂，以利用农闲劳动力发展生产**，有关部门应当支持。

以上5点，请各地党委根据当地情况及时注意解决。**至于实行亦农亦学制度，必须逐步进行，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才逐步推广。** 

中央 1964年9月8日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会见了举办北京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法方负责人，他在谈话中说：

“戴高乐总统7月23日批评了西德。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

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是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不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

9月17日，周恩来用电话向毛泽东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是早试验。二是晚试验。三是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验。毛泽东听了就说：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9月21日，毛泽东拿起周恩来这一天刚刚送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2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22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令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3同志参加。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毛泽东看罢，提笔写了一个简短批示：

“已阅，拟即办。”

此后，毛泽东从南方回到了北京，他听说轿车司机朱德魁患了肝炎，久治不愈，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一个名叫李志绥的保健医生到医院去看望朱德魁。

吴旭君和李志绥到了医院，向朱德魁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嘱咐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还将毛泽东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了朱德魁，让他增加些营养。

吴旭君回到菊香书屋对毛泽东说：朱德魁总是琢磨自己是否离死期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就又派身边的人去看望朱德魁，并将亲手书写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条幅，送给了朱德魁。

后来，朱德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改由中医治疗，他的身体终于奇迹般地康复了。

9月间，王力随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王力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职务，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决定让王力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并让他跟随彭真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彭真在这次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夸他是一个“优秀干部”。**据师东兵在《王力访谈录》中记载**，当彭真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插话说：

“我们不要轻易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江青闻讯后说：

“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9月25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给江渭清9月8日检讨信的复信**做了部分修改，他加写的内容是：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上看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写给他的一封信，就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陈莲是延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孟起予的女儿，她在9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学和演出中的一些问题，并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批语中写道：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 9月27日

接着，他又在署名之后加写了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9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

9月30日，刘少奇就江渭清9月8日的检讨信发出了《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批评江渭清在给他的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刘少奇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他还说，**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复信中重提了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江渭清的谈话，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10年前更多了，还是比10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10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在信中又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

在这封信中，刘少奇将7月份在南京讲话时就提到过的“**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他说：“**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刘少奇还以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为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这样做，“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在信末，刘少奇要求江苏省委开会讨论这封信，并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的指示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10月l5日，江苏省委发出了《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196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数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群众的游行队伍。

是日晚，毛泽东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了烟火晚会。

10月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

下午4时许，孔祥秀与其他代表进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列队接受毛泽东等人接见。

孔祥秀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县庞寨乡一个农民家庭，他在195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二团。

孔祥秀在接见合影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左侧，摄影一结束，毛泽东起身与战士们握手告别，迎面就是孔祥秀。孔祥秀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啊，我们全体警卫战士向您问好!”

“同志们好！”毛泽东亲切而和蔼地回应着，并面向全体战士们说：“问同志们好!”

站在孔祥秀身边的是老警卫战士陈昌奉，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陈昌奉同志好!”

此时的陈昌奉是山东公安总队总队长，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

接见结束后，陈昌奉将一枚刻有“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纪念像章佩戴在孔祥秀的胸前，鼓励他好好为人民服务。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党组： 

现将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包括改良农具，下同）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这个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的具体措施。这对于节约农业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对于逐步实行农业技术改革、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人委**必须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认真抓好生产力。在抓生产力和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又要一手抓机械化，一手抓半机械化，坚持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半机械化为主的方针。**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坐等农业机器而放松了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必须教育干部全面的、正确的接受过去大搞农村工具改革的经验教训，坚持科学实验，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扎扎实实地进行半机械化农具的一系列工作。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专人，把半机械化农机具研究、制造、推广、供应、使用、修理等有关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健全专管机构，加强领导，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半机械化农机具的推广工作能够更好地开展起来，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会议中的报告和有关文件由农机、农业两部下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4年10月8日

10月11日，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报经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电报等手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批准。

就在10月11这一天，**苏联果真像毛泽东在半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宫廷政变。**

蓄谋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正在南方黑海边皮聪大的中央别墅中度假的赫鲁晓夫通了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说主要讨论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拒绝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隔了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再度用电话通知赫鲁晓夫，说如果他拒绝回莫斯科，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这样，赫鲁晓夫才答应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机场一下飞机，便遭到了隔离。

苏共中央主席团原来准备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后来因为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态度粗暴，且带有污辱性的发言举动，遂决定不再保留他的中委职位。主席团会议一直进行到10月13日深夜，赫鲁晓夫最终被迫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公开发表的辞职申请书。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李雪峰写给他的信，他说：

“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参照李雪峰同志的经验，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左’勿右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

10月13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3楼小礼堂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

毛泽东神情专注，看得十分认真，很快就入了戏，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着。当他看到江姐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时，立刻板着脸，瞪着眼，嘴唇紧闭，一副很生气的模样。当他看到蒋对章和警察局长沈养斋一段戏时，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演出结束了，他深情而又惋惜地说：

“江姐那么好的一位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

周恩来听了，会意地笑了笑，便随着毛泽东、朱德、董必武一起走上舞台，接见全体演员。

10月14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消息和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的照片。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空政文工团的有关人员，他说：

“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写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沈醉在北京嘛，大特务头子，我们早已抓住了。沈醉的检查我都看过了嘛。”

他还说：

“就让双枪老太婆把沈醉包围住，不要跑掉了，要抓住嘛。”

10月14日晚6点，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因赫鲁晓夫错误行为在中央主席团造成的不正常局面》的报告。接着，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撤销他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会议决定由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是日晚，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将莫斯科政变的简单情况告诉了他。伍修权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约见契尔沃尔科，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契尔沃尔科只说是赫鲁晓夫出于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毛泽东立即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时局，商量对策。

1964年10月16日4时59分40秒，中国成功地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那神奇般的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为打破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核垄断，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

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说：

**“是不是核爆炸，一定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我们真的炸了原子弹。”**

周恩来又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通知了现场指挥张爱萍。

10月16日，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动苏联和全世界的消息，消息说：

“赫鲁晓夫已接受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他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龄考虑，决定不再担任目前的工作。他本人已正式提出辞职。”

塔斯社还刊载了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的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有力措施，让中苏双方都找到一个台阶，力争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勃列日涅夫等人发贺电；并由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东欧司司长余湛，传达毛泽东指示，命令他起草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4人联名的、发给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3人的贺电电文。

这份贺电除了对勃列日涅夫等人表示祝贺外，还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

10月16日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说，已经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计此次核爆炸的威力为**2万吨级以上梯恩梯当量**。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转述的报告，风趣地说：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瑞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他当即批准新华社于当晚发表《新闻公报》和由他作了重要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1964年10月16日5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1963年7月美、英、苏3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3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

10月16日这天晚上，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说起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与上海的文艺界不无关系哩。原来早在1964年6月18日晚，陈毅在上海陪同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由上海的专业文艺院团、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联合演出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演出结束后，陈毅对上海市委负责人说：“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后来在7月13日晚，周恩来在上海与陈毅一起，由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他回到北京后先后找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和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谈话，他说：“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建国15周年时，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主持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要有人写，写几首壮丽的史诗，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有人建议以“东方红”为名，周恩来说：“《东方红》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7月24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江青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上演。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并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不久，上海12位文艺界人士奉命进京，参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此后，周恩来、江青等亲自指导了《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在排练“星火燎原”一场中，开始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周恩来看后说，对我党来说，蒋介石叛变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分裂了党，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经过紧张地创作和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场演出**。这部大型歌舞是由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70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业余合唱团3000多人，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而成的革命史诗，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史诗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全剧共分6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以豪迈磅礴的革命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图景，高度概括而又形象地表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伟大历程。

《东方红》首场演出后，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此后接连演出14场。毛泽东观看的这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满面笑容地快步走上舞台，接见全体创作和演职人员，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尔后，周恩来愉快地宣布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霎时间，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待会场里稍稍静下来，笑着说：

“高兴可以，但是，不要把地板跺个窟窿哟！”

周恩来也笑着说：

“别跳得太高，把大楼震塌！”

此时，新华社已经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播发了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整个北京，整个中国，一片欢腾。

赫鲁晓夫垮台和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竟然如此巧合。当时社会上广泛地传颂着一阕题为《满江红·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词，据说是毛泽东的新作，是否真实，谨抄录如次，以待后人考证。其词云：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笑老修，大势已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凶，众喽啰，瞎起哄。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螳臂挡车千鈞力，庄生梦蝶一场空。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

10月18日，刘少奇复信给李富春说：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方面。

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我们7月中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3个月，他赫鲁晓夫就垮台了。**世界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持不坚持，坚定不坚定。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在大家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10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

“有可能。**再有10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当李富春汇报到第3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泽东说：

“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

欲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能否得到改善，毛泽东所说的“**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这个新的预言，和以前的另一个预言，即苏共中央新领导人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是否应验？且待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中苏论战成了赫鲁晓夫垮台的外部因素。而**勃列日涅夫等人以政变手段攫取了苏联的最高权力，则验证了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预言。**

在中苏论战过去几十年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护党救国维护苏联体制的“八一九”事件，因为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致使叶利钦在8月22日又搞了一个二次政变，夺取了最高权力，导致建国70多年的苏联解体了，继之东欧各国党和政府也发生了巨变。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中苏论战期间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从本传前面的叙述还可以看出，早在修正主义刚刚泛滥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严重后果，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那无人企及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畏强暴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思想和品格，是永远值得世人钦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毛泽东所领导的反修、防修斗争，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佩服。苏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柯西金曾对中国驻苏大使潘自立说：**“你们的文章太厉害了！”**然而中方曾经积极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却在毛泽东身后说：**“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在1983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邓小平还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9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他后来的实践张目。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38章**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

**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话说196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指示》批转了江苏省委10月15日的《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指示》中还说：

“**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通过这个《指示》，刘少奇有意无意地把他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和江渭清的矛盾，特别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暴露在了全党面前。

10月23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送审的两篇讲话稿。在陈伯达9月16日在讨论发展电子工业问题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上，毛泽东批了一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叫作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是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对，又抓得紧，雷厉风行，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大庆油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陈伯达主导并反复修改的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批示全文（从其中的文字如第二自然段和“**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提法可以看出，这个批语不是毛泽东起草的）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

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是先搞“四清”，还是先搞对敌斗争，过去各地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作法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地贫下中农和多数群众要求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先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要被预先规定的一些框框所束缚。

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无法达到。这是我们现在应当吸取的教训。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中央转发的信阳经验是正确的。但在信阳夺权斗争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如集训的干部太多（一个地委集训了几万人），在集训工作中有某些粗暴的态度，集训中的生活管理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当纠正，也容易纠正。

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最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它的反面，变为最先进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不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就在许多地方套用信阳经验，盲目地进行夺权斗争，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方法又对头，那我们就不会如信阳问题、小站问题、白银厂问题、贵阳问题那样，拖延很久才去解决，就可以比较及早地加以解决，并在基本上不会犯错误。

中央 1964年10月24日

后来在1972年，天津市委按照中央领导关于对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破坏“四清”运动的问题进行调查的指示，派出小站地区“四清”调查组，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天津市委于1973年3月11日以文件形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报了《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

原来早在1960年，陈伯达就到过小站地区。当时曾有人写信向他反映原小站公社幸福之路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姜德玉的“反革命历史和弄虚作假的问题”，说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地主富农。陈伯达建议天津市委监委调查处理此事。1961年5月，陈伯达再次到小站，进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富农分子的假证据。天津市监委于1962年1月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所有荣誉称号（当时仅限于党内宣布）。1964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率“四清”工作队进驻小站地区。当时**周扬和方纪在北闸口公社的西右营蹲点**，参与“四清”运动。3月初，陈伯达从北京带着一批干部来到小站地区，插手小站“四清”运动。3月26日，**陈伯达第一次去西右营，用了不到 40 分钟就宣告了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政治上的死刑，称张凤琴是假劳模、假贫农。**5月5日，周扬要回北京，问陈伯达西右营“四清”的性质，陈伯达从东右营支部书记藏枪和北义心庄支部书记打人说起，联系到张凤琴黑帮集团，给西右营“四清”定了性质，把西右营的问题说成是“黑帮”搞的“反革命集团”。5月21日，陈伯达来到小站镇，又如法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和“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月间，各工作队在陈伯达操纵下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玉仑、张凤琴3个“反革命集团社会关系分布图”和3个“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1份，接着搞了3个“反革命集团材料”，于7月31日呈报给党中央。此后，陈伯达又仿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搞出了上边那个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在9月25日报送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共中央。

天津市委1973年3月11 日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中说：被列入张凤琴、张玉仑、姜德玉3个“反革命集团”的246人中，虽确有坏人，但构不成反革命集团关系，所谓3个“反革命集团”，均不能成立（此后为其中的176人平了反）。

再说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抓好生产救灾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

今年各地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涨，全国总的收成情况是好的。大多数地区比去年有较大的增产；有些地区获得了丰收，粮食和许多经济作物的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了以往的最高水平。但是，在总的丰收形势当中，今年也有部分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若干地区，遭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地区由于8月以来持续阴雨，大片农田长期积水，造成了较重的涝灾，晚秋作物有较大的减产，群众生活发生困难，已经开始出现人口外流的现象。**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极大注意。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组织力量，集训干部，准备在城乡开展以“四清”、“五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手较早的地区，工作队已经进村，运动正在逐步展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坚决地进行到底，搞深搞透。但是，应当看到，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这些工作既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又是组织明年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季节性强，时间紧迫，要求我们同时抓紧做好。放松这方面的工作，将会给我们引来极不利的后果，从而也会影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顺利进行。各级党委，**必须将当前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救灾等日常工作两不误。即是：既要抓社会主义革命，又要抓日常工作；既要抓重点地区、重点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抓面上的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各级党政组织除了抽出必要的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外，必须留下必要的干部，组织好工作班子，负责面上的日常工作。必须坚决防止顾此失彼，无人负责的状态。要向干部们讲清楚：参加“四清”、“五反”是伟大的革命工作，留下来坚持日常业务，也同样是伟大的革命工作。正是因为人手少了，留下来的同志更应当勇于把工作担当起来，发扬革命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积极主动地把工作做好。特别是受灾地区的干部，更应当努力把工作做好。对在面上工作的某些犯有错误的干部，应当进行教育、鼓励和督促他们积极地作好当前工作，争取以功补过，不许消极、怠工、观望和等待。有这种情况的，上级领导应当立即检查纠正。

1963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所提出的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目前仍然是适用的。请有灾的省、地、县各级党政组织，重新讨论这个决定，并认真贯彻执行。**今年的生产救灾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的方针。必须继续做好秋收工作，注意收集副产品和野生作物，大力组织冬季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增强抗灾力量。必须实行以丰补歉、相互支援的原则，不论灾区省份和非灾区省份，都应当尽可能从丰收地区多征购一些粮食，收集一些副食品，以支援受灾地区。这一条非常重要。**

以上通知，请即讨论布置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4年10月31日

1964年11月初，中国京剧院一团《红灯记》剧组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地排演和反复修改，终于成功了，林默涵邀请周恩来观看，还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进京观看。周恩来看后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她也表示满意。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47周年的庆典，希望借此机会沟通双方的关系，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1月6日晚，中国京剧院一团《红灯记》剧组在中南海小礼堂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演出，当舞台上演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毛泽东的眼角上渗出了泪水。在剧间休息时，大家请他去休息室坐坐，他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地摇摇头，说：

“你们休息吧。”

大幕再度拉开，在演到李玉和一家人上刑场时，毛泽东的眼里再度溢满了泪水。

演出结束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走上舞台，接见了《红灯记》剧组演员，还与爱华沪剧团的导演及演员亲切握手。

11月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11月1日的请示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关于由贫协行使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权力的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障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3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

附通知草案

湖南省委 1964年11月1日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3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 各专署，各重点县（市）人民委员会、贫协筹委会，各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工作组：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分期分批地开展，第一批重点地区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上述3种情况，只要查明属实，经工作队批准，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把政治的、武装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领导权统统拿到贫协组织手里，一直到选出新的领导核心，移交权力时为止。**

以上通知，请各地贫协研究执行，并请工作团、队、组帮助执行。

（此件由工作组向全体社员宣读）

省长 程潜 副省长 华国锋

省贫协筹委会主任 张平化 省贫协筹委会副主任 王延春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送少奇同志阅。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以考虑发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退毛泽东 11月7日**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方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到周恩来面前说：

**“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泽东、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吃了一惊，他正色道：

“你胡说什么！”

说罢转身离去。马利诺夫斯基在后面仍然冲着他说：

**“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理睬他，就又到贺龙面前纠缠，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崔可夫元帅说：

“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决定：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11月8日，周恩来看到**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看罢，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一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得罗波夫和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一见面，忍不住气愤地质问勃列日涅夫：

**“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列日涅夫见周恩来脸色铁青，就解释说：

“马利诺夫斯基纯属胡说。这件事我们是事后得知的，都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向中国同志道歉。”

周恩来说：

“吃酒后胡说八道，这是不能作为解释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酒后吐真言。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这个根苗，他才说出这个话来。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然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也未曾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急忙说：

“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

波德戈尔内也说：

“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周恩来说：

“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今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胡说八道？”

勃列日涅夫说：

“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我们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周恩来说：

“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勃列日涅夫无可奈何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

11月9日，中苏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直截了当地说：

“中国代表团愿意与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

勃列日涅夫说：

“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是提出一些问题，首先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它步骤。”

周恩来心想，中苏公开论战是赫鲁晓夫挑起来的，对我党进行了那么多攻击，今天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避而不谈，却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他决定转换话题，就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一事，试探一下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结果双方围绕这个话题纠缠了许久，不欢而散。

周恩来由此得出结论说：

“**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苏联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做个正式答复。”

此后，周恩来与罗马尼亚、波兰、越南代表团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通过几天的接触，**发现苏联的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领导软弱，内部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11月1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克里姆林宫，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进行第2次会谈。勃列日涅夫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周恩来断然拒绝了。他说：

“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厉声问道：

“你们对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到底持何态度？”

周恩来平静地说：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1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第2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决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第3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恩来表明了原则立场之后，又说：

“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共同努力。如果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列日涅夫说：

“很遗憾，这一次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高级会谈。”

周恩来说：

“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议，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11月12日，中苏双方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按预定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勃列日涅夫依然说赫鲁晓夫是出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没有说出什么新内容。勃列日涅夫还说：

“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我们建议，只要你们方面准备好，我们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周恩来说：

“我们将会把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敞开着的。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团结共同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11月1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等人按照毛泽东11月7日批语起草的《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全文如下：

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军委总政：

湖南省委11月1日来电和省人委、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3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同意这个通知草案。望湖南省委照此办理。

现将湖南省委来件转发各地，各地亦可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现在大多数省、区还没有组织起各级贫协，但有些农村已经组织了贫协。**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以上3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没有贫协组织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

中央 1964年11月12日

11月13日，周恩来与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要离开苏联回国。柯西金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些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

周恩来略带嘲讽地说：

“请问，你们的区别何在？”

“这个……”

柯西金似有难言之隐。周恩来见他如此，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到机场迎接，并留下了一张流传极广的照片。这一不寻常的举措和照片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了。

11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现将江苏省委《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转发给你们。

15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情况是：一、在解放全国的时候，**把原有的学校和师资接收下来，除了改掉国民党的“党义”课，和取消“训导制度”以外，其它不动。**这是对的。二、1952年起，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基本上还是对的。三、1953年起，**照抄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教育改革”。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了。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教育。**这是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四、1958年，即**在建国以后9年，我们才真正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的不同所在，才真正开始了教育改革，真正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五、今年，中央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在教育工作中，全日制小学还要发展，全日制的中学和高等学校不再发展了；以后，**国家的教育经费，除了维持这些全日制的学校以外，新增加的主要用来办理或者津贴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中等和高等学校，这样来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消灭文盲，培养又能做体力劳动又能做脑力劳动的新人，大大发展生产，和根本消灭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为将来完全消灭三个差别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

1958年教育改革，各地办了很多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1959年以后，由于经济困难，同时**由于对这种新型学校的意义估计不足，全党全民都没有经验，认识上不是彻底清楚，因此，许多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大批垮台了，或者取消了，或者改为全日制学校了。只剩下少数坚持下来。**这些坚持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虽然数量是小的，但是它们**代表了我们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因而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江苏省委对于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提出了规划，提出了办法，这是很好的。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规划，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规划要切实可行，不要一哄而起，避免1958年所犯的错误和缺点。**

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对于1958年以来坚持办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集中力量做一些典型调查，调查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或者缩小成绩，有问题，有困难，不要避而不谈。这种调查，还要经过核实，真正可靠。调查材料，并应与全日制的同级学校对比。这种调查，请省、市、自治区有计划地进行，把你们的调查计划和进展情况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调查结束并核实之后，也分送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我们已经办了6年，应该总结出经验来了。**这种经验，对于今后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对于说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对于说服教育工作人员，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请抓紧调查和整理。

中央 1964年11月17日

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原来的计划还要写十评的，因赫鲁晓夫突然下台，遂作罢。毛泽东在一次会议说，**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写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了**。陈伯达向《红旗》杂志国际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国际组两位编辑执笔起草文稿，稿子写出后，由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审定，将题目定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后来发表在11月21日《红旗》杂志第21-22期合刊上。

11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作汇报，他不无讥讽地对刘少奇说：

“**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对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思想准备，只得说：

“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

“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据陈伯达在几十年后回忆说：“从1964年10月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3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原来，胡乔木自长期休养以来，无所事事，在1964年10月间，突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兴趣，写下了第一首《六州歌头·国庆》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据他自己说：“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出于一时的风尚”。这一时的“风尚”，自然是来自于毛泽东。他把最初写的词稿抄呈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修改一下。此时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尽管已经在四清运动的方针与对象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但他还是忙里偷闲地作了一些修改。自此以后，与毛泽东久违了的胡乔木，又重新和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他先后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谈论改诗词的问题。这是他自请长假病休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的频繁联系：词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改后送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后发还……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修修改改，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江青。江青毫不客气地对胡乔木说：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要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这句话无疑是对胡乔木浇了一盆冷水，使这位被毛泽东曾经称之为“一介书生”的胡乔木大为恼火！江青哪里知道，她已经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胡乔木又是填词又是请毛泽东帮忙改词，这说明他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已经具备了写作条件，完全可以回到毛泽东的秘书岗位上了。这一明显的信息，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后来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1965年元旦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显然是胡乔木重返政治核心的信号。可是，胡乔木却始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再一次召唤。其中的原因，胡乔木肯定是心知肚明。读者诸君看了本传前后叙述的诸多故事，自然也是不难明白的。当然，胡乔木在多少年后又一次时来运转，成了邓小平的座上宾，那倒是毛泽东不曾料到的事情了。尽管如此，胡乔木后来在谈到他的《词十六首》时，还是说：“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再说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的蹲点报告上作了批注并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谢富治在11月15日写了一份题目为《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蹲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该厂存在4个严重问题，并列举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八种表现”，诸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科学试验，为名为利”等等。

毛泽东在谢富治这个报告中提到的**该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这句话**后面，批注道：

**“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毛泽东又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12月12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2月7日送审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上批示道：

“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中和陈正人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一个多月的蹲点情况报告**中作了批注。

他在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作的两处批注是：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他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作的批注是：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12月13日，周恩来将准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做了不少批改，并在其中加写了这样两段文字：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100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它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此时想到北京大学一些人骂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咒骂大跃进是“吹牛的骗子”，“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咒骂反苏斗争是“想做霸主，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他接着写道：

**“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毛泽东还把报告稿上“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改写成：“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欲知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请继续往下看吧！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写的两段文字，既富于哲理，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人类社会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规律，**说明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及15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不同寻常的话语，特别是第二段中那几个排比句，读起来不但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而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毛公卓越的驾驭文字能力，不止是他同时代的笔杆子无人能及，就连那些所谓的文学大家们，也都相形见绌！

**第39章**

**“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

**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

**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

**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

话说1964年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根据11月25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来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他说：

“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

“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说：

“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

“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

“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

“**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不会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吧？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

“不能征购。要到5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

周恩来插话说：

“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

毛泽东说：

“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刘少奇又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尔后说：

“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

“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从16日到19日，中央工作会议都是每天上午讨论，下午召开全体会议。

12月20日中午12时，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他同朱德、周恩来等已经到场的一些人谈笑风生。在谈到孙中山时，他说：

“**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种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一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一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们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毛泽东又谈到了余秋里，他说：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周恩来插话说：

“去冲破一潭死水。”

提到《人民日报》，毛泽东说：

“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

他说的“大白菜也上了头条”，是指《人民日报》12月5日在头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报道的北京市干部参加运销大白菜的消息，这个消息还配发了短评，刊登了社员的来信，很有些声势，是副总编辑安岗与北京市记者站的记者共同组织的。毛泽东又说：

“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他正在高谈阔论，刘少奇进来了。他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说：

“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刘少奇不再推辞，于是重提12月15日下午他已经说过而还没有经过会议讨论的老问题，他说：

“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命。”“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说：

“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

“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还是坚持把话题绕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他说：

“**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说道：

“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5大领袖嘛，5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也是只管说自己的问题，他说：

“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说：

“不要管下层，只管‘5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见毛泽东如此明确地表了态，也只好表示赞成了，他说：

“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来，大家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及处理办法。毛泽东说：

“**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10%。**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20%，7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100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100块钱到150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80%。”**

邓小平插话说：

“这次运动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把话题转移到“四清”的概念上，他说：

“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他还特意嘱咐大家说：

“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1月、2月、3月、4月、5月，再搞5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刘少奇见毛泽东说完了，就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他说：**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当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则冷冷地说：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插话说：

“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接过话题说：

“**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4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4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少奇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问题不放，他坚持说：**

**“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它的。”

李葆华问道：

“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说：**

**“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反唇相讥：**

**“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毫不让步，他说：**

**“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说：**

**“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时，毛泽东没有再和刘少奇继续争论下去，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毛泽东批改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

“**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零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报告》中还说：

“**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力量的增强，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的伟大力量，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

周恩来为了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指示，在会议上再次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并号召全国向他们学习。

周恩来曾先后3次到大庆，肯定了大庆人靠“两论”（毛泽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的经验，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建设大庆矿区的方针。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称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4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2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亚非文学座谈会的许多国家作家代表团的代表。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周岁生日，他要在晚上请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大庆“铁人”王进喜、回乡知识青年代表董加耕、邢燕子及钱学森等部分科学家、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少数中央部门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吃饭。为此，他亲自拟定了名单，并安排钱学森和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还有陶铸和曾志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跟他坐在一桌，而江青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等人，则分坐另外两桌。

晚饭前，毛泽东一到场就说：

“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他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整个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说完了，就来到自己的位置上，紧紧握住陈永贵的手说：

“永贵好啊！”

他又挨个和客人握手问好，并询问了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还说：

“**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

说罢，点上一支烟，望着陈永贵和钱学森，又说：

“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车，这很好**。”

席间，毛泽东见陈永贵很少动筷子，就热情地说：

“永贵，吃菜，吃菜嘛！”

他随手为陈永贵夹了一筷子，招呼道：

“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

毛泽东知道陈永贵已50岁，便风趣地说：

“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说：“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上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相结合，工作队队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生产队规模，基层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最后一条是讲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文件第一条关于运动的性质，并列举了几种提法：一、“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件认为，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并且强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朱德发言后，陈伯达对《十七条》作了一些说明，他说：

“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的讨论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插话说：

**“现在15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在发言中讲了文化革命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

他在批评文化部时还点出了文化部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在会议将要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他说：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见毛泽东一直批评他的工作，本来就接受不了，再一听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反驳说：

“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你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刘少奇越说越生气，他质问毛泽东：

“**你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见刘少奇已经撕破了面皮，非常气愤，便说：**

**“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3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字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揭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

后来在1967年1月22日，张霖之在被群众批斗后上吊自杀了。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动员群众斗争张霖之的是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也是他们指定我去讲话的。”**“**当时法医的验尸报告都在，他的皮下伤并不致死，他确实是上吊自杀的。**”

再说毛泽东在12月27日下午的会议结束后回到家中，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一首古诗突然跃出脑海。他以沉重的声调吟诵道：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这是他在几十年前很喜欢的一首古诗，诵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何时何人所作，于是便在次日凌晨提笔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三垂冈一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 1964年12月28日凌晨，

写罢，他吩咐值班卫士将信送与田家英；又拿过3张印有红线竖格的宣纸，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挥洒出了一幅令不少书法家拍案叫绝的毛体书法作品——《三垂冈》。

大凡有较高文化素养、有诗词功底的人，在愉悦或激愤或悲痛的状态下，每每有相应的警句、格言会不期而至地浮现在脑海，于是便低吟浅唱，或奋笔疾书。历史上的一些书法杰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便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三垂冈》**也属于这一类书作。**这类书品淳朴厚重，浑然天成，绝没有那些风月派乃至当今学院派的矫揉造作且自以为高明的小家子气**。

毛泽东诵诗中“朱梁”的朱，是指在五代初期建立后梁的**朱温。此人乃唐末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的无耻叛徒。**毛泽东在批《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时曾这样写道：“**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而他在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时则写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就是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的小名。

经田家英找专家查阅，《三垂冈》一诗是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海珊诗钞》。毛泽东所书有两字与《海珊诗钞》不同，即第4句中的“犹”字在《诗钞》中为“且”，第7句中的“下”字在《诗钞》中为“畔”。但是，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所引的《三垂冈》一诗，却与毛泽东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深深地为后来的专家所折服。

再说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之后，就《十七条》中的第1条和第16条内容，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

“**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作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

“这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没有说明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和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当前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这个提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提法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重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十七条》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就说：

“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3章也看一下，那是讲自由民主的。这里有两个人——”

他指着刘少奇、邓小平说：

“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参加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

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不让我参加会议”，是指邓小平曾经以毛泽东身体不好为由，说没有什么重要事，劝他不要参加会议。他所说的“一个不让我讲话”，是指刘少奇在12月27日下午会议上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有两本书——”毛泽东说着，拿出了两本书，摇动着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

他又摇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

“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条，这个条文叫第85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87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谁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插话说，算集会。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游行示威的。**”

毛泽东最后问大家：

“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大小礼堂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

“你们的会开完了吗？”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28日下午印发《十七条》后，就准备结束。而这个**发放《十七条》的结束会议，刘少奇等人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听陶铸说会议已经结束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生气地说：

“**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他又问陶铸：

“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回答说：

“有的已经走了。”

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转身对汪东兴说：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说《十七条》“中央正在修改，停止下发，并由各级领导自行将文件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12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对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记录稿的批语”中写道：

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毛泽东1964年12月31日

1965年1月2日，毛泽东为修改1941年撰写的批判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章”**，将旧书稿印发给谢富治等人征求意见，批语全文如下：

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3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1945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即周恩来——笔者注）**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我自己在1941年（可能是这一年的春季，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写好，只给弼时、少奇两人看过，自己也忘了。1964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历史博物馆找到的）送给我看，我才记起确曾写过此文。

毛泽东 1965年1月2日

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这边的会议一结束，刘少奇立马赶去参加毛泽东晚上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的这“一个小县”，指的是河北省新城县。他接着说：

“我跟前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你一个新县城，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为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

他扭过脸问刘少奇：

“**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与会者听毛泽东如此一说，纷纷议论起来。毛泽东待大家平静下来以后，接着说：

“**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得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3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也说：

“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

“**我听说有6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5个人嘛。”**

有人提出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

“时间问题，全国1967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

“**在人代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了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说：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2次会议也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10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他说，人代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关于“四清”运动，《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1月6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陆续来到北京，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在1月3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传达。尔后，各小组讨论《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修改。

1月9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斯诺。

斯诺是在1964年10月8日来到中国的，他首先和周恩来谈了话，然后就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斯诺在参观中看到中国在3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好转得这样快，感到很惊奇。见到毛泽东后，斯诺首先请求毛泽东准许他把这次采访的全过程拍成电视记录片。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

“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泽东带着苦笑回答说：

“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经毛泽东同意后，进来了一位摄影记者，开始拍摄斯诺采访毛泽东的全过程。这次会见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种问题，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气氛相当轻松活跃。斯诺首先谈到了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他说：

“我22岁到中国，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国得到的。”

毛泽东问：

“那是什么时候？”

斯诺回答说：

“1936年。最集中的是和主席一起的5个月。那时在保安的时间太短，不过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几个月比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的两年半学到的还要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可能这是真的，你在中国比较自由些。”

斯诺说：

“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答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些。”

斯诺说：

“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泽东说：

“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100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1000年以后大概会显得可笑吧。”

斯诺说：

“1000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泽东说：

“今后的1000年比过去的1000年可能变化大。”

斯诺说：

“深入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泽东说：

“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诺说：

“**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泽东说：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诺问：

“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泽东说：

“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诺说：

“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说：

“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一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用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都不想要。事实证明，到处兴风作浪的不是‘竹幕’后面的中国人嘛！正是那些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自己。**说中国掌握了原子弹就是给世界带来灾难是不公平的。你也看到了，中国可没有拿着那个东西到处吓唬人，倒是那些对我不放心的人，在到处搞核威慑。什么‘大规模报复战略’呀，‘灵活反应战略’呀，都是用原子弹、氢弹威胁世界和平。**美国人就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承诺了，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一天就承诺了。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

斯诺谈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说：

“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诺问：

“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泽东说：

“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诺又问：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泽东说：

“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诺说：

“在苏联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泽东说：

“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诺将话题一转，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

“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对此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悬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认为这将演变成战争和历史上的大悲剧。”

毛泽东说：

“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诺问：

“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认为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希望吗？”

毛泽东说：

“是的，我看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历史的力量一定会再次把两国人民联结起来。**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说：

“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说：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好多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说：

“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泽东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说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诺说：

“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强调说：

**“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交谈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毛泽东说着说着半闭上眼睛，声音慢慢低了下来。斯诺见他有点累了，就说：

“我从来没有会见过约翰逊总统。但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特别信息给他，我也许能够转交给他。你有愿意对他说的话吗？”

毛泽东说：

“没有。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共进了晚餐。斯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出人民大会堂门口。在大门附近，没有卫士。毛泽东在零度下的夜晚没有穿大衣，不顾斯诺的反对，又要送斯诺去乘汽车。到了汽车跟前，毛泽东跟斯诺握手，要斯诺多保重，他说：

“天有不测风云。”

眼看着斯诺上了车，毛泽东还独自在那里站了片刻，以传统方式向斯诺挥手告别。直到斯诺乘坐的汽车开动后，他才转身回去。

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在1960年会见斯诺后，中国的新闻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这一次斯诺被《人民日报》的新闻介绍为《西行漫记》的作者。

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后，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泽东的谈话。英、德、意等国的报刊相继转载，唯独美国各大报未予登载。回到美国后，**斯诺把这次在中国整个采访过程中拍摄的电影记录片命名为：《人类的四分之一》，充分地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又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和约翰逊见面，但这位美国总统傲慢地应付了几句，便让送客。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

欲知中美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接见斯诺时候的心态，完全是一种大决战前夕的状态。斯诺没有也不可能猜想到。在1960年和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都做出了准备与美国政府接触的暗示。很遗憾，美国政要人员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他这种特有的处事方式。

另：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历来评论者众说纷纭。读者不妨看一看斯诺是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的。斯诺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现在，人们说，刘和毛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据毛说，在党由两个人领导的四、五十年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来是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始终能够客观地观察和报道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而他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判断**，**即“**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也就是对于**革命的路线和道路“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这一评论，不是比一些中国人更客观一些吗？

**第40章**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

**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话说1965年1月11日晚，毛泽东邀程潜、章士钊、周世钊、王季范到菊香书屋便餐小叙。谈到湖南一师的校友彭庆一生以教书为业、退职后生活困难时，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我有稿费。”

送走客人后，毛泽东阅田家英1月10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1月8日讨论《后十条》的书面意见。华东组提出：

**《后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

具体意见有：**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95%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后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后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

毛泽东阅罢华东组的书面意见，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可以看一下。”

1月12日，毛泽东对徐寅生1964年9月28日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毛泽东 1965年1月12日

1月13日下午3点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

原来，朱德、贺龙等人曾经找过刘少奇谈话，劝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参加党内生活会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一共17人。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月13日这一天，高智因参加中国与印尼通航派往印尼的代表团提前来到北京，毛泽东马上接见了他。

高智在离开毛泽东这两年零8个月里，一直想着毛泽东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的交代，想着老人家交代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所以他这次从西安经郑州到北京时，对毛泽东没有走过的西安至郑州段的铁路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沿途有多少个涵洞？哪个最长？地形怎么样？路好走不好走？一一都记在了本子上。

这天下午，高智进了中南海，经过怀仁堂、居仁堂，径直来到毛泽东住的院落。此时毛泽东还在休息，高智就坐在卫士值班室等候。不一会儿，毛泽东睡醒了，机要秘书徐业夫给他倒好了茶水，向他报告说：

“高智来看望您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让他马上来。”

高智随着徐业夫快步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到了毛泽东，他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就那么握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

“主席，我想坏了……”

毛泽东拉着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询问他在分别后的情况。高智给毛泽东点着了烟，回身坐在椅子上，汇报了陕西的外事活动，汇报了他的工作情况，倾诉了想念老人家的心情。毛泽东说：

“你给我的信和小米都收到了，由于工作忙，没有亲自复信给你。你过去在我身边工作得很好，我很满意。”

他还鼓励高智在陕西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高智说：

“主席，我离开您时，您让我写了一个学习计划，可到西安后学习计划没完成。当初有些好高骛远。”

毛泽东说：

**“我和你犯了一个毛病，也有些好高骛远。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工作忙，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对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只有7年，从1927年到1934年；在延安和陕北住了13年嘛！在那个时候，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还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高智便把自己对西安至郑州段铁路状况的观察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他和高智一聊就是45分钟，高智一看表，时针已经指向下午5时25分，便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要他把在西安的具体住址和电话留下，还拉着他的手嘱咐说：

“你从印尼回来后，再来见我。”

他还说，晚上春藕斋有舞会，要高智随他一块去。

高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北京之行竟是他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后，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

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十三条》。文件全称还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为《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把毛泽东的讲话列成条文，有的作了文字加工，有的就是毛泽东的原话。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长时间存在的矛盾与斗争公开化了。**《二十三条》中规定：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运动中的“秘密串联、大兵团作战”的“左”的偏向作了纠正，规定：**要正确对待基层干部，干部中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少数是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要尽快地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要以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不要在少数人中活动，反对搞神秘化和繁琐哲学。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二十三条》又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同时，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二十三条》中还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陈伯达把上面第二句改为：

“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毛泽东表示赞赏。

在“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一句中，**“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议加上的。毛泽东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就同意了**。

中共中央还为下发《二十三条》，专门写了一个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为准。”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1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的反映到中央。

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1963年5月搞了10条。为什么只隔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2个10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1964年8月1日推广“桃园经验”的讲话——笔者注），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110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说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110万人搞那么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需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联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学艺术界的问题，他说：

“你这个文艺，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年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笔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找毛泽东谈话，他检讨说：**

**“我对主席不够尊重。没有尊重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说：**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此乃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笔者注）。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再说1月21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送审的报告上写了**一个很特殊的批语**。

李富春将按照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批示精神再次写出的“关于计划工作革命化和编制长期计划的报告”，是在1月6日送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看了还是很不满意，批示道：

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由秋里自选5、6、7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

毛泽东 1965年1月21日

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

“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

他还说：

“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关于长远规划设想问题，毛泽东说：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周恩来立即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

1月27日，毛泽东批转了李富春的一份关于计划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说，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3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这项措施是当前卫生工作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促进卫生队伍革命化的一条有效途径**。这样做，**有利于帮助提高农村医疗技术质量，培训农村卫生人员，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也是为农村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创造条件**。各地可选择几个大、中城市，先行试点，并应重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中央 1965年1月27日

此后，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深入农村，进行防病治病工作。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

1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杨成武、雷英夫，他写道：

杨成武、雷英夫同志：

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苏军总参谋长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笔者注）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

毛泽东 1月30日

1月末，毛泽东接见了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夸奖阎肃在剧中古诗运用得好，他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改成‘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改得好，古为今用嘛。**”

毛泽东还说《红梅赞》是又一首《咏梅》。

阎肃为了创作歌剧《江姐》剧本，曾两度入川，在渣滓洞监狱里体验生活。他让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脚镣，脚镣很重，碰到踝骨那是钻心的疼。他双手被反铐着，编号为3841，三餐吃的是监狱里用木桶装的菜糊糊，夜里睡的是地上发了霉的草垫子。就这样，他在那里熬了7天7夜，对剧本初稿进行了重新构思。此后两年间，他和音乐创作者羊鸣、姜春阳、金沙一起，又将剧本和曲谱从头到尾修改了几十次，终于创作出了久演不衰的歌剧——《江姐》。

关于毛泽东的接见，阎肃曾回忆说：“那是在1965年初，一个礼拜六，我也没穿军衣，我也没刮胡子，实在狼狈不堪，我就，敬礼也不对，我就给他鞠个大躬吧，给毛主席。毛主席一站起来，那个儿，比我高多了，大高个儿，那手伸出来，大手。握着手，阎肃同志啊，这是湖南话，夸我，就说我写得好，写得很好，很喜欢，很有文采，我听不大懂。我当时脑子里想，我说我说什么呀，我说我写得好，没道理啊，我说写得不好，主席说你好，你说不好也不对，我说我还要努力学习，还要努力学习。完了毛主席说送你，送我一套书，送我一套他的书，我的书，送他的书，什么书呢？《毛泽东选集》。”

1965年2月10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后将路过北京，周恩来同意和他们进行接触性会谈。

2月11日凌晨，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们这次对苏方过路接待规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今天上午9时至10时半的会谈，还要涉及国际形势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争论不求解决，只为今后外交来往做一交代，否则要改进国家关系，即使3月1日会议取消也很难进行。”

周恩来还建议说：

“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

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意会见柯西金一行。

2月11日上午11时，周恩来陪同柯西金去见毛泽东，这使柯西金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拿起一支香烟，又抽出一支请柯西金吸，柯西金说：

“谢谢，我不会抽烟。”

毛泽东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你们都是讲卫生的。”

柯西金开玩笑地说：

“我是专门挑选了不抽烟的人组成代表团的。”

周恩来在旁边插话说：

“他们两位将军不听他的。”

毛泽东哈哈一笑，指着两位苏联将军说：

“噢，我还有朋友啊？”

言归正传，毛泽东似乎很认真地说道：

“**苏共二十大，我不赞成。什么斯大林那么坏，有个人迷信。到后来又搞成一个赫鲁晓夫也搞个人迷信，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这个赫鲁晓夫是个好人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整下去呀？”**

柯西金说：

“我们当然可以谈为什么把他解除了。可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把他解除了吗？”

毛泽东抽着烟，说：

“他身体不好？我们没有把他解除，我们没有收他的照片，也没有收他的书，照样发行。”

他弹了弹烟灰，似乎不无遗憾地说：

“就是销路不行，可惜呀，销路不行。赫鲁晓夫这个同志怎么搞的？”

柯西金被弄得哭笑不得，便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毛泽东同志，他怎么搞的，你们最好问赫鲁晓夫他本人最方便。”

柯西金原来想着他这一将，管教毛泽东再无法还口，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说：

“叫他来一下嘛！”

周恩来和刘少奇被毛泽东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柯西金亦非无能之辈，微微一笑，说：

“你去叫他来嘛！”

毛泽东顺水推舟地问道：

“我们现在发出邀请，你们代表团可以答应吗？这可是个宝贝呀！”

这一将，柯西金没有退路了，他哪里做得了主啊？只好退回去说：

“赫鲁晓夫的问题，我们已经给你们谈过了，跟周恩来同志谈过，详细谈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笑嘻嘻地问：

“谈过了吗？”

周恩来插话说：

“我说，我们不满意那个解释，因为没有谈实质性问题。”

他知道毛泽东再怎么将军，柯西金也是不会对赫鲁晓夫下台问题露任何口风的，于是就转换了话题，不料，他自己又和柯西金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争论了起来。毛泽东笑着打圆场，说道：

“你们两国总理吵起来了啊！”

柯西金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两个总理是不会吵起来的。”

毛泽东频频摆手，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两个总理总打仗，而且看来柯西金总是打胜仗。”

柯西金一笑置之。毛泽东继续追问道：

“你这次又得到不少胜利回去吧？”

柯西金摇摇头，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打仗，我也没有取得胜利的任务。而且，如果有这种任务，也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侧过脸问：

“噢，无法实现？”

“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全世界都说周恩来同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柯西金说罢，看看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为自己的一箭双雕颇为得意，就接着说：“前天美国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

这天中午，柯西金在苏联驻华使馆设宴，答谢周恩来对他的热情招待。下午1时半，柯西金一行离开北京回国，周恩来到机场为他们送行。

2月18日，廖沫沙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的文章，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2月19日下午4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周恩来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手举着香烟，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

他突然把话题一转，问起坦桑尼亚发生的兵变。周恩来插话说：

“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笑着问：

“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在场的中国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听完翻译一愣，也跟着笑了起来，他解释道：

“**那次兵变是帝国主义故意搞的**，有两个目的，一是想重新控制我们，二是使周恩来总理不能对我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发表声明说，非洲的革命形势大好，帝国主义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所以才策划了那次兵变。**帝国主义知道发生兵变后必须请他们来帮助平息，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赖在我们那里不走了。**可是兵变平息后，我们马上就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周恩来插话说：

“当时，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接连发生兵变，3国都请了他们的军队进行平息，但坦桑尼亚是头一个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关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尼雷尔诚挚地说：

“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让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样办。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毛泽东说：

“**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周恩来说：

“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我们还教给你们技术。”

毛泽东突然问尼雷尔：

“听说你们那里野兽很多，有斑马吗？有老虎吗？有狮子吗？”

尼雷尔作了详细回答，又说：

“周恩来总理访问我国的时候，我要陪同他看看我们的野兽。”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冶金工业部和第5机械工业部，国防工办，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人委，重庆市委和人委并中央工交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和人委：

西南三线建设现在日益展开，任务艰巨。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大力协作，使三线建设进行得又快又好，现作如下决定：

一、凡是在三线一个地区建设的重大综合项目，如**以钢铁为中心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的配套建设，以及**铁路建设工程**等，都应**采用大庆经验**，即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

1、**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特区人委问题，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月5日批复西南局1月7日电报执行。**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同志为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冶金工业部基建司司长李非平同志为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总指挥。**其他人选，由冶金部商有关部门决定。

2、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由第5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参加，**任命第5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同志为总指挥**，四川省委或重庆市委指定一人为副总指挥，请西南局决定。其他迁建项目，仍由各部负责。

3、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由铁道部负责不变。川汉铁路的勘察、设计、选线等工作，由铁道部负责，直接指挥。

二、西南三线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在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它问题，如协调地方与建设人员的关系等，由有关省、市、区负责安排。

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并撤销原攀枝花基本建设筹建小组，**由李井泉同志任该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其他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提出，报中央批准。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由西南局计委、经委、建委负责或另设小的办公室，亦请西南局决定。

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

1、领导和督促检查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

2、领导和督促检查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3、领导和督促检查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地方军工等）的进行。

4、如西南局三线建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中有重大不同意见时，报中央解决。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5年2月26日

欲知三线建设的情况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后，毛泽东在1月14日的会议上又谈到了文艺界的问题。他说：“你这个文艺，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此后不久，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可那些一线中央大员却偏偏要在文化战线上再生事端，又掀波澜了！

**第41章**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

**其它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话说1965年3月1日至5日，勃列日涅夫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有1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分裂会议，**中苏两党关系不可挽回地彻底破裂了**。

3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文艺界的整风，试图尽早把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停下来。邓小平在会上说：

“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踏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要赶快刹车。**”

身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彭真，也提出学术讨论要降温。

这样，《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3月间，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一心要打开批判《海瑞罢官》的突破口，她便找到康生，问：

“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

康生一连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江青摇摇头，说：

“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像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有气魄。”

康生说：

“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

江青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又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借上海攻北京。江青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商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撰写《评（海瑞罢官）》。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后来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3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3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3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3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中一些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一、**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有些报刊在向群众进行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中，界限不够明确，交代过于简单。因此，有些群众该买的东西不敢买了，该吃该用的少吃少用了。有些地方乱改商店名称、商品名称。有些地方的商业行政部门强调改革商品牌号、商标和图案的范围过宽，以致当地的商业单位不敢进货，已经买进的商品有的也要求退货。反映在市场上，这些地方若干商品销售情况不好，有些服务业和手工业营业额顿然减少。这种情况，不利于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进行，也会使群众的正常需要不能充分满足。**

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勤俭节约、勤俭持家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是，我们**提倡勤俭持家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群众，不要只顾个人生活的改善，不顾国家建设的需要；是为了教育群众，生活水平要同当前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要有过高的要求；是为了教育群众有计划地安排生活，不要一下子花得太多，过后又无法安排。**在勤俭持家的宣传教育中，要照顾到各种地区、各种人的实际情况，不要去限制群众的正当消费。

三、各地在社会主义教育当中，要**注意把人民群众正当的生活改善，同多吃多占、损人利己、不劳而食、只求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区别开来。要把群众正当的喜庆、节日活动，同讲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的旧习气作风区别开来。要把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残余，同有批判有分析地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区别开来。要把大是大非的两条道路斗争，同群众的生活细节和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区别开来。**在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供应上，还应当照顾到他们的传统习惯和特殊需要。

四、**少数商标图案在政治上明显反动的商品，应当经过省、市、自治区一级批准，停止生产，停止出售。**已经生产出来的，要进行改装或改制，然后出售。除此以外，一般商品中，凡是历史上沿用已久的名牌，或者群众已经习惯了的名称、牌号、商标，基本上不要改动。有些牌号、商标和图案需要改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主管生产的部门，经过研究，制定方案，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整理，不许随意停止出售。**出口商品的牌号、商标、图案、式样，应当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由对外贸易部门统一管理，各地不准随意变动。

五、当前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应当把群众的这种革命热情，引导到大是大非问题即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问题上去，引导到生产建设上去，促进生产新高潮的发展，而不要把群众的精力过多地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要干扰群众的正常经济生活。**

中央 1965年3月4日

3月4日晚，毛泽东在《后汉书》的封面上批示道：

“送陈毅同志阅。”

他又在封面上写明要看该书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还批示：

“送刘、周、邓、彭一阅。”

《陈寔传》中说，有小偷夜入陈寔家，躲在房梁上。陈寔发现了，起身叫来子孙，训诫他们说：“人不可以不自我勉励。干坏事的人不一定天生就坏，只是长期习惯了，才逐渐变得这样。梁上的君子就是这样的人！”小偷闻言，非常惊恐，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叩头请罪。陈寔说：“看你的样子，不像是个坏人，应该改掉自己的坏毛病，重新做个好人。”他吩咐家人送给那人两匹绢。从此以后全县盗贼绝迹。这个故事说明，**为人要宽容，要给别人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更要尊重别人，哪怕对方犯了错误也要给对方足够的尊严。**

《李固传》、《黄琼传》中说，李固仰慕黄琼的才学，勉励他出仕。黄琼应召入朝，却又在中途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后，才继续向京城出发。黄琼到达洛阳近郊时，收到了李固写给他的一封信。李固在信中非常诚恳地启发和开导了黄琼。他在信中所写的“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名言，一方面批判了一些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以那些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告诫。

毛泽东历来提倡**以史为鉴**，这大概就是他向陈毅并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推荐阅读这3篇东汉人传记的本意吧！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中，免去齐燕铭、夏衍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4月9日，毛泽东对杨成武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在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4月9日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坚决打击美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将海南岛地区的海军航空兵改由空军统一指挥。周恩来审阅修改这一报告后，杨成武即呈交在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驻青岛的那个师调去海南岛没有？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

后来，海军航空兵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从1965年到1970年在海南岛先后击落入侵美军飞机7架，击伤1架，还迫使美军击落自己飞机1架；生俘美军飞行员史密斯。中国海军航空兵无一伤亡，取得了9比0的辉煌战绩。

4月9日这一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称：“**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11日中午，柯庆施的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

据《书报文摘》刊文称，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龙、李井泉等宴请了柯庆施，午夜12时柯庆施就出了事，3天之后猝死。这一突发状况为柯庆施之死蒙上了一层迷雾。在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小将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是“贺龙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为此，上海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到成都进行了调查，查明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

柯庆施是应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于3月13日到了成都。4月5日是清明节，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与贺龙、柯庆施等人。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同桌，可在临开席时有人提议：**今日晚宴男女分桌，大家一醉方休**。于是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柯庆施曾在1964年做过肺癌致癌肺叶切除手术，身体很虚弱，日常生活均由夫人照料，而这天的晚宴一没有夫人陪侍，二是时间过长，从下午6时开席，一直至晚9时许方才结束。**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大约午夜12时许，柯庆施感觉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随即为他作了常规处理，可到凌晨2时，病情还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柯庆施身边虽有四川方面的优秀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可依然无效。3天后，柯庆施不治身亡。

再说4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

二、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

越南人民反美革命斗争的形势很好。越南南方军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美帝国主义的“特种战争”已经破产**。越南南方军民有充分的信心，在必要的外援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南方，逐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越南民主共和国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坚决保卫北方，支援南方。越南军民英勇打击来犯敌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一方面在越南南方增加侵略军，另一方面**对越南北方不断进行轰炸，把战火逐步向北伸延，向局部战争发展**。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性是严重存在着的。

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步骤，必须认真对待，绝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

三、**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它在越南疯狂地扩大战争，并不是它强大的表现，而是它虚弱的表现。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用了很大的力气，花了近10年的工夫，在只有1400万人口越南南方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而且注定要遭到最后的失败。**美帝国主义要进一步扩大战争，它的致命弱点是，它进行的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的战争，是极不得人心的，甚至它的一些盟国也是不支持的。它在军事上，**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士气低落，地形不利。**如果它不顾一切地扩大战争，只能进一步暴露它的弱点，进一步加深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进一步自掘坟墓。**一切悲观失望和害怕战争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对于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我们要充分估计到敌人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占有海空优势，目前**敌人在太平洋地区加紧进行的军事部署，主要是针对我国的。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一切盲目侥幸和麻痹松懈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四、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我们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久经考验的人民解放军，有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团结，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败美国侵略者，推进世界人民革命，首先是推进东南亚各国人民革命。

五、现在，**越南人民勇敢地挑起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重担，不仅是为了保卫祖国，而且是对于中国，对于亚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贡献。**我们也应当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尽一切可能援越抗美，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反对美国侵略、争取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越南人民需要我们什么援助，我们就给他们什么援助。**

六、**苏共新领导修正主义集团在越南问题上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玩弄假支持、真出卖的阴谋。它企图插手越南问题，控制中越，同美帝联合搞“和平谈判”**，扑灭南越人民的革命斗争，阻止东南亚革命的发展。**我们对于苏共新领导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必须大力宣传越南人民反抗美帝侵略的武装斗争的连续胜利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坚强意志，必须继续**揭露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四联四反的真面目。**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美帝及其帮凶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巩固和扩大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七、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1、大城市和大的工矿交通企业，要建立和整顿防空委员会，做出必要的防空规划，进行防空教育。2、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它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究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3、军队的备战动员，按军委的命令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八、目前，除边境地区外，暂不在群众中进行备战动员。对于广大群众援越抗美的积极性，领导上要注意引导到发奋图强，做好本岗位的各项工作中来。1、在工矿企业中，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保证军需和民用。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项目按期或提前建成投产。商业部门要做好收购和推销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人民生活中的正常消费。各有关部门都要加强物资的保护工作。2、在农村中，要努力争取今年夏季和秋季的丰收，改善社员的生活，增加生产队、公社和国家的储备粮。3、科学技术研究部门，要加紧工作，更快地创造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国防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在学校中，教师要教好，学生要学好，要保证教学的正常秩序，保证教学质量。5、在党政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中，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革命化。6、在所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要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把“四清”工作做得更好。

九、这个指示发到县委和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单位。**关于备战工作有关情况，一律不得在报纸刊物（包括党内刊物）上发表。对于省、市级以上民主人士，可由负责同志向他们作口头说明。**

**对于人民群众，可根据《人民日报》评论和新华社报道，加强时事教育。**

在备战工作中，要注意各阶层的动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是可能出笼的，让他们暴露一下，没有什么坏处。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公安部门，要加强工作。重要情况，要随时上报。

4月27日，江青在谈到柯庆施的时候说：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4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说：

“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他还说：

“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这种空降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后方，配合正面的进攻。空降的兵力不会很多，一个地区无非是1、2个师，或者一个小的集团。所以这些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

4月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取消军衔制的问题。

此前，国防部在1965年2月18日曾发出通知说：中央已批准取消军衔制度，正在办理法律手续，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1965年4月21日，军委办公会议又审定了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部门提出的军队新服装方案和由总参谋部代军委起草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的报告。

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它的统统都吹了。”**

他还说：

**“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就在4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

后来在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9次会议，讨论**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取消军衔制的命令**。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规定》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5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论，社论说：“取消我军的军衔制度”，“是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一项重大措施，完全符合我军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反映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愿望和要求。”“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缔造、领导的人民军队。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是我军固有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亲密的战友和阶级兄弟。我们军队和人民血肉相联，鱼水相亲。”“**10年的实践证明，实行军衔制度，与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不相符合的，与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不相适应的。**我军的建设，最根本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培养优良作风，提高军事素质，使我军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因此，取消军衔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取消军衔制度，也有利于促进我军指战员思想的进一步革命化。”“**取消了等级表面化的军衔制度，有利于消除助长等级观念和名利思想的一些客观条件，可以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普通一兵、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更加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6月6日，国防部就关于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称呼问题发出通知。通知规定：**废除原按军衔的称呼，如“元帅”、“将军”、“校官”、“尉官”、“上士”、“列兵”和不成文的习惯称呼，如“某某总”等。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的相互称呼，可称姓名加同志，或姓加职务和姓名加职务，或职务加同志，如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职务时，可简称“同志”。**

再说4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58号上刊登的《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4月29日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4月29日晚，毛泽东到了长沙，他在这里住了22天，一直到5月21日上午。

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员、上将刘亚楼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享年55岁。

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痛悼刘亚楼，按大将规格极其隆重地为他举办了葬礼。

5月9日，林彪在上海召见了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

吴法宪说：

“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

林彪说：

“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

吴法宪马上说：

“我这个空军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

不久，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说：

“空军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

林彪立即再次召见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

吴法宪激动地说：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

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关于吴法宪的为人，《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吴法宪这个人，后来人家说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错了，这个人聪明透顶，大家都挺喜欢他。他是南方人，口齿清楚，他常会说一些笑话给江青听，江青见了他就很高兴。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了他和江青闹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词的，而讨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写。且有的地方则纯是编造，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与江青公开闹矛盾，讨好江青都来不及呢。”

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政府派出了3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

目前，爱国的多米尼加人民正在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英勇的战斗。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我深信，只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多米尼加的反美爱国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是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

**美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和侵略。这一次，美国政府把什么“睦邻政策”、“不干涉原则”等等骗人的鬼话一股脑儿摔在一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干涉和侵略，这就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强盗的原形**。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还打着“反共”的旗号。美帝国主义的“反共”，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做美国奴隶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保卫本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人。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

**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拣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使多米尼加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必须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新的反美浪潮。英勇的多米尼加人民，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亚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非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胜！

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必败！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发表修改后的“九篇文章”，重新修改了1月2日写给谢富治等人的那篇批语，全文如下：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篇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

毛泽东 1965年5月12日

5月中旬，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前，会见了秘密访华的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身着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灰白的长须，飘在胸前。毛泽东亲切地和这位老朋友握手拥抱。宾主落座后，胡志明对毛泽东说：

“我这次到中国来，有3个目的，第一是问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说：

“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你们感谢我们。”

胡志明坚持说：

“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有两个中国同志，不署名捐款给我，一个寄100元，一个寄几十元，并说明是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捐献给越南，打美帝国主义。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兄弟友谊。美军要增加到10万，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我们已下定决心，即使敌人炸坏河堤，淹没许多地方，我们全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决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5年、10年、20年。”

“美国打不了20年。”毛泽东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美国人少，你们人多。他顶多来个十来万人。**”

胡志明说：

“美国来个十来万人，我们不担心。我们可以打败美国的陆军。我们不止有正规军，有游击队，有人民，而且**气候、蚂蝗、蚊子、蚂蚁、沼泽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还有坚固的后方，这就是中国。”

毛泽东说：

“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胡志明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张绘制着越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该吃饭了，毛泽东邀请胡志明一同进餐。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对胡志明说：

“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说：

“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敌机常轰炸。”

“**我就是要去看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有看到轰炸了。**”

“等形势好一点请你去。”

毛泽东固执地说：

“**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劝道：

“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

“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

“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我就是想现在去。”

胡志明自然是不能答应的，他婉转地说：

“等下半年，看情况如何再定吧。”

后来在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接到毛泽东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援越问题。6月9日夜晚，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援越部队就要出发了。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代表中央军委和3总部，欢送由王名辉率领的第一支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境内。不久，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的第二天，秘密抵达了越南北方。此后，大批的援越部队先后进入越南，使越南北方能够抽出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进行抗美战争。大批中国解放牌汽车紧急运送军火物资到越南南方，有力地支援了南方解放战争。

欲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后去向何方？有何特殊意义？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本章所讲到的4月9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关于打击美国入侵飞机报告的批语、4月12日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5月12日毛泽东发表的《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和毛泽东会见胡志明的谈话，可以连在一起看一看。这些文献有一个共同核心，那就是要打击和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看毛泽东这气魄！后来还真地打出了一个几十年的和平年代，打出了一个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打出了一道资本主义世界首领争相朝圣、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心甘情愿地鞠躬输诚的风景线！！！

**第42章**

**“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

**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

**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得住他们？”**

话说1965年5月间，毛泽东眼看着苏联的新一代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人执行的仍然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国内的局势和党内日渐严重的矛盾也不容乐观，这一切无不使他忧心忡忡，长久以来酝酿的战斗激情，时时触动着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中的倒数第2句，源自赫鲁晓夫在1964年4月的一次演讲，他说：“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在毛泽东看来，用吃喝等极庸俗的福利标准去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纯粹是放屁。

5月19日，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江西省委并井冈山管理局，说毛泽东将于22日上井冈山，请他们做好接待工作。

5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离开湖南省委第九招待所3号楼，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夫妇和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陪同下，乘汽车前往火车站。毛泽东的专列于12时50分抵达株洲。下午1时，他改乘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小车队司机赵毅雍驾驶的吉姆车向茶陵进发，行至攸县境内的洣水河边，汽车开上轮渡渡过洣水，于下午7时许到达茶陵县城。吃过晚饭，毛泽东就在县委办公室安置了自带的一张木板床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像窗帘、被褥、便桶之类，准备休息。他让县委书记找来《茶陵州志》，躺在床上一直阅读到凌晨3点。

5月22日一早，茶陵县委书记找到汪东兴说：

“毛主席来茶陵，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安排。”

汪东兴说：

“主席怕惊动群众和干扰你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是路过茶陵去井冈山的。”

县委书记说：

“我的房子可以让毛主席住。毛主席住在办公室里，我们心中十分不安。”

汪东兴说：

“住办公室也蛮好。主席睡惯了自己的床，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基本生活习惯带来了一些用品，不麻烦你们了。我代表主席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

县委书记说，县委的领导同志们想见见毛主席。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说：

“当然要见嘛！路过一次茶陵也不易呀。38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困难。这一次来可不一样了。”

他喝了一口龙井茶，点燃一支烟，高兴地说：

“你先安排好，待我吃过饭就见他们。”

早饭后，毛泽东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张平化夫妇、李强、徐业夫和汪东兴陪同接见。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对大家说：

“这次我们就不多谈了，要赶路，谢谢大家。”

众人热烈鼓掌，目送毛泽东上了汽车。吉姆车绕道行驶，经莲花县到达永新县，在县委招待所休息，吃午饭。然后，毛泽东接见了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周克用、黄荣庆和永新县委负责人。永新县委的负责人问毛泽东午饭吃好了没有，毛泽东说：

“这顿饭又吃到当年在永新吃过的新鲜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

毛泽东接见完毕，4辆小车、两辆大车开始向宁冈县井冈山方向前进，于天黑之前就到了井冈山北麓茅坪位于山腰的谢氏慎公祠和祠后他曾经居住过的八角楼。前行的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都下车了，司机赵毅雍也准备停车，毛泽东示意不下车，赵毅雍便见机行事，开着车子在八角楼前的地坪上徐徐兜了个大圈。毛泽东撩开窗帘，浏览了一下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外景。随后，车子掉了个头，直奔通往黄洋界的盘山公路，穿越崇山峻岭，于下午登上了海拔1343米的黄洋界。

毛泽东一下车，与井冈山管理局负责人握手后即持着竹拐杖，快步走向山顶。他对身边的人说：

“这就是黄洋界！当年我们就是利用黄洋界的险要地形，经过和敌人的几次较量，把敌人赶下了山。那时为了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我们在这里构筑了一些工事，给敌人很大打击。”

他又对汪东兴说：

“东兴同志，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当年工事的痕迹？”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前去查看。毛泽东跟张平化夫妇在木制纪念碑前合影，接着跟江西迎接的同志合影留念。他看到木制纪念碑上刻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和架设在哨口上的一门大炮，深情地说：

“1928年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趁我军在赣西南欲归未归之际进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好险哦！守军凭险抵抗，反复较量，终于把敌人赶下山，才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汪东兴去不多时回来报告说：

“主席，有几个地方还依稀可以看出有当年构筑的壕沟式工事在。”

毛泽东又与汪东兴等随行人员在木制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茨坪宾馆。他在宾馆楼上眺望四周，环视着大约3平方公里的茨坪镇，见高楼巍然而立，一排排住宅整齐有序，路旁绿树成荫，老百姓过去住的泥土墙屋已变成砖瓦建筑，十分兴奋，微笑着对身边的人们说：

“今天的井冈山与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从文家市到井冈山要走半个多月。这次来坐汽车，两天就到了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毛泽东在汪东兴、张平化等人陪同下，手持井冈山的竹杖，向宾馆的后山攀登。他爬上山坡，高兴地举起手中拐杖，寓意深长地说：

“这东西是个好武器，平时可以帮助我们走路，坏人来了可以用它自卫，打击敌人。”

说完，他又自信地往前走，井冈山陪同人员提醒说：

“主席，那边没有路，不能去了！”

毛泽东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嘛，我就不信前面没有路，有山就有路！”**

5月23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请你办两件事，第一，拟一个电报给中央、周总理，告诉他们，我已安全抵达井冈山，请他们放心。这里山高路远，如没有急事暂不要送文件来。第二，安排工作人员和湖南来的同志分批参观一下井冈山。最好请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帮忙介绍一下情况，让年轻人增加些历史知识。你抽时间去参观一下井冈山博物馆，回来向我讲讲展览室的情况。”

5月25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115房间找来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王卓超等人谈话。张平化要汇报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

“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张平化不可能知道，此时的毛泽东，胸中正酝酿着将要发动的一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雷。接下来，毛泽东深情地回忆了历史，他说：

“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故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那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块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是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高兴、激动。**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事变，宣布反共。5月21日，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遭到了巨大的挫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后来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紧？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的吧。’”

毛泽东笑了笑，接着说：

“你们说，井冈山人对我还不好啊？”

他继续回忆着历史，说道：

“1927年9月份，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民和安源的工人武装，在修水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我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议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的提议。他在泸溪一战中英勇地牺牲了。

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邱国轩团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秋收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中不良习气。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我提议部队在此整编，把原来的4个团改编为1个团。**实际当时剩下2个营，7个连，不足1000人。**对于那些对革命灰心丧气、摇摆不定的旧军官，根据整编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愿意留在革命队伍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以及革命军人。人虽然少了，但却精干得多了。

后来我们上了井冈山，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在井冈山站稳了脚，扩大巩固了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所以人们现在说，**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革命根据地吧？井冈山是个好山寨，它与湘、粤、赣交界，周围500里全是峭壁山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山上有袁、王绿林好汉武装，周边6县农民运动活跃，群众基础好，就是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红米饭、南瓜汤，住破草房，盖禾草，穿草鞋。那时只有极少数人闹点情绪，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坚定乐观的，因而作战非常英勇，黄洋界保卫战就是有名的战例。后来鲁迅在上海看到我的诗词写‘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感到有种‘山大王’气概，我笑了，确实有股梁山好汉的气概。我对这个‘称号’甚为得意，也喜欢结交绿林朋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嘛！

井冈山不愧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胜利真是用生命换来的呵！**”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接着说：

“**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同志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有牺牲精神的年青人。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陈毅安、胡少海，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生生的，牺牲时他们才二十几岁呀！”**

毛泽东站起来倚着窗户，望着窗外的景色，不禁想起从这里走出的两位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他说：

“**袁、王都是好同志，为创建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我表扬他们对边界的工农运动‘功莫大焉’！可是极‘左’路线和土、客籍矛盾把他们杀了，这一泣天历史悲剧，我在闽西听到后，几天饮食无味。”**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

“这次我来井冈山，准备会见袁文才妻子，并同她合影留念，你们安排一下。”

**“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党和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你们看，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啊！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现在，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假话满天飞，也是官僚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得住他们？所以我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不能从我们的第3代和第4代身上丢掉。**”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接下来，毛泽东向在座的人了解了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被错杀后井冈山各方面的反映。之后，他着重谈了发扬井冈山精神的问题。他问在场的人，什么是井冈山精神？大家回答说是艰苦奋斗。毛泽东听罢笑了，说：

“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面去想。”

汪东兴说是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点点头，他说：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写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全国都需要推行民主政治。**”

刘俊秀问：

“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权力。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踱着方步对大家说：

“今天的井冈山，比起38年前，大不相同了，修了公路，通了汽车，住进楼房，饭菜多样，衣着整洁，还看电影，神气多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更好，更加神气。但是我劝大家，过上好日子，艰苦奋斗的精神千万不能丢掉，要知道，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人民江山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啊**！

**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缩小而不是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5月25日晚，毛泽东对历史的深深回忆和对现实的缜密思考，使他激情澎湃，诗兴大发，提笔填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其词云：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5月26日，雨后天晴，阳光照耀着翠绿的山岗。毛泽东起床后用过饭，在汪东兴、刘俊秀以及管理局袁林、孙景玉等陪同下，在井冈山宾馆附近散步。他对袁林、孙景玉等人说：

“我这次回井冈山来看看，感到井冈山的变化很大。修了公路，通了汽车，解决了上山难的问题。”

袁林说：

“现在井冈山已经修建好了两条公路，一条是由黄洋界到宁冈、永新，一条由拿山、泰和去吉安。还有一条由井冈山到遂川，这条路正在修建中。”

毛泽东问：

“井冈山现在建有博物馆、纪念碑，还有这么好的宾馆，来客多不多？”

袁林说：

“不少，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来井冈山参观的人很多。”

毛泽东说：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当时有人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我们以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实践，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革命成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应该利用井冈山革命的这些历史，多宣传井冈山的革命传统，让后来的年轻娃娃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育他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袁林问：

“当年井冈山的斗争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激烈，许多同志英勇献身了，您知道现在还有哪些老同志健在吗？”

毛泽东说：

“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党政军领导岗位上的领导同志如朱德、林彪、陈毅、陈伯钧、陈士榘、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萧克、曾志、彭儒、贺子珍等。袁文才、王佐不在了。**现在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来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5月27日下午3时，汪东兴拿着中共中央派人送上井冈山的文件，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此时，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写诗。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填写的第二首词：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提前与交际处和宾馆结清住宿、用膳账款。按以往规定，毛泽东的伙食标准，除按定量交全国粮票外，每天伙食费交2.50元，7天合计17.50元。在宾馆当了6年会计的雷良钊坚决不肯收下，他说：

“38年前，毛委员在井冈山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拿出好东西来招待毛主席，连酒都未喝一次，仅仅严格按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

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解释说：

“你句句话在理，但首长和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约法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

雷良钊会计还是摇着头，不肯收下。管理员又说：

“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认为‘吃饭给钱，天经地义’”。

雷会计听后，噙着热泪，开出了发票。

5月29日，毛泽东起床散步后，对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说：

“井冈山是座好山，风光好，空气新鲜，是休息健身的好地方。我们已经住了一个星期，该走了。”

张平化、刘俊秀说：

“能有这次难得的机会陪同主席重上井冈山，心里非常高兴。现在井冈山的人民迫不及待地要见主席。”

毛泽东说：

“我们难得上山一次，一定要见他们。昨天我让东兴同志安排了，不知安排得怎么样了？”

汪东兴说：

“我按主席的意见，将人分成4批会见。”

毛泽东说：

“就照你的安排办，下午见面，见完就走，不要他们送了。”

下午4时，毛泽东接见井冈山人民的活动就要开始了。此时井冈山上人声鼎沸，欢声雷动，到处都有人高喊：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井冈山人很有秩序地分批同毛泽东见了面。毛泽东每接见完一批，仍然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最后，他在欢呼声中登上汽车，开始下山了。井冈山人民群众自动拥到道路两旁，为自己的领袖送行。

毛泽东一行经拿山、泰和县直达吉安地委招待所。由于这一天太劳累，毛泽东吃过晚饭就休息了。

5月30日，毛泽东起床后问汪东兴：

“今天如何安排？”

汪东兴说：

“一大早，吉安地委的同志就要我转达他们要见主席的愿望，我答应报告你后再定。”

毛泽东说：

“那就见吧，照照相。”

会见了吉安地委常委、吉安市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会见结束后，他乘汽车从吉安出发，经吉水、峡江、新淦到达樟树的火车站，和张平化、刘俊秀等人依依话别，上了专列。

1965年6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15期，针对里面所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毛泽东 6月2日于杭州

6月6日，毛泽东在同汪东兴谈话时说：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6月7日，毛泽东读了中央办公厅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73期，关于上面所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一文，他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阅。共4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6月7日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要到柳莺宾馆去看望住在那里养病的胡志明，他交代警卫处长伍一说：

“胡主席身体不好，不要通知他说我要去看他，你们工作人员知道就行了。不然的话，胡主席就要先来看我了。我是主人，他是客人，应当我先去看他。”

从刘庄到柳莺宾馆，只需要七八分钟时间。毛泽东的车子一开动，伍一就吩咐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了胡志明。毛泽东的车子刚进柳莺宾馆的大门，胡志明已经从房间里走出来迎接了。他见毛泽东下了车，就快步迎上，问候道：

“毛主席好！”

“胡主席好！”

毛泽东也微笑着快步向前，紧紧地握住了胡志明的手，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走边交谈起来。叶子龙和伍一就在他们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警卫着。这一次会见，只是属于礼节性地看望，毛泽东和胡志明并不谈实质性问题。几分钟后，叶子龙、伍一见毛泽东向他们招手，知道会见就要结束了，赶紧走上前去。毛泽东问叶子龙：

“胡主席这边的工作是谁在负责？”

叶子龙回答说：

“伍一同志。”

毛泽东把伍一叫到跟前，拍拍他的背，对胡志明说：

“我每次来杭州，都是他管我。这次，我就把他让给你了。”

胡志明高兴得连连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与胡志明亲切地握手告别。胡志明见车子开走了，就问伍一：

“毛主席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跟过去呢？”

伍一微笑着回答说：

“照顾好胡主席，跟照顾好毛主席一样重要。”

胡志明闻言非常感动，深情地感叹道：

“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毛泽东审阅的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批准谷牧同志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希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全国各设计单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很多设计人员下楼出院，到生产前线去，到基建现场去，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就地解决问题，这是设计方面一个很大的改革和进步，半年多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设计革命运动的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领导带头检查，主动承担责任，启发设计人员自觉革命；并且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同时组织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联系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促进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作风，最后把思想革命落实到设计工作的改革上去。**

中央认为，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采用这种办法来进行“四清”运动，是一个比较好的、成功的经验。这种做法可供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等部门参用。

设计是基本建设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只有实现设计工作的革命化，认真做好设计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日益繁重的基本建设任务。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党委，必须加强对设计革命运动的领导，经常督促检查，认真总结经验，注意防止偏差，保证运动更健康更深入地发展，争取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央 1965年6月14日

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听取了余秋里、谷牧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说：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5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3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毛泽东还说：

**“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

6月18日，周恩来、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阿联，准备在访问结束后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出席6月29日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6月19日，代表团抵达阿联首都开罗，得知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胡阿里·布迈丁推翻了本·贝拉政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建议在访问开罗期间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召开。毛泽东和书记处研究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让他们在开罗一边访问，一边观察阿尔及尔的局势。

周恩来随即派陈毅赶往阿尔及尔参加将在24日举行的外长会议。陈毅到达阿尔及尔后，前来参加亚非会议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着急，出于对中国政府和对陈毅外长的信任，纷纷向陈毅打听中国的态度。陈毅戎马半生，性格刚直，是个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都着急，他就未加思索地说道：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陈毅把话讲得太死了，没留余地。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召开。可是后来由于阿尔及尔局势不明朗，会议已经无法按时举行了，于是，各国代表团就纷纷离去。周恩来从开罗回到北京，听说陈毅放了空炮，连连说：

“胡闹台，简直是胡闹台！”

陈毅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到西花厅来见周恩来。他一进西花厅前院，工作人员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他却连连说：

“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走到门口，他悄悄地问卫士：

“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说：“生气了。”

陈毅一步跨进西花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像见毛泽东那样，以军人的标准姿势报告说：

“总理，我来了。”

“你无组织无纪律！”

周恩来浓眉扬起，目光灼灼，当头就是一棒。他朝陈毅疾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又猛地停住脚步，用力盯住陈毅，转过身又是几个疾步，立在办公桌旁，背对着陈毅，以拳击桌，砰砰砰三声：

“这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敲击并不算重，可陈毅的脸色已经发白了，他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颈挺直，将本来已经立正的身体更加立正了，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转过身，目光逼着陈毅，声色俱厉：“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周恩来起伏的胸脯渐渐恢复了常态，目光和声音也缓和多了，望着陈毅说：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说：

“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做检讨。”

陈毅走了，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地向周恩来进言：

“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一圈在坐的人，说：

“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秘书也趁机小声说：

“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周恩来的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道：

“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欲知中国的外交工作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写于5月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构思巧妙，形象生动，且极具震撼力！而有的人，却认为该词中一些用语粗俗不雅。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囿于认识上的局限性，那便是立场问题了。读完全篇，再看末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读起来不是很爽嘛！

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要奋斗、要拼搏的时候，往往是激情澎湃，诗如泉涌。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到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时时酝酿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践着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在国内也时时酝酿并实践着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正是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和斗争，才使得毛泽东在诗词创作方面又出现了一个高峰期。正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词，无不充满着渴求战斗的激情，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

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绝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这和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横渡长江一样，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思想大决战前夕，更多的是一种坚定的政治抱负的充分展示。他在井冈山上的谈话和所作的两首词，也无不耐人寻味，堪称金玉良言！你看：“**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看看当今的世界吧，这不是一语成谶吗？

**第43章**

“**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

**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

话说1965年6月20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一个别墅里单独约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刘大杰事先不知道是中央哪位领导要见他，一进别墅，见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看书，又惊又喜。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颇为拘谨。毛泽东见刘大杰如此，就问道：

“你是哪里人？”

刘大杰说：

“我是岳阳人。”

毛泽东朗声吟诵道：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刘大杰见毛泽东背诵起杜甫的《登岳阳楼》，竟是如此的潇洒、爽朗和随和，拘谨顿消，也不客气，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香烟抽起来。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还会抽烟哪。”

刘大杰抽完了，又拿起一支烟。毛泽东笑着说：

“你烟瘾还不小呢。”

此前，刘大杰正与郭沫若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问题进行争论，又与茅盾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对这些都很关注。他幽默地对刘大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茅盾矛盾。**”

刘大杰忍不住笑了。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跟前辈的人敢于争鸣，这很好嘛。**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读过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这套《中国文学发展史》还算是比较好的。他说：

“**屈原写过《天问》，过了1000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他还说：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说：

“《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谈到李商隐的《贾生》一诗时，毛泽东问：

“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刻以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喟然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说起杜牧，刘大杰很推崇杜牧的《河湟》；毛泽东则谈到了杜牧《题乌江亭》那一首中的名句：“胜败兵家事不期”。

最后，毛泽东又谈起了学术争鸣问题，嘱咐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中去。”

6月2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上海市委、市人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上海市委、市人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上海市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千分之十四点五，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这个事实说明，只要领导重视，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说服教育和群众自愿的原则，辅之以必要的奖励计划生育的措施，积极加以提倡，不搞硬性规定，不搞强迫命令，使计划生育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人口出生率是可以较快的降下来的。各地应当参照上海的作法，结合本地区情况，切实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更好地把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起来。

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计划生育的各项技术措施，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计划生育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改进和提高避孕用具、药品的质量，降低成本，及时组织供应。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5年6月23日

一天下午（1965年夏季），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间客厅里，接见了来自长沙的客人毛福清。

毛福清眼前的毛泽东，不但发福了，而且高大魁梧，身穿米黄色的衬衫，青色的裤子，脚上是青丝袜子，一双布鞋。已经不再是她认识的那位文质彬彬、少年英俊的读书人了。她端详着毛泽东的面庞，怎么也找不出当年那个毛泽东的影子了。毛福清激动地喊了一声：“三哥！”禁不住两眼热泪涌流。毛泽东用双手握着年近6旬的毛福清的手，说：

“你是福清妹妹，我还是在你小的时候看见过你。”

本传在第一卷中曾经说过，毛福清原籍在韶山冲，是毛泽东的远房妹妹。她4岁那年，过继给在长沙三泰街开“彭福泰棉絮店”的姑姑毛贵英、姑爹彭华做女儿。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因为爸爸很少资助他，所以生活上非常拮据，就常常去本家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家里蹭饭，有时就在他们家食宿，姑妈总是要给他做些好吃的。毛泽东也把毛福清当做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看待，教她识字。那时，姑妈姑爹也按旧习俗给毛福清裹脚，是毛泽东好说歹说劝姑妈、姑爹给她放了脚，这才保全了毛福清的一双自然脚。本传在第二卷中还叙述过毛泽东在1925年8月受到军阀的狗腿子追捕，躲避在姑妈毛贵英家里，在突然出现险情之时，幸亏毛福清机灵，才躲过了一场大难。

再说待毛福清落座后，毛泽东问道：

“福清妹妹，你的那双脚走路还方便吧？”

毛福清说：

“方便，方便。还是托三哥的福。”

毛泽东想起在姑妈家避难的事，又问道：

“我那次走了以后，姑爹姑妈受连累了没有？”

毛福清说：

“自从那次三哥走后，家里受到牵连，父亲被迫关闭店门，远走他乡谋生，生活非常艰难。不久，父母因病无钱医治，相继过早地去世了。”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沉思。他想起姑妈毛贵英对自己的种种看顾，禁不住潸然泪下。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了报答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的一饭之恩和掩护之功，总是惦记着他们一家人。他曾经请湖南省委领导人代为寻找，可惜没有找到。这么多年后，还是毛福清写信来，才取得了联系，才有了这次难得的兄妹相会。兄妹两人不知不觉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连催3次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这才起身对毛福清说：

“你们受苦了。我想留你在这里多住几天。”

毛福清说：

“三哥，你是主席，工作很忙，影响你的工作。再说，乡里快扭禾了，家里的事情也多，我住不得了，以后再来看你。”

“那好吧。”毛泽东叫来摄影师，说：“帮我照个相吧。”

于是，兄妹俩站在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替我拿点钱给她，再帮她配副眼镜。”

两天后，毛福清依依不舍地离开三哥，回到了长沙。

6月26日，毛泽东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讲到全国医务工作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后很生气，批评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1966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在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子、杏子各5斤，并附上一信。

原来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半年，上下两部近100万字的初稿已经完成。毛泽东闻知此事，说是自己也爱柳文，要章士钊将书稿送他一阅。章士钊便派人将上部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5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1965年6月26日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看了共青团中央办公厅6月25日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第18期登载的《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后，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语。

文章中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们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2年级一个班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施行**。如何请酌。”

7月17日深夜，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的号召和周恩来的安排下，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搭乘一架波音707客机回国。

7月18日凌晨，波音707客机飞行在中国南部边境云海中进入广州市区上空，李宗仁凭窗俯瞰故土的山山水水，激动地对他的夫人郭德洁和秘书程思远说：

“我回来了！16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想不到再会回来，可是世事变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国的召唤，今天我又回来了。”

李宗仁是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后于1949年12月经香港飞往美国的。身在异乡，他寂寞孤独，思念祖国之心日益迫切。本传前文已经说过，经过程思远多次归国联络，奔走于中美之间，排除险阻，终于使李宗仁回到了祖国。

波音707客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徐徐降落。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张云逸等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一行。李宗仁走下飞机，激动得抱住周恩来，半天说不出话来。周恩来说：

“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认出了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老战友、大革命以后的老对头张云逸，他握着张云逸的手说：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你，胜之兄！”

张云逸说：

“德邻公，不要客气，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回来就好，叶落归根！”

7月18日下午，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泽东对章士钊撰写的上下两部、近百万字的**对柳宗元文集的研究专著**《柳文指要》兴趣甚高，看了上部，又向章士钊借了下部，读罢，他在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康吉！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高二适，是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他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中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后来，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7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就江青转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5月12日关于美术学院使用人体模特儿一事给江青的信，写了两段批示，其一是说：在美术创作中应当使用人体模特儿。其二是写给陆定一、康生、周恩来等人的，他写道：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休息时，检查青年服务员们的学习情况，他看到小高的学习笔记本上有雷锋的照片，就对大家说：

“青年同志们，应当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

说罢，他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接着，他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青年们看到毛泽东的题词，争相传阅。小高更是激动，她双手捧着自己的学习笔记本，认真地说：

“毛主席，我一定牢记您的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7月20日这一天，李宗仁一行乘飞机抵达北京，在机场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感动得热泪盈眶，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拱手致谢。这位国民党的末代总统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也紧紧地握手。溥仪对李宗仁说：

“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在这欢迎人群中，还有一位李宗仁的老部下，他就是刘仲容。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争取李宗仁回国，从那时起，刘仲容就开始配合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5月，原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秘密来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随后，程思远到刘仲容家里商讨对策。程思远五上北京，刘仲容都参与了接待。李宗仁回到北京后，刘仲容奉命专职从事接待李宗仁的工作。

且说李宗仁在机场候机大厅里，宣读了回国声明，声明中说：

“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和夫人。李宗仁极为感激，他说：

“周总理在庄严伟大的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使宗仁能与各位首长各位朋友欢聚一堂，我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此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恳的谢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欢迎我回到祖国，这种宽大精神，更使我感动。”

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请教写诗的一些技法。他还把自己作的一些诗，呈请毛泽东修改。于是，毛泽东就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盅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敬颂教安！

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

后来，**华罗庚的专著《统筹方法平话》**再版时，作者署名为“齐念一”。有人问华罗庚是怎么回事？华罗庚笑着说：“我这样做，是要永远铭记7月21日，那一天主席给我写信，表示欢迎我为人民服务。”人们这才明白，**华罗庚是把7月21日的谐音“齐念一”当作了自己的笔名。**

再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了刘仲容。刘仲容一边陪毛泽东游泳，一边回答毛泽东关于桂系及有关情况的询问。

此时，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纺织厂参观，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要接见他们。李宗仁等人坐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毛泽东在游泳池休息室里由刘仲容等陪同，正等待着他们。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前去，同李宗仁和他的夫人亲切地握手，高兴地说：

“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他又握着程思远的手说：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毛泽东让大家坐下，突然对李宗仁说：

“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他的幽默使李宗仁一时不知所对。程思远脱口说道：

“我们是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

彭真跟着说：

“是的，登了彼岸。”

毛泽东、李宗仁及其他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李宗仁对毛泽东说：

“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

“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告诉毛泽东说，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毛泽东说：

**“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他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李宗仁十分乐意。毛泽东邀彭真、程思远和他一起游泳。于是，彭真和程思远便下水跟着毛泽东在一池碧水中前行。毛泽东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一般。程思远游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夸奖他说：

“你游得不错嘛！”

程思远说：

“跟不上主席啊。”

毛泽东游了一会儿，上岸晒太阳。他让程思远坐在他的身边，询问程思远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程思远说：

“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近来一个国民党人对我说过，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毛泽东听了，笑着问：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答不上来，就照实说：

“不知道。”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盯着程思远说。停了一下，他又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午一时许，毛泽东要在丰泽园设宴招待李宗仁一行，于是，众人便来到了菊香书屋。饭前，李宗仁在谈话中对台湾问题久悬未决深以为虑。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他问坐在一旁的程思远：

“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程思远答道：

“因为对于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对程思远的回答很满意，又问道：

“你有别字吗？”

程思远回答：

“没有。”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号，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李宗仁表示赞成，程思远也表示感谢，他说：

“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照相，然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宴会气氛也很热烈。李宗仁感动万分，多次感谢毛泽东的盛情招待。

下午3时，徐冰部长附着程思远的耳朵说：

“可以散了吧？”

于是，程思远便对李宗仁说：

“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

毛泽东用目光盯着程思远，语气好像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7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于立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立群同志：

1964年9月16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150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祈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敬问暑安！

并祝郭老安吉！

毛泽东 1965年7月26日

1965年8月3日下午，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准备将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中国政府首脑，他被领进人民大会堂一个墙壁上装饰有传统的中国书画的大厅里。**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的刘少奇的那张“长脸”，于是，便走上前去和刘少奇握手问候。此时，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马尔罗把戴高乐的信件递交给刘少奇，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同马尔罗及法国驻华大使握手问候，而后坐下来交谈。他问道：

“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

马尔罗是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活动过。他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回答说：

“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又问：

“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说：

“**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长。在谈到苏联的现状时，他**联系到了中国，谈到了走马列主义道路和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两重性；谈到了中国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尔罗说：

“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说：

“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说：

“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泽东说：

“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问：**

**“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说：**

**“是的。”**

马尔罗说：

“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说：

“**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问道：**

**“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说：**

**“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问：

“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在国内方面。”

毛泽东说：

“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他还低语道：**

**“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

马尔罗谈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和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用了“联盟”一词。一直没有说话，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摆动的毛泽东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说道：

“我——们的同盟！”

他又面带讥讽地说：

“你——们的，我——们的。”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法国大使接过话头说：

“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毛泽东问道：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法国大使以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毛泽东说：

“**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这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不发**。

接见结束后，刘少奇要求和毛泽东谈话，他说：

“主席，看来我已经越来越跟不上你的思想和部署了……（引用资料如此，下同——笔者注）过去可能我们在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问题有误会……”

毛泽东说：

“有分歧是正常的，没有矛盾却是不正常的。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很难用分歧来解释吧。**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我最近又看了过去的一些文章**（指“九篇文章”——笔者注）**，事实证明我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当初我坚持正确意见的时候，你们好多人都反对我，当然你比王明、博古、张国焘那些人要好一些，但是也是跟着他们走的。周恩来也是跑得很紧呐！事实证明，要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你这个国家主席。当时认为你会坚持我的主张，我希望我在见上帝的时候把你们的威信树立起来。没有想到……**（引用资料如此，大概是为其尊者讳——笔者注，下同）**发展到好多事情不和我商量**……”

刘少奇说：

“过去我的工作指导上肯定有不少的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今后凡是重大的问题一定要首先向主席请示，再不会犯同类型的错误。我的错误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和谅解。但是现在把我们党内的分歧公开出去究竟对谁有好处，我看没有多少好处。凡是有意见我是会提的，也就是说我是搞公开的争论的。**从斯大林的问题被揭露以后，我就认为，在我们党内再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不好的。**”

毛泽东说：

“**但是你在许多的场合里说过，你要搞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

“**这是为了给小平同志树立威信。**”刘少奇解释说：“**你现在公开文章，起码对活着的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对周恩来同志也不好嘛。弄得我们都不好再工作了。**”

毛泽东听刘少奇如此一说，便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目前不再公开发表修改后的“九篇文章”。

8月5日，毛泽东给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柳文指要》全书。他在信中写道：

康生同志：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 1965年8月5日

8月6日，海军某部在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吴瑞林的指挥下，在“八·六”海战中击沉了企图对大陆沿海偷袭的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12号”。

8月6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李宗仁和夫人回国茶话会。李宗仁在会上说：

“我在十多年前就写信给海外的朋友们说，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服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国家建设好了，我们大家都有份。我后来觉得与其坐而言，何如起而行，所以决定身先回国，深望此一行动能引起台湾军政人员和海外爱国人士同声响应，相率来归，促成国家的最后统一。耿耿此心，想为海内所共谅。”

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李宗仁夫妇到北戴河疗养。然后，又安排他们到东北、广东、广西等地去参观游览。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了几内亚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要看他们政治水平如何。**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8月11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罗瑞卿关于战备问题的汇报，其间，他曾经插话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19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1962年刮歪风”，只有毛泽东和林彪顶住了。他现在说的“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自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含蓄地来评述那一次重大斗争，常委们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8月23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县委：

今将中央办公厅和农业银行整理的4件材料发给你们参考。这些材料，都是反映当前农村工作中在一个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的。请你们检查一下，如有这类情况，迅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防止这类现象的继续发生。

今年夏收，又获得了一个好收成。这是1962年以来在连续3年丰收的基础上获得的丰收，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如果领导同志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生产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就有可能产生自满情绪，不再愿意谨慎从事，不再愿意因地制宜地、实事求是地、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了。在生产发展较慢的地区，也有可能产生急躁情绪，重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这就是说，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是认真蹲点，摸出规律，做出样板，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指导工作。其结果，必然会和这些同志的主观愿望相反，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把事情办坏。当然，**停止不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精神状态，在不少地区的领导同志中间还相当普遍存在，**这是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是必须迅速纠正的。特别在四清运动中要来一个比较彻底的纠正。

中央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不断认真总结经验，全面接受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保证新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持续发展，**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棉、油等各项主要指标。

中央 1965年8月23日

8月30日，毛泽东应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的请求，在她的一个32开的横纹笔记本上为她题词，他写的是：

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1965年8月30日

1965年9月1日，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筹备，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早在1964年，毛泽东接见阿沛·阿旺晋美时曾经说：

“经过民主改革，农奴翻了身，从农奴和奴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干部，成立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应考虑正式成立自治区，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具体如何办，请周总理同你们商量。”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摘要如下：

“一、自从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以来，农村副业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较，农村副业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目前，我国**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已经接近达到或者超过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副业生产还低于1957年的水平**。据估算，1964年农村副业生产比1957年低10%左右；如果把发展较快的猪、禽、蛋除外，其他各项副业比1957年低25%左右；若干多年生的品种和许多零星的小产品比1957年低得更多。其结果，**许多产品供不应求，影响到生产、建设、市场、出口各方面的需要；同时，许多生产队资金缺乏，社员手中钱少，不利于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巩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在当前政治和经济的大好形势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必要也有可能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在继续大抓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同时，**大抓副业生产，大力发展农村副业，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

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重视了，就能够迅速发展；不重视，就会发展缓慢，迟滞不前。

发展农村副业，能够综合**利用农村的人力物力，为社会增加财富，为集体增加资金和积累，为社员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扩大城乡商品交换，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满足生产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问题。**认为农村副业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思想，只重视大宗产品，看不起小宗产品的思想，有灾才搞副业，没灾就放松的思想，是不对的。**只说生产队和社员钱少，单纯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贷款投资，而不从发展多种经营中去增加收入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一定要全面的领会毛主席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指示，更好的贯彻执行。

三、发展农村副业，首先要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同时也要**积极地指导和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地有计划地增加集体副业在整个副业生产中的比重，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这是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凡是资源集中，使用劳动力较多，投资较大，需要一定设备或者需要占用集体土地，集体经营比分散经营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项目，应当由集体经营。集体副业应当以生产队（包括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队）经营为主。一个生产队无力举办的，可以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在不‘平调’生产队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前提下，也可以由生产大队直接兴办。

**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从农村副业说，社员家庭副业在长时期内还将占一定的地位。凡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家庭副业项目，都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社员家庭副业，只要不投机倒把和弃农经商，不影响集体生产和集体劳动，不损害公共利益，不破坏国家资源，就应当看作是正当的，不要乱加干涉和限制。**

农村副业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项目，应当以集体经营为主，有些项目，应当以社员家庭经营为主。同一种副业，可能在这个地区应当以集体经营为主，在另一个地区应当以社员家庭经营为主。处理这个问题，应当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千篇一律。集体副业有广阔的发展天地。社员家庭副业也大有发展的余地。生产队在发展集体副业中，除了某些确实不应当由社员经营的项目以外，决不能采取把社员家庭副业集中起来的办法，来建立集体副业。

四、**发展农村副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

**集体副业必须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将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里。必须加强群众监督，实行民主管理，勤俭经营，财务公开，合理分配。**集体副业的收入应当纳入农副业总收入中，统一分配，从事副业生产人员的报酬，要适当合理。**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反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多吃多占、铺张浪费。**为企业、机关和建设单位提供劳务，应当由生产队统一组织，**严禁‘包工头’居间剥削**。

对于社员家庭副业，应当加强领导和帮助。要加强社员的政策教育。要通过适当的经济措施，力求把社员家庭副业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要积极扶助贫下中农发展家庭副业，帮助他们解决发展副业中的困难，同时也不要害怕中农和其他群众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当然，**对于那些违犯国家政策，偷税漏税，投机倒把以及剥削他人劳动等资本主义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八、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副业生产的领导，特别是专、县每年要检查和讨论几次副业生产。在布置、检查和总结农业生产的时候，也要布置、检查和总结副业生产。各省（市、自治区）、专、县可以根据需要成立副业生产领导小组。**副业生产领导小组应当由党委的一个负责人亲自主持，吸收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应当有一名副社长、副队长专门负责领导副业生产**。

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领导副业生产中，**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大鼓革命干劲，发扬大寨精神，坚持自力更生，充分发挥群众中伟大的潜在力量**。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步骤地扎实细致地进行工作。农村副业生产，一定要在最近一两年内作出显著的成绩来，并且坚持下去，不断前进。”

欲知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能否实现？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请仔细看看在1965年8月3日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之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双方的状况、以及毛泽东与马尔罗的谈话内容吧，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真实写照吗？！

**第44章**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话说1965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创建者之一的许光达，将坦克第2师工兵连班长王杰英勇保护民兵和人民武装部干部的英雄事迹材料上报中央军委。

王杰当兵4年，写下了10多万字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一字一句，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一篇一页，都折射出他的理想光辉——**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当兵是为人民、为党、为祖国**而来的，不管任何工作，党指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就是需要献上青春也没有怨言。

**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情愿。

在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部队拉练驻地邳州张楼指导民兵训练进行最后一项“绊发防步兵应用地雷”实爆训练时，为了安全，他让民兵们在训练场等着，独自到几十米外的河边进行了两次成功实爆，然后让大家围成一圈，认真地进行讲解，仔细地做着示范动作。突然，拉火装置出现意外，用于替代地雷的炸药瞬间即将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有着丰富爆破经验的王杰只要身体向后一仰，就可以脱离生命危险，然而他却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扑向了炸药包。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部干部得救了，王杰却英勇地牺牲了。

毛泽东在党内的一次会议上高度赞扬王杰精神，他动情地说：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向王杰学习的热潮。

9月15日，毛泽东为 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9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第3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的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当面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

“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此时，彭真并未真正领会毛泽东这句话的巨大分量，事后，他也未体味出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当然，更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深知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就加紧了撰写批判吴晗文章的步伐。

在上海，姚文元9易其稿，每一稿都是由张春桥把它夹带在《智取威虎山》剧本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请有关人士提出修改意见。文章定稿前，毛泽东不止一次亲自审阅过，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一封信，心里很高兴。

原来，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提议要彭德怀到外地去挂职，于是，中央就指派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与彭德怀谈话，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没有谈成。后来，彭德怀在9月2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忍受不了在吴家花园的谪隐生活**，要求到农村去搞点工作。

9月23日清晨，毛泽东召见彭德怀。彭德怀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在那里等着。一见面，彭德怀说：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略带几分伤感地说：

“几年不见，你显老了。我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他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说话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也来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说：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说：

“在庐山会议后，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看，当时，我向主席作了3条保证。”

毛泽东问：

“哪3条？”

彭德怀说：

“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说：

“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做结论吧。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想，多做点事情。”

毛泽东又对在座的几位说：

“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同志为主，彭德怀同志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同志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1、2、3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发生‘富田事变’时，有人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分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德怀同志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

毛泽东转对彭德怀说：

“在我的选集中，还保存了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彭德怀表示，自己的处境到西南三线工作有困难。毛泽东劝他说：

“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终于接受了去西南搞三线建设的任务。这次谈话，一直谈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还和彭德怀等人共进了午餐。

彭德怀从毛泽东那里回去后，兴奋地对家人说：

“我们谈通了。”

自从这次同毛泽东谈话后，彭德怀就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于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成都担任了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他首先问道：

“会开得怎么样？”

有人说：

“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

毛泽东说：

“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

接着，他又问道：

“就讨论这个问题吗？”

有人说：

“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调整、‘四清’4个问题。”

毛泽东接着问：

“还讨论什么？”

有人说，讨论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说：

“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打仗，不怕造反**。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

“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各省有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毛泽东又讲了10年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他还说：

“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

10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余秋里讲到计划工作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插话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5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继余秋里之后，李先念、彭真分别就财贸、党的建设作了发言。彭真在发言中说：

“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

毛泽东插话说：

“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说：

“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70%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

最后，朱德、周恩来分别就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发言。毛泽东曾经插话说：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侵略。”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习。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改任广东省委书记；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再说11月10日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发表的。文中说：《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在于他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实质上是涉及到了1961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里的一些领导人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

本传前面已经叙述过，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与中央其他一些少数领导人之间，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严重对立的过程。毛泽东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批评刘少奇、邓子恢、彭德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他又提出，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央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实际上正是在寻找突破口。于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就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推到了历史发展的日程表上。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这一天，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嘱令他的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航空版。

原来，彭真这个人很多心，早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就曾经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所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他就立即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他还在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上问康生：

“你知道上海发表那篇文章的背景吗？”

康生回答说：

“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

彭真又问：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

康生说：

“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

彭真说：

“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

康生回答：

“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除了彭真对此极为不满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也都持抵制态度。

《戚本禹回忆录》中曾说：“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曾两度打电话问彭真，请示他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就是黄敬的夫人。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交代过，黄敬在1958年2月10日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范瑾后来再婚。

彭真对范瑾说：

“《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11月13日，毛泽东看了毛泽荣的来信，就叫秘书处给他寄去200元钱；还让秘书室另复一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10月25日寄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对你生活困难的补助。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5年11月13日

11月13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7次到徐州，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徐州。

11月14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挥海军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了国民党军护卫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

11月14日下午1时至2时40分，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地市负责人丁平、关明政，询问了工农业生产和战备情况。尔后，毛泽东问道：

“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

丁平、关明政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提议去看看，他还饶有兴趣地讲述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燕子楼的故事和一些景观的来历。

11月15日，毛泽东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当安徽省委负责人汇报到“四清”运动中运用毛主席著作很能解决问题，思想就通了时，毛泽东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他说：

“这本书共有3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

李葆华等人说：

“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

毛泽东说：

“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

此后，毛泽东又驱车去了江苏南京。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他还在山东、安徽、江苏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等谈到了“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的问题。谈话内容节录如下：

　　一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20亿元不够，30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棉布存一点，反正要穿。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只好当废铁用。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

三七高射炮有没有？其他炮有没有？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其实真正打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敌人登陆要找弱点。青岛工事修得那么好，敌人为什么要在青岛登陆？龙口、成山头，过去日本人就登过陆。越是认为他来不了的地方，设防薄弱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登陆了。

**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他**。先消灭他一个营，再一个团，再一个师。

　　二

越南仗打得这么好，我们能不能打好？你们看美国人怎么样？只要我们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不主动“挑衅”，就可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津浦线一带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地方师？抗战时期，我们只有3个师，现在地方有十几个师了。将来打仗都依靠中央是靠不上的。地方有一个师就好办了。

　　三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准备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同志，过去都是在军队里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一个地方师拨给你们了吧？有了地方师，有了小三线，地方就有了东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线，也就有了东西了。

美国人来不来，要做两手准备。美国人对我们有些怕。越南海岸线很短，美国也只敢占据几个沿海城市，不敢纵深发展，一怕补给线长，二怕被吃掉。中国海岸线有一万多公里，敌人占领了上海，敢不敢占领苏州？

11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新党员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在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报告还要求改变由于这几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造成的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更少的状况，在今后6年中，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接收一些新党员。要求各级党委订出具体的规划和办法，认真贯彻执行。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指导下，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级干部达几十名之多。此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以培养年轻后备干部。1965年全国新发展党员94．3万人，1966年发展319万人，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

11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下榻在西郊的一栋旧式别墅里。

周谷城应邀来到了毛泽东在西郊的下榻处，他一进门，正和陈丕显谈话的毛泽东就起身相迎，笑着说：

“又碰到了。”

这是毛泽东每次见到周谷城时的常用语，话虽平淡无奇，却透出了老朋友之间的亲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候之后，两人便天马行空地聊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哲学史的写作，他说：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周谷城说：

“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了下文。”

毛泽东话题一转，说：

“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他们又谈到旧体诗，谈到了晚唐的李商隐。周谷城说着说着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仰靠在沙发上，随口用湖南腔哼起了李商隐的一首七言诗：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把前几句反复吟诵了几遍，可那最后两句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朋友忘了，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吟道：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周谷城在毛泽东面前不经意地吟唱这首讽喻帝王末路的诗篇，是不太妥当的，而他竟然轻轻松松地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自然然地接了下去。毛泽东念出最后一句时，周谷城又跟在他的后面哼，而且感到心情舒畅，超乎寻常。毛泽东和周谷城一样，心情也很舒畅。可周谷城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此生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

1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为斯特朗80寿辰，派人送给她两张祝贺卡。

11月22日，有关部门特意为斯特朗包了一架专机，满载着她和她的30位中外朋友飞抵上海，住进了古朴典雅的锦江饭店。毛泽东将在这里会见她，祝贺她的80大寿。起初，毛泽东只打算会见斯特朗一个人，斯特朗不同意，她说：

“我的朋友们这么大老远和我一起来，假如毛主席见我，也应见他们。”

11月24日，是斯特朗的80周岁生日。毛泽东将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斯特朗和她的朋友们。

天将近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一个大房间的门口迎接客人，江青也站在毛泽东身旁一同迎客。毛泽东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愉快，他首先祝贺斯特朗生日愉快！然后同客人们一一握手，说：

“我已经认识你们中的好几位。但大多数人是新的。”

当毛泽东与中宣部领导包括副部长吴冷西在内的几位干部握手时，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面有不豫之色。他把客人领进了接待室。这里铺着一个大的地毯，摆放着一个大的椭圆型桌子。毛泽东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到第2幅作品前看了一下，又走向第3幅作品；尔后他让斯特朗坐了首席，自己在相邻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慢悠悠地说：

“我，一个吸烟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是对立的一派，不吸烟派。”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这个开场白感到吃惊。身为医生的马海德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便挑战似地说道：

“你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派别问题吗？”

毛泽东说：

“当然，在我和医生之间，医生说我不应该吸烟，我说我要吸。我行我素嘛！”

他用目光巡视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又说：

“你们有多少人吸烟？吸烟的人拿一支香烟举起手来。手里拿一支烟就是吸烟者的标志。”

毛泽东说话的口气很轻松。在场的外国朋友不知毛泽东何出此言，而几位中宣部领导干部却深知个中原因：毛泽东还在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生气呢。他们面面相觑、惶惑不安。

原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从11月12日开始，上海的《解放日报》、浙江的《浙江日报》、山东的《大众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的《福建日报》、安徽的《安徽日报》、江西的《江西日报》，都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北京市各家报刊及全国其它各地报刊却都拒绝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自然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使他非常愤慨，于是他就指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结果，北京连单行本也不予理睬。

且说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人，见没有几个人拿起烟举手，他笑了笑，旁敲侧击地说：

“好吧，看来在这方面我也是少数派喽。不管怎样，我还是吸烟，并且劝你们也吸。”

午宴开始后，毛泽东以传统的主人姿态，从第一道菜拼盘中，夹了一些，放在斯特朗的碟子里。午宴的气氛虽然并不十分热烈，但毛泽东对斯特朗的关怀与盛情，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斯特朗还是感到很满意、很愉快。

11月26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14日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的有功人员。接见结束后，江青对罗瑞卿说：

“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

罗瑞卿当场表示说：

“我们《解放军报》支持。”

他马上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一个态度鲜明的编者按。

11月29 日，在压下姚文元的文章19天之后，彭真得知《解放军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得不给范瑾打去电话，要《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第二天，《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加上了彭真亲授的按语。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原来在11月27日，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组织人写关于近年来海军思想斗争的材料，他特意嘱咐李作鹏要在这份材料中说明罗瑞卿的表现。

此前，罗瑞卿对林彪的“顶峰论”、大搞“突出政治”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拉拢他无效，便认为他是妨碍自己向上爬的障碍，就决定除掉他。李作鹏立即召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秘密整理了材料，说罗瑞卿“怀有巨大的阴谋”；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想当国防部部长”。

1965年12月1日，《光明日报》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这个时期，各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均仿照《北京日报》加了编者按语。这些按语，强调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力图把这一讨论局限在学术领域。此后，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向阳生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协作组“方求”等，接二连三地发表批驳姚文的文章。就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还击时，《红旗》杂志的编委关锋和戚本禹站了出来。戚本禹表示：

“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

此后，关锋、戚本禹二人来到了上海，与姚文元商谈此事。张春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就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而这场论战便成了不久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在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林彪在这个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55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12月2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12月初，毛泽东获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在军人集团10月1日政变夺取掌权后于11月24日被杀害，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写出了《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其词云：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鼓吹的所谓的“历史主义”。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12月8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了，吴冷西也列席了会议。

叶群在会议上分3次作了约10个小时的发言，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12月11日，罗瑞卿被召到上海会议上，但他没有得到申辩的机会。

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提出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说：

“他罗瑞卿只是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也只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嘛。”

林彪说：

“他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反对主席。”

毛泽东见林彪如此坚持，只好退了一步，说道：

“**可以先挂起来么。**10年不行，20年，挂1万年行不行？”

毛泽东不愿意打倒罗瑞卿，但他又不能不同意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离军事领导岗位。

林彪建议由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那么匆忙，还是让他代代吧。”

于是，杨成武就出任了代理总参谋长职务。

12月15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上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他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

这份《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是以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又吸收了4月25日他在政治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看了《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批复道：

“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太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后来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通知，连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中央在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同时注明：“不登党刊。”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会议决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5条意见：

“1、性质严重，手段恶劣。2、**与彭、黄有别。3、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4、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领导有责。”

会议还决定：**“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欲知罗瑞卿后来的状况如何，请看下一卷便知。

东方翁曰：常言道：党内有党，派中有派。此一时期中共党内、军内的状况便是如此。面对着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实力派的挑战，毛泽东不得不处理好军内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从大局出发，压抑着与罗瑞卿的深厚感情，从保护罗瑞卿的目的出发，调动他离开军队，到地方上去工作。以这种有条件的方式，支持三军统帅林彪。舍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惜罗瑞卿不理解，不愿意离开军队。以至于后来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状况，这也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第45章**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

**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

**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话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回到了杭州，下榻于杭州刘庄宾馆。他在与刘庄宾馆服务员孙丘珍等人拉家常时，询问她们的家庭情况。当他问到孙丘珍时，孙丘珍说：父亲原是一个建筑工人，因工伤失去了劳动能力，瘫痪在床。母亲没有职业，年幼的弟弟因无钱上学，只得呆在家里。全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她每月28元的工资维持。毛泽东十分同情孙丘珍的家境，关切地问：

“靠你这点工资能养家吗？”

孙丘珍说：

“不能，但组织上照顾我，每月给我补助七八元。”

毛泽东说：

“那我来接济一点吧。”

孙丘珍连忙推辞说：

“我怎么好用您老人家的钱呢！”

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你家里有困难，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来接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交代秘书：

“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接济一下小孙，她家非常困难。”

后来，秘书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取出500元钱，托护士长吴旭君交给了孙丘珍。孙丘珍捧着500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也都十分感动。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摇了摇手中的1965年第6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说道：

“这一期哲学研究我看了3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他写的文章是针对翦伯赞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的**。**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反洋’，后来变成‘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笔者注）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笔者注）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5年的话，在下面搞3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

陈伯达插话说：主席除外。毛泽东说：

“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谈话结束后，江青要艾思奇和关锋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因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就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彭德怀的那段话。艾思奇提醒他说：

“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去。”

田家英说：

“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12月22日，毛泽东将昨天评价《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的那个话又向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彭真等人说了一遍。**彭真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他还说：**

**“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

彭真对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一直表示不满。早在11月28日，他在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谈话时，听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他就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又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华在毛泽东72周岁寿辰之际，去杭州看望父亲。毛泽东一字不错地挥笔背录了叶剑英写的《远望》一诗：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叶剑英曾对《远望》这首诗作过说明，他说：“《远望》一诗，为斥责‘北极熊’蜕化变修而作，时在1965年秋。”

毛泽东书写好《远望》一诗后，赠给了儿子和儿媳。后来，毛岸青、邵华夫妇著文说：“1965年12月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72岁诞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为了教育我们这些孩子们，激励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反修精神，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七律《远望》。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那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

“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尔后，毛泽东从杭州去了武汉。

1月9日，由艾思奇、关锋整理又经田家英删改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经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批示后印发到各地。

据叶永烈记载：“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1月间，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后尚无定见。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泽东汇报，要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彭真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给他讲了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表现，最后说：**

**“参加不参加还有时间考虑。”**

彭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一致意见，不参加。**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一份电报，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回音。**刘少奇又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此事。彭真说：

“可以考虑从另一个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

他提出的另一个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请，我们接受，这是个礼节问题。2、朝、越两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他们距离过大。”

**彭真这个理由被多数人否定**后，刘少奇说：

“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毛主席。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

会后，刘少奇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个电报给毛泽东，结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动笔起草了一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毛泽东，毛泽东仍然没有回音**。

1月12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1965年8月第2次读完章士钊的巨著《柳文指要》后，在《柳文指要》的跋中加写了一段话，对柳宗元和韩愈共同发起的古文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写的是：

“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尔后，毛泽东将《柳文指要》送给康生阅读。后来康生在12月底给毛泽东写信说：

“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2日给章士钊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1965年12月16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

顺颂春安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泽东 1966年1月12日

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康生在信封上写的是：“请交主席 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在旁边写上了“章行严先生阅”。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化名为“思彤”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首次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1月15日，戚本禹撰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与此同时，关锋和林杰也撰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这两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传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3报3刊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根据彭真同志指示，要把3报3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样一来，戚本禹、关锋的两篇文章，自然就被压下了。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文章何时发表？许立群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又越过许立群，直接把文章清样送给了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彭真让他的秘书给他们打电话说：**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1月2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江青因批判《海瑞罢官》受到抵制一事，乘坐轿车来到苏州给林彪拜年。她准备在取得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到上海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果然同意了。

叶群给在北京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打了一个电话。此时，总政主任萧华身体不好，总政日常工作由刘志坚负责。叶群向刘志坚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她说：

“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和萧华商量一下，把名单报给林办。最好萧华去参加。”

刘志坚向萧华做了汇报，萧华说：

“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萧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参加人员名单，又经过总政党委讨论同意，就算定下来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乘飞机直抵上海，住进了部队开设的延安饭店。这天下午，已经先期到达上海的江青，给刘志坚等人送来了座谈会必读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不久，张春桥来到延安饭店看望刘志坚。刘志坚和张春桥曾在1963年由中苏友协派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在张春桥陪同下，刘志坚来到华山路丁香花园江青的住处。江青满面笑容地迎接刘志坚，她说：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这是叶群打的电话，传达林彪的一段讲话，刘志坚很仔细地作了记录，上面写着：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兴，她说：

“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双方客气一番之后，江青又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这天下午5时，江青在张春桥、刘志坚陪同下，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来自北京的其他几个人见了面。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了刘志坚外，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及两名工作人员：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黎明。包括江青在内总共7人。

江青说，在座谈会期间，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她还问：有没有人带窃听器呀？江青说起发给大家的毛泽东关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说：

**“尽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是日晚，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张春桥一起，以东道主身份，宴请江青、刘志坚一行人。

晚饭后，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座谈会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众人总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张春桥有时也来看。陈伯达到上海后，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一边说一些意见。

再说2月3日，彭真作为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召集副组长陆定一和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主要议题是关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问题。**彭真说：**

**“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此后一连两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康生在会议上说：**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最后，**彭真将会议记录拿给康生看，康生提议说：**

**“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此后，彭真等人以5人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这个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意见，而其重点部分还有这样一句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6日，毛泽东关于重新印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给彭真写了一个批语：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毛泽东 1966年2月6日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汇报了《二月提纲》。**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示同意这个提纲中的意见，即在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他们先后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名，**还提出要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题，介绍了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干部向焦裕禄学习。

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方法及学习状况，提高了思想觉悟，改变了领导作风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等人，飞抵武昌，带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见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已经签字同意，就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他说：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提出对“左”派整风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这样的问题，3年以后再说。”

他还说：

“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这样讨论可以放心了吧！”

**毛泽东所说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对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说要在离武汉后，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讲清楚。

这一天，毛泽东从武昌回到了杭州，要江青速到杭州见他。江青对刘志坚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飞回了北京，向萧华汇报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这一天，江青来到杭州，毛泽东告诉她，**彭真的5人小组已经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违心地没有正面表示反对。**

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批转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纲》，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二月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不满。**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2月18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谈话，当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两、三年，然后搞两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预分配时，他说：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6年中先搞3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两年。尖端科学搞3年也许行，要有针对性。3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6年改3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结果出来尽打败仗，作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按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三千年历史，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用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玻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10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

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2月19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给王任重写了一个批语：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5年、7年、10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25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25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25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已经过去10年了，这10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泽东 1966年2月19日

2月19日这一天，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江青要刘志坚等人写一个材料。尔后她对刘志坚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刘志坚等人回到住处，一边讨论，一边根据江青和刘志坚的8次谈话，4次集体座谈，由陈亚丁整理出有关记录及有关会议材料。尔后再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

2月20日晚，刘志坚要上海警备区将《汇报提纲》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

2月22日，刘志坚一行6人离沪飞往济南，向在济南的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说：

“这个材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接到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秘书说：

“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同志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请你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刘志坚向萧华做了汇报，决定由熟悉材料的陈亚丁去上海参与修改。陈亚丁到上海见了江青才知道，是因为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汇报提纲》的过程中，陈伯达提了2条建议，他说：

“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还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讲一个小故事。据刘庆棠回忆：江青在指导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供你们考虑。”剧中“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则是由刘庆棠和饰演通信员的小黄一起编排的。后来担任《红色娘子军》主演的白淑湘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杀闻一多，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她说过怀念父亲的话；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又揭发她曾说过“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于是她便被送到干校锻炼。刘庆棠向江青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江青接着问：“她认识如何？”刘庆棠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刘庆棠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这样，白淑湘就又回到了剧组。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曾说：“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且说江青听了陈伯达的话，高兴地说：

“伯达同志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自此，众人将《汇报提纲》原稿反反复复改了8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万多，最后定名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马上将《座谈会纪要》送毛泽东审阅。

1966年3月4日，林彪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逐渐升级，说他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后来在3月18日，罗瑞卿感到强加给他的罪名是百口莫辩，决定以死表白心迹，便跳楼自杀。很侥幸，他并没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

这次批判会议一直开到4月8日才结束。

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瞬间波及到了北京。

此时毛泽东正在住处办公，护士长吴旭君慌忙跑进来，一边喊：

“地震了！地震了！”

一边搀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去，抓起案头上的一个牛皮纸袋夹在腋下，随着吴旭君走出屋外。吴旭君问：

“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你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下办公室，说道：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吴旭君说：

“主席并不是一无所有。你有那么多著作，是一笔多么大的精神财富啊！”

毛泽东正在考虑哪里是地震的中心，灾区群众的损失会有多大？似乎没有听见吴旭君的话，在院子里一块草坪上坐了下来。吴旭君见毛泽东面色凝重，为使他放松一下，便提议说：

“主席，讲个故事吧。”

毛泽东哪儿有心情讲故事，瞅了她一眼，说：

“平时我给你们讲过许多故事了，今天你给我讲一个，好不好？”

吴旭君想了想，决定讲一个笑话，让老头儿开开心。她说：

“那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是上海人，当时还小，亲眼见到解放军进城睡在马路上。有一次，一位战士为班上做饭，准备吃米饭，要淘米呀？刚进城哪去找淘米用的炊具，正巧碰见一个抽水马桶。那位战士觉得是一个又大又干净的瓷缸，便把米倒进去淘起来了，结果一抽水米被冲走了。战士很奇怪，便高声喊叫起来：你们快来看哪，这个缸子还会吃米呢！”

吴旭君讲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她以为毛泽东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毛泽东不但没有笑，反而背过去身子，沉默不语。她就问：

“主席，我讲的不好吗？”

毛泽东低沉地说：

**“你看不起我啊！你讽刺我啊！我们是土包子，你们是洋包子，土包子不如洋包子，连抽水马桶都不认得哟！可是，我们土包子打下了天下，无产阶级坐天下。难道这不是真理吗？”**

吴旭君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想不到老头儿如此较真儿，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反惹得他这样不高兴，心中暗暗后悔不已。

不久，毛泽东得到了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的报告。他立即指示周恩来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立即飞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后来在3月22日，宁晋县东南又先后发生了6.7级和7.2级地震各一次，3月26日在老震区以北的束鹿南发生了6.2级地震，3月29日在老震区以东的巨鹿北发生了6级地震。邢台地区的5次地震波及了石家庄、衡水、邯郸、保定、沧州6个地区，80个县市、1639个乡镇、17633个村庄，造成8064人死亡，38451人受伤，倒塌房屋508万余间。

3月10日，刘志坚、陈亚丁接到通知再度来到上海，江青让他们看了毛泽东对《座谈会纪要》的修改。

此前，毛泽东在3月上旬对《座谈会纪要》**作了3次修改，亲笔改动了11处。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毛泽东还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此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又对《座谈会纪要》进行了修改。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电话事件”，情况是这样的：

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与许立群、胡绳谈话，询问《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是指谁？另外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

3月11日，在杨永直返沪之前，许立群在电话里转告了彭真的文字答复，内容如下：

许：杨永直问，你那个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谁像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地将电话内容转告给毛泽东。

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3月11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7天至10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5、7、10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上，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者），在超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产品，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的但是稳步的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余是小计委负责人，林是成员——笔者注）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70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7天至10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毛泽东 1966年3月12日

3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和医务工作者谈话中说：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院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没有吃苦，应该锻炼。有的人是不赶不下去的，有的人是赶还不下去。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3月15日，江青将再次修改后的《座谈会纪要》送给毛泽东。

3月17日晨，**毛泽东在《座谈会纪要》的标题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这样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还在《座谈会纪要》上的批示中写道：

江青：

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 1966年3月17日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还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邓小平以在西北视察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它问题也可以谈。”

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后，明确地说：

“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什么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同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毛泽东说：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

“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在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时，毛泽东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在讨论其它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在《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下发前，田家英身为一个贴身秘书，为发泄私愤，竟然擅自删除了其中的部分重要内容，可谓胆大之极。他的理由“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时人和后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田家英的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封建时代专了权的宦官。那些变了态的宦官利用近臣的身份，常常将愚昧无能的皇帝把玩于股掌之上。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想必自命不凡而又长期周旋于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田秘书不会不知道吧？！

另：关于中共中央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事，斯诺在他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的报道中是这样分析的：“**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第二个问题是同第一个问题密切联系的，即**刘少奇妄图提出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的问题**。从1965年起，美国对北越的进攻，出现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危险。**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196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目的是恢复中苏联盟。**”斯诺的这一番话，尽管可以说是一家之言，但其毕竟不失为一个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46章**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

**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

**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

话说1966年3月19日，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给林彪的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4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4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5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5年、10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1958年研究历史的方法。”**

林彪说：

“这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

“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林彪说：

“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泽东说：

“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他指着《红旗》杂志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接着说：

“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关于尹达的文章，《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4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3封信。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

再说毛泽东在会议上接着说：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林彪说：

“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毛泽东说：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说：

“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毛泽东说：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插话说：

“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说：

“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说：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插话说：

“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毛泽东说：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工业体制问题，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插话说：

“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80万、家属也是80万。”

毛泽东说：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我们这个国家是20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插话说：

“要搞机械化。”

毛泽东说：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4、5、6、7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说：

“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毛泽东说：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插话说：

“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毛泽东说：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说：

“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毛泽东说：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3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说：

“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毛泽东说：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10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插话说：

“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

林彪说：

“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毛泽东说：

“这好像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说：

“小钢厂有4000个，给中央统光了。”

毛泽东说：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说：

“明年搞个办法。”

毛泽东说：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说：

“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毛泽东说：

“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说：

“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毛泽东说：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说：

“中央也无权呀！”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说：

“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说：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说：

“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说：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说：

“这些人只想专政。”

毛泽东说：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在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前，还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批评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从会议厅出来，对周恩来说：

“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说：

“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西泠饭店，又和彭真讲了此事，彭真也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毛泽东在杭州开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没有回北京，而是去了武汉。

3月22日，林彪在上海接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座谈会纪要》大字排版本，知道已经毛泽东亲自改定，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当然双手赞成，一字不改，就批给了军委常委们。林彪让刘志坚、陈亚丁替他起草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亲自3次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7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3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二十三大”的公报。

3月25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年仅54岁因病去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艾思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著的中心位置上。

3月28和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赵毅敏、魏文伯进行了多次谈话。

其间，康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少奇的情况：前些日子，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来到中国访问。日本共产党担心美国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要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刘少奇等人对此十分热心。他们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后，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在联合公报上，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评苏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毛泽东听后很生气，他说：

“**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

康生又说：

“彭真在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

“**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又说：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并要求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他还说：

**“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他还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上的两个杂文专栏。而《三家村札记》是由《前线》杂志主编邓拓、编委廖沫沙和吴晗共同创办的专栏。三人商定：**从吴晗名字中取一个 “吴” 字，从邓拓的本名中取一个“南” 字，从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中取一个“星”字，叫作“吴南星” 作为三人共同的笔名。3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不久，邓小平带着宫本显治到了杭州，在郊外山中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安静的疗养所里，见到了毛泽东。宫本显治鞠躬刚完毕，就看到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责邓小平等人说：

“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日本人拒不同意。

3月30日这一天，林彪发给军委常委的《座谈会纪要》已经为中央军委常委们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奉命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给总书记邓小平，可邓小平也不在北京，所以就送到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手里。彭真读罢《座谈会纪要》和信件，大吃一惊，但他还得公事公办，要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座谈会纪要》，内容无非是例行公事的几句话。刘志坚不敢怠慢，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

3月31日，康生从杭州赶回北京，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立即向周恩来、彭真等人做了传达。他又向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资料，以便他在4月初向政治局传达，还要用于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的蓝本。

1966年4月1日，彭真把《座谈会纪要》和中共中央的批语，以电传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因刘少奇自3月26日至4月19日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3国，电传就没有给他发送。

毛泽东当天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日这一天，张春桥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总结了《汇报提纲》的3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4月2日，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

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还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4个人的发言材料及罗瑞卿于3月12日的检查。

4月5日，署名为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4月9日，邓小平乘飞机赶回北京。

此前，康生在北京给在陕西的邓小平打电话说：

“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书记处开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一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批评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彭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

1、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5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邓小平根据上述决定，叫列席会议的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他写的是：

“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4月10日，王力起草的一句话通知送到了杭州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他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

他还指定要陈伯达负责重新起草《通知》。

4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及中共中央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迅速转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下发文件的唯一变化是：刘志坚原来按照彭真的意思所拟出的中共中央批示，换成了刘志坚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个批示，这个新批示对《座谈会纪要》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批示中写道：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3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座谈会纪要》的核心内容是这么写的：

“**17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月11日，邓小平在北京再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陈伯达和王力一起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第2稿。康生提议说：

“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说：

“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于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修改《通知》稿。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书记处会议结束后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彭真和到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

4月14日，邓小平把重新修改后的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再送杭州。

毛泽东看了《通知》稿，仍不满意，还是以为太简单。他作了部分修改后，提议扩大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10人为成员，一共11人，在上海继续修改《通知》。

接着，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4月16日晨，廖沫沙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广播声。他后来回忆说：

“江青和一些人讲话时，动不动就说从战略上看，文化战线将会给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如何如何，用的词全是军事方面的术语。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这一点没有白学。说老实话，我对江青很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子。她到我家来住的时候，随身带的有一个皮箱，里面全是书籍，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经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许多时间来看书。这一点，应当肯定，**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从参加文艺活动的时候，就是主张文艺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她从来不演和现实斗争没有关联的戏剧和节目**。当然我后来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显，是一个丝毫都安静不下来的女人。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她当然对文化界和艺术界不满意了。从那个时候就不断地向文艺界发难和开刀，目标不完全是对准一些作家和演员的，而是对准了彭德怀和一切为翻案的中央领导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对准刘少奇和彭真这些人的。”

4月16日，中央文件11人起草小组集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去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由江青主持了文件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由此，中共中央历史上一个非同凡响的《通知》起草工作，再次开始了。

4月16日这一天，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纲》。刘少奇因出访未归而缺席。

4月17日，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写出《通知》修改稿后，由张春桥派人带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后，也派人直送张春桥，再行修改。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有什么惊人预言，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6年4月14日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文字虽然不多，却是一篇有关教育革命方面的很重要的文献。他说：“**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你看，这不是与后面将要讲到的“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对学生、学校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吗？！

**第47章**

“**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有的时候**

**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

话说1966年4月20日，昨日出访归来的刘少奇出席了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2月3、4、5、6、7，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个5人小组文件（指《二月提纲》——笔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和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4月23日，毛泽东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 1966年4月23日

4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稿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决定提交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4日这一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将中央工作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及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4个人的发言材料，还有罗瑞卿写于3月12日的检查，一同呈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4月27日，毛泽东又在江青等修改的《通知》稿上作了部分修改。

4月29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严厉地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他说：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侮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一共有76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外，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以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身份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其间，毛泽东一直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这次会议的程序和各种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毛泽东安排的。会议的情况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会前，李雪峰接到会议通知后刚到北京，叶剑英就跑来对他说：

“又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

李雪峰闻言，不由得一怔，说：

“不知道啊！”

叶剑英隐隐约约地把毛泽东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消息给他透露出来。李雪峰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彭真出问题会连累许多人的，因为他那个汇报提纲各大局都贯彻执行了呀！” 他问叶剑英：

“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

“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扩大会议开始时，彭真紧挨着李雪峰坐。李雪峰看得出来，彭真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李雪峰故意不多搭理他，而且还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会议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的讲话，集中批判了彭真、陆定一。

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批判彭真。彭真见康生、陈伯达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立刻和那些人顶起来，他要求中央对他进行审查。**刘少奇说：**

**“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大家见刘少奇说出了这样的话，都跟着指责彭真。

李雪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彭真根本没有辩护的权利，开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开口，就被康生和陈伯达顶回去了。”

中央决定，停止彭真参加会议。

**刘少奇在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谈话的时候说：**

**“彭真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我搞封锁，不讲真话。**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也说：

“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市在指挥我们。”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5月5日，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在同谢胡的谈话中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 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45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5月6日，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林彪寄来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非常兴奋。他浮想联翩，挥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当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3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2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3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产品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这封信后来以中央正式文件发往全国各地，成为**著名的“五七指示”。**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撰写的署名为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江青在文章中写道：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1961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文章最后写道：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严厉地批判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上所发表的杂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写道：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5月1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刊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

5月11日这一天，《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题目为《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对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邓拓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再说5月12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戚本禹，通知说：

“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你们，要你和陈伯达、杨成武3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戚本禹放下电话就通知了陈伯达，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

“我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你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

《戚本禹回忆录》记载了他们此次上海之行的整个过程：

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打电话催戚本禹和陈伯达出发。戚本禹、陈伯达坐车来到机场，与杨成武会合。他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戚本禹心里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现在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3小时左右，杨成武一行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泽东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泽东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发给了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要他们先看看这些文件。

毛泽东也是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不久。大概清晨7点左右，陈伯达一行到了毛泽东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此时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但他事先有交代，说陈伯达3人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护士长吴旭君请陈伯达等人在客厅里先坐下，转身去叫毛泽东。

这间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3人沙发，在沙发的两侧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戚本禹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戚本禹想，你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你坐椅子呢？一番推让，最后还是戚本禹坐了椅子。

不一会儿，毛泽东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了。他通常都是晚上工作，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他和陈伯达3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对戚本禹说：

“好久不见了。”

入座后，毛泽东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戚本禹坐在他身边。此时，江青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戚本禹马上起身让座，请她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以手示意，要戚本禹还坐在他边上。江青在3人沙发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戚本禹叙述至此，在《回忆录》中加写了一段话，他说：“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接着，戚本禹记载了毛泽东会见他们的情形和谈话内容：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来了早餐。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毛泽东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

“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他问陈伯达等人看了文件有什么意见？陈伯达首先发言说：

“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杨成武说：

“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

“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

杨成武接着说：

“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

毛泽东听了，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杨成武回答说：

“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戚本禹开始发言，他从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说起：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 “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戚本禹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毛泽东插话说：

“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

戚本禹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时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他在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他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他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他复述的战士的话，问道：

“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

戚本禹说，这个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毛泽东说：

“**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老残游记》上也讲 ‘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说：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泽东说：

“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戚本禹说：

“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这次谈话，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他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毛泽东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这次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让陈伯达3人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毛泽东那儿出来，陈伯达3人就入住到锦江饭店。吃过午饭，他们3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和文件，对毛泽东的批示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5月14日，毛泽东的回批就下来了，说陈伯达他们写的东西可用，让他们当天上午带回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

戚本禹叙述了这件事后，还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就在5月1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林杰撰写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一文。文章中写道：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1962年2月22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1962年7月25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作《专治“健忘症”》的杂文。”“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了，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欢喜有人愁。物极必反尔可知？自作孽时祸临头！

欲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情况怎样？请看本传第九卷：玉宇澄清。

东方翁曰：关于党内在文化战线上发生的那些斗争的起因，叶永烈曾经引用过史学家黎澎的一段话。黎澎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她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黎澎的这些话，是针对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在文化艺术上的不同立场和观念而说的，无非是要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党内的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永烈似乎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况看，如果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话，那么可以说，江青的《座谈会纪要》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颗重要信号弹，而后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则无疑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大决战的宣言书，从而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